

WORLD

崔可夫



崔可夫 著

亲历记

世界大战史研究会★国防大学出版社★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

# 崔可夫亲历记

## 第一章 血 城

背后是斯大林格勒  
艰苦的防御战  
我们已没有退路  
德军的进攻势头终于被顶住了  
反复厮杀于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  
德军再次猛攻  
鲍卢斯好梦难成  
不惜一切代价  
疲倦的胜利

关于法西斯德国背信弃义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消息，我是在中国的重庆听到的。当时国民党中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蒋介石正在重庆。我在那里曾身兼二职：蒋介石的首席军事顾问和驻中国武官。

我动身去中国任职时，战争已经席卷整个西欧。波兰、丹麦、挪威、比利时、荷兰、法国相继失陷。法西斯德国入侵英国的危机已经形成，法西斯空军对英国和平城市进行狂轰滥炸。英国的空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伦敦燃起了熊熊大火，考文持里市被夷成一片废墟。

战后我们从搞到的关于希特勒的档案材料中得知，早在1940年秋季希特勒就打消了强渡英吉利海峡的想法。这显然是政治上的考虑，影响到战略、战术上的决心。

英国自从他的远征军历尽艰险撤出敦刻尔克之后，危难的处境得到明显的好转。德国的空袭没有使英国人民屈服。英国的空军力量已经赶上了德国。美国商船队源源不断地将飞机运往英国。美国工业已经转为（尽管缓慢）生产各种武器装备。

在远东，军国主义的日本已伺机掠夺原料和争夺市场与势力范围。

当时我在中国工作。我那时的任务是：一、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这时日本已经侵占了中国的主要工业中心和沿海港口）；二是顺便查明日本对于太平洋问题的立场。由于日本顽固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它必将继续扩大侵略范围。但是矛头将指向哪里？当时还不得而知。

苏联政府和苏联外交政策曾尽一切可能来避免战争，这乃是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

为了完成我国军队的改装工作，我们原需要赢得一至两年的时间。

我们的航空工业已经试制出好几种性能超过德国的飞机。这些飞机在当时已经能够成批生产。红军里已经组建了机械化军。我国的工业已经具备了成批生产T—34型和KB型坦克的能力，这两种坦克的战斗性能当时都优越于德国坦克。新型的步兵武器也开始大批生产。

这时希特勒还玩弄了一个狡猾的政治把戏。他利用各种渠道，通过个别人物从中斡旋，不断地探测英国的立场：英国政府会不会讲和？德国一旦袭击苏联，英德关系会不会出现松动？

希特勒终于决定入侵苏联，遂使德国陷于两线作战的地位。当初是不是曾有过一种设想，即德国一旦进攻苏联，英德之间将会靖和？依我看从德国方面起码有过类似的试探。

战争终于爆发了。

当时我正在中国，心情是沉重的。真是身居国外，心向祖国，心中一直惦念着那些捍卫祖国的同志们，可是我在中国的任务当时还没有结束。

1941年夏季前线情况已十分严重。明斯克夫陷，敌人夺占斯摩棱斯克后，正向莫斯科进犯，列宁格勒被围，基辅失守。

这时出现了日本进犯我国的危险。日本军国主义者完全可能趁我危难之时，从背后进攻我远东地区。不过后来秋季恰恰出现了日本南下的征候，日本可能把矛头指向美国。

我们不断地向莫斯科递送这方面的情报。可是单凭我们提供的情报，是不可能影响战略行动的。因为轻易松动远东，背后就可能挨打，这样冒风险太大。不过入秋后已确实察明，日本真的在准备袭击美国。当时莫斯科战事正在吃紧，这样一来，最高统帅部就能够下决心从远东调回几个师。

不久日本偷袭珍珠港。德国和意大利对美国宣战。

1942年3月初我回到莫斯科。在此地，1918年在莫斯科红军第一教官训练队里，最后形成了我的终生志向。

二十多年过去了。1942年3月我从遥远的中国返回，见到莫斯科戒备森严，枕戈待旦，战备程度不亚当年。因为莫斯科会战中希特勒军队虽被粉碎并被击退100—250公里，但战局仍旧十分紧张。莫斯科上空挂起拦阻气球，高炮部队处于戒备状态，敌人的轰炸机留下的弹坑仍然可见。莫斯科居民的表现，严肃而紧张，他们挂念着祖国的命运。

“请让我快去前线！”我在中国完成任务，回国述职之后，便迫切要求去前线。

我这种心情并非一时的冲动。国内战争时期我还是一名青年红军指挥员，年轻好胜。可是今日不同，我已经是42岁的人了，曾身负重伤，指挥过大兵团作战，在苏芬战争中指挥过一个集团军，被授予中将军衔。我今日心情迫切，是想快些与法西斯强盗交手，为战胜希特勒军队尽我所能，不遗余力。

战争已经进行了11个月。在这期间发生的一桩大事就是法西斯军队在莫斯科近郊被粉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以来，希特勒分子们还是第一次受到如此重大的损失。对苏联实施“闪击战”的计划破产了。德军损失了经验丰富的基干官兵队伍（特别是那些作战精干的坦克兵和飞行员）。希特勒的战略已经碰壁，他们面临着一场持久的战争。

苏联本来应该尽早组建和训练新的战略预备队，可是这件工作从1942年春季才开始，因为这项工作需要时间，而且在短期内是极难完成的。1941年敌占区居民的数量已占全国人口的40%，而且有数千个曾为红军提供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的工厂企业被丢在敌占区。不过年迁到祖国腹地的工厂已经弥补了丢失的生产能力，并且还大幅度地超过了原有的生产能力。

由于苏联人民忘我的劳动，1942年上半年武器、弹药和技术兵器的生产情况大有改观。1941年下半年的生产能力是：步枪（包括步骑枪）—157万支；120毫米迫击炮—2315门；各型坦克4849辆；作战飞机—8200架。可是到了1942年上半年，只经过6个月的时间，生产情况是：步枪（包括步骑枪）—194万支；120毫米迫击炮—1万门；各型坦克—1万辆；作战飞机—8268架。

从1942年5月份起航空兵集团军开始编入各方面军，这一编制适应了战

争的要求。混编的坦克集团军以及坦克军原来属于最高统帅部于备队，后来由于客观情况的需要，不断用来加强主要方向上作战的方面军。

可是这时候盟国（英国和美国）统治集团对于 1942 年夏季苏德战场局势又是如何估计的呢？他们是如何履行盟国义务的呢？

当着法西斯集团武装力量 80% 都投在苏联战场上的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军事首脑则采取了袖手旁观、隔岸观火的态度，准备把他们的武装力量使用在一些次要的战场。到 1942 年夏季，英美两国，都已拥有上千万人的军队，并编有大量的装甲部队和强大的海、空军。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坚决要求英国和美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英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曾承诺 1942 年在西欧开辟军二战场。可是这一诺言完全是为了缓和社会舆论，同时由于英美两国人民也迫切要求本国政府积极援助苏联，因此这一诺言也是为了愚弄本国人民。我们的盟国也深知，德国军队以及被德军占领的西欧国家的军队源源不断地开往苏德战场，而这些军队都是从西线调去的。凯特尔上将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942 年 5 月 1 日在东线还下列 31.8 万人，因此，曾有入提议，在 5 月份把 24 万人调往东线。在 5 至 9 月间适龄应征的青年尚可动员 96 万人。可是一到 9 月份被征调的就所剩无几了”。于是希特勒不得不采取极端的措施，以弥补德军在苏德战场所受的损失。他把 18 岁到 45 岁的德国人统统征调入伍，甚至开始征集 46 岁至 55 岁的成人。

苏德战场上敌人除需要补充人员外，还需要补充武器装备，需要扩大军工生产，特别是重型武器的生产。1942 年比 1941 年增长情况是：坦克、自行火炮和强击炮由 3806 增至 6189 个单位；迫击炮由 4230 门增至 9780 门；作战飞机由 9540 架增至 11408 架；强击机由 3660 架增至 6000 架。

此外，尽管美国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可是美国垄断集团还继续向德国提供战略原料。即使到了 1942 年德国还通过西班牙接受美国提供的 40.6 万吨粮食、22.7 万吨煤和焦碳、17 万吨燃料和 1500 吨橡胶。

由于上述原因，也由于我们盟国消极的参战态度，使得法西斯集团在 1942 年春集中 600 多万军队、约 5.7 万门火炮、3000 余辆坦克和 3500 架飞机来对付苏联。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希特勒当时发动战争的时候，也未曾有过这么多的军队。

不错，敌人在这次行动中进攻地带缩小了，所有能用来再次发动进攻的兵力都集中在苏德战场南翼，并进一步扩大了向北推进的地带。

希特勒着手进军高加索，目的是掠夺石油产地并进而逼近伊朗边界和伏尔加河。希特勒大概还认为在我国边远地区，苏军的抵抗不会那样顽强有力。

我在这本书中当然不打算全面描述 1942 年春季前线上的所有事件。不过，在谈到斯大林格勒会战时，我则不得不概略地涉及到法西斯指挥部的作战意图。因为这有助于读者全面了解伏尔加河地区战事的意义。

有关希特勒军政首脑的作战意图，在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 1942 年 4 月 5 日第 41 号训令中有所阐述，并且在 6 月份的第 44 号和第 45 号训令中又有具体的说明。

现在介绍一下第 41 号训令的内容。

训令开始是这样写的：“在俄国，冬季战局即将结束。由于东线我军士兵勇敢善战不怕牺牲，我防御作战已取得重大战果，敌人的武器和人员遭受重大损失，敌人自以为初战取胜。为利用所谓战果，在冬季就把本来准备用

于下次战役的大部预备兵员消耗殆尽。”

我们可以看到，德军指挥部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我军的力量，并把他们在莫斯科近郊遭到的失败当成了所谓的胜利。希特勒对我军力量估计不足，却过高地估计了他们自己的力量。

他们究竟抱定的目的是什么？训令中说，“要彻底消灭苏维埃国家尚能保存的力量，尽量夺占他们的军事、经济中心……首先应集中我们现有的全部力量在战线南段实施主要战役，以消灭顿河以西之敌，进而夺占高加索的石油产地，并越过高加索山脉。”

希特勒已着手突击刻赤地区，强攻塞瓦斯托波尔，以巨大的代价攻占了克里木，并组织侧翼的部队向高加索和伏尔加河进攻。

塞瓦斯托波尔的保卫战一直坚持到7月初。法西斯强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发动多次强攻才拿下该城。

西南方面军的部队于1942年5月12日转入进攻。该方面军沿着向心方向实施两个突击：一个从西南方向巴尔温科夫突出部实施，迂回哈尔科夫；另一个辅助突击从沃尔昌斯克实施。

有关西南方面军的这次进攻，在许多苏联著名军事首长的历史著作和回忆录中都有广泛的叙述。我在这里无需赘述和多加评论。众所周知，西南方面军的这次进攻不幸遭到惨败。在我西南方面军转入进攻之前，敌人原也是处于进攻的态势。希特勒对于伏尔加河、沃罗涅日和高加索的进攻也早就准备妥当。德军成功地利用了当时的态势，这使得敌人在突破我军的防御后能够继续向纵深和两翼扩张。

希特勒的原一位将军库尔特·蒂佩尔斯希曾写道：“德军的进攻是预先经过充分准备的。俄国人企图阻止这次进攻，正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我们并不希望俄国人不战而退。俄国人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实力就会受到削弱（当然这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对于我们的初期作战，是极为有利的。不过，这需要进行充分的准备，发起进攻之前需要变更部署，补充各类必需品。这中间整整占去了几乎一个月的时间。”

6月底，希特勒指挥部完成了进攻的准备。

如今我们得知，在苏德战场南翼（大致从奥廖尔到塞瓦斯托波尔）作战的敌人是“南方”集团军群。

该集团军群现已一分为二，分编为A集团军群和B集团军群。这两个集团军群的任务是粉碎顿河以西的苏联军队。

具体要求是，B集团军群必须合围顿河以西的苏军，进而与A集团军群在斯大林格勒地域会师。

这两个集团军群的编制，开始时是这样的：

A集团军群（李斯特元帅指挥）编有坦克第1集团军，第17、第11野战集团军，还有意大利第8集团军。

B集团军群（冯·弗·鲍克指挥）编有坦克第4集团军，第2、第6野战集团军以及匈牙利集团军。此外，还有从纵深开来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敌人的飞机和火炮占优势，并能不断地增强主要突击方向上的兵力。

6月28日晨，德国第之野战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以及匈牙利第2集团军转入进攻，矛头指向布良斯克方面军左翼。

6月30日德国第6集团军开始实施突击。

当然德寇距离斯大林格勒尚且遥远，他们正向沃罗涅日疾进。可是1942年的交战已经开始了，它像一台淌着鲜血的磨碎机，正把一批批的军队投入磨口。

1942年5月我被任命为预备队集团军的副司令员。该集团军当时驻扎在土拉，还没有正式任命司令员。因此，集团军的全部重担便落到了我的身上。7月初，大本营下达命令，将我集团军命名为64集团军，并由土拉调至顿河。此时，我西南方面军正处于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压迫之下，逐步向东撤退，我集团军正面临着一场与法西斯强盗进行的苦战，地点可能在顿河地区，也可能在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的某一地区。

我集团军各部队准备沿铁路机动，登上列车后，径直地向伏尔加河、顿河之间的集中地域开进。

在去巴拉朔夫的路上，我带领集团军司令部乘坐火车。后来，为了尽快地了解前线情况和尽快同前线官兵面谈，到巴拉朔夫后，我同军委委员康斯坦丁·吉里科维奇·阿布拉莫夫都改乘小汽车，我们终于赶过了火车。

为了掌握集团军各列车的运行情况、我们凡是经过大站，都要把小汽车停下来，去看一看。法西斯的轰炸机对运行的列车和车站接连不断地进行空袭。

我们在弗罗洛沃火车站遇到了第21集团军司令部。参谋长对我们十分热情，但却无法向我们介绍战场情况。我们了解的只有一点，就是方面军司令部现正在伏尔加河，在斯大林格勒。

第62集团军在顿河右岸的克列次卡亚、卡耳梅科沃、苏罗维基诺、佩歇尔斯卡亚、苏于洛夫斯基一线组织防御。司令部设在顿河左岸卡梅什村，距离部队60—80公里。

这时，第64集团军的部队开始在沿站下车。

第112师在科特卢班、卡恰利诺、菲罗诺沃下车；第214师在顿斯卡亚、木兹加、雷契科夫下车；第29师在茹托夫下车；其余的部队在伏尔加河沿岸下车，距离方面军指定的防御地区120—150公里。

7月17日我们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员的训令：

“第64集团军辖步兵第229、第214、第29和第112师，第66和第154陆战旅，坦克第40和第137旅，应于7月18日夜晚进到苏罗维基诺、下索洛诺夫斯基、佩歇尔斯基、苏沃罗夫斯基、波捷姆全斯卡亚、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一线，组织防御以顽强的战斗阻止敌人向斯大林格勒进犯。同时每个师应派出一个团的兵力，并配属有炮兵，组成前进支队，配置于齐姆梁河地区……”

训令中规定的任务显然是无法完成的。因为集团军各师和各直属部队刚刚从列车上卸载下来，下车后向西、向顿河开进时，还没来得及编成行军队形，而仍然保持着沿铁路运行时的序列。有的师，先头部队已经接近顿河，而队尾还在伏尔加河河岸，甚至有的还没有下火车。集团军的后勤部队和作战物资还留在土拉地域，等待车皮，处于待运状态。

集团军各部队下车后不但需要收拢，而且还要徒步行军120—150公里，然后还要渡过顿。此外，集团军前进支队的防线规定在齐姆梁河沿岸，距离集团军的基本防御地区足有40—50公里。

我到方面军司令部主找方面军作战部长鲁赫勒，向他报告，我们不能在

规定的期限内完成任务，并请求他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第 64 集团军只能在 7 月 23 日占领防御地区，时间无法提前。

后来方面军把期限由 7 月 19 日改为 7 月 21 日。

可是到了 7 月 21 日我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还是未能按方面军司令部指定的地区占领防御地域。

我集团军有的部队还是刚刚下火车，正在朝着顿河沿草原向西开进。为了收拢这些部队，我顺便来到了 62 集团军司令部。

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是科尔帕克奇中将，他身材魁梧、匀称。军事委员会委员古洛夫，留着一撮黑黑的山羊胡子，脑袋剃得明光晶亮。他俩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的防御地带由方面军司令部选择于下列地区：克列次卡亚、苏罗维基诺、上索洛诺夫斯基、苏沃洛夫斯基、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

根据我军条令和各种教范规定，防御者首先应判断敌情、地形并利用最有利的态势部署自己的兵力。对敌情和地形的判断乃是定下战斗决心的基础。防御者总是更依赖于地形：依托有利地形实施反冲击，根据地形配置各类兵器，利用地形进行伪装。

此外，地形的选择还应尽量有利于迟滞进攻者开进和机动。地形经过工程改造能使坦克难以通行，可以制止进攻者隐蔽地向前接近，在较远的距离上就受到火力杀伤。

可是，对于第 62 集团军防御地区的选择，却没有考虑上述要求。部队没有来得及充分利用大小河川以及深沟峡谷。其实这些天然障碍稍加改造即可成为敌人难以逾越的障碍，可惜该集团军的防御工事却构筑在光秃秃的草原上，阵地十分暴露。而且进行防御的各分队之间和各部队之间存在着许多间隙，特别是在战线南翼，情况更为严重，敌人可利用这些间隙迂回我防御阵地并插到我军侧后。

顿河以西的我军防御正面十分宽大：第 62 集团军第一梯队的 4 个师的防御正面为 90 公里；第 64 集团军两个师和一个旅的防御正面为 50 公里；特别是右翼的步兵第 192 师防御正面拉得更长。同时，第一梯队各师当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的兵力被编为前进支队，派到距离主力 40—50 公里的地方，既没有炮火支援，也没有航空兵支援。这样一来，主要防御地带的力量大大削弱，同时第一梯队各师的预备队和第二梯队的兵力被缩减到了最低限度。

不过，第 62 集团军司令部里，大家的思想情绪还是满高的。司令员科尔帕克奇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他在最近几天要设法摸一摸当面敌人的实力。

就这样，我们同右邻取得了联系，可是对左邻的情况还一无所知。只知道与左邻的分界线，这还是在方面军司令部里从地图上看到的。

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为了执行方面军的训令，正在向西挺进，以便渡过顿河。

这时戈尔多夫被任命为我集团军司令员，可是眼下还没有到职，因此必须由我定下组织防御的决心。

当我研究了当时的情况，分析了从第 62 集团军各部队搜集到的敌情之后，根据方面军 7 月 17 日的训令当即定下决心：以两个步兵师（第 229 和第 214 师）、一个陆战旅（154 旅）、一个坦克旅（121 旅）在顿河右岸占领苏



罗维基诺至苏沃洛夫斯卡亚镇一线。集团军左翼，波捷姆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由第 29 师防守；第二梯队，步兵第 112 师在奇尔河岸（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接合部上）展开，第 66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以及数个教导团沿梅什科夫河各居民点展开。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设在伊耳缅、奇耳斯基村。

7 月 19 日傍晚，戈尔多夫来到司令部走马上任。我担任他的副职，他是中将军衔，已满头银发，褐灰色的双眼显出十分疲惫的神态。

戈尔多夫审阅了我的决心之后，对于第一梯队的部署没有进行较大的修改，签署之后，当即下令执行。不过对于第二梯队的部署则改动较大。他决定不把步兵第 112 师部署在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而是将其部署在外线，在洛哥夫斯基与格罗莫斯拉夫基之间的梅什科夫沿岸，即斯大林格勒防御地区，将第 66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旅以及军校学员教导团调至阿克赛河地区，即调至集团军左翼。

根据戈尔多夫将军的决心，集团军全部预备队将控制在顿河左岸。这样一来，集团军在顿河以西的防御不但没有第二梯队，也没有预备队。

7 月 21 日晨，我乘车来到顿河以西的防御地区，在那里会同各师师长用了两天的时间（21 日和 22 日）进行了现地勘察并选足了防御阵地。这时，各师、团已经从卸载车站出发，正在行军途中，大部没有按时到达阵地，而且建制都很不完整。

近日来集团军各兵团和部队进行防御地区的行动无疑已被敌人发现。敌人的“福克式”侦察机总是在我军阵地上空盘旋，而我们则无法对付，因为集团军内这时还没有高射炮兵，方面军所辖的航空兵集团军的歼击机还正在方面军的其它地段上执行任务。

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开始时间，通常是从 1942 年 7 月 17 日第 62 和 64 集团军前进支队与敌人接火算起。我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可惜只坚持到 7 月 19 日，因为希特勒的大批军队赶到，克服了我军的抵抗，开始向顿河大弯曲部进犯。

现在我们搞到一份文件，文件中透露了敌人当时实施这次突击的目的。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第 45 号训令中，涉及到这个问题。这份训令是由第 40 号训令经希特勒进行某些修改之后写成的。

第 41 号训令中说：

“无论如何要力争进至斯大林格勒，万不得已时也要将该城毁于我重型武器的轰击之下，使该城失去军事工业中心和交通枢纽的价值。”

1942 年 7 月 23 日的第 45 号训令中写道：

“A 集团军群的当前任务是合围并歼灭撤过顿河的罗斯托夫以南和东南地域的敌人军队……。

B 集团军群的任务是，正如过去曾指出的。一方面在顿河沿岸构筑防御阵地，另一方面对斯大林格勒实施突击。粉碎集中在那里的敌人集团，攻占该城，进而截断顿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切断敌人沿河流的运输。”

希特勒急于尽快进犯高加索，因此对于我军几个新锐的集团军在顿河大弯曲部的出现，竟未引起重视。于是把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通过鲍卢斯的第 6 集团军战斗队形调到右翼，靠近齐姆梁镇，并把坦克第 4 集团军编入 A 集团军群的序列。

为了夺占斯大林格勒，敌人从鲍卢斯的第 6 集团军中抽出部队组成南、

北两个突击集团：

北突击集团，编有坦克第 14 军和步兵第 8 军，任务是：从 7 月 23 日开始由哥洛夫斯基、波烈拉佐夫斯基地域出发，沿顿河右岸向上布济诺夫卡、小纳巴托夫斯基方向实施进攻并派出部队夺占卡拉奇。

南突击集团，编有步兵第 51 军和坦克第 24 军，任务是：从 7 月 25 日开始，由沃利夫斯卡亚、上河克谢诺夫斯基地域出发，突破苏罗维基诺以南的防线，经过旧马克西莫夫斯卡亚从南面迂回到卡拉奇。

这两个突击集团并不脱离第 6 集团军的建制。其共同的任务是合围并歼灭顿河大弯曲部的苏军主力，尔后渡过顿河向斯大林格勒实施进攻。

此外，德军还建立了第三个集团。该集团编有坦克第 4 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师，另外，还有罗马尼亚的 4 个步兵师。其任务是：于 7 月 30 日强渡顿河，夺占登陆场，准备由西面沿科帕耳尼科沃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和由南面进攻斯大林格勒，或者向南面进攻高加索。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德国法西斯军队特别是南突击集团的主要矛头是指向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仓促构筑的防御地区。我前面说过，敌人已经接连不断地进行了空中侦察，不会不发现我军的行军纵队，也不会看不到我军的展开和进行防御作业的情况。就是说，敌人对于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地段上我军的已经了如指掌。

关于这个仗要打多大规模，其结局将是如何，我们当时并不了解。因为我们还不了解战略和战术的全貌，我们只能顾及到自己防御地段当前应当执行的任务。

至于如何与德国法西斯军队打这第一仗，我心中还没有底，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支强大而有战斗经验的敌人军队。我们当前首先必须研究敌人的战术，找出他们的强点和弱点。

我找了许多曾经与敌人打过仗的指挥员，同他们交谈。我尽量多接触部队，向有经验的指挥员学习，尽量吸取红军战士们的作战经验。

7 月 22 日我返回集团军司令部，得知戈尔多夫曾被召到莫斯科，当他从莫斯科返回时，已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司令员。

我在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接到命令，令我把第 66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旅调至顿河右岸，靠近齐姆梁斯卡亚镇。这两个旅的任务是：实施侧后突击，歼灭正在渡过顿河的敌人军队集团。两个旅遵照戈尔多夫的命令，于 7 月 22 日夜集中集中在苏沃洛夫斯卡亚镇。但是坦克第 137 旅的重型和中型坦克却无法渡河，因为下奇尔斯卡亚大桥的载重负荷不够，坦克无法通行。该旅只把一个摩托化营配属 15 辆 T—60 型轻型坦克编入陆战旅渡过河去。

后来得知，进至齐姆梁斯卡亚的敌人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军队集团，而当方面军司令部签署上述命令时，对这个敌情却还不甚了解。

我当初就反对分散兵力，可是戈尔多夫却不肯收回成命，于是我不得不乘 Y—Z 型飞机飞往苏沃洛夫斯基督导这个命令的执行情况。

7 月 23 日 10 时我们来到苏沃洛夫斯卡亚镇，当返回的时候，我决定乘飞机沿集团军的防线飞一趟，从空中观察一下我军的阵地。

在苏罗维基诺东南，我们与敌人的一架“容克”—88 飞机遭遇，敌机作了一个战斗转弯，当即向我们冲过来。

法西斯强盗向我们接连冲了十来次。我们的 Y—Z 飞机上没有装备任何武器，而敌人的“容克”式飞机却装有机枪和火炮，双方的力量实在是太悬殊。

敌机又连续向我们冲击。这样下去，我们的飞机定会被敌机的枪炮火力所击毁，可是又不能光秃秃的草原上着陆，因为着陆后不能隐蔽，会成为敌机的固定靶子，毁于敌炮火之下。

我们的飞行员以太阳为方位，急速向东飞行，打算找一个小村子或小树林，下去躲避一下，可是草原上一片荒芜。我也记不得敌机向我们冲了多少次，只觉得我们的飞机一下子坠落在地上摔碎了。

当飞机临落地的时候，我们作了些应急的动作。因此我和飞行员被摔得并不十分严重，我们都被摔出了座舱。我的前额被碰了一个大包，胸前和脊背感到十分疼痛，飞行员双膝流出了鲜血。

敌机的飞行员见我们的飞机冒起了烟，以为我们都丧了命，于是转了一个圈子，便向西飞去，在地平线上消失了。

不久，第 62 集团军作战部的一位参谋谢米阔夫大尉在草原上发现了我们，并把我们的汽车拉我们闯出了危险区。谢米阔夫后来荣获苏联英雄称号。

敌人北突击集团于 7 月 22 日晚间到达第 62 集团军的主要防御阵地前。这是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集团。此时，第 62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已经与敌人展开了顽强的战斗。

第 62 集团军右翼部队在克列次卡亚、叶夫斯特检托夫斯基、卡耳梅利夫地区进行的防御也被敌人突破。敌人投入新锐的兵力之后，开始向马诺伊林和迈奥洛夫斯基发展突击，并经由普拉托诺夫向上布济诺夫卡进犯。到 24 日日终前，敌人摩托化第 3 和第 60 师的先头部队已经进至顿河流域的戈卢宾斯卡亚地域和斯克沃林地区。

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帕克奇考虑了当时的情况，于 7 月 24 日晨 5 时决定以坦克第 13 军和近卫步兵第 33 师的部队实施反突击，以便恢复近卫步兵第 33 师的态势，进而稳定集团军整个右翼的防御反突击规定在上午 10 时，反突击的准备时间只剩下了 5 个小时。面对当前这股数倍于我的敌人，第 62 集团军反突击的决心可以算是大胆而果断的。

此时我第 64 集团军各部队虽然遵照方面军规定的地点进入了防御地区，但部队大都没有到齐。只有比留阔夫指挥的步兵第 214 师和斯米尔上校指挥的 154 陆战旅的情况较好。他们的部队已全部集中完毕，并且争取了几乎三昼夜的时间组织防御。可是萨润上校指挥的步兵第 229 师仍然还在向防御地区的开进途中第 66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旅正遵照方面军的命令从苏沃洛夫斯基出发向齐姆梁斯卡亚运动之中，根据我们的估算，此时已经陷于敌人的侧击之下。

当得知敌人已开始向第 62 集团军的防御正面实施进攻之后。我坚决请求方面军司令员允许将第 66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旅调回原阵地。戈尔多夫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这两个旅于 7 月 24 日又返回下齐尔斯卡亚。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以及斯大林本人都要求尽快阻止住敌人的进攻并把敌人赶过奇尔河。

1942 年 7 月 25 日是我在卫国战争中首次参加战斗。

战斗是从早晨开始的。

战斗整整进行了 3 天。当然 3 天算不上漫长的时间，但是，这 3 天对于我这个刚刚奔赴前线的人来说，各方面都是十分重要的第 64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不得不向后撤退，不过初战的失利并没有使我们丧失信心。我相信。迟早

有一天，那些妄自尊大的德国将军们会尝到苏联红军奉送给他们的一杯失败的苦酒。

敌人之所以曾取得一点战果，多半是因为他们占了先发制人的便宜。当他们开始进攻时，我集团军师、团两级还没有收拢完毕。假如我们当初能争取2—3昼夜的时间组织防御，收拢团营（包括炮兵营）两级兵力，构筑工事，组织火力协同和通信联络，补给弹药并组织正常供应，那么敌人是不会轻而易举地突破我第64集团军防御正面的。

当德寇对步兵第229师防御地段实施炮火准备时，我仔细观察，发现他们在战术上存在不少弱点：炮兵在进行袭击时火力比较分散，而且只打前沿，不能向纵深延伸火力，同时在进攻过程中也没有广泛进行火力机动。

回想当年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时，我研究过德国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西线进行的多次战役，曾了解到德国将军们（例如贝尔加登）对炮兵在未来战争中作用的观点。因此，在顿河地区作战的头几天我想敌人肯定会按照传统的方法进行火力协同，组织精确的火力急袭，实施急速的火力和火器的机动。可是在这次战斗中却没有出现这些特点。我当面的敌人采取陈规旧套，慢腾腾地逐个地“啃”堑壕。

假如这时我们的防御是大纵深配置的（不是5个营，而是9个营），并且掌握有反坦克预备队，那么就不但可以阻止住敌人的进攻，而且还可以给敌人造成重大伤亡。

德寇的坦克实施进攻每次都离不开步兵配合和航空兵支援。外国报刊经常报导德国坦克如何英勇善战，行动如何果断迅速，可是这次在战场上我却看不到这些。

德寇步兵的自动枪火力确实很强，可是在战场上却未见到他们表现出行动迅速和果敢冲击的精神。

他们在进攻时确实不吝惜子弹，可是却常常毫无目的地乱打枪。

7月27日当步兵第112师向新马克西莫夫斯基农庄实施反冲击时，敌人的步兵根本没有进行抵抗就仓促后撤了。直到次日（7月28日）敌坦克部队赶来增援，才开始争夺昨日放弃的阵地。

德寇的前沿很暴露，特别是在夜间，他们不断打曳光弹和各色信号弹，看得十分清楚。这可能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也可能是为了消遣解闷。

德寇沿草原机动时，摩托化纵队里的汽车前灯全部打开，因此我们观察得很清楚。

敌人航空兵在战斗中动作十分精确，航空兵同地面部队的通信联络和协同动作也都训练有素。使人感到，德寇飞行人员很熟悉敌我双方地面部队的战术动作。

只要敌人的步兵一旦被我炮火和步、机枪火力压制住，他们的飞机就会立即在上空出现，俯冲的轰炸机组成环形，对我军战斗队形和炮兵阵地进行轰炸扫射。

这就是我对敌军战术所做的初步结论。

7月26日到7月底，战斗基本上是在集团军右翼进行的。具体地区是：大奥西诺夫卡、叶利斯基和上奇尔斯卡亚。在该地段上敌人曾力图在步兵第229和第112师的战斗队形中打开缺口向东北方向进犯，迂回到第62集团军侧后，直逼洛哥夫斯基地域的顿河渡口。

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在观察所，观察所设在雷赤科夫斯基铁路车站以

北的一个高地上。我同第 229 师和第 112 师师长，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络并通过司令部与其它部队保持联系。

战斗中双方各有胜负。敌人接连几天把步兵第 51 军的部队（加强有坦克）投入冲击。在个别日子里，敌人一次约出动上百辆坦克实施进攻，而我军在这一地段只有 10 辆坦克。但是我们的部队，特别是第 112 师，顶住了敌人的强攻，并巨适时转入反冲击。

就这样，战斗进行了 5 天。7 月 31 日凌晨，第 229 师和第 112 师各团在原有的 10 辆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下再次转入反冲击，并把敌人赶过了奇尔河。当日晚间，我们截获一份电报。内容是：“在苏罗维基诺渡过奇尔河的步兵第 51 军部队已被击溃。”电报是德寇的一名军官打给他的（B 突击群）司令部的，签名用的是代号——“KC”。

我第 64 集团军系新建的部队，不久前还属于预备队的建制。很多军官和士兵都是初次参加战斗。他们深知撤退的艰难，饱尝撤退的痛苦，但是他们没有动摇。初战的失利并没有使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失去信心。他们是撤退了，但是并不是溃逃。他们边打边撤，阻止着敌人的进攻，而且他们对敌人的实力并不十分摸底。我们对于自己的部队不能过于苛求。敌人兵力占很大的优势，要以我第 64 集团军当时的实力阻止住敌人的进攻，确实是十分困难的。即使如此，我集团军全体官兵还是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希特勒指挥部原企图合围并歼灭我们的部队于顿河右岸，可是这个企图被我们粉碎了。

当战斗正在顿河地区激烈进行的时候，我在观察所里接到了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科尔帕克奇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他已被免职，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已决定任命罗帕金中将为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

一天以后，第 64 集团军也更换领导人。舒米洛夫少将来到了集团军司令部，接任了集团军司令员的职务。

此时来了一道训令，训令是由方面军参谋长尼基雪夫签署的。他命令第 64 和第 62 两个集团军同时实施突击，消灭上布济诺夫卡地域的敌人集团和奇尔河地区的敌人集团，同时给第 64 集团军加强步兵第 204 师和坦克第 23 军。

这道命令是 7 月 28 日下午 2 时接到的，可是命令规定发起冲击的时间是 29 日凌晨 2 时，就是说，准备的时间只有 12 个小时。

我同舒米洛夫立即去寻找第 204 师和坦克第 23 军，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我们打电话去询问方面军司令部，得到的回答是：

“你们到顿河与利斯河之间去找找看！”

为了寻找配属给我第 64 集团军的部队，我们乘车在茫茫的大草原上整整跑了一夜。

到次日（7 月 29 日）天亮之后继续寻找，到了中午才在日依尔科夫地域找到坦克第 23 军的一个旅。旅长对情况一无所知，当然对于实施进攻也就是毫无准备。

在“十月胜利”国营农场寻找第 23 军司令部，中途我们去到设在沃洛金斯基的第 62 集团军指挥所。在那里，第 62 集团军司令员罗帕金将军接待了我们。他身体肥胖，淡黄的头发，仪表十分文静。他款待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他说，第 62 集团军无法执行方面军参谋长签署的命令，因为部队没有准备，弹药也没有运到。另外，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并没批准这个命令。

关于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为什么没有批准方面军司令部草拟的这个命令，

罗帕金谈了自己的看法：莫斯卡连柯将军和克留钦金将军指挥的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已经对敌人实施了反突击。至于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反突击应当发展坦克集团军的战果。可是坦克第1和第4集团军实施的反突击都没有阻止住敌人的进攻，也没有击溃敌人的部队。

罗帕金告诉我们坦克第1集团军处境十分危险。敌人的航空兵掌握了全部制空权。同时，克留钦金的坦克第4集团军原准备集结后渡过顿河，但是失败了。因此两个坦克集团军并没有能够同时实施反突击。

于是我不再寻找第204师和坦克第23军，决定赶回集团军司令部。

7月30日我奉戈尔多夫的指示来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为了等待方面军司令员的接见，7月31日我在斯大林格勒住了一整天。

在这些日子里，斯大林格勒实际上已经成为靠近前线的城市。但是我在哪里却感觉不到十分明显的战备气氛，这多少与该城的居民情绪有关。因为他们很难想到，这座城市即将会变成残酷的战场，也很难想到红军会阻挡不住敌人向顿河的进犯。

8月1日傍晚方面军司令员接见了我们。

我从斯大林格勒回来后得知，敌人于7月引日以众的兵力从齐姆梁斯卡亚地区出发，沿提霍尔列兹克至斯大林格勒的铁路，向科帕耳尼科沃方向实施进攻，以图迂回到第64集团军，乃至整个方面军的后方。

希特勒在顿河大弯曲部遇到顽强抵抗后，立刻重新审查了第45号训令并重新部署了兵力。他把霍特将军的坦克第4集团军从A集团军群（其矛头指向高加索）调出来转隶给B集团军群。赋予的任务是：从行进间实施突击，钳制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从南部攻占斯大林格勒城。

近日来苏联人民国防委员会1942年7月28日颁布的第227号命令已经传达到各部队。命令中极其坦率及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当前形势的复杂性和危险性。命令中说：

“敌人尽管遭受重大损失，仍把全部新锐力量调到前线，继续向苏联腹地进犯，不断侵占我广大地区，毁坏、蹂躏我广大城乡，屠杀，掠夺我苏联居民。

战斗正在沃罗涅日和顿河地区进行。在南部，在通向高加索的门户外也在进行战斗。德国占领者妄想逼近顿河与斯大林格勒并不惜任何代价夺取盛产石油和粮食的库班和北高加索。

敌人已夺占伏罗希洛夫格勒、斯塔罗别尔斯克、罗索什、库片斯克、瓦卢依基，诺沃契尔斯克、顿河的罗斯托夫以及半个沃罗涅日。自从丧失乌克兰、白俄罗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顿巴斯以及其它省份以来，我国的领土大大缩小了，因此人口、粮食、钢铁。工厂等也相应地减少。一年内我们丧失了七千多万人口、八亿多普特粮食和一千万多吨钢铁。

如今我们在人员后备和粮食储备方面已经不占优势。若再继续撤退，必将危及自己，危及我们的祖国。

今后每丧失一寸土地都会削弱我军的防御，削弱我们的祖国，而敌人则会得到加强。有人说：我们的国家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粮食年年有余；我们的国家大得很，有的是地盘，可以无限制地撤退。对于此类言论，应该加以杜绝。因为它歪曲了现实，因而也是有害的。它将瓦解我们的斗志，有利于敌人。假如我们再继续撤退，必将挨饿受冻，必将陷于没有钢铁、没有原料、没有工厂和铁路的危难处境。现在是停止撤退的时候了，再不准后撤一

步！

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口号。应当想尽办法保住苏联每一块土地，坚守每一个阵地，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

我们的祖国正处于危难时刻。我们应当站稳脚跟，而后不惜任何代价把敌人击退并将其歼灭。敌人并不像那些张皇失措的人想象得那样强大。他们已经是强弩之末。在当前和今后的数个月内如果能够经受住敌人的突击，我们就有了取胜的把握。

那么我们能不能经受住敌人的突击并进而把敌人赶回西面去呢？能够的。因为我们后方工厂的生产情况很好，前线不断得到越来越多的飞机、坦克和各种火炮。

现在我们缺少什么呢？现在缺少的是秩序和纪律，在连、营、团、师，在坦克部队，在空军部队都缺乏良好的秩序和纪律性。这正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缺陷。在我们的军队里应当建立起最严格的秩序和铁的纪律，否则我们就无法挽救危机，无法保卫我们的祖国。

8月2日早晨，第64集团军司令员舒米洛夫将军把我叫到他那里。他的房间是卧写兼作办公室。在那里我见到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全体委员。集团军参谋长报告了南部的局势以及集团军左翼的态势。

情况是严重的。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突破第51集团军的防御之后，于8月1日夺占了热蒙特纳亚并进至科帖耳尼科夫。敌人已经从南面对第64集团军左翼以及整个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形成了包围的态势。

舒米洛夫将军建议我立即赶到方面军南段了解情况，并根据情况当场采取必要的措施。他告诉我，这个决定是经过方面军司令员戈尔多夫同意的。

我急速做好准备。与我同去的还有副官科里莫夫、传令兵列沃尔德·谢多林、司机卡尤姆·卡里穆林和瓦吉姆·谢多罗阔夫，还有几名通信兵。我们分乘3辆汽车（其中一辆装无线电台），向南面开去。

在途中我顺便来到214师司令部。在那里我们见到了师长比留阔夫（我从7月24日以来还一直没有见到过他）。他向我报告了情况，该师整个防御正面上十分安静，敌人甚至没有企图渡过顿河的迹象，也没有积极地进行侦察。我觉得情况有些奇怪。

我同比留阔夫将军在于草垛旁边坐着，突然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爆炸了大约30多发炮弹。等稍微平息一点之后，我告别了比留阔夫继续向南赶路，准备到根尼拉罗夫斯基——第64集团军第29师司令部所在地。

第29师是沿着阿克赛河部署的，防御正面向南，防御地段由戈罗茨卡亚村至诺沃阿克赛斯基。该师以北是第214师沿顿河部署的防御。该师以南是配属给集团军的独立骑兵团，该团自波提金斯卡亚至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部署了防御。第29师左翼是暴露的。

我还了解到，第118筑垒地域已经展开在梅什科夫基河一带并正在组织防御。不过其位置处于侧后，在阿克赛河以北。我在第29师师长科罗布金上校那里注了一夜。8月3日早晨继续赶路，准备在上雅布洛契诺，科帕耳尼科沃方向实施侦察。临出发时，我从第29师司令部带了两个步兵班，他们分乘两辆汽车。在草原上视界良好，可以观察8—10公里。

我们乘车赶到上雅布洛契诺农庄时，看到由南面开过来两个步兵纵队，其中还有火炮。这是由留得尼阔夫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38师和库罗帕钦科上校指挥的步兵第157师。他们正在向北撤退。

这两个师均已建制不全,已经编入科洛耶亚茨少将指挥的第 51 集团军的序列。他们在齐姆梁斯卡亚和烈蒙特诺亚遭敌冲击后损失严重,又与集团军失去联系,遂决定向北撤退,直奔斯大林格勒方向。同他一起撤退的还有由集团军炮兵副司令员德米特里耶夫少将带领的两个近卫火箭炮团。

留得尼阔夫和库罗帕钦科两人对南面的情况了解甚少,简直被敌人的进攻吓昏了头脑,这一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我决定收编这两个师并把他们调在一个地方进行休整。赋予这两个师的任务是,经整顿后,撤过阿克赛河并在那里组织防御。在这两个师的后面我部署了斯米尔诺夫上校指挥的第 154 陆战旅,作为第二梯队。我把这些部队统一编成一个南部集群,并巨组成了一个临时司令部,司令部设在上库姆斯卡亚镇,任命第 51 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位参谋为该集群的参谋长。

接着我与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沟通了联系,通过作战值班员把方面军南段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汇报,但始终没有能够同第 64 集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

我从方面军司令部得到通知,在奇列科夫和科帖耳尼科沃火车站刚刚开来的西伯利亚步兵第 208 师,现有正在卸载过程中,建议我也把这个师编入自己的序列。

“该师的司令部在哪里?”我向方面军司令部询问,可是却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

8 月 4 日晨我向师长们具体交待任务,要求他们在已经占领的地段上,沿阿克赛河组织防御。然后,我们继续赶路,准备经根尼拉罗夫斯基、上雅布洛契诺向西南方向实施侦察。

在格勒米亚恰车站我们又看见不少人员和马车沿铁路线向北撤退。我在人群中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名指挥员,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个严重的情况:8 月 3 日当步兵 208 师正在科帕耳尼科沃火车站卸载时,数辆车厢遭到敌人航空兵和坦克的突然袭击。没有遭受损失的分队已沿着铁路线撤退。师长在哪里?各团团长和司令部在哪里?都没能找到。

步兵第 208 师有一个营沿涅口科夫火车站展开成散兵线,构筑了堑壕,对南面组织了防御。营长报告说,由南面撤下来的人告诉他,在科帕耳尼科帕出现了敌人的坦克,于是他便主动地组织了防御,可是他也不知道师长和团长在哪里。不过我对他组织防御的主动精神还是深表赞同。我吩咐他赶紧阻止住撤退的人员并答应他在就近的地方找到一个司令部,同他接通联系。我想,在奇列科夫火车站一定会找到一个司令部的。

我们驱车赶到火车站,看见有好几辆军用列车,这是第 208 师的另一部分部队。他们正在卸载。大概他们还不知道该师有 4 辆车厢已被敌人击毁。沿铁路路基和列车周围入群拥挤,坎烟四起,到处堆放着刚刚卸下来的辎重。

我找到一个列车指挥长,他戴少校军衔,职务是营长。我把南面的情况向他简短地做了介绍,吩咐他向涅贝科沃村附近的两个高地派出了强有力的掩护队,其余各分队赶紧撤离火车站,等待师司令部的命令。

吩咐完毕之后,我便带领身边的人来到第 1 号商品奶牛饲养场,地点在奇列科夫火车站以西两公里的地方。

在那里,我们架设好无线电台,以便与方面军司令部取得联系。

这时我们的无线电台又偏偏坏了,使我不能再同外界联系。

直到晚上我们在比留科夫斯基铁路站找到了 208 师师长沃斯博伊尼阔夫上校。我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情况:面色苍白,声音颤抖,惊恐万状。特别



使他感到震动的是，自己的部队还未与敌人交手就遭到这么大伤亡。

“将军同志，”他对我说：“究竟我们为什么会遭受这么大的无谓牺牲，我无法向部队解释。”

我在这里一共耽搁了数个小时。当沃斯科博伊尼阔夫冷静下来之后，我把师政委、师参谋长和师政治部主任一齐叫来，当面向他们交待了任务，要求他们赶快联系部队。现在部队分散在涅贝科沃火车站、茹托夫和呵勃戈涅罗沃一线。

要趁夜间把部队收拢起来，撤过阿克赛河，在安东诺夫至茹托夫之间的地段上组织防御，对于该师的当面和左翼情况要加强侦察。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判断，我军虽沿科帖耳尼科沃部署了部队，但德寇并不打算与我军纠缠，而是企图通过普罗多维托、晋古恃村进行深远的迂回。后来得知，敌人坦克第48军的坦克、纵队果然从科帖耳尼科沃地域出来后向该方向实施冲击。因此我明确要求第208师的领导要加强侦察，查明敌人在该地域内使用主力的方向和具体的行动方法。

我们乘车回到南部集群临时司令部时已经是黑夜。

所幸那夜晚是明月当空，草原上被照得通亮，汽车用不着打开前灯。在离根尼拉罗夫斯基以南10公里的道路交叉点附近，我们碰上了骑兵侦察班。我们派到前面去警戒的乘车步兵小队与这个骑兵侦察班遭遇。

这个骑兵侦察班是独立骑兵第225团派出的，他们刚刚从上库尔莫亚尔斯卡亚撤退下来。这个侦察班的班长告诉我们，从凌晨开始即有众多的敌人渡过了顿河。

我来到根尼拉罗夫村之后才知道，第29师已奉方面军的命令紧急撤离防御地段，被调往东面的阿勃戈涅罗沃火车站地域。我理解到，方面军已得知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已经自科帖耳尼科沃出发，从南面向斯大林格勒推进的消息后，当即决定让舒米洛夫的第64集团军转向南面迎击敌人的坦克第4集团军。这样一来，我的这个临时组成的南部集群恰好从南面掩护了第64集团军的机动。

8月5日清晨草原上传来的隆隆的爆炸声把我们从梦中惊醒。这是敌人的航空兵轰炸、扫射沿阿克赛河河岸缓慢地向东运动的步兵第29师的行军纵队。

当天早晨，独立骑兵第255团团团长受命接受第29师留下的防御地段（包括樵索夫斯基和根尼拉罗夫斯基）。当然，用一个团来防守这么宽大的地段，兵力是太少了。可是当时实在没有其它兵力可用了，况且看来敌人并不打算对这个地段实施进攻。他们正把兵力调往东北方向，靠近铁路线，以便从西面掩护自己的部队。

使我们能稍微松口气的是，我们担任掩护任务的骑兵团当面敌人较弱，主要是罗马尼亚的一些分队，可是另一种情况却又使我们忐忑不安，敌人主力已向东北方向转移。很明显，敌人准备从南面实施突击，迂回到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翼侧和后方，切断我们的交通运输线并切断我们同后方基地的联系。

我与方面军沟通了联系，汇报了南部的情况。方面军当即给我下了死命令，要求我以现有兵力坚决守住阿克赛沿岸的防御。

我给所属部队下达了预先号令，要求他们坚守阿克赛河沿岸地区。尔后我又去检查炮兵的射击准备情况。同时为了防止遭受敌人的突然袭击，我还

向各方面派出了侦察。

这时，我手中掌握的预备队只剩下第 154 陆战旅和在凹地里严密伪装起来的两个“卡秋沙”火箭炮团。

8 月 5 日德军和罗马尼亚军队对于留得尼阔夫和库罗帕钦科两个师的接合部发起了进攻，主要突击的正面宽 8 公里。结果敌人的步兵渡过了阿克赛，在局部地区上还楔入我军战斗队形。看来敌人的坦克也准备渡河。

德寇在顿河右岸占了便宜，自以为他们的战役、战术手段很灵验，于是这次进攻时，便照搬不误，先是实施航空兵轰炸，接着便是炮击，然后步兵开始冲击，步兵后面是坦克。8 月 5 日晚间我们的侦察兵和观测兵发现，在我们的防御阵地当面（特别是在波波夫凹地里），已经有敌人的步兵、炮兵和辎重的集结。

我决心打破敌人的这次进攻。

我的计划很简单：天刚破晓时对集结在出发阵地上的敌人实施炮火突击，尔后进行迅猛的反冲击，把敌人的步兵赶过阿克赛河。

天黑之后，敌人的行动更加肆无忌惮：在他们那边，汽车大开前灯，根本不考虑防空；坦克都停在那里，等待开辟渡河点。

当时我心里想，看来敌人的如意算盘是，当他们的航空兵出现在我们的头顶上，炮兵开始压制我军支撑点，步兵已经出动时，他们便把装甲拳头打出来。总之，像往常一样，敌人准备还有仿照习惯的打法，以坦克履带碾平我们的堑壕。

夜间我分别到两个师长（留得尼阔夫和库罗帕钦科）那里走了一趟，把 8 月 6 日晨的行动计划告诉了他们。他们一点就破，马上理解了我的用意，并且立即着手进行准备。

我们达成突然性的意图全部是如愿以偿。天刚朦朦亮，我们的炮兵就对集结的敌人开了火。我们在 147 高地上看得十分清楚，经我炮击后，敌人的步兵开始从凹地和掩体里跑出来，随后炮兵和辎重队也开始四处窜逃。他们狼狈不堪，乱成一团，纷纷向南面拥过去。

敌人准备于 8 月 6 日实施的进攻，就这样被我们打破了，而我军则几乎没有受到多大损失。

在 8 月 6 日的这次战斗中，敌人伤亡惨重，而且有大量人员被俘。我们缴获了 8 门火炮以及许多机枪和步枪。

通过这次战斗使我认识到，在撤退者当中收拢起来的部队并没有丧失斗志。他们打得很漂亮：冲击时，迅速而果敢；迎敌时，冷静而沉着。打胜仗，主要在于士气。结果，我们不但在敌人面前站稳了脚根，而且还狠揍了敌人。

日终之前我向方面军司令部汇报了当天的战况。同时还了解到，就在这一天，第 64 集团军调至阿勃戈涅罗沃、晋古特地域后与敌人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战斗。

最后我还了解到，安得烈·伊万诺维奇·叶廖缅科上将领导了东南方面军（我与他早在 1938 年就曾在白俄罗斯军区共事）。当天晚上我就简要的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我们不要老是消极地防御，应该一有机会就实

---

1942 年 8 月 7 日大本营把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划分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编有第 63 集团军、第 21 集团军、坦克第 4 集团军（无坦克）和第 62 集团军。东南方面军编有第 64 集团军、第 57 集团军、第 51 集团军，已进至斯大林格勒的近卫第 1 集团军和航空兵第 8 集团军。——作者注

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可是我一直没得到回信，也不知道他是否收到了我的信。

8月7日敌人在原来的方向上再次发动进攻。到中午时，敌人已楔入我防御大约5—6公里。

我们决心以反冲击恢复原态势。赋予的任务十分简要：粉碎敌人的进攻并把敌人赶过阿克赛河。这次反冲击的时机，我也没有选在白天，因为白天敌人的航空兵活动十分猖狂；我没有选在早晨，因为8月6日的那次反冲击是在早晨进行的，我把实施反冲击的时间选在日落前两小时，因为此时敌人的航空兵几乎已经没有什么白昼活动的时间，同时敌人坦克一向与步兵分开配置，此时敌人坦克还在河对岸。我们这次活动又取得了成功，敌人被赶过了阿克赛河。

8月12日，遵照方面军司令部的命令，第66陆战旅和斯大林格勒筑垒地域编入我南部集群的序列。

南部集群的战斗队形的实力原来十分薄弱，现在有了这些部队，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右翼得到了加强。我们利用天然障碍（河川、冲沟、凹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

德寇坦克第4集团军已经从南面向普罗多维托、阿勃戈涅罗沃实施进攻。第64集团军在加强了塔纳奇申上校的机械化第13军之后，此时正与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

很明显，希特勒的将军们想运用他们的拿手战法——“楔入”，从西面和南面实施突击，一举夺占斯大林格勒，同时包围位于该城以西和西南的我军全部兵力。方面军把南部集群向后调动了一下，使它靠近梅什科夫河，看来很可能是出于对付这个敌情的。

方面军要求我军后撤的命令，我们是8月17日接到的。接到命令后，南部集群司令部当即着手制定向新的地区后撤的计划。

由于我们动作迅速，南部集群各部队在夜间顺利地完成了后撤任务，安全到达新的防御地区，未受任何损失。敌人迟迟未能发现我军向新的防御地区的撤退，直到8月18日晚间敌人的侦察机才出现在梅什科夫河的上空，可是敌人并不急于马上冲击新的防御的阵地上我军部队。这可能是因为敌人没有发现这一有利的战机。

在这段时间里，主要战斗是在别的方向上进行的，即在62集团军右翼的魏尔加奇、科待卢班、斯大林格勒；在第64集团军左翼的普罗多维托、士普杜托沃、斯大林格勒。在这些方向上的战斗中，参加的军队和技术兵器要比阿克赛河地区多得多。

人们都有自知之明。我在阿克赛河指挥南部集群，组织了坚不可摧的防御，都是出于个人的第一次临机处置。我自信没有辜负指挥部对我的期望——不但把敌人阻止于一定的地区，而且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后被迫撤退。要在防御中取胜，必须对自己的部队抱有信心，特别要相信部队的干部和战士。要善于审时度势，临危不惧。在进行所受领的任务时要意志坚定，百折不挠。

我深知，我还面临着新的、更加严酷的考验，因为前线战况变得十分危难。德寇依仗坦克和航空兵的优势，不顾一切损失，猖狂地向伏尔加河，向斯大林格勒进犯。我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准备接受任何考验。

当南部集群从阿克塞向第64集团军撤退时，种种思绪萦绕于我脑际。正在此时，伏尔加河、顿河中间地带的交战已经拉开了序幕。

8月下旬的头几天，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交战已经向东转移，延及伏

尔加河、顿河之间的地带。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已准备对斯大林格勒实施进攻。现在敌人这两个集团已经合为一股，他们共同的行动计划是：合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军队并进而抵达伏尔加河。

我与舒米洛夫将军共同研究了集团军当面的敌人，据部队指挥员报告，在瓦西里耶夫克镇我军正与进攻的敌人进行激战，于是我们便乘车前往该地。在瓦西里耶夫克和普金斯基以北，靠近110.4高地，我们找到了炮兵团团长的观察所。该团配属于库罗帕钦科的第157师。敌人的坦克和步兵已经冲了过来，可是不知为什么该团的火炮还没有动静。

“为什么还不朝进攻的敌人开炮？”我急忙问团长。

这位团长有点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炮弹快打完啦！”

凡是那些打算撤退的指挥员通常这么回答问题。

“我命令你们马上装填炮弹，立即开火！”

“打什么目标？”

“打敌人的预备队！”

我从观察所里看得很清楚，有一大群敌人的步兵正从比尔佐瓦严镇拥出来。一连响起了两个齐射，已经开出来的敌人步兵被打得沿着长形凹地纷纷逃窜。

过了不久，第157师长来到观察所。我们当即组织师属炮兵又进行了补充射击。在炮火掩护下，师属各步兵团遂转入了反冲击。战斗共进行了两个小时。结果瓦西里耶夫克和卡普金斯基两个镇子相继落入我手，敌人在慌乱中向南撤退。

第二天我乘车来到138师师长留得尼阔夫的指挥所。这个指挥所设在第74号火车站附近。留得尼陶夫请我进入避弹所。这个地方实在太狭小了，宽1.5米，长约6米。虽经他几次的约请，但我却不肯忙于钻进这个洞洞。敌人打过来的重型炮弹在我们周围爆炸，我却无暇理会，因为我心里正在关注着战场，我们的部队已经开始反冲击了。

实施反冲击的主力是留得尼阔夫的138师所辖的一个坦克营和若干步兵分队。我观察到，法西斯军队的坦克和步兵在我部队的打击下已经节节后退。但是在20—30分钟以后敌人的飞机赶到战场，开始进行俯冲。我们的步兵和坦克都停了下来，原地进行射击，敌我双方的坦克展开了激烈的火力战。双方都不肯向前靠近。火力战持续了数个小时。

我觉得这个地段上的态势已经比较稳定。我把情况向舒米洛夫进行汇报之后，便乘车来到第29师防御地段上的尤尔金国营农场（阿勃戈涅罗沃以北10公里）。

到那里之前，我们中途在靠近一辆被烧毁的T—34型坦克旁边停下来，准备在这里吃点东西。我们实在饿坏了。可是当我们刚刚在地上坐下来，打开罐头，伸手要取面包的时候，在我面前，距离我们的行军“餐桌”只有一米远的地方，从草丛里露着一只人的手臂，那只手臂已经腐烂发霉，皮肤变黑。我向那里瞟了一眼，大家顿时伤了食欲，恶心起来。我们把要吃的东西丢在一张报纸上，起身上车，离开了。

我在第29师的指挥所里遇见了方面军副司令员菲利普·伊凡诺维奇·戈里科夫。看来，他在方面军司令部里是坐不住的。我从这个指挥所里观察到，

敌人的航空兵正在轰炸自己的步兵。事情是这样的：当敌我双方经过短暂的对射之后，我方分队迅速撤到了新防御地区，让敌人乘机接踵而来。正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赶到了。他们以 20—30 架的编队按原计划轮番进行轰炸。可是炸到的都是自己的军队。轰炸持续了半个多小时，德寇的步兵和坦克纷纷四逃，躲避炸弹，并且不断朝天空打白色信号弹，表示“自己人”、“自己人”。可是敌人的轰炸机不管那一套，照样轰炸，直到把炸弹扔完为止。

我军的后撤原是有计划的。这是一种不太复杂，但又十分巧妙、果断的机动战法，我步兵分队先是放弃那些敌人要进行轰炸的阵地，尔后把敌人引诱到我们的阵地上，让他们饱尝自己飞机扔下的炸弹。

晚间我决定返回集团军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泽塔以东约 10 公里的一个狭长的凹地里。

在靠近铁路道口的地方，我们碰上了集团军政治部的一位工作人员（他的名字我已记不清了）。他说，舒米洛夫和司令部全体人员都守在电话机旁，查寻我的下落。这时我才猛然想起，我们已经有将近 10 个小时没有给集团军司令部进行电话联系了。

舒米洛夫将军、军事委员会委员谢尔丘克和阿布拉莫夫以及参谋长拉斯金对我十分关心。我们大家初次见面就找到了共同的语言。我们平素友好相处，工作上互相支持，协调一致，个人之间彼此互相关照（当在这个集团军工作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这种友好相处的关系）。如今我竟这么久同他们失去联系，当然引起了他们的担心。他们这种担心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将军“迷路”，一去不复返（不是牺牲，就是被俘）是常有的事情。

我回来后一进窑洞，舒米洛夫便高兴地大喊起来：

“唉呀，可找到你们啦！”

他当即打电话给方面军参谋长，告诉他，我已经回来了。

同志们又是责备我，又是痛骂我。可是从他们每个人的脸上可以看出，大家都充满了喜悦。回来后才知，他们为了找到我，已经给留得尼阔夫和部队的一些指挥员交待了任务，让他们在战场上仔细寻查，哪怕找到一辆被打坏的汽车也好。这回使他们喜出望外的是，我竟然安然无恙地回来了，而且连乘坐的汽车也是完好的。

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在继续实施进攻，经由通杜托沃从南面实施主要突击。8 月 21 日他们在第 64 和第 57 集团军的接合部上已经楔入 15 公里。形成了从南面突至斯大林格勒和伏尔加河的严重威胁。

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 司令员叶廖缅科为了加强防御，对付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的进攻，把第 62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 4 个反坦克歼击炮团、4 个近卫迫击炮团以及坦克第 56 旅调到斯大林格勒以南，即第 57 集团军受威胁的地段上。这里得到加强后，当然有助于制止霍特集团军的进攻。但是从顿河往南调遣部队却削弱了第 62 集团军和坦克第 4 集团军的防御力量，而鲍卢斯的第 6 集团军正在准备通过这两个集团军的接合部从西面进攻斯大林格勒。

法西斯强盗计划从斯大林格勒以北进犯伏尔加河的同时，还力图对第 62

---

两个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 8 月 13 日起统一由叶廖缅科将军指挥。戈尔多夫将军被任命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作者注

集团军右翼进行深远的迂回。看来他们是想不打折扣地完成合围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计划。

1942 年 8 月 23 日是斯大林格勒最紧张、最激烈的一天。这一天，敌人在维尔佳奇至彼斯科瓦特卡地段上突破了第 1 集团军的防御。随之又有 3 个步兵师、2 个摩托化师和 26 个坦克师（均隶属于坦克第 14 军和步兵第 8 军）进入突破口。敌人这些部队的先遣营在 100 辆坦克的支援下在雷诺克以北进至伏尔加河。

局势是万分严重的。只要有一点张皇失措、失去方寸，就可导致致命的后果。希特勒分子们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为了制造紧张气氛，趁机冲入斯大林格勒，于 8 月 23 日出动了大批飞机进行轰炸。仅在一于之内就出动了将近两千架次。敌人的空袭，在整个战斗中都未达到过这样的程度。斯大林格勒是个大城市，沿伏尔加河伸展 50 公里。如今全城到处都是熊熊大火。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到不幸。8 月 23 日那天，我们的空军和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 120 架）。敌人整日轰炸，入夜方休。

战斗越打越激烈。希特勒分子们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重大的代价。这些匪帮越接近城市，战斗越激烈，苏联战士们也越打得勇敢顽强。打个比喻说，斯大林格勒当时的防御好比一个大弹簧，压得越紧，它的反作用力也越大。

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接近地上遭到激烈抵抗后，希特勒指挥部再次向这里增调兵力。战斗规模越打越大。

8 月 23 日希特勒分子们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突至伏尔加河，但未能发展突破，也未能夺占该城的北部。因为雷诺克斯帕尔塔诺夫卡、奥尔洛大卡各镇已经组织了坚强的防御，使敌人无法接近。在斯大林格勒北部郊区作战的是成千上万的劳动人民，以及防空部队的高射炮兵。他们与第 62 集团军并肩作战，法西斯分子未能突入城内。

在城南，第 64 集团军的地段上，法西斯分子们甚至未能进到伏尔加河。因为我军不断实施反冲击，把敌人打得狼狈不堪。

在这个时期内，我军防御的最薄弱之点是在科特卢班和科诺地域，即第 62 集团军的右翼。

假若法西斯强盗能从科诺地区哪怕调出两个师沿铁路线南下，那么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突至沃罗波诺沃车站，进而插到第 62 集团军和第 64 集团军的侧后，截断这两个集团军同斯大林格勒城的联系。

但是希特勒的将军们求胜心切，他们想一箭双雕：既要一举拿下斯大林格勒，又要把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统统包围，他们在渴望求胜当中竟未察觉到苏军抵抗日益增强的情况。德寇以野蛮轰炸迫使我们恐慌和动摇的企图完全落空了。全城军民终于经受住了这种沉重的打击。

实际上，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已经落入了一个口袋之中：口袋底部在顿河沿岸约利亚普切夫镇附近；口袋的北部边缘在伏尔加河上的雷诺克附近；南部边缘在通社托沃附近。不过霍特的坦克第 4 集团军要想在通社托沃以南，克拉斯诺阿尔麦斯克（红军城）附近插到伏尔加河，那还必须再往前推进一段，按直线距离算也要 15 公里。

希特勒的司令部里把情况估计得相当乐观，认为斯大林格勒及其近郊指日可下。因此希特勒命令鲍卢斯和霍特一定要于 8 月 25 日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们军队依靠的就是从战士到司令员每个人的坚决顽强的战斗精神。我

们深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以及斯大林本人的决心：竭尽全力坚守斯大林格勒。我们也认识到，1942年全年的整个战局的命运和结局皆将系于此地一战。

1942年的斯大林格勒如同1941年的莫斯科，既是战略要地，又是政治、经济中心。如今它已经是世界名城，整个战争目的和任务皆系于该城。伏尔加河上1942年秋季的战事灼热已极，整个世界均为之牵动。苏联军队能否守住斯大林格勒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事。

尽管形势严重，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军队不仅守住了阵地，而且不断地对敌人主力实施反突击。不过此时敌人已经从科帖耳尼科沃经由通杜托沃向伏尔加河推进，企图把我全部军队合围于斯大林格勒。因此8月下旬顶住敌人在南部打下的这个楔子，已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正在不断地加强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从8月1日至20日向这里共调遣15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军。可是由于铁路的通行能力所限，这些部队迟迟不能赶到前线。至8月20日，15个步兵师当中只有5个师到达卡恰林斯卡亚地域；而坦克军到达斯大林格勒近郊的时间最早也要23日或24日。而且由于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战事紧迫，部队一到，即被投入战斗，常常没有熟悉情况和组织战斗的时间。

从大本营预备队中调来的步兵第315师（师长是科尼亚捷夫少将）8月23日急行军开往戈罗基塞地域，以便在内城地带占领防御阵地。可是就在当天下午，该师在行军途中遭到敌航空兵的突击，随后又遭到来自维尔佳奇地域的敌人坦克的冲击。

近卫步兵第35师（师长是格拉兹阔夫）的任务是在中间地带组织防御。但该师各部队的先遣支队于23日夜才到达防御地域。师的先遣支队（由大尉斯托利亚罗夫指挥）在科特卢班火车站以南遭到敌人大批坦克和步兵的冲击。法西斯分子们曾5次发起冲击，均被击退。在激战中，大尉斯托利亚罗夫牺牲。上尉卢宾·路易斯·伊巴露丽接替了指挥。他是西班牙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多洛列夫斯·伊巴露丽的儿子。在这次战斗中他身受重伤，危及生命。

卢宾·路易斯·伊巴露丽牺牲后被授予大尉军衔并荣获苏联英雄称号。他的骨灰至今仍存放在英雄的斯大林格勒城。

该师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占领防御地区，即遭敌优势兵力的冲击。因此被迫撤至萨莫发罗夫卡地域。

为了肃清突入之敌，当时组建了两个突击集团。第一突击集团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副司令员科瓦连科少将指挥。该集团由坦克第4军和第16军步兵第84、第24和第315师编成，受领的任务是，8月25日晨向苏哈亚——米秋特卡方向实施突击。第二个突击集团由坦克第2军和第23军编成，由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军主任施得夫涅夫中将指挥，任务是经由奥尔洛夫向吐尔佐夫卡总方向进攻。这两个集团的总任务是以共同的行动合围并歼灭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地域，已突至伏尔加河的敌人集团。

为了恢复顿河左岸的防御态势，给各部队规定的任务是：坦克第4集团军左翼各部队（近卫步兵第27师和步兵第298师）从对面维尔佳奇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在下格尼洛夫至维尔佳奇地段上进至顿河；第62集团军右翼各部队会同加强的部队（近卫步兵第35师和坦克第169旅）向皮斯科瓦特卡实施进攻并于日终前攻占维尔佳奇、皮斯科瓦特卡地区，最后在顿河左岸与

坦克第4集团军会师。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司令部继续留在斯大林格勒不动。不过为了便于指挥于8月26日在小伊凡诺夫卡地域组织了一个辅助指挥部，由方面军副司令员科瓦连科少将和方面军参谋长尼基舍夫少将两人带领。

第一突击集团不断实施突击，迫使敌人坦克第14军转入防御。至8月26日，在卡特卢班的突破口的宽度已经缩小到4公里。鲍卢斯不得不从空中补给部队。不过此时敌人已经组织了强大的反步兵和反坦克火力。那几日敌航空兵活动特别猖狂，早在行军中就不断地对我部队进行轰炸、扫射，阻止我部队白天有秩序地组织战斗和进入战斗。

我军本打算利用坦克第4集团军左翼部队和第62集团军的右翼部队实施反突击，在顿河左岸恢复到下格尼洛夫斯基、维尔佳奇、皮斯科瓦特卡地段。但是没有成功。

我在这里准备着重谈谈我军当时的通信联络情况。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通信联络仍然是我军的一个弱点。当时德寇军队各个环节都装了电台。而我军还仍旧采用有线通信，有线通信又经常遭到破坏。于是不得不派军官联络，给军队指挥造成极大困难。当时我军各部队分散于广大的草原上，联络起来相当困难。

来自敌方的压力越来越大。在敌人的压力下我们不得不向后撤退，字面上标有“立即送达”的命令，送达部队时，部队常常是已经放弃了命令上指出的居民点。甚至有时连受领任务的部队已经作为战斗单位不复存在了。

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进攻整整约有一周的时间，但并未取得多大战果，而且人员和技术兵器方面遭受重大损失，因此不得不放弃了继续进攻克拉斯诺阿尔麦斯克并经由此地突向伏尔加河的企图。

希特勒指挥部于8月27日和28日两天变更了部队的部署。把大批军队从右翼调至左翼，确切地讲是把兵力集中到了中线，把坦克第14、第24师，摩托儿第29师以及罗马尼亚步兵第6和第20师调至阿勃戈罗沃、卡普金斯基地域，以便集中力量实施突击，经由泽培、纳里曼镇，使这些部队与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会合。这样一来，很可能使我军第M集团军的两个师和整个第62集团军陷于被合围的处境。

不过，敌人的这一动机已经被我军侦察发现。方面军司令员当即下令，要求第62和第64集团军全部撤到以下地区：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新希望”国营农场、大小罗索什卡、罗索什卡左岸、切尔夫连纳亚河左岸、新罗加契克、伊凡诺夫卡。

8月29日夜间我同第64集团军工兵主任勃尔季洛夫斯基乘车出发，准备前往切尔夫连纳亚河一带进行现地勘察。我们当夜在皮斯昌卡村后集团军后勤主任亚力山大洛夫少将那里住下。第二天清晨我们开始进行勘察。

8月30日晨，当我们在新罗加契克地域正在进行勘察时，见到第62集团军的部队正在撤退。在卡尔波夫卡地域已经在进行战斗，第64集团军的部队离该地域还有30—50公里。当时我特别担心，不知道他们能否及时撤到新的防御地区，能否像南部集群在8月17日做的那样，隐蔽地摆脱敌人。

到了中午我们遇见了戈里科夫将军，他也是奉方面军司令员之命前来进行现地勘察的。他一见到我们特别高兴，因为知道了这个地段应该交给谁。见到他之后，我也很高兴，因为他从自己的预备队里把一个反坦克炮兵团拨给了我们，这样我好歹能利用这个团掩护部队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了。



8月30日晚敌人航空兵发现了该地区的我军阵地，对该反坦克炮兵团的各营投掷了一些炸弹。

最后我把现地勘察的情况以及新的防御地区和友邻第62集团军的情况一并向舒米洛夫作了汇报。8月30日整个夜晚和第二天上午，为了等待撤往新的防御地区的部队，我们一直未能合眼休息。8月31日早晨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部队没有能够隐蔽地摆脱敌人。

第64集团军渡过切尔夫连纳亚河之后，立即开始进行侦察和占领阵地。集团军指挥所设于卡拉瓦特卡凹地，司令部设在“山中旷地”国营农场。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翼侧在新罗加契克镇接连在一起：在方面军左翼，第64集团军与第57集团军（由托尔布辛指挥）会合。不过敌人并没有打算从行进间在此处冲击我军的新的防御阵地。

9月1日，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右翼与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在旧罗加契克会合，但是我军的部队并没有陷入敌人的钳形攻势之中。

从这时开始，鲍卢斯的第6集团军和霍特的坦克第4集团军的主力基本上是指向斯大林格勒的中部，即卡拉奇至斯大林格勒和斯大林格勒至科帖耳尼科沃的铁路线。

敌人可能于9月1日已经调整了兵力，并为尔后继续进攻占领了出发阵地，9月2日，敌人对我军后方、炮兵发射阵地和通信枢纽进行了猛烈的轰炸。我军设在雅果得纳亚凹地的预备通信枢纽遭到破坏。很显然，德寇已经发现我军的通信枢纽，甚至知道了我军指挥所的位置。

9月3日早晨当德寇进行狂轰滥炸和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全线发起了进攻。至中午12时，敌人在我集团军左翼渡过了切尔夫连纳亚河，方面军司令员当即要求我们立即恢复原态势。舒米洛夫奉命赶到128.2高地，亲自指挥反冲击。

我与军事委员会委员阿布拉莫夫携带通信和指挥工具留在靠近波波夫农庄的卡拉瓦特卡凹地指挥所里，中午方面军副司令员戈里科夫将军来到我们这里。他了解了一下这里的情况并向我们传达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的指示，便继续沿防御正面视察情况。半小时后，敌人对这里进行了轰炸，看来，他们经过空中侦察，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指挥所。可是我们无权擅自转移指挥所，而巨进行军队指挥的通信设备都在这里，同时，在敌人轰炸之下沿开阔的草原进行机动也是不可能的。

因此只有继续留在掩蔽部里。这里很不牢固，上层不过只覆盖了不到四分之一米的木杆和沙土。我放电话的小桌子紧对着军委委员阿布拉莫夫的桌子。室内总共有6平方米，四周都是土墙，上顶很低，又闷又热，而且尘土飞扬。用木板和木杆好歹支撑起来的屋顶不断往下漏土。

敌机一连轰炸了数个小时，我们坐在这里也慢慢地习惯了，再不理睬飞机马达的轰鸣声和炸弹的爆炸声。

突然，我们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好像飞上了天。我不记得，我同阿布拉莫夫是怎么落在地上的，桌子和凳子都翻在地上。我们的头顶上露了天，满天的烟尘。团团的泥土和沙石纷纷下落，周围一片喊叫声和痛苦的呻吟声。等烟尘稍散之后，我见到离我们6—7米远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直径为12—15米的大坑。旁边躺着几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几辆汽车翻在地上，旁边有被炸毁的无线电台。有线电通信设备也遭到破坏。

集团军中间通信枢纽设在雅果得纳镇地域，距离刚刚恢复的基本指挥所

以南两公里。我准备去利用那里的通信工具联络部队。

我把副官科里莫夫和司机卡尤姆·卡利木里诺叫来一同乘车出发了。汽车刚刚开出凹地，敌人的飞机便来轰炸我们的指挥所，敌人扔的炸弹并不大。当几架“容克”—88型飞机超低空向凹地扔下10—12枚炸弹之后，便开始追逐单个的汽车。我见到一架“容克”式飞机直朝我们的汽车追了过来，我目不转睛地盯着那架飞机，向卡尤姆喊道：

“照直开，别转弯儿！”

当我看到炸弹刚刚离开机舱时，让司机猛向右打方向盘，我们的汽车开足马力突然转了90度弯子，当炸弹落地的时候，我们的汽车已经向旁边跑出去约一百米。几次脱险，完全是沉着和机智救了我们。

敌人的“容克”飞机总共大约投下了12枚炸弹，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负伤。只损坏了汽车的电瓶，电解液倾出，马达失灵，这一切都发生在距离我们的指挥所300—500米的地方。

趁着司机修理马达，我登上附近的一个小山包，看见从策本科农庄开出来许多德寇的坦克。开头有10来辆，接着又是10来辆，队切尔瓦连纳河谷也窜出敌人的坦克。总共100余辆，这些坦克出来后沿道路排成纵队向北开进，直奔巴萨尔基诺火车站方向。

敌人的坦克原来是趁他们的飞机袭击我集团军的部队和指挥所时，突破了瓦尔瓦洛夫卡和策本科地域的我军防御，现在这些坦克距离我们的指挥所还有两公里之远。我们的炮兵向敌人开了火，同时我也改变了主意，决定不再去中间通信枢纽。我步行回到被炸毁的指挥所。这时我又碰见了方面军副司令员戈里科夫。他是第二次来到这里。

我们与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恢复了通信联络，才知道，法西斯军队不但在策本科镇附近，而且在纳里曼镇也突破了第64集团军的防御。

第62集团军防御地段上的情况也不乐观。敌人突破罗索什卡河上的防御之后，已进至巴萨尔基诺火车站一线。

天黑之前我们一直守在原来的指挥所，直到夜间舒米洛夫才通知我们转移到新的指挥所，地点在别克托夫卡以西5公里的树林里。

第62和第64集团军各部队一边进行艰苦的阻击，一边撤向最后的防御阵地——斯大林格勒。

9月5日敌人夺占了沃罗波诺沃，向前调遣预备队之后，进一步企图经由萨多瓦亚火车站不停顿地发起进攻。

敌人在该方面上实施的突击正插在第62和第64集团军的接合部，这就使情况更加严重起来，于是我带领集团军司令部的几名参谋分乘3辆汽车来到皮斯昌卡镇，这距距离沃罗波诺沃两公里。我们来这里的任务是巩固该地段的防御。

从皮斯昌卡镇的西北郊可以清楚地观察沃罗波诺沃火车站，那里驻扎着敌人的高射炮兵、步兵和坦克兵，这时天空中出现了我军的7架“伊柳辛”式飞机。我看到这些飞机用火箭弹袭击敌人的高射炮和集结的坦克。

我光注意观察这里的战斗情况，竟没有留神敌人有好几架“容克”式飞机发现了我们的汽车，从南面直朝我们冲下来。

所幸附近有一个比较坚固的掩蔽所，我们毫不迟疑，一下子都躲了进去。说老实话，这真叫迅速及时，也搞不清轰炸这个镇子西郊的共有多少敌机，我们直觉得炸弹都是落到了我们掩蔽所附近，轰炸共进行了大约10分钟。

当烟尘稍散之后，我们发现掩蔽所被炸开了一半，说也奇怪，我们中间谁也没有被炸伤，或被木质覆盖层的碎片碰伤。

我们走出掩蔽所之后，见到德寇的坦克已经从沃罗诺沃方面对我军在上吐尔山卡的防御阵地实施冲击，敌人先是出动 25 辆坦克，步兵随后跟着冲击。我们的坦克和步兵早有准备，坦克隐蔽在上吐尔山卡镇并进行了严密的伪装，步兵隐蔽在坦克前面。当敌人冲上来之后，我军当即以火力进行迎击。我们第一次齐射后，敌人有 7 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其余的坦克向后调转方向，开足马力逃回了自己的出发阵地。

我方，特别是步兵部队，虽然损失严重，不过终究击退了敌人的各次冲击。在这次战斗中，坦克兵表现特别出色，他们先后共击伤和击毁 15 辆敌人的坦克。

敌人突破我军外层防御地带并迫使我军撤向内层防御地带之后，即把主要兵力投入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的接合部，由卡尔彼夫卡至萨多瓦亚的铁路沿线。敌人力图从行进间一举攻下斯大林格勒。

至 9 月初，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方面的敌人集团有：9 个步兵师、3 个坦克师和 1 个摩托化师。该敌人集团内共有 500 辆坦克。在空中进行支援的还有第 4 航空队的 1000 多架飞机。除了对斯大林格勒进行袭击外，敌人在该战斗地段上每天要出动 1000 多个架次。对于防守斯大林格勒的东南方面军，敌人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况且东南方面军此时所属各兵团都曾受过较大的削弱。在第 62 和 64 集团军所属的若干师当中，有的只有 500—1000 人。在这两个集团军地带内行动的 9 个坦克旅中总共才有 120 辆坦克。

大本营鉴于斯大林格勒地区的严重情况，于 9 月 3 日下达一道命令，要求大本营派出的代表朱可夫大将采取坚决的行动，训令中说。

“斯大林格勒情况已经恶化，敌人距离斯大林格勒还只有 3 俄里。如果我北部集团不立即进行支援，斯大林格勒则可能于今明两日内被敌人攻占。

请您要求在斯大林格勒北部和西北部进行坚守的各部队司令员，立即向敌人实施突击并迅速支援守城的军民。如今，迟疑就等于犯罪。”

在斯大林格勒城北集中的部队，是斯大林格勒方面军所属的 3 个集团军：由科兹洛夫少将指挥的第 24 集团军（编有 5 个步兵师和 1 个坦克旅）和由马利诺夫斯基中将指挥的第 66 集团军（编有 6 个步兵师和 4 个坦克旅）；此外，由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 1 集团军也已经补充和集中完毕。该集团军编有 8 个步兵师。另外还有 3 个坦克军（第 4、第 7 和第 16 军）正在向前线开进之中。

同时由鲁坚科空军少将指挥的航空兵第 16 集团军也编入了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序列（该集团军共有飞机 100 架）。遵照大本营的指示，该航空兵集团军应使用于支援从北面和西北面进行反突击的部队。

为了遂行大本营赋予的任务，方面军司令员决定：实施反突击的部队除上述 3 个集团军之外，还将有坦克第 4 集团军的右翼部队；此外，航空兵第 8 和第 16 集团军应掩护方面军军队集团的集中和突击敌人的主动力量和技术兵器。

我们得知，斯大林格勒以北，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集中了大批兵力，准备实施反突击，其目的是消除已经形成的走廊（从维尔佳奇至伏尔加河），并把法西斯军队赶出斯大林格勒城，进而与第 62 集团军会合。

此外，德寇军队从罗索什卡河和切尔夫连纳亚河一线进至内层防御地带

之后，他们的前进速度应该说是已经减低了。因为敌人为了组织部队强攻斯大林格勒城，在行进中需要补充和调整部队。

我们守城的部队当时曾经认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和方面军指挥部选择的战机可能是，当鲍卢斯的集团军纠缠于城市战斗之际，我军对德寇军队集团的翼侧实施突击。如今我们才知道，在斯大林格勒北面发生了不利的情况。

莫斯卡连科指挥的近卫第1集团军开始进攻的时间原定于9月2日。但该集团军未能及时赶到出发地区。

此时，大本营派到斯大林格勒的全权代表是朱可夫（他是最高统帅部的副主席），大本营三番五次地催促他把3个集团军投入战斗。

关于此事朱可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曾引用他同最高统帅部在电话中的一段通话。在通话中，朱可夫曾要求把进行反突击的时间推迟一下，以便让部队有时间把全部兵力及其加强兵器全部集中起来。当时斯大林的答复是：

“您是不是以为敌人会等你们慢腾腾地准备？……”

叶廖缅科断定，如果你们不立即从北面实施突击，敌人可能会一举拿下斯大林格勒”。

朱可夫继续写道：

“我回答说，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请求准予按原定时间5日发起总攻。至于航空兵，我现在就下令全力轰炸敌人。”

我当时并没有机会与最高统帅部进行类似的谈话，也不可能参与高级司令部的活动，不过我认为朱可夫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那时敌人确实已被阻于内层防御地带。其进攻的速度已经降低，其进攻的势头也已锐减。至于所谓突击斯大林格勒与攻下斯大林格勒——这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在城郊，我们的部队还在顽强地进行战斗，敌人在城内已胶着于巷战之中。

可是大本营却急不可待。

近卫第1集团军虽于9月3日转入进攻，但由于缺乏充分的炮火和航空火力的准备与支援，还由于未能将全部兵力调至出发阵地就仓促发起进攻，结果只推进了5—6公里便被敌人所阻。

同时，敌人在内层防御地带已经变更了兵力部署，而我军的部署直到9月5日还是依然照旧。

为了执行大本营的命令，朱可夫于9月5日将3个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和第24、第66集团军）投入进攻。然而此次进攻仍旧没有进行充分的准备。朱可夫写道，由于炮火的密度不大，所以敌人的火力配系没有受到可靠的压制，这次进攻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以致未能彻底完成所受领的任务。

斯大林格勒以北的苦战一直延续到9月15日。为争取时间，我们的部队往往是经过50公里的行军后便立即投入战斗，以致进攻无所进展，不能把敌人赶出阵地，也不能向南突至斯大林格勒城。

最高统帅部副主席朱可夫和国防委员会主席马林科夫于9月1日共同给大本营呈递了一份公文：

“莫斯科，斯大林同志：

……………。

第二点：对于军1、第24和第66集团军实施的进攻，我们制止和实施均不坚决。为实施曾向您禀告过的那次进攻，我们使用了现有的全部兵力和

兵器，我们未能与斯大林格勒守城的军民会合，是因为我们在炮兵和航空兵方面均处于劣势，我近卫第1集团军实施进攻时，未曾得到一个炮兵团的加强，未曾得到一个反坦克炮兵团的加强，也未曾受到航空兵的掩护。

斯大林格勒的严重情况迫使我们又于9月5日把第24和第66集团军投入战斗，当时既未等部队集中完毕，也未等加强兵器到达。各步兵师经过50公里的行军开到之后，立即进入战斗。

集团军所属部队分散进入战斗，而且也没有得到加强兵器，以致无力突破敌人的防御，也未能与守城军民相会合。不过，我们急速实施突击也倒吸引了敌人的主力，从而改善了我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态势，否则，斯大林格勒有可能被敌人所攻占。

第三点：我们没有给自己规定任何其它的和未经大本营得知的任务。”

第62和第64集团军各部队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下不得不撤至距离斯大林格勒城郊2—10公里的地区，此时敌人在晖波罗斯诺那地域进至伏尔加河，遂把第62集团军与方面军其它部队隔离开来。给第62集团军规定的任务是防守斯大林格勒城的中部和工厂区。该集团军的防御正面是，伏尔加河右岸的雷诺克镇附近，经由奥尔洛夫卡、戈罗基塞和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以东试验站、萨多瓦亚火车站、库波罗斯纳亚一线。该集团军的防御与伏尔加河岸最大距离为10公里。从9月13日起，双方展开了直接攻守斯大林格勒的战斗。

一个半月的战争生活使我学习了许多东西，使我提高了在战斗中研究敌人并分析敌人战役。战术企图的能力。

向大纵深打入数个楔子，继而在纵深内会合于一点——这就是德国将军们全部战役、战术思想的基础。法西斯强盗们在空军和坦克方面占有优势，他们能够比较轻而易举地突破我们的防御。打入楔子，造成一种进行合围的声势，从而迫使我们的部队后撤。其实只要我们进行顽强的防御或者不断地实施反冲击把他们的其中一个楔子制止住或打掉，那么其它路兵力——即其它的楔子就会失去依靠。

敌人的战术中存在着呆板现象。只有当坦克出现在冲击目标的前面时，步兵才肯大胆进攻。而只有航空兵出现在上空，敌人的坦克才肯发起冲击，其实只要打乱敌人这种程序，那他们的进攻就一定会受阻，实施进攻的部队当然也就会后撤。

不久前，在顿河地区就发生过类似的情形。那时我军第112师曾一连数日打退敌人在上奇尔斯卡亚和新马克西莫夫斯基的进攻。原因是我军为掩护顿河上的铁路大桥，曾集中了强大的高炮群，使得敌人的航空兵一直不敢接近我军阵地。敌人的步兵一旦失去空军的配合，其攻击力量当然就差得远了。阿克赛河也有此类情况，当敌人的步兵一时失去坦克的支援，便马上被我军击退了。

在普罗多维特和阿勃戈温罗沃以及其它地段上的情况也是如此。

法西斯强盗一般经受不住我军的突然袭击，特别是炮兵火力的袭击。他们一旦遭到打击，便会仓皇逃散。

德寇怕近战，他们往往在一公里以外就开始打枪，子弹常常到达不了我们的阵地，而且大多偏离目标。他们打枪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壮胆，也是为

了吓唬我们的战士。当我军实施反冲击时，敌人特别害怕我们接近。只要我们一靠近，敌人就会立即停止进攻或者干脆调头撤退。敌人的步、炮、空三者联络比较紧密，特别是借助于无线电台和信号弹联络时，动作很是熟练。敌人的地面部队为了联络自己的空军，往往施放大量的信号弹显示部队和阵地。我们的官兵往往也掌握敌人的这种联络方法，加以利用，使得敌人真假难分。

分析了敌人的这些战役。战术手段之后，我设法要找出对策。我考虑最多是如何减杀德寇的空军优势，消除我军战士对敌人空军的恐惧心理。这时我不禁想起在国内战争时期与白卫军和波兰白军作战的情况。那时，我们每次进攻都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和机枪火力，而我军自己却没有炮火支援，不过我们虽然是徒步接近敌人，由于动作迅速，使得敌人的炮兵来不及变换瞄准距离。我们齐声高喊，“乌拉！”一冲而上，解决了战斗。

参考过去的经验，使我想到了对付法西斯强盗最好的方法是近战，我们应当不分昼夜利用一切机会打近战。我们的前沿或第一线堑壕应尽量靠近敌人，使敌人的航空兵无法对我们进行轰炸。同时要设法让敌人每个士兵都感觉到他们经常都处在俄国武器的控制下，随时都可能饱尝弹丸而丧命。

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打得如火如荼、十分激烈的时候，冷静下来细心揣摩克敌制胜的办法，我这时似乎觉得，只有城市战斗中才能迫使敌人打近战，才能打掉敌人手中的王牌——空军。

1942年9月11日我奉命前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这是两个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和东南方面军，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我在临行前告别了第64集团军司令部舒米洛夫、集团军军委委员阿布拉莫夫和谢尔丘克以及拉斯基诺和其他同志之后，便离开了别克托夫卡，乘车前往伏尔加河左岸的亚梅方面军司令部。

我有一个多月没有离开过作战地区，也没有见过我们的后方。

后方的道路十分拥挤繁忙，镇子里住满了撤退的部队或逃难的百姓。法西斯的飞机对于东撤的老百姓进行了野蛮的轰炸。河流的渡口出现了堵塞现象，伏尔加河河套上的轮渡经常中断，渡船离岸时总是超载，河岸上挤满了运载伤员的汽车和马车。我见景生情，内心十分不安，但是对此却无能为力。伤员们见我身上佩带着将军军衔，便都向我问东问西：“斯大林格勒城怎么样啦？”

“我们会放弃斯大林格勒吗？”“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再不撤退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大本营和方面军指挥部的计划，但我始终没有失去信心，我认为我们一定会全力坚守斯大林格勒。

“我们不会放弃斯大林格勒的，”我鼓励他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当伤员们问我，什么时候才开来运输工具把他们运走时，我就无言以答了。

这时伤员们还都躺在露天，无遮无盖。身上的绷带脏得不成样子，斑斑的血渍和灰尘的污染，变得像一块块树皮。伙食供应也经常中断。医护人员日夜操劳，疲惫不堪。

离渡口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野战医院。我走进手术室，见医生正在给一名战士动手术，那位战士是被炮弹破片炸伤了背部，外科医生和护士们个个面色苍白，工作劳累和缺少睡眠，把他们搞得精疲力尽。伤员们不断痛苦呻吟，手术台旁放着的盆子里装满了血迹斑斑的纱布。那位外科医生朝我看了一

眼，又低下头去继续手术，当他结束了第一个手术后，马上又开始第二个。按次序下一个该谁啦？

另一个手术台上躺着一名伤了头部的战士，他嘴里语无伦次地不断嘟囔着什么。头上的包扎被打开的时候是十分疼痛的，可是他仅是轻声地呻吟，并没有高声尖叫。其它手术台上也都在进行手术。我忽然觉得自己头晕脑胀，嘴里发苦。是的，这里也是战场。

我们趁着夜暗悄悄地渡过了伏尔加河。

我们一行共有四个人：我、我的副官科里莫夫、司机卡尤姆和通信员列沃尔德·谢多林。

半夜时我们到达亚梅村，这里曾经是个村子，但现在村子里的房屋全被法西斯的远射程火炮和飞机轰炸所毁坏。我们的战士把残砖破瓦和剩下的木料用来构筑掩蔽所，有的木料用来当燃料。我们没有马上找到方面军司令部，甚至没有找到一个能够给我们指路的人。

也记不清围着这个地方转游了多久，大约在夜间两点的时候，找到了第64集团军后勤主任亚历山大罗夫的掩蔽所。他把我们领到了方面军司令部。

方面军司令部设在地下掩蔽部里，上面用树丛进行了严密的伪装，值班的一位将军告诉我们，方面军军委委员和方面军参谋长刚刚躺下休息，至于为什么让我到这里来，他也一无所知，他请我在这里住下休息，等明天再办事，我只好从命，于是投宿在亚历山大罗夫将军的住处。

这是我参战以来第一次睡安宁觉，这里离战场有8—9公里远，而且与敌人有一河之隔，夜间再不担心有敌人突然袭击了。

我于9月12日上午10时整到达方面军司令部。叶廖缅科和方面军军委委员赫鲁晓夫接见了我们。

他们宣布，我已被任命为第62集团军司令员并且当场向我交待了任务。

任务的中心要旨是：当前德寇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攻占斯大林格勒城，我们决不能把该城让给敌人。我们再不能撤退，也无处可退了，第62集团军司令员洛帕京将军认为他的集团军无力坚守该城。

方面军司令员问我：

“崔可夫同志，您怎么样？准备接受任务吗？”

对于这件事，我本毫无思想准备，因此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可是在这种场合又不容你前思后虑。因为一切都显而易见十分明确。于是我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我们决不能把斯大林格勒让给敌人。这个城市对于我们，对于全体苏联人民都是贵不可失的。如果放弃斯大林格勒，定会挫伤人民群众的情绪，一定要想方设法保住斯大林格勒，至于我有什么请求，眼下还想不到，我想到城内了解一下情况再说，我定要全力坚守，发誓决不撤出，决心与这个城市共存亡。”

方面军司令员和军事委员对我说，他们认为我已经正确地理解了所受领的任务。

谈完后我便告辞了。这时，我真想一个人单独地坐一会儿，冷静地思索一下，我是否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是不是过于相信了自己的部队。想到这里，不由深感肩上的责任重大，任务确实是艰巨的。因为敌人已经逼近城郊。

斯大林格勒的大街上死气沉沉。所有的树木皆毁于大火，已经没有半点枝叶，木质房屋都化为一片灰烬，只剩下孤伶伶的烟囱。许多砖石质楼房经

过大火已被烧得污焦不堪，楼板倒坍，门窗也被烧得荡然无存，那些还能够勉强住人的房屋也在不断倒坍。住户人家从残垣断壁中狼狈逃出，又把茶炊、碗碟以及大小包袱从碎砖破瓦中抠出来，然后又运到码头。

我们在伏尔加河岸顺着铁路线乘车到达察利茨河口，尔后沿洼地到达阿斯特拉罕大桥。可是并没有找到指挥所，这时天色已晚。

我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地方遇到了工兵部队的一位政委。正巧这位政委知道集团军指挥所的位置，他把我们领到马马耶夫山岗。

把汽车留在山下，我们徒步爬上山。一路上灌丛遍布，荆棘横生。

前面就是指挥所了。在山上的一个冲沟里，我们见到刚刚构筑好的避弹所和掩蔽部。这里就是马马耶夫山岗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块弹丸之地不久将成为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久这里将弹坑遍布，寸草无生。

再往前走就是集团军参谋长尼古拉·伊凡诺维奇·克雷洛夫少将的掩蔽部了。

我与克雷洛夫从前未见过面，对他不甚了解。只一般地知道他曾参加指挥过做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防御战，其实同志们在战火中相遇，匆匆见面，又匆匆分手，我俩都有过不少类似的经历。可是这次彼此相逢之后，俩人却成了终生好友，莫逆之交。他后来晋升为苏联元帅，他在任战略火箭军司令时逝世，当时我曾到红场为他送葬。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我们并肩战斗，在战火下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日日夜夜。我们曾为失去自己的战友而共担苦痛，我俩是患难逢知己，友谊永长存。

可是在见面之初呢？在见面之初，互不了解，甚至还担心过性格上是否会合得来呢！

我走到克雷洛夫的掩蔽部一看，这个地方严格地讲算不上一个掩蔽部，只不过是一个长长的避弹壕上面加上甲干树枝和干草做成的一个顶盖而已，不过上层还是堆了10—20公分的沙土。进到里面，一侧是土制的坐凳，另一侧是土炕和当做桌子用的一个土墩。掩蔽部的顶盖总是随着炮弹的爆炸声不停地颤悠。德寇对市区和这个山岗，已经开始炮击，好在只是进行面积射，还没有按标定的单个目标进行射击。土墩上摊放着地图，地图上散落着砂土。

掩蔽部里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克雷洛夫将军，他正在拿着听筒打电话；另一个是值班的女电话兵。

我拿出证件并放在克雷洛夫面前。他继续打电话，一面在责斥什么人，一面用眼睛扫视我递给他的证件。最后他放下听筒，我们彼此寒暄一阵。我借着小油灯微弱的光亮看见了他的面孔，觉得这是一个性格刚毅、态度严肃而又令人可亲的人。

美国人有一句格言：时间就是金钱。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说：时间就是鲜血，因为一旦错过时间，我们就要用鲜血付出代价。克雷洛夫显然看出我的心思。因此他在打电话的时候。一边讲话一边用削尖的铅笔在地图上指指画画，说明他谈到的作战地区，给所属指挥员在电话里布置工作时也是不厌其烦，一再重复，借此让我快些进入情况。这时我深深感到，我与他已经取得了共同语言。

在斯大林格勒的保卫战中我与克雷洛夫形影不离。我们同住一个掩蔽部，同吃同寝，同甘共苦。



他是集团军参谋长，也是集团军第一副司令员，在艰苦的日子里我们能心心相印，融洽无间，无论情况多么复杂，我们对形势的估计都取得一致的意见，从来没有产生过分歧。

他在做德萨和塞瓦斯托波尔的防御战中获得了丰富的战斗经验。他知识渊博，有组织才能，又善于做人的工作。而他最突出的优点是对党无限忠诚，对同志无限关心，对事业忠心耿耿。

我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发了电报，报告我已经到职，然后便着手开展工作。我开始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处理坦克军军长的问题，弄清在当前已经有命令“不准后撤一步”的情况下，为什么还发生擅自把指挥所转移到伏尔加河岸的事。我要通了电话，让他和我讲话。

“坦克军军长在听您讲话。”女电话兵向我报告，把听筒递给我。

我向那位坦克军军长说明我的身份后，便问他为什么未经许可转移自己的指挥所。军长开始解释，敌人炮击，人员伤亡，下属部队不坚定和其它原因迫使他们采取这一措施。我又问当他决定转移司令部时有没有同集团军司令部指挥所取得联系，他回答说：

“我不知道，需要了解一下。”

我当即命令他和政委立刻到马马耶夫山岗来见我。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库兹玛·呵基莫维奇·古洛夫走了进来。我们相互问候，和他是老相识了。我同他也和克雷洛夫一样，在工作中朝夕相处，常常就同住一个掩蔽部里。我们的工作地点相距最远的时候，也不超过两三公里。我们常常在一块儿研究问题，定下决心。他是搞政工的，但是对于军事方面的情况也十分了解。他要求所属的政工人员要从政治上保障战役、战斗决心的实现。这方面他也总是以身作则。他对集团军司令部全体工作人员和部队的指挥人员都很熟悉。由于他了解干部情况，因此对于干部的使用问题，能经常提出一些衷肯的意见。

这时司令部各处处长和副处长都到掩蔽部来看我。

不久，坦克军军长和政委已到达，准备见我。我当即请他俩到我的掩蔽部来，同时我把当时凡是在司令部的人员都叫到跟前。我当着这些人的面质问那位坦克军军长：

“作为苏联将军，您又是那个战斗地段的首长，如果您部下的指挥人员和司令部擅自后撤，您会怎么对待他们呢？如今您擅自把自己的指挥所撤到集团军指挥所的后面，从执行人民国防委员会第 227 号命令的角度，您应该怎么认识自己的这种行为呢？”

军长和政委低头不语，面有愧色。我接着严肃地警告他们，他们这种行为纯属战场脱逃性质。我下令让他们在 9 月 13 日凌晨 4 时前一定要把自己的指挥所设在 107.5 高地上。

军事委员古洛夫说了一声“正确”表示赞同我的决定。接着他又吩咐那位政委到他的掩蔽部去一下。他们谈了些什么，我不得而知。不过古洛夫返回时对我说：

“就应当这么抓下去！”

当时方面军副司令员戈里科夫来找我们，我想，正当我在马马耶夫山岗担负起第 62 集团军指挥任务时能见到他，使我十分高兴。

我与他在战场上经常见面，他经常亲临前线，对各集团军的情况十分熟悉，他能正确地估计形势，对当前战斗和整个交战总是坦率地发表自己的看

法。这次一见到我便开门见山地说，他对斯大林格勒的前途深表忧虑。

第 62 集团军所属各部队，在不久前的各次战斗中受到很大的削弱，有些步兵师只剩下几百人，整个集团军早在顿河大弯曲部就已经打得精疲力竭，现在确实需要补充几个精锐的师。戈里科夫答应回去后把这个情况反映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我们谈完后，他便乘车离开了。

经过与几个副职的交谈，特别是亲自观察了参谋长克雷洛夫的工作情况，我虽然对许多末端细节还不够详细了解，但是对于集团军的基本情况，到夜晚 2 时已经有了大致的了解。

9 月 12 日日终前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第 62 集团军当面进攻的是敌人坦克第 4 集团军的数个师以及第 6 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同时，敌一部兵力此时已经在雷诺克镇以北和斯大林格勒以南的库波罗斯诺进至伏尔加河。总的看，我集团军已被德国法西斯军队以马蹄形的强硬阵式从正面和两翼压迫到伏尔加河。

编有 9 个师的敌人整个集团（配属有加强兵器）以及对第 62 集团军进攻的“施塔黑尔”集群得到第 4 航空队将近 1000 架各种作战飞机的支援。这一强大集团的当前任务是：拿下斯大林格勒，进至伏尔加河，即向前推进 5—10 公里，把我军赶过伏尔加河。

第 62 集团军所属各部队的兵力和装备严重不足。截至 9 月 14 日晨，集团军的一个坦克旅只有一辆坦克，其余两个坦克旅实际上根本没有坦克，而且很快要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去整编。一个混编支队（由各种不同的旅和师编成）截至 9 月 14 日晚有将近 200 名骑兵，实际上还不到一个完整的骑兵营。与其相邻的步兵第 224 师（由阿发那西耶夫指挥）的兵力还不到 1500 人，其中骑兵数量还不足一个满员的骑兵营。步兵第 42 旅有 666 人，其中骑兵还不到 200 人；左翼近卫第 35 师（由杜比亚恩斯基指挥）的骑兵数量不超过 250 名，其他各兵团和部队的人数也都大致如此。由波波夫将军指挥的坦克第 23 军所属各坦克旅编有坦克 40—50 辆，其中 30% 被击毁，只能被当做火力点使用。只有由萨拉耶夫上校指挥的内务部所属步兵第 10 师以及 3 个独立步兵旅建制还比较完整。

第 62 集团军与左右友邻没有横向的通信联络。我们两翼只能依托伏尔加河。德寇的空军每昼夜能出动 10003000 个架次，而我军的航空兵却不能相应的对付敌人，所出动的架次至多只能是敌人的十分之一。

敌人稳定地占据着空中的优势。而我军的高射炮一部分被敌人摧毁，一部分撤到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掩护河面，掩护沿河右岸的一个狭长地带。留在伏尔加河右岸的高射炮兵已经所剩无几。9 月 13 日第 1079 和第 748 两个高炮团已编成一个高炮群，由叶尔邵夫上校指挥。可是一个高炮群实在太少了。因此，法两斯的飞机敢于在斯大林格勒上空，伏尔加河面以及在我们部队的头顶上一天到晚不断地盘旋。

在观察敌人航空兵活动规律之后我发现，法西斯的飞行员投弹技术并不高明。他们轰炸我军前沿时，只选择双方对峙距离较大的地段，惟恐误伤自己的部队，这就给我们一个启发，要把双方对峙距离尽量缩小，缩小到手榴弹的投掷距离。

由于战斗中不断遭受损失，人员大量伤亡，弹药和粮草十分缺乏，加之兵员和技术兵器又不能及时补充等情况，我军士气受到很大影响，有些人甚至产生了想快些撤过伏尔加河的消极畏战的思想。

集团军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想方设法提高部队的士气。我的几位副手和战友，如克雷洛夫和波让尔斯基，维特科夫上校、旅政委瓦西里耶夫和师政委古洛夫以及其他同志，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我们的指挥员和政工人员都深深懂得，为了保卫斯大林格勒城，必将战斗到底。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定下决心：

1. 首先稳定部队的思想。使部队认识到，再不能后撤，同时也无处可退。我们定能打败德寇。斯大林格勒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们定要把这里变成敌人的葬身之地。苏联军人应当响应党的号召，不负人民的重托誓死保卫斯大林格勒。应当依靠党、团组织把这个决心贯彻到部队的全体人员。

2. 在城内大企业中建立由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武装支队。他们可独立地，也可以协同集团军所属部队一起保卫工厂，根据部队装备标准发给他们武器和装备。

3. 没有集团军司令员和司令部首长的允许，任何人不准从阵地上撤退。

4. 集团军司令部必须留在伏尔加河右岸，斯大林格勒城内。任何情况下集团军司令部不准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以及河面上的各岛。

同时我们还要集团军所属一些部队进行整编，集团军内没有一个部队和兵团齐装满员，有的甚至达不到编制的一半。由于作战的需要，一些师、旅的指挥机关被调往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顿编组。当然这与撤往伏尔加河左岸不能相提并论，同时，我们还决定把一些建制不全的部队合编为兵团。

截至9月13日凌晨2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已经拟制出一份近两天的作战计划。

“你们每逢到这个时候是不是要吃点东西？”我问克雷洛夫。

“是的，有时我们这个时候吃点夜宵。”古洛夫代回答说。

我们的副官不知从哪里搞来了一些面包、罐头和冷茶。吃过点心，我们便各自回去睡觉。不过每个人心里都想着同一个心事：“谁知明天会怎么样？”

我们决定首先保护渡口，以免遭敌人炮击。为此，集团军左右两翼必须坚守防御，把中央拉平。方法是以中央的部队不停地组织巨冲击，夺占拉兹古利亚耶夫车站，并从这里沿通往两南的铁路线发展进攻，一直到达铁路的急拐弯处的古姆拉克。这样就可以把拉平的部队依托在可以当做反坦克障碍物的铁路线上，并可以进而夺占戈罗季谢和亚历山德罗夫卡镇，为实现这一任务，我们决定派出坦克军加强步兵部队，同时以集团军的大部炮兵进行支援。定于9月13日部队变更部署，9月14日开始冲击。可是，敌人抢在了我们的前面。

清晨，敌人的炮击和飞机的轰炸把我们从梦中惊醒。

6时30分法西斯分子们以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在40—50辆坦克的支援下，从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地域转入进攻。突击方向是，经由机场镇向中央车站和马马耶夫山岗实施突击。

这是突向我中央的一路，而在我集团军两翼则只是搞一些牵制性活动：例如，在右翼以一个营的兵力从北面向奥尔洛夫卡方向对我步兵旅实施冲击；在左翼以若干独立营对我混编团实施冲击。

在集团军中央和左翼的战斗已经进行了一整天。敌人投入新锐的预备队后继续发展进攻。敌人的炮弹铺天盖地地打过来。他们的航空兵整天盘旋在

战场上空。

从马马耶夫山岗能够十分清楚地观察到空战和地面的战斗。我们亲眼看到大约有 10 架敌我双方的飞机拖着团团的火焰坠落在地上。德寇军队尽管遭到苏军地面部队和航空兵的顽强抵抗，还是依仗数量的优势占了上风。

据我们估计，敌人此次进攻属于战斗侦察性质。敌人主力的进攻可能还要等一两天才能开始。

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马马耶夫山岗顶部。敌人的炮弹和炸弹如倾盆大雨似地落下来，我与克雷洛夫同在一个掩蔽部进行指挥，不时地走到炮队镜前观察战场。附近有几个掩蔽部已经被敌人摧毁。集团军司令部里出现了伤亡。

电话线时常被打断，无线电枢纽也常常中断工作，有时很长时间不能恢复，为了修复通信设备，通信人员常常要全体出动，有时就连我的掩蔽部里的电话兵也得放下电话机跑出去检查线路和修复设备。9 月 13 日一整天我与方面军司令员只通过一次话。我简短地向他汇报了情况，并请求在最近一两天内增援我们两三个新锐的师。因为我手里实在没有东西抗击敌人的突击了。

尽管通信人员全力以赴，可是 16 时以前我与部队的通信联络几乎全部中断。

此时掩蔽部外面的情况也不很妙。

从正面向奥尔洛夫卡实施进攻的一个营虽被我步兵第 115 旅歼灭，但在集团军中央的部队由于损失严重，被迫向东撤退，撤至巴里卡德镇和红十月镇以西，树林的西边。这时法西斯分子已占领 126.3 高地、机场镇和一座医院，在左翼，我混编团放弃了萨多瓦亚以东的机械拖拉车站。其它地段上敌人实施的几次冲击已被击退。

我们决定实施反冲击。为了先敌行动，我们把反冲击的时间选在 14 日凌晨。我们深知，集团军的力量甚为有限。此次行动，实在拿不出更多的兵力。不过我们认为，敌人也知道我们现在兵力不足，因此也不太可能估计到我们会有什么更积极的行动。苏沃洛夫有一个信条：“预见意味着胜利。”我们并不打算速胜。不过我们可以预见敌情，可以打乱敌人的作战计划。关键在于取得突然性，进行突然袭击，哪怕暂时地、局部地能把敌人推到被动的地位也好。

实施反冲击的命令于 22 时 30 分前下达到部队。命令中给每个部队规定了具体的任务。

摩托化步兵第 38 旅（另有一个加强的摩托比步兵连和一个配属的炮兵营）向拉兹古利亚耶夫卡东南的一个镇子实施进攻。萨拉耶大的师以一个团的兵力沿 126.3 高地和 144.3 高地实施进攻。

中集团军中各种不同的部队编成的混编团配属一个坦克旅。向机场镇和 153.7 高地方向实施突击。独立步兵第 42 旅沿医院、153.7 高地实施突击，准备策应我军的反冲击。

参加反冲击的各个部队事先都组织好了互相间的协同动作和可靠的通信联络。

集团军其他各部队的任务是坚守各自占领的地区。

这次反冲击将得到一个反坦克歼击炮兵团，最高统帅部预备队的 3 个炮兵团以及 3 个近卫火箭炮团（装备“卡秋莎”火箭炮）的支援。

我们在马马耶夫山岗渡过的一天表明，这里的指挥所不适于指挥作战，

因为敌人的炮击经常使通信联络中断，部队经常失去指挥，后来我们决定将指挥所转移到察利茨河凹地。马马耶夫山岗只留下集团军的一个观察所，关于转移指挥所的问题，我们是在转移的两天前取得方面军司令部同意的。

这段时间是第 62 集团军最艰难的日子。我们迫切需要补充几个新锐的师。

截至 9 月 13 日，敌人与伏尔加河的最大距离已经不超过 10 公里。斯大林格勒城原是沿着伏尔加河岸修建起来的，南北长 50 公里，东西宽 5 公里。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 10 公里就打到了斯大林格勒城，首当其冲的就是该城的北部工厂区。

9 月 14 日拂晓集团军指挥所转移到所谓的“察里津地窖”。这是一个大型的隧道式掩蔽部。里面有数十个隔间，墙壁全由厚 325 毫米的木板镶嵌，8 月份这里原是斯大林格勒——东南方面军的指挥所。顶部土层厚度约达 10 米，成吨重的炸弹才能炸穿其薄弱部位。掩蔽部共有两个出口：下层出口直通察里津河口；上层出口可通普希金大街。

我与克雷洛夫于 9 月 14 日拂晓前从马马耶夫山岗出发。吉洛夫比我们先走。集团军装甲坦克和机械化兵副主任巴音卢布中校做为我们的向导与我们同行。这时德寇的夜航飞机不断在空中盘旋，借着大火的光亮搜寻目标进行轰炸。

我们穿过残垣断壁和已经毁为一片废墟的大街向前行驶，汽车开到距离新的指挥所还有五百来米的时候，车轮子被电报和电话线给绞住了，不能再行驶。这时克雷洛夫与巴音卢布同乘的一辆汽车也跟着停了下来。我们总共耽搁了大约 3 分钟。就在这 3 分钟里，离我们不远的地方敌人投下了约 10 枚小型炸弹。所幸我们大家谁也没有负伤，不久我们就到达了目的地。

我们简直顾不得睡觉和休息，刚一到就亲自动手干起来。检查通信联络，检查部队进行反冲击的准备。一切还算正常，敌人在夜间除了出动夜航飞机之外，并无其它动静，看来可能是夜间要休息，也可能是正在准备明日天亮后的行动。

凌晨 3 时我们开始炮火准备，3 时 30 分开始进行反冲击。我打电话给方面军司令员，向他报告，反冲击已经开始，并请求天亮之后派航空兵进行掩护。方面军司令员答应出动航空兵并且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大本营预备队准备抽近卫步兵第 13 师配属给我们。部队准备于 9 月 14 日晚间在红斯洛博达地域的伏尔加河渡口集中。

这次配属给我们的虽然只是一个师，但是我们已经感到无限欣喜了，因为 9 月 14 日进行的反冲击，虽然是集团军组织实施的，但必竟是力量单薄、而且这种部队原来就已经打得精疲力竭了，估计不会取得重大成果。

为了迎接近卫师的到达，我立即派工兵主任图皮切夫上校带领集团军司令部的一个参谋组前往红斯洛博达镇。我与克雷洛夫则再次联络部队，了解战况。

开始时，我集团军中央部队的反冲击取得了一点战果，但至中午 12 时敌人接着投入了大批步兵和坦克，向我军压了过来，冲向中心车站，直追马马耶夫山岗。

敌人的这次突击相当有力量，强盗们不顾一切伤亡，硬是杀开一条血路，他们搭乘汽车，搭载坦克，拉开纵队，径直冲击城内。看来敌人已利令智昏，自以为大局已定，想快点儿赶到伏尔加河，赶到斯大林格勒市中心，到那里

大发横财。德寇进到城来，乐得昏了头脑，个个都像醉汉似地从车上爬下来，狂呼怪叫，吹着口琴在人行道上蹦蹦跳跳。而我们的战士、阻击手。防坦克枪手、炮手则冷静沉着地隐蔽在房屋、地下室和土木质发射点里以及房屋的拐角处严阵以待，德寇的情景都历历在目。

德寇在大街上成千上万地被击毙，可是新的部队又源源不断地拥了上来。德寇的冲锋枪手已经穿插到铁路线以东的城区、火车站以及专家大楼。战斗已经打到距离集团军指挥所 800 米的地方，形势十分危急。敌人很可能在近卫步兵第 13 师到达之前占领火车站，把集团军割裂为二，进而直插中心渡口。

在集团军左翼的米尼纳郊区，战斗也进行得十分激烈。敌人在右翼不断地进行骚扰，形势不断恶化。

我手中的预备队这时已所剩无几，只有一个重型坦克旅，全旅总共有 19 辆坦克。当时该旅配置在集团军左翼之后，靠近南郊大型粮仓的地方，我立即命令该旅派出一个营（共 10 辆坦克）火急赶到集团军指挥所。两小时后该营赶到。参谋长克雷洛夫当即把司令部参谋人员和警卫连组织起来，编成两个战斗群。第一个战斗群加强 6 辆坦克，由作战处长扎利丘克上校带领，任务是封锁住从火车站通往码头的各条大街。第二战斗组加强 3 辆坦克由巴音卢布中校带领，任务是夺回专家大楼，因为德寇占据这里之后，不断地用大口径机枪射击伏尔加河河面以及河岸上的码头。

每个战斗群里都有由集团军司令部派出的参谋和政治部派出的干部。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战斗群出动后。果然阻止住了企图夺占中心码头的德寇，成功地掩护了运载罗季姆采夫的第一批渡船的安全到达。

14 时近卫步兵第 13 师师长亚力山大·伊里奇·罗季姆采夫来见我，他是少将军衔，已获苏联英雄称号。他一路上风尘仆仆。来到集团军司令部时已经是满面污垢，在途中为了躲避敌机的俯冲扫射，他几次跌到弹坑里和藏在废墟里，罗季姆采夫向我报告，他的师是满员师，大约有一万人。可是武器不足，弹药缺乏。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托方面军副司令员戈里科夫中将把该师短缺的武器补齐，务必于 9 月 14 日晚间前送至红斯洛博达。可是这些武器能不能按时送到，当时并没有十分的把握。我于是当机立断，指示管后勤的副司令员柳保夫少将（他当时正在伏尔加河左岸）马上动员所有的工作人员在集团军的后勤部队搜集武器并直接送到近卫步兵师的手里。

近卫师师长罗季姆采夫少将对于我集团军前线的战况已经有些了解，原来参谋长克雷洛夫有一套能在百忙中向别人介绍情况的本领，罗季姆采夫很快也就进入了情况，他受领的任务是：于 9 月 14 日夜晚把全师带到伏尔加河左岸，此时师的炮兵除开反坦克炮兵外均已在伏尔加河左岸占领发射阵地，以便从这里支援步兵部队的行动，反坦克炮和火箭炮都已经渡过伏尔加河开进城内。

近卫师一进城便投入了战斗。该师两个步兵团的任务是肃清盘踞在市中心、专家大楼和车站里的敌人，第三个团任务是防守马马耶夫山岗。留一个步兵营控制在集团军指挥所附近作为预备队。

师的战斗分界线，右面是马马耶夫山岗和铁路迂回线，左面靠察利茨河，师长的指挥所指定设在伏尔加河岸，靠近码头的地方。那里已经有现成的掩蔽部和掩壕，并且建立了通信联络，我给他打了电话，通话结束时我问他：

“情绪怎么样？”

他回答说。

“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根本没有从这里离开的打算，而且也决不会这么做。”

我当即又补充一句：

“一旦你师各部队到达战斗前沿后，该地段上所有独立作战的部队统统划归你指挥。”

他沉思了一下对我说，把他的指挥所放在集团军指挥所的后面，他感到惭愧不安。我安慰他说，等他的师完成这次任务后再考虑让他的指挥所转移到前面去。

“敌人不会善罢甘休的，”我强调说，“他们是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统统消灭，进而拿下斯大林格勒，因此我们不能光是防御，也要抓紧一切机会反击，要调动敌人，要积极主动地去作战，打破敌人的企图。”

这时已是下午4时，离黄昏大约还有5个小时。我们的部队和分队原来都是分散孤立的，而且已经打得疲惫不堪，如今把他们投入中央方向去完成人们正常情况下难以完成的任务，他们能胜任吗？他们能否坚持10至12个小时？这使我最为耽心，如果他们胜任不了这项任务，那便是失败。到那时，近卫步兵第13师即使能赶到，也只能在伏尔加河左岸上坐观我部队失利的惨景。

正在此时偏偏又传来消息说，实施反冲击的混编团由于干部伤亡很大，部队已失去指挥。我们现在手里已经没有预备队可派。连最后的一点力量——集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和警卫人员也都投入了战斗。这时隔着掩蔽部的顶盖已经可以听到敌人飞机的马达声和炸弹的爆炸声。

为了寻找一点儿预备队，我把萨拉耶夫上校叫来。他是一位师长，现在又担任城防司令。他的师现在正负责防守城内各永备防御枢纽和支撑点。

他来到后向我汇报情况，详细地介绍了全师的现状，该师各部队的防御地域的情况以及城内各区和工厂的状况。

从他的汇报我了解到，原来那里的防御工事都是一些小型的土木质发射点，里面的设施只完成25—30%，当然其坚固程度就差多了。有些防御工事，特别是一些街垒，坚固程度实在太差，根本顶不住德寇的冲击。

萨拉耶夫上校汇报完之后，我问他是否知道，他的师已经编入我集团军的序列，现在必须绝对服从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领导。我还问他，为了证实这事，需不需要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打电话核实一下。萨拉耶夫当即回答说，他明白，他现在已经是第62集团军的人了。

当然如果现在就把萨拉耶夫的某个部队调出作为预备队去对付敌人的进攻，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支撑点上的部队现在决不能动。不过在他手里还掌握着各工厂和城内各区的一些武装支队。各个支队都配有一名警卫队长。支队的成份多来自警察、消防队员以及工厂的工人。人数总共可达1500名，可惜就是武器不够。我吩咐萨拉耶夫要在市中心区选择几栋坚固的大楼，派几名党员指挥干部各带50—100人，分别进入大楼，构筑工事，依托楼房进行坚守。最后我告诉他，关于全师和各武装支队所需武器弹药可到集团军弹药补给处去领取。我还提醒他，一定要经常同集团军指挥所保持联系。

他立即在城市全景图上向我当面提出几处特别重要的坚守目标，我都一一表示同意。

萨拉耶夫是师长，又兼任城防司令，他熟悉城区情况，掌握同城内各工

厂的联络渠道。这大大有助于我们组织武装支队，坚守工厂和坚固的建筑物，城内居民都已经组织起来，与第 62 集团军各部队并肩战斗，誓死与法西斯强盗血战到底。

我与萨拉耶夫交谈时，参谋长克雷洛大也在场，萨拉耶夫走后，我把参谋长叫到我那里共同研究如何组织可靠的通信、情报以及军队指挥等问题。

我们同集团军所属部队经常失掉联系。因此，我有好几次不得不同古洛夫一起走出掩蔽部来到普希金大街了解情况。到这里哪怕能听一听动静也好，因为这时战斗地区离我们仅有 400—500 米。

历史学家们常言，战场上的统帅往往由于一营之缺而不能在决战中取胜。我想，在这些日子里鲍卢斯为了与我决战，力图把我第 62 集团军割裂为二，进而突至伏尔加河。为达此目的，他手里有的是这样的营。可是我们的战士那种英勇善战的精神把敌人的这些兵力都抵消了。

快到黄昏的时候，坦克旅长霍普科来见我。他说，他们旅仅仅剩下的一辆坦克也被敌人打坏了，现在正停在车站附近，靠铁路大桥的地方。

“您看怎么办？”他问道。

我询问了一下详情。原来这辆坦克虽然被打坏，可是坦克上的枪炮还可以继续射击。此外，全旅还剩下百来名坦克兵，他们都装备着步枪和手枪。

“先去看看那辆坦克吧！”我吩咐说：“要把人们都召集起来，守住铁路大桥，要坚持到近卫第 13 师的部队到达。”

他立即领会了我的意图，转身跑回去执行任务。我后来得知，霍普科回去后完满地完成了任务。

天已黄昏，战斗开始平息下来。天空中德寇的飞机也开始减少了。这时我守在电话机旁，不断地询问近卫第 13 师的近况、位置在哪里？部队在干什么？渡河器材准备得怎么样？然后，我又坐下来同司令部参谋人员一道总结当天的战斗。

敌人已靠近马马耶夫山岗，直逼市区内通向中央车站的一段铁路线，不过中央车站还控制在我军手里，但德寇的冲锋枪手从我军战斗队形薄弱的地方穿插过去之后，已经占据了市中心许多楼房。

在集团军中央作战的我军部队，现在几乎所剩无几。在马马耶夫山岗的集团军观察所，全部被敌人的炮击和轰炸摧毁。据集团军左翼报告，敌人的冲击虽然被击退，但现在正集结兵力，进行侦察，准备再次发起进攻。

通观整个部队的现状以及战场上的情况，我认识到，再不能向方面军事委员会请求什么支援了。因为他们为了减轻这里的压力，已经是全力以赴了。9 月 14 日夜为支援近卫第 13 师渡河，伏尔加河上的所有渡口都行动起来。

这天夜里，集团军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忙得整夜没有合眼。有的到前沿帮助分队恢复战斗力；有的在专家大楼和车站附近进行战斗，以保障近卫师各部顺利渡河；也有的在中央码头地域迎接已经渡河的各营，并准备穿过被破坏的街道把他们带到前沿。

近卫第 34 和第 42 团以及第 39 团的一个营已经趁夜渡过了伏尔加河。这时天已破晓，上空出现了敌人的飞机，影响了继续渡河。

已经到达的各团，在市中心占领了从“大陆沟”至车站的地段。第 42 团的第 1 营已开往车站。防守马马耶夫山岗的萨拉耶夫师的一个营以及叶尔莫勒金上校步兵第 112 师所属的若干分队，在车站左侧（即西南方向）进行



防御的是一些零散的部队。他们分别属于坦克旅、混编团以及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步兵第 42 旅。其它地段上战况无大变化。

9 月 15 日晨敌人开始从两个方向实施进攻：在集团军中央，向车站和马马耶夫山岗进攻的是敌人加强有坦克的第 295、第 76 和第 71 步兵师的部队。在左翼，向米尼纳郊区、库波罗斯诺耶进攻的是坦克第 24 和第 14 师以及步兵军 94 师的部队；在右翼，战场上比较平静。敌人在发起进攻前进行猛烈的轰炸。尔后敌机继续留在战场上空，不断在我部队头上盘旋。

战斗一开始，我军即感到很大压力。因为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师夜间刚一到达，还没有来得及了解情况和构筑工事即遭敌人优势兵力的冲击。

车站和米尼纳郊区的战斗打得特别残酷。争夺车站的战斗打得如火如荼，一天之内四次易手。入夜后，我军才站稳脚跟。近卫师第 34 团在重型坦克的支援下对专家大楼多次发起冲击，德寇始终坚守不退，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步兵旅在萨拉耶夫师所属各分队配合下发起进攻。因伤亡严重，被迫撤向列索波萨托契纳亚。杜比亚恩斯基上校的近卫步兵第 35 师及其它部队所属的一些分队，也因伤亡严重而退至斯大林格勒西郊，察利茨河以南地区。

马马耶夫山岗战斗越来越激烈，到 9 月 15 日晚间还搞不清到底落入谁手。送来的报告也相互矛盾。这时，敌人的自动枪手已经沿着察利茨河穿插到铁路大桥，不断朝我们指挥所这里打枪。集团军司令部的警卫队已经与敌人打响。人们为了躲避敌人不断进行的炮击和轰炸到了夜晚把指挥所的通道挤得水泄不通。掩蔽部人口处虽然有警卫人员小心警卫和严格盘查，还是有不少人借口什么“有要事禀报”，想方设法挤进来，进来后就在这里逗留住了。这些人都是集团军直属通信部队的、警卫营的、行政管理部门的，也有从部队来的联络参谋以及司机等等。由于掩蔽部里没有通风设备，里面又闷又热，搞得臭气熏天。特别是到了晚间，简直使人难以忍受。指挥所的工作人员被搞得实在坐不住了。后来我们不得不决定轮流走出去，到外边换一换空气。这时城内察利茨河以南的街道上已经燃起通天大火，天空被照得明如白昼。我们走出掩蔽部时，枪弹不断在我们头上飞来飞去。可是掩蔽部内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我们宁愿顶着枪弹，在外面多停留一会。

那天夜里我们大家都为马马耶夫山岗的命运担忧。因为此处一旦落入敌手，那么斯大林格勒全城以及伏尔加河的河面将会全被敌人所瞰制。

我当时下令，一定想方设法让叶林上校的第 39 团的那些尚且还留在伏尔加河对岸的一些分队赶紧趁夜过河，渡河后立即带到马马耶夫山岗，以便在那里组织防御，不惜任何代价坚守山头。

这时我认识到，光是在这个长形凹地里的指挥所对整个集团军进行指挥是有困难的。因此，我吩咐波让尔斯基将军带领集团军作战处和炮兵司令部的部分工作人员组成一个辅助指挥所，设在伏尔加河岸，紧对着宰采夫斯基岛南侧，靠近码头的地方，该辅助指挥所由波让尔斯基领导，在集团军司令部和集团军右翼各部队之间起着中间环节的作用。

在 9 月 16 日的战斗中，仅被击毙的敌人就达 2000 多人，受伤人员比死亡人数多出两倍以上。9 月 14 日—15 日两天的战斗中，敌人总共伤亡 8000—9000 人，被烧毁的坦克 54 辆。我们的部队人员和技术兵器也遭受很大损失，而且还撤出了一些地盘。我这里说“损失很大，撤出了一些地盘”，并不是说部队是从一个地区有组织地撤到另一个地区的，而是说，我们的战士（甚至不是成建制的分队），当敌人的坦克冲击。碾压过去之后，常常是带

着浑身的伤痛撤到下一个地区，在那里被一些战斗分队收容，补充弹药，又重新投入战斗。

德寇不久便清醒过来，他们开始看到，靠蛮劲儿一拥而上是攻不下斯大林格勒的。硬吞是要烫舌头的。往后便开始小心起来，每一次进攻之前总是要做好充分准备。而且打起仗来再不敢吹口琴，也不敢唱歌跳舞了。

9月13日、14日、15日的3天战斗表明，在城市内的残垣断壁中，比起在伏尔加河和顿河之间的开阔草原上作战更能大量歼敌。

尽管敌人在兵力上占很大优势，可是在进攻中总是遭到重大伤亡。原因是在狭窄的街道上，在一片废墟之中，敌人的优势兵力展不开。视界受到限制，看不清哪里向他们打枪，不知道什么地方等着要他们的命。

“这块土地上，在伏尔加河岸，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在大街上和公园里，到处血流成河。敌人今天在这里已经是战战兢兢，如踏薄冰，马上就要陷入灭顶之灾了！”这是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豪言壮语。

我军指战员们深知，我们已经无处可退，而已也不能撤退，更重要的是，他们已经看出，德寇是可以被战胜的，他们并不是铁打的，我们的子弹照样可以把他们打穿。我们的防坦克枪手已经敢于把敌坦克放近到50—100米再打，而且百发百中。

9月16日和17日以来战斗越打越激烈。敌人不断调动新锐的预备队向近卫第13师和步兵第42旅的中央发起冲击。马马耶夫山岗和车站地域，战斗打得异常残酷。

9月16日早晨叶林团在步兵第112师所属各分队配合下夺回了马马耶夫山岗，尔后进攻受阻。接着双方展开了遭遇战斗和遭遇性的冲击，实际上战斗已经打到白热化，形成了殊死的搏斗。这种情况在马马耶夫山岗一直延续到1943年1月底。

敌人已经看到，如果他们一旦拿下马马耶夫山岗，就能瞰制全城，就能控制城内整个工厂区和伏尔加河河面，为此他们不惜工本倾巢出动。我军也全力以赴，拼命坚守。他们的许多坦克师团和步兵师团都先后毁于此地。而我军在这场空前残酷的战斗中各师也伤亡惨重，这是一场巨大的消耗战，其残酷、激烈的程度在历史上是少见的。

重型火器都被推上战场，重磅炸弹和203毫米大口径炮弹把这里的土地整整翻了一遍。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步枪和手榴弹仍然能够大显身手。白刃格斗和近战仍然是最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作战手段。

专家大楼的争夺战时起时落。只要我军的进攻和炮击一减弱，敌人便马上趁机轰击伏尔加河上的中心渡口。这时我军即被迫马上继续进攻，箝制盘踞在专家大楼里的敌人。

苏维埃大街上有一栋四层大楼。过去这里是州消费合作社联社的家属宿舍。现在从9月17日开始改造成为罗季姆采夫师左翼的一个支撑点，这栋大楼后来定名为“巴甫洛夫大楼”，称“巴甫洛夫大楼”并不是因为这栋楼房的主人而得名，而是因为当年的战斗英雄雅可夫·费多托维奇·巴甫洛夫带领战士们在这里坚守，法西斯强盗对这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先后使用强攻和围困的方法，一连50个日日夜夜，死亡好几百官兵，却始终没有把它攻克。

这栋楼的东侧至今还保留一座四层大厦和曾被炮弹截为两段的烟囱。当时这里是制粉厂，与“巴甫洛夫大楼”形成一个统一的防御体系，阻挡住了进犯伏尔加河的德寇。

车站地域进行的战斗互有胜负。车站和附近的一些楼房一天之内竟四、五次反复易手，每次激战之后，双方都要付出数十人甚至数百人的伤亡，搏斗的双方都已消耗得筋疲力尽，战斗分队日渐减少，双方都不得不增加新锐力量，调动预备队。

我军战士，特别是近卫第 13 师的战士们，在市中心进行着顽强而坚定的抵抗，打破了鲍卢斯的作战计划和行动企图。最后，鲍卢斯不得不倾巢出动，把配置在沃罗波诺沃、佩斯昌卡、萨多瓦亚的第 2 突击集群的全部兵力投入战斗。

敌人集中了两个坦克师、一个摩托化步兵师和一个步兵师，补充了人员和技术兵器后。对我集团军左翼实施了迅猛的进攻，敌人的这次进攻早在我们意料之中。可是要把敌人打出来的这只拳头击退，我们却深感力不从心。不过，尽管敌军实力雄厚，他们每前进一步都得付出重大的代价。

综观过去的战争史，一个目标，不管它是一座城市还是一个村落，敌对双方在争夺之中数次易手已可称激烈之典型。人们都知道，在斯大林格勒南部至今仍保留着一个大型粮仓以示纪念，可是人们哪里知道，就在这里，从 9 月 17 日至 9 月 20 日中间日夜进行激战。不但整个粮仓，就连粮仓里面的各层乃至各个库房都曾反复易手多次，无怪近卫第 35 师师长杜比亚恩斯基在电话里报告说：

“情况有变化，不久前我们还占着粮仓顶层，德寇在我们下面。可现在我们有部队从下边打他们。这回敌人又窜到顶层来了，眼下我们正在顶层和敌人打着呢！”

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像这样顽强坚守目标的例子不下几十个甚至几百个。至于在某些目标的内部，为了一间屋子，为了某一个突出部，为了一段楼梯，往往要反复争夺好几个星期。

9 月 16 日早晨我向方面军军事委员会报告，我现在手里的预备队已经用光了，而敌人则源源不断地投入新锐力量，如果再这样打下去，整个集团军可能消耗殆尽，难以坚持，因此我请求火速增援 2—3 个新锐师来。

方面军指挥部对城内的情况当然一清二楚，并且看到了城市战斗的重要性。9 月 12 日至 16 日的战况表明，在城市战斗中，实施防御的部队比在草原开阔地上实施反突击更能歼灭敌人。

方面军司令部于是决定把第 92 陆战旅和坦克第 137 旅调给我们集团军。陆战旅是齐装满员的部队，全旅成员一律是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方舰队的水兵，很有战斗力。该旅受领的任务是防守北起察利茨河南至铁路三岔道口的一段铁路线。

坦克旅只装备有轻型坦克。坦克火炮的口径为 45 毫米，该旅受领的任务是，在马马耶夫山岗以东半公里的铁路迂回线地域占领环形防御，制止敌人窜往伏尔加河。

我于 9 月 19 日得知，在斯大林格勒以北占领防御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即将从阿卡托夫卡至库兹米奇地段出发，向南实施进攻。进攻部队的任务是消灭敌人集团，进而与防守斯大林格勒城的第 62 和第 64 集团军在城西南会师。

这是一件大喜事，因为整个方面军马上就要转入进攻了。我们集团军马上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配合进攻的部队。眼下我们集团军正被敌人压迫在伏尔加河岸。因此当务之急便是尽快与左右友邻建立联系。于是我们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要继续在集团军中央进行积极的防御，同时在右翼出动萨拉

耶夫师的两个步兵旅和一个步兵团对敌人实施突击，以便尽早与在城北作战的部队会师。

当天晚上叶廖缅科中将告诉我，近日即将实施进攻，要求我集团军以右翼部队支援友邻，并要从红十月镇和马马耶夫向西南实施突击，割裂并消灭斯大林格勒西部市区的敌人。为了加强集团军右翼部队，我们把格里什纳上校的步兵第 95 师给他们。该师于 9 月 18 日晚间已在伏尔加河渡口附近集中。

我们的指挥所不断遭到敌人的炮击，因此上级批准我们离开察利茨河凹地的掩蔽部，转移到新的指挥所，地点在“红十月”码头以北一公里处。

9 月 17 日晚集团军占领的态势是：右翼从雷诺克至马马耶夫山岗尚无变化（5 天内敌人多次实施冲击被击退）；集团军中央犬牙交错，马马耶夫山岗和中央车站被我军控制，专家大楼被敌人占领，并从这里不断炮击中心渡口；集团军左翼，从察利茨河沿铁路线直抵伏尔加河岸边的扬水塔均为我军控制。

新锐部队到达后，混编团的余部编入巴特拉科夫步兵旅。南翼（即左翼）的其余全部兵力因遭重大伤亡，编入杜比亚恩斯基近卫师。部队合编后，剩下的司令部机关调至伏尔加河左岸进行整编。

经调整后，集团军左翼剩下两个步兵旅（第 42 与第 92 旅）和杜比亚恩斯基的第 35 师。这样，指挥起来就方便多了。

17 日夜晚，集团军指挥所开始向新的地方转移。通信设备、保障人员以及一些参谋人员从晚间就开始行动了。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和作战处的工作人员最后转移。由于考虑到城内大街上经常有敌人的冲锋枪手和坦克出进，如果沿街转移随时可能碰上敌人。携带文件会冒风险。因此决定让司令部的主要参谋人员和军事委员会渡河转移。这样做会安全些，不过绕道而行相当麻烦：先从察利茨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左岸的红斯洛博达，再从红斯洛博达乘车向北到“62”渡口，面对宰采夫斯基沙洲的地方，尔后再从那里转乘装甲舰渡过伏尔加河，重新回到右岸，到达新的指挥所。

从察利茨河口乘船渡过伏尔加河到达红斯洛博达的组织工作，指定由维持科夫带领几名助手负责。午夜 12 时我们装满文件和个人行李、什物的车队离开掩蔽部出发了。车辆在夜暗中行驶。顺利地到达上船地点集中。炮弹不断地从我们头上飞过。

渡过伏尔加河之后，我们在博卡尔德和红斯洛博达镇为寻找汽车转游了大约一个小时，最后算找到了，把东西装上了车。这时古洛夫跑来找我，他建议把车先开到离红斯洛博达镇 5 公里的国营苗圃，可以到那里的行政管理部门去洗洗脸、吃点东西再继续赶路。于是我吩咐参谋长克雷洛夫带领司令部人员先到新的指挥所，随后我们就到，同时给他们带点吃的东西去。我和古洛夫以及几位副官便一道来到苗圃。这里把我们当稀客招待。洗过热水澡之后，又送来干净衬衣。饱餐一顿，然后换上了又暖和又厚实的绒衣。时间过得飞快。往窗外望去，天还黑。可是不知不觉，转眼间天已破晓，等我明白过来之后，不由大吃一惊。原来渡河只能在夜间进行。看来，我们是要迟到了！假如我们今天不能过河，按时到达新的指挥所，那么司令部工作人员甚至参谋长克雷洛夫本人会怎么看我们呢？

我们跳上汽车，朝“62”渡口猛开。我不认识路，由古洛夫乘车在前面引导。可是偏偏他也走糊涂了，转了半天，开到红斯洛博达。一看不对，又往回开。

赶到“62”渡口时，我见码头上只有一艘汽艇，看样子正准备返回。可是汽车偏偏又陷在沙里。车轮干打转，车子开不动。我脑子里顿时闪过一幅景象，汽艇马上就返回，万一赶不上，我们就得在左岸耽误一整天。可是在这一天之内集团军会发生什么事？斯大林格勒城会发生什么事，想到这里，不由毛骨悚然。于是我不顾一切向码头奔跑过去。这时汽艇已经准备离岸。我用尽全身力气，奔跑中猛地跳向汽艇，所幸一下子就跳上去了。这时古洛夫也朝码头奔跑过来。我向汽艇的撑舵人大喊一声：“快把船往回靠！”那个人慢条斯理地转过头来问：

“你是什么人？”

“我是第62集团军司令员！”

撑舵的是个军官，他忙把船靠岸。古洛夫带领副官们也跳上了船。汽艇开足马力向右岸驶去。

那位军官向我道歉，说方才没有认出我来，10分钟后，我们便到了右岸。我紧握着他的手，表示衷心感谢。

到了新的指挥所，克雷洛夫和维特科夫以及其他同志前来迎接我。大家情绪非常高涨，因为同志们又会在一起了。不过不是所有的人都到了。晚间我检查伤亡的时候，发现主管炮兵，工程兵和装甲兵的几位副司令员不在了。于是军事委员会重新任命了几位副职。尼古拉·米特罗冯诺维奇·波让尔斯基被任命为炮兵副司令员；马特维·格里果利耶维奇·巴音卢布中校，被任命为装甲兵副司令员；工程兵副司令员由于没有适当的人选，暂时空缺。我将此事报告给方面军军事委员会，不久，来了科辛科少将，在特卡琴科中校未调来之前，科辛科担任了数个星期的工程兵副司令员。

集团军新的指挥所没有掩蔽部，就连能够抵挡枪弹和零碎弹片的掩蔽工事也没有。在伏尔加河的这段陡峭的河岸上，我们可以利用的只是一些盛石油的大桶和盛重油的水泥池子。岸边的沙滩上堆积着车床。发动机以及工厂的其它设施。这些东西本应运过伏尔加河进行疏散的，可竟乱堆在这里。靠近河水的地方还停放着几艘破烂不堪的驳船，还有一些待运的木材。集团军司令部工作人员只好占用几艘驳船，否则只有在露天办公，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长的工作地点设在利用河岸抢修起来的几个避弹壕，壕上连顶盖都没有。

工兵同志们开始在这里构筑掩蔽部，不知听谁瞎说，上面那些油桶都是空的，便信以为真。后来，我们为这事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集团军右翼部队正在准备向马马耶夫山岗西南实施反突击，以便协同从北面实施反突击的3个集团军（近卫第1集团军，诸兵种合成第24和第66集团军），割裂并粉碎正向斯大林格勒实施进攻的敌人军队。

9月18日同往常一样，太阳刚刚一露头，敌人便出动飞机开始对我集团军各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重点是突击车站和马马耶夫山岗的我军部队，接着便开始炮击。这时，我军炮兵也开始还击。战斗越打越激烈。可是到了上午8时，上空的法西斯轰炸机突然统统不见了。我想，这一定是城北作战的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各部队已经开始积极行动，开始了战斗侦察。到了下午2时，我军头上又出现了数百架“容克”式飞机。他们同早晨一样，继续轰炸第62集团军的部队。这时我想，城北我军的战斗侦察一定已经结束，或者起码是暂时停止了。

敌人对我们的部队，特别是城北部队的每一积极行动，都反应十分灵敏。因此，凭借着敌人航空兵的一举一动，可以立即判断我军在其它地段上的情

况。我们第 62 集团军能取得 6 个小时的喘息机会改善阵地，多亏友邻部队的配合。

集团军右翼部队早晨转入进攻后，取得了一些战果。戈罗霍夫上校的步兵旅已夺占 30.5 高地，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已占领 135.4 高地。坦克第 23 军的地段上，摩托化步兵第 38 旅已全部攻占红十月镇西南的一个菜园。

叶尔莫勒金师所属各分队和叶林近卫团正在马马耶夫进行激战。一天之间，他们向前推进了 100—150 米，并在山岗顶部巩固下来。市中心和集团军左翼的战斗仍十分激烈。敌人兵力尽管占很大优势，但并未取得多大战果，在过去 5 天的战斗中，车站反复易手 15 次，直至 9 月 18 日被敌人占领。我们部队在其它地段上均在坚守阵地。

这时我们本想以反冲击夺回车站，可是兵力已经不足。罗季姆采夫将军的第 13 师已经打得精疲力尽。该师是渡过伏尔加河后立即投入战斗的。德国法西斯军队曾对斯大林格勒实施主要突击，企图一举攻下该城。该师的战士们坚决顶住了敌人的突击，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当然该师撤出了几个街区。不过，这并非退却或撤退。我们没有一个人撤走，战士们誓死坚守。只有当身负重伤后才不得不离开阵地。他们在与主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各自为战，三两个人一个战斗小组，坚持在车站的板道房里以及车站附近的楼房地下室里，还利用月台通道和车厢与敌周旋。他们日夜出击，时常出没在敌人侧后，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独立自主地完成任

务。他们广泛发挥巷战的有利条件，迫使法西斯军官们把成连，成营的兵力龟缩一团，日夜不得安宁。同时又常常被迫把一些新锐的部队派到四面八方去围剿那些苏军战士们誓死坚守的“个人堡垒”。

早在我踏上战场之初，脑子里就一直琢磨着一个问题：如何对付这种训练有素而又墨守陈规的敌人？如今总算是有了一个眉目。

在我的思考中，是把战士放在首位。因为战士们总是先与敌人当面交锋。战士们更能摸清敌方战士们的心理活动。这一点，有时反倒胜过那些仅在指挥所观察战场的将军们。战士们总是不时研究敌人。他们不但了解自己的指挥员，还能够经常审时度势，揣摸敌人的企图，当然，比起司令部工作人员，战士们下能全面了解敌人军队，比起代们这些从观察所指挥军队的人，战士们的眼界也不够开阔。可是战士们却能亲眼看到敌人的士兵在战场上的活动。在反复冲杀中与敌人士兵直接交手，因此比其他任何人更能了解敌人的士气。

一个素质好的战士，如果要能掌握敌人的精神状，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面对敌人的优势兵力，也会冷静沉着，毫不畏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战士们即使身负重伤仍不肯离开战场。仍能坚持杀敌。

在巷战中，每栋房屋，那怕是里面只有一名战士，都应当成为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当战士们在地下室或楼梯口坚持战斗时。只要他心中装着集团军总任务，哪怕只剩下一个人，也能有恃无恐，独立作战，完成任务，在巷战中，有时士兵就是将军。

不相信士兵才干的人，不配当指挥员。在车站的争夺战进行最激烈的时候，我同军事委员会委员古洛夫和参谋长克雷洛夫就决定修改我们的战术，打破军队中历来规定的一些战斗编组，即在连和营的编制中除了排和班之外，增加新的战术单位——规模不大的强击群。

9月18日我们接到东南方面军的一份命令（当时第62集团军编在东南方面军的序列内）。

命令内容如下：

“摘自第00122号战斗命令。

东南方面军司令部，1942年9月18日18时。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向南发起总攻后，敌人在我军打击下，接连在库兹米奇、苏哈亚——米秋特卡、阿卡托夫卡等地域遭受重大损失。为了对付我军北部集团的进攻，敌人正在从斯大林格勒、沃罗波诺沃地域，经由占姆拉克，把许多兵团和部队调往北面。

为了协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粉碎敌人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兹命令：

1. 第62集团军应在马马耶夫山岗建立一个突击集团（兵力应不少于3个步兵师和一个坦克旅），向斯大林格勒西北部方向实施突击，歼灭该地域的敌人。集团军的当前任务是：歼灭城内敌人，牢固地控制雷诺克、奥尔洛夫卡、128和98.9两个高地以及斯大林格勒西郊和西北郊。

方面军炮兵主任在右起戈罗季谢，左至占姆拉克地带内组织强大的炮兵进攻，保障第62集团军实施突击。

格里什纳步兵师，从1942年9月18日19时起编入第62集团军，第62集团军司令员应于1942年9月15日5时前利用红十月地域内的北部渡口组织该师大部兵力渡河并开入斯大林格勒城。该师到达后应从102高地向斯大林格勒西北部实施突击。

步兵开始进攻的时间：9月19日12时。

从方面军的命令中可以看出，戈里什纳师应在12—18小时内渡过伏尔加河并占领出发阵地，可是此时渡河条件极其困难。规定的时限实在太短。

其实，组织该师渡河还只是任务的一个方面，方面军在命令中还规定，第62集团军应派出不少于3个师的兵力实施反突击。可是在集团军第二梯队和预备队里连一个师也没有。所有能够拿起武器的人都在前沿作战，投入巷战。叫我们到哪里去找3个师呢？

对于方面军的任务还是一定要千方百计地去完成。

集团军司令部各个环节以及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在准备反攻的工作中，表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业务效能。

为了进一步落实方面军的命令，我于9月18日23时50分给集团军各部队签发了一道进攻的命令。我们经过了艰苦的防御战，经过了退却（即使是迟缓的），如今出现了一个新的词，即进攻。我们的军队是经过浴血奋战，打得疲惫不堪之后，抱着欢心鼓舞的心情转入进攻的，转入进攻，就是说我们还有力量。对自己的力量并没有失去信心，看来，老是进行防御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进攻开始的时间规定在9月19日12时。

我们从早晨开始便注意观察敌人的动静，看看敌人阵地上是否有表现慌乱的现象，看看敌人是否在从我军当后面撤部队。但我们只发现敌人航空兵的活动有所减少。这天早晨斯大林格勒上空没有出现敌人的轰炸机。看来，我军在城北还继续采取积极行动。

中午12时，我集团军各部队开始发起冲击。这次冲击得到了方面军炮兵群和航空兵的支援。敌人没出动航空兵，有利于我们的冲击，当然，在巷战中航空兵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可是到了下午 5 时，上空又出现了德寇的飞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断定，我们对敌人北侧实施的冲击已经失利。

第 62 集团军突击集团所实施的进攻，形成了与敌人的遭遇战。这是由于敌人在我军中央和左翼也都采取了积极行动的结果。在我右翼，敌人在行动上表现消沉。

9 月 19 日马马耶夫山岗上全天战斗都打得十分激烈。战斗进展很不平衡。我军摩托化步兵旅已占领了 266.3 高地，叶尔莫勒金步兵第 112 师的一个团进至多尔吉冲沟以北地域，与摩托化步兵旅已取得协同动作。格里什纳师的两个团 18 日夜间渡河后从行进间投入战斗。进入战斗前没有来得及进行准备，也没有熟悉情况，加之敌人也采取了积极的行动，因此，该师的部队翻过马马耶夫山岗的分水岭之后当即与敌坦克和步兵遭遇。叶尔莫勒金步兵第 112 师各分队从早晨开始打退敌人数次强大的冲击，于日终前坚守以下地区：从马马耶夫山岗至波洛尼亚纳大街的铁路沿线、多尔吉冲沟的岔口、沿阿尔条莫夫斯克大街的克鲁托瓦冲沟公路大桥。

敌人若进至伏尔加河，定会沿河岸实施进攻，把我们的部队与河岸以及渡口隔开。对于这一点，我们是很清楚的。因此，军事委员会决定 9 月 23 日晨从马马耶夫山岗地域继续实施进攻，并把巴丘克师投入战斗（该师在昨天夜间已经全部渡河，并进入城内）。该师各团的任务是歼灭中心渡口地域的敌人，并从两头控制住察利茨河河谷。

我向师长已丘克交待任务时，让他注意运用小什队进行巷战的经验。开始时，我还觉得他对于强击群的作用和行动方法不够了解。因为我想连、排编制早已是成规，部队的连、排战术也是他按照常规一手教出来的，他难道会轻易摆脱已经习惯了的老框框吗？想不到这个敏捷、挺拔的中校——巴丘克却能很自信地回答我：

“司令员同志，我们到这儿来不是参加检阅，是来打仗的，到时候会随机应变的。况且我们都是西伯利亚人。……”

原来他在过河之前，对第 62 集团军的战术就早有所闻。他通过我们的联络参谋了解第 62 集团军创造出的种种新的战法，从那时开始，他就要求所属各营、营长注意研究城市作战经验，并且要求让战士们多带于榴弹、炸药包和十枪子弹，数量上要比规定的多一倍。

我与他交谈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已确信，该师全体战士定会勇敢顽强地与敌人进行搏斗，定会在伏尔加河右岸坚持到底，此时，他的师已经沿河岸向南发起反冲击，并向中心码头支援罗季姆采夫师，与此同时我给罗季姆采夫师补充了两千名兵员，我们估计，通过这次反冲击，不但会阻止住敌人从南面实施的进攻。而且会把突至伏尔加河的敌人各个歼灭掉，进而还可以与留在市内南区的各旅恢复协同关系。反冲击的时间定于 9 月 23 日上午 10 时。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一直延续了两天。战斗经常发展到白刃格斗。结果，敌人由中心码头向北实施的进攻暂时被阻止住了。不过我们却未能把进至伏尔加河的敌人歼灭掉，也未能与在察利茨河对岸作战的步兵旅会合。

鲍卢斯企图进至伏尔加河后沿河岸从两翼夹击我集团军的如意算盘是落空”。由于罗季姆采夫、巴丘克、格里什纳、叶尔莫勒金等同志指挥的各师，巴特拉科夫，捷里霍纳、博尔维诺夫、安德鲁完科等同志指挥的各旅，波波夫、布勃诺夫指挥的坦克部队以及我集团军其它部队进行了顽强的防御，鲍



卢斯被碰得头破血流。

时至今日，第 62 集团军已经渡过了难关。自从敌突至伏尔加河以来，代集团军再没有后退一步。马马耶夫山岗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敌人并没有成建制地吃掉过我们任何一个部队。在城内，巴丘克师的这些西伯利亚的英雄们阻止住了敌人的进攻。敌人被杀得血流成河。数十辆坦克被燃烧，成千上万的尸体被遗弃在大街上。

就我个人来讲，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关于撤过伏尔加河的事。甚至连撤到河中的某一个沙洲，都没有想过。因为这会严重地影响到部队指挥员、司令部乃至全体战士的思想情绪。有一次，古洛夫提醒我说，他手里还亨握着为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准备的几条船。我当时对他说，这不关我的事，只要我神智还清醒，是决不会撤回左岸去的。

一句话说得古洛夫紧紧地抱住我，感动地说：“哪怕最后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也要坚持到底。”

这种患难相交的感情，超过了任何的友谊，它使我们俩更加了解，更加亲密无间了。

不过当时我认为在与敌人相距 1—3 公里的地方指挥部队，实在是困难很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参谋长克雷洛夫，起初他同意我的看法。可是当我暗示他到左岸去，在中间通信站开设司令部时，他坚决反对。他说：

“我们大家还是在一起的好。但愿大家生死与其。”

当时我们深深地感觉到，部队在看着我们，几乎所有的师团司令部都在学我们的样子。不少部队还派军事和政治干部到我们集团军司令部来，这样可以了解到，集团军的领导入确实同他们在一起留在伏尔加河右岸。

我们大家（确切他说，就是我、古洛夫和参谋长克雷洛夫）了解到部队这种心情。因此常常有意识地走出自己的指挥所，到师团观察所去转一转。有时一直下到堑壕里去看看。我们这样做，可以让战士们亲眼看到，我们这些将军们——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成员们，没有离开他们，现在正同他们在一起。

我们集团军的指挥位置，比起敌人来是很靠前的，鲍卢斯和他的司令部，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距离前沿足有 120—150 公里，而我第 62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及其司令部，在 10 月中旬，几天几夜的时间离前沿只有 400 米。

在当时，这一点十分重要。只有指挥靠前，才能使战士们，甚至师、团长都能感到他们不是孤立的，同他们在一起的是集团军的军事委员会。

城市战斗乃是一种特殊的战斗。解决战斗不光是靠实力。而是要依靠动作纯熟、随机应变、出敌不意、以巧制敌。敌人的进攻部队好比是潮水，城市里的建筑物就如同是防波之堤，把敌人的战斗队形梳割成缕，迫使部队沿街道发展。因此，在城市战斗中，我们派出入数不多的兵力，防守坚固的建筑物，在四面被围的情况下组织环形防御。那些坚如盘石的楼房对我们十分有用，把它们改造成支撑点，依托这些支撑点发扬自动枪和机枪的火力，大量杀伤实施进攻的敌人。我们进行反冲击时，也尽量不使用一般的战斗队形，也不动用团一级的兵力，甚至很少使用大批的分队。到 9 月底，各团出现了强击群。这种战斗组织的特点是，兵力小、突击力强。进攻时，势如破竹；运动时，灵活机动，有如行蛇。德寇盘踞的目标纷纷遭到我强击群的突击；先是遭到炸药包、手榴弹和其它人力杀伤，随后战士们又手持刺刀、匕首一拥而上，此时，敌火通常很难经受得住。在城市战斗中注重逐楼争夺。在楼

房内部，每个地下室、每个楼道口都可能是激烈争夺的对象。战斗一经转入楼房内部，大街上、广场上便空荡无人了。

在频繁、激烈的战斗中，我们广大指战员学会了一套保存自己，减少伤亡的办法。力对付敌人航空兵和炮兵进行火力准备时的杀伤。我们的部队尽量靠近敌人的阵地。敌人的飞行员和炮手由于害怕误伤自己的部队，而无法对我军战斗队形实施火力突击。

我军力争与敌人打近战。德寇不喜欢近战，因为他们不适应这种战斗形式，眼前一出现手持武器的苏军战士，就胆战心寒，失去了作战的勇气。我们往往离敌人还老远，他们就开始射击，特别是在夜间，德寇士兵往往每隔5—10分钟就打一阵冲锋枪，给自己壮壮胆。我们的战士碰上这种外强中干的家伙，爬过去靠一支步枪甚至一把刺刀就可以把他们解决掉。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学会了一套打坦克的办法。当敌人坦克冲上来时，先把它放过去，随后打坦克后面的敌人步兵，让敌人坦克直接进入我坦克饱和反坦克枪的火力控制之下。这样敌人的步但协同便遭到了破坏。敌人的坦克一旦失去步兵的配合，其作用就差得多了。突入我阵地的敌人坦克，一见战果下大，损失不小，只好撤回原出发阵地。

夜间是我们的天下。德寇不善于夜战。打夜战则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们的仗战本领，其实也是形势逼出来的。因为白天敌人的飞机老是在我们头上盘旋，我们根本无法展外行动。可是到夜里，我们就有恃无恐了。白天我们通常进行防御，抗击敌人的冲击，因为在白天敌人步兵没有坦克和航空兵支援，通常是不出动的。强击群白天在防御中总是紧紧依托楼房和工事等待敌人接近到手榴弹的投掷距离，再开火。

还有我们的“卡秋莎”火箭炮。这种火炮，打敌人实施进攻前集结的坦克和步兵，特别有效。叶罗钦上校指挥的“卡秋莎”火箭炮团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该团在斯大林格勒城内把陆地设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岸坡上，敌人的火炮无法摧毁他们。因为该团装备的这种火炮是履带牵引的，行动迅速。需要发射时，迅速推到发射阵地，打完后立刻撤回掩蔽工事。

我军这种技术兵器性能好，官兵又掌握了高超的射击技术，给敌人造成很大威胁。

在这个伏尔加河战场上，战士们打一仗提高一步。大家出谋献策。研究新的打法，先进事迹层出不穷。在这场残酷的斗争中，从每个战士到指挥员，人们越打越精明，越打越振奋。

后来，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的时候，我们从敌人尸体和俘虏身上得到他们写的战斗日记。从里面了解到，我们的一些新的战法曾使敌人付出了重大的伤亡。当我们实施突击时，敌人搞不清我军的行动地点、使用多少兵力、采取什么行动方法。一到夜间，我们把敌人搞得寝息不安，到第二天参加战斗时，个个被搞得无精打彩，疲惫不堪。

我们有时也一反常态，在日落之前或在战斗临结束时，派部队主动出击一下。当然，这种突击常常并没有多大力量。不过，此时敌人往往已经是强弩之末，相比之下，没有多大力量的突击反而会打得敌人胆战心寒。我们几乎每天把敌人搞得精神紧张，惶惑不安，不知道什么时候又会遭到突然袭击。

9月26日，全部侦察材料证明，敌人准备从戈罗季谢、拉兹古利亚耶夫卡向新的方向实施进攻。

我们决定，在继续对敌人集结的坦克和步兵进行炮火袭击的同时，命令坦克第 23 军和叶尔莫勒金的步兵第 112 师各部队，经过充分准备后，抗击敌人的这次进攻。此时，斯梅霍特沃罗夫少将的步兵第 193 师已经到达我集团军，正准备用来加强坦克军的防御。

在马马耶夫山岗顶部进行防御的，是戈里什纳师的部队。山岗的南坡和西坡均已被敌人占领。敌人只要再向前推进 100 米，全城这个战术要点以及工人住宅区就有可能落入敌人手中，我们对此深感忧虑。为了不使敌人得逞，为了打破敌人对工人住宅区实施进攻的准备，我们决定再次发起反冲击。

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无论是步兵、炮兵、坦克兵，还是水手们，大家齐心协力，为抗击敌人对工厂和工人住宅区的进攻，积极进行准备。我们准备开始先进行反冲击，时间定于 9 月 27 日早 6 时。

在这一天，第 64 集团军也在库波罗斯诺那地域转入进攻。

战斗开始时，我军进攻略有进展。到了上午 8 时，敌人出动了数百架俯冲轰炸机，对我军战斗队形进行猛烈突击。实施反冲击的分队被迫停了下来。

由于集团军与部队不能经常保持通信联络，指挥所虽然与前沿最大距离只有两公里，可是我们仍然不能准确地掌握前面的情况，为了及时了解战斗过程，我们不得不再把指挥所向前推，有时，我们二十主要领导人只好带上通信参谋，亲临火线：古洛大到坦克团；我到巴丘克师；参谋长克雷洛夫到戈里什纳师指挥所。

即使到了第一线，仍难免不能掌握战斗的全貌。因为烟上滚滚，不便观察。晚间，我们回到指挥所时，又发现司令部里牺牲了不少参谋人员。

直到深夜，我们才确实地掌握到一些具体情况。情况是严重的。敌人不顾重大伤亡，已经穿过了我们的雷场，突破了我们的第一线防御，在若干地段上已经向东推进 2—3 公里。当时我心里想，“如果敌人再组织这么一次进攻，我们就要被赶到伏尔加河里去了。”

坦克军和叶尔莫勒金师的左翼遭到敌人主力的突击，伤亡和损失十分严重。至 9 月 27 日终前，其残部尚能防守下列地区：梅切特卡河大桥、巴里卡德镇以西 2.5 公里处、巴里卡德镇的西南部、红十月镇西郊，直至班内冲沟。敌人已经占领沙赫持大街、热杰夫大街 107.5 高地。

这时戈里什纳师已被迫撤离马马耶夫山岗顶部。该师各战斗分队虽已残缺不全，但仍然继续顽强地组织防御，占据山岗的东北坡。

在集团军其它各地段上，敌人的进攻均已被击退。

10 月 8 日，敌人开始准备新的进攻，我们得知，希特勒已经向他们的仆从国发出诺言，要在近日内拿下斯大林格勒。

我们近卫战士的力量在于，他们不但勇敢，而且也打得精巧；少浪费弹药，多歼灭敌人。要使我们祖国人民交给我们的武器能发挥更大的效能。这些日子里，成千上万的战士们表现出大胆果敢，英勇善战的精神；不但如此，他们还能十分熟练地使用各种武器。

62 集团军的战士们当时有个信念：只能歼灭敌人，不能向后撤退；为了保卫祖国的土地，要寸土必争。

在伏尔加河上负责搞运输的同志中，也是英雄倍出！

在伏尔加河上工作的人，每时每刻都要同死亡打交道。他们冒着枪林弹雨，驾驶小船在河上渡来渡去。确实需要过人的勇气和钢铁般的意志，我们的船工和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水兵们为了把粮食和弹药源源不断地运往斯大林

格勒，昼夜不停地往返于伏尔加河两岸之间。

这时，在整个集团军的防御正面上，敌人的局部性进攻还是时有发生。其目的是，一方面在集团军全正面上进行武装侦察；另一方面企图把我军的机动范围束缚在沿伏尔加河右岸的一个纵深不大的狭长地带。为了对付敌人这种行动，我们的强击群在集团军全正面上不断出击，对盘踞在楼房内的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同时，我们的神枪手（全集团军大约有四百名），四处出动，以冷枪冷炮打得敌人不敢走出掩蔽工事，在这些行动的掩护下，我军终于完成了兵力调动，加强了工厂地域的防御力量。

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曾命令他的军队在整个苏德战场上转入防御，惟独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例外。而且正向这里增调兵力，准备再发动一次强攻。对斯大林格勒发动强大攻势，这已经是第三次了。希特勒这次的企图，是取得决定性胜利。我们于10月13日，对此就有预感。据侦察部门了解仅在城市工厂区的当面，鲍卢斯就集中3个步兵师和2个坦克师。这5个师展开的正面，只有5公里。这确实是一次十分有力量的强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异常残酷的一天，开始了。

传令兵鲍里斯·斯科尔尼亚科夫给我斟了一杯浓茶，我一口气喝下去，便匆匆地离开了掩蔽部。外面很亮，太阳照得我几乎睁不开眼睛。这时我遇上了司令部和指挥所的警卫长格拉德舍夫少校。我们一起向北走了几十米，便到了司令部各处的所在地。只见这个陡峭的伏尔加河右岸上，尽是临时构筑起来的一些掩体和洞穴，司令部各机关都挤在里面。我走进一个洞穴。里面摆着一个图拉式茶炊，上面架着一个自制的小烟筒，不断地冒着烟。茶炊旁边坐着集团军炮兵司令波让尔斯基将军。他是图拉省人。在整个战争中，他一直随身带着这个“小老乡”——图拉式茶炊。因为他有饮浓茶的癖好。

敌人的航空兵以及坦克和步兵毕竟是占有优势。因此，有时能够将我某些防御基点突破。第62集团军实际上已经被割裂成两段。拖拉机工厂和“巴里卡德”工厂之间有将近1.5公里的距离。敌人对这个地段进行了严密的封锁。敌人还以火力封锁了通往伏尔加河的杰涅日纳亚河叉的所有冲沟。我们的通信参谋根本无法经过这里去联络拖拉机厂。我们从自己的指挥所对拖拉机厂看得一清二楚，可是对该厂车间里进行的战斗却一点儿也观察不到，我们唯一能办到的，就是进行炮火支援。对于炮兵的指挥，始终掌握在我们的手里。

战斗接连不断，日以继夜地进行着。

在各处进行防御的部队和分队，都已经陷于孤立无援，四面被围的困境中。

10月15日午夜查明，法西斯强盗们已经把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工厂从四面八方包围起来，战斗已经转入了各个车间的内部。

可是我得到的答复是：“决不允许。”

况且，我们集团军的掩蔽部这时越来越拥挤不堪。因为若卢杰夫师的司令部和坦克第84旅的司令部先后遭到破坏。那里的人员纷纷来到集团军掩蔽部。他们在这里既能躲蔽轰炸，也多少能够联系自己的分队。

我出于万般无奈，只好担着风险吩咐炮兵司令波让尔斯基将军转移到左岸去，从那里指挥自己的炮兵，可是，他一听就坚决反对，急得几乎流出眼泪，他说。

“不，我不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死也在一起。”

他不肯去，我只好让步，其实，他若转移到左岸，更能便于对炮兵进行指挥。

从各部队不断送来令人担心的报告，不少人请求支援，还有人请示如何处置具体问题，等等。

对于这些事，我们一律作了简单而明确的答复：

“竭尽全力，战斗到底，不准离开岗位！”

我们的伤亡是巨大的。10月15日，若卢杰夫师和戈里什纳师的步兵战斗成员损失约百分之七十五。然而，在这一天内敌人进攻没有进展，各次冲击均被击退。敌人共损失33辆坦克和大约三个营的步兵。

从10月15日开始，敌人又投入新锐兵力（步兵第305师），并继续沿伏尔加河分别向南、北两个方向发展进攻。敌人的炮火能覆盖我军战斗队形的全纵深，航空兵继续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

我集团军虽已被割裂成南北两部，但仍在坚持战斗。北部集团的兵力，包括步兵第124、第149、第115旅以及叶尔莫尔金师的部队，已经陷入合围。敌人分别从三个方向对他们实施进攻：从北面的拉塔尚卡；从西面沿莫克拉亚山谷，从拖拉机工厂。

鲍卢斯的战术十分明显。他是竭力想把我军主力吸引在工厂地域，把我们牵制在这里，同时悄悄地准备力量，在新的地段上实施突击。

然而敌人这一招并没有得逞，我们对此并未失去警惕，我们的侦察兵及时查明了敌人的企图。敌人实施进攻时、所到之处，都碰上了我们预有准备的防御。

例如10月16日白天，敌人的大批步兵在坦克的支援下沿拖拉机工厂和“巴里卡德”工厂之间的道路开始实施冲击。这个方向，正是敌人的主要的、带有决定性的突击方向。可是敌人一开始，就遭到了第84旅设伏坦克的袭击。在电车大街及其以西地域。我军坦克在100—200米的距离上，以密集的火力抗击敌人的冲击，敌人的10多辆坦克顿时被击中着火。趁着敌人的步兵和坦克进攻受阻，我军左岸的炮兵开了火，狠狠地消灭敌人。

希特勒的将军们远离战场进行指挥。他们对战场情况并不十分了解，只是一味盲目地增调部队，出动大量兵力轮番进攻我防御地区。这些部队遭到我“卡秋莎”火箭炮强大火力突击后，进攻受阻，损失惨重。敌人的坦克遭到我军T—34坦克的伏击和反坦克火炮的致命打击后，丢下步兵，自己逃命去了。

集团军装甲坦克兵副司令已音卢布和坦克第84旅旅长别雷对于抗击敌人的进攻，早有准备。他们给敌人准备了一个啃不动的“硬果”。直到当天下午，德军指挥部才醒悟过来，知道是碰了钉子，于是便出动了航空兵。在集团军的其它防御地段上，敌人的进攻也被击退。第一天我们打得很成功，没有让敌人前进一步。

10月16日夜，柳德尼科夫师的其余两个团也来到了伏尔加河右岸。我们当即将其投入战斗。这两个团在沃尔霍夫斯基大街、“巴里卡德”工厂和雕塑群大街一带与若卢杰夫师和戈里什纳师的零散部队会合。柳德尼科夫师的司令部也设在了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掩蔽部里，因为他们无处可去。

我与军事委员会委员占洛夫赶到码头上去迎接。四周轰轰隆隆的爆炸声连成一片。德寇的6管火箭炮不停地轰击伏尔加河。许许多多负伤的人员吃力地向渡口和码头移动。我们在中途下时地迈过死人的尸体，因为不知道方

面军司令员的快艇在哪里靠岸，我们沿河岸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只好返回掩蔽部。回来后，使我们十分吃惊的是，叶廖缅科和波波夫已经来到我们的指挥所。

见到我们这里凄惨、狼狈的景象，他俩十分吃惊。指挥所的掩蔽部由于不断遭到袭击，已被炸得露了天，还剩下几个圆木，光秃秃地立在那里。这里的物件都落满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和一些被烧得焦糊的东西。

拂晓时，当方面军司令员要离开的时候，我请求他多给我们补充一些人员。我特别提出，不是要成建制的师，而是希望从预备队调给我们补充战斗分队。另外，请求多给我补充弹药。

“好吧，满足你们这个要求”他临离开时这样说，同时还建议我们，由于138师已经到达，应当把集团军的指挥所转移一下。转移的地点是，沿伏尔加河右岸向南靠一靠。

10月17日整天，防御战斗进行得十分残酷、激烈。我军的北部集团军一直在合围圈内坚持战斗。20多辆德寇坦克在冲锋枪手的配合下，已经冲到斯帕尔塔诺夫的南部边缘。那里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如果指挥员们稍欠沉着和坚定。整个北部集团军就有遭到毁灭的危险。

我步兵第125、第115和第149旅的部队和分队仍在坚守雷诺克和斯帕尔塔诺夫镇。可是敌人多次传出消息，说这些部队“已经被完全消灭。”这些假情报，只有在希特勒司令部的报告中才经常出现。

德军B集团军群司令冯·魏克斯给希特勒大本营写的一份报告中说：

“被包围在斯帕尔塔诺夫卡镇的苏军部队已经被歼灭”。而10月20日德军总参谋长却向希特勒报告说：“坦克第16师和步兵第94师的部队已突入斯帕尔塔诺夫卡镇，并占领了一个建筑群。”（看，这就是所谓的“歼灭”！）

德军第4航空队司令里希特霍芬在10月19日的一份作战日志中写道：

“在斯大林格勒根本无法确实地掌握情况。一般他讲，各师都报告顺利的情况。不过有时也各有不同。有一个师报告，在斯大林格勒以北的斯帕尔塔诺夫卡进攻时受挫。

第7航空军司令菲比格将军感到悲观失望，因为步兵不能利用他的飞机取得战果。

里希特霍芬谴责鲍卢斯和赛得利茨。他说，德军步兵在俄国人面前显得束手无策。航空兵对俄国人进行了轰炸。但德军步兵就是不能及时利用轰炸的效果。其实，需要继续推进的距离，只相当于手榴弹的投掷距离”。

沃尔夫甘·韦尔坚在《第16坦克师的经历》一书中写道：

“第16坦克师的任务，当时是集中全力进攻雷诺克。伯爵·唐的各团以25辆坦克，对雷诺克的进攻失败了。该师遭受重大损失，该师的四百多名官兵埋葬在野战公墓。”

第124和第115旅的旅长们给我们打来一份电报，请求准许他们的司令部转移到斯波尔内岛。我回答他们说，离开伏尔加河右岸就等于逃脱战场。随后，我又把作战处长卡梅宁派往北部集团，以便进一步说明我的意见和了解一下那里的情况。

此时，敌人继续向南进攻，由拖拉机工厂向“巴里卡德”工厂实施冲击。敌人的航空兵（有数百架俯冲飞机和轰炸机）轰炸和扫射了坦克第84旅集结的地段。楼房起了火，大地也在燃烧；在该地域的设伏坦克被击毁，也燃起熊熊大火；人员不断遭到损伤，兵器不断遭到破坏，原因是我们的坦克兵没

有得到高射炮的严密的掩护。

这里成为我集团军指挥所最后一个转移点，直到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时，我们才离开。

前面我说过，我曾派集团军司令部作战处长卡梅宁前往北部集团，现在（10月18日）他从那里送来报告。他说，那里的情况是严重的，但是并不是没有希望了。因为突入斯帕尔塔诺夫卡的敌人已经被歼灭。目前北部集团的部队正在以下地区进行防御：雷诺克镇北郊、斯帕尔塔诺夫卡的西部和南部，以及靠近莫克拉亚梅切特卡河口的一个码头。这个消息使我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暂时不再担心集团军右翼的安全了。

这一天的主要战斗仍是继续争夺“巴里卡德”工厂，而且向南发展到了“红十月”工厂。柳德尼科夫师，若卢杰夫师和占尔季耶夫师的部队，一整夜和一整夜，都在抗击敌人从北面向“巴里卡德”工厂和雕塑群公园发起的冲击，下午3时，敌人在杰列文斯基大街以南突破我阵地，并进至伏尔加河。我军第650团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消灭了突入之敌，恢复了原态势。

日终前，敌人以坦克和步兵沿电车大街实施了突击，突破我军阵地，并进至“巴里卡德”工厂以西的铁路线。该工厂的工人支队当即与敌人展开了激战，战斗一直继续了数个昼夜。战斗结束时，工人支队里只剩下5名同志。

10月19日和20日，集团军击退了敌人对斯帕尔塔诺夫卡、“巴里卡德”工厂和“红十月”工厂的进攻。在这两天两夜之中，敌人的进攻并未取得多大战果。

因为我军昼夜都在活动，因此也迫使敌人不但在白天，同时也在夜间进攻，但是敌人夜间实施进攻，通常得不到航空兵的支援，常常没有什么效果，有时进攻的行动仅限于火力战。

不过我们也清楚地看到，敌人在巴里卡德镇和107.5高地地域集结兵力。敌人正准备集中新锐力量，再次发动进攻。那么我们就要精确地计算自己的兵力，既要准备抗击敌人接连不断的进攻，又要准备抗击敌人可能在新的方向实施的进攻。

为了补充人员的伤亡，我们只能从集团军的后勤部队中抽调人员，以及依靠各师卫生营中恢复健康的伤病员。我们还对机关和勤杂人员进行了精简。把一批司令部参谋人员调到后方去；让一个饲养员管5—7匹马；压缩了修理所和仓库的人员。我们还把负责搞缝纫、修鞋以及其它技术工作的战士编成补充连，调到伏尔加河右岸的前线上去。这些人原来战斗素质很差，有的甚至根本没受过训练。可是当他们来到斯大林格勒城，经过实战的锻炼。很快都成了打巷战的能手，这里紧张而残酷的环境，迫使每个人都去亲身体验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实质。

在这两天内，敌人共损失坦克15辆，步兵一千余人。敌我阵地之间已经非常靠近，我甚至能够使用喷火器，在百米之内以火焰消灭敌人。

10月23日，敌人的步兵第79师，在进行人员补充和加强了坦克之后，在大批飞机的掩护下发动了进攻。某主要突击指向中央大街。卡鲁赛尔大街和“红十月”工厂。如今的战个重心已转到“巴里卡德”工厂至班内冲沟的地段上。

日终前，法西斯强盗们付出重大代价，突入斯塔利大街（通往面包工厂），并且越过了堆满破烂车厢的工厂的专用铁路线。兵力约为一个连的小股敌人，已经穿插到“红十月”工厂的西北角。

战斗前沿距离伏尔如河岸还只有 300—500 米。集团军的最后一个渡口受到了严重威胁。

晚间，我军在暮色之中，对集结在“红十月”工厂接近地上的敌人步兵和坦克，进行了猛烈炮击，稍微迟滞了敌人的进攻，并减轻了我防御部队的压力。

敌人于 10 月 18 日至 23 日间，是以主力进攻“巴里卡德”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卡，可是从 10 月 24 日起，集中了更多的兵力进攻“红十月”工厂。这里的战斗越打越激烈，越打越残酷。

不过，当敌人遭到我军战士越来越顽强的抵抗之后，鲍卢斯的冲击力就明显地减弱了。这种结论，我是在签署 1942 年 10 月 24 日的战报时提出来的。战报中写道：

“在集团军防御的北段和中段，整日进行着艰苦的防御战。南段与我作战的只是敌人的小股步兵。

上午 11 时，敌人在进行了猛烈的航空兵火力和炮兵火力准备之后，以新锐的坦克和步兵部队，对于“巴里卡德”工厂、“红十月”工厂和斯帕尔塔诺夫镇重新发起进攻。

我北部集团在一天之内击退了敌人的各次进攻；入夜后驱逐了渗透进来的小股敌人，全部攻占斯帕尔塔诺夫镇。

敌人出动新锐的步兵和坦克部队，自图皮科夫大街地域沿红色刊物大街向“红十月”工厂北部边缘频繁实施进攻；同时，以部分兵力沿斯塔利大街实施进攻，力图进至伏尔加河。我步兵第 193 师从上午 11 时起，不断抗击敌人的各次进攻。下午 6 时，敌人的坦克进至步兵第 895 团指挥所，跟随敌人坦克实施进攻的步兵已楔入该团兵力薄弱的战斗队形。目前战斗正在继续进行。

我的决心是：

从步兵第 45 师抽调两个营，分别配属给近卫步兵第 193 师和第 39 师（每师一个营）。两个师的任务是：恢复沿铁路线，沿射韦尔大街和图皮科夫大街一带的防线；并制止敌人继续向前推进。

根据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和当前的战斗进程可以看出，敌我双方的兵力均已消耗殆尽。在 10 天的战斗中，敌人再次把我集团军分割为两段，并夺取了拖拉机工厂。但是，敌人并未能消灭我集团军主力。

敌人眼下的兵力、兵器还不足以消灭我集团军主力，他们还需顺从纵深调遣预备队，甚至从德国本土调遣新锐部队，集团军当面不断出现德寇的新锐师，敌人甚至把一些独立团和独立营空运到这里，不过其兵力必竟有限。敌人在宽大的正面上从各种不同的部队把这些独立营（特别是工兵营）抽调出来，匆匆地投入战斗，交战之后，很快就葬身于战火之中了。

不过，希特勒是不甘心轻易放弃战争主动权的。尽管他现在已经力下从心，还是力争再发动进攻，同我们较量一次。

希特勒 9 月底在国会上的一次讲话中说，“我们正在强攻斯大林格勒，我们一定能拿下它。这一点，你们尽管放心，我们一旦占领了什么地方，肯定能使那里固若金汤。”

戈培尔在同土耳其记者们的一次谈话中说：“我可以满怀信心地对你们说，入冬之前俄国军队对于德国不会有更大的危险。我说这话，并不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每谈及此事，我总是确信，我是了解事实真相的。我请你们几个月后能再想起这一点。”

可以确信，希特勒和戈培尔对于直接在斯大林格勒参加战斗的官兵的情绪是了解的，我们从德寇军官9月和10月的一些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事情的各种看法，其中有些人看来还没有尝到斯大林格勒战斗的味道。例如，德军中尉·海内斯在10月初写道：“我们正在强攻斯大林格勒。元首说：‘斯大林格勒应当陷落。’我们回答说：‘一定会陷落’。斯大林格勒很快就要落入我们手里了。伏尔加河将是我们今年的前线。”

从10月24日开始，敌人减少了夜间的进攻。想必是敌人夜间进攻没有讨到什么便宜，决定夜间休息，准备次日白天进攻。我们则相反，我们恰恰是充分利用夜间。在夜间出动强击群，并以炮兵和航空兵进行突然的袭击，搞得敌人整夜不得安宁，无法进行次日的进攻准备。夜间变成了我们的天下。

10月25日白天，敌人又出动重兵全面发起进攻。敌人出动一个师的兵力，在坦克配合下，进攻斯帕尔塔诺夫镇，对我北部集—99—团造成严重威胁。

敌人的步兵在坦克和航空兵的支援下，迫使我步兵第149旅后退，并占领古姆拉克——弗拉基米尔铁路以南地域和斯帕尔塔诺夫卡镇中心。伏尔加河区舰队赶来支援，使用舰炮火力重创敌人。

10月25日，第64集团军右翼部队在库波罗斯诺那地域转入进攻。

敌人于10月26日和27日连续实施进攻，均未能取得战果。博尔维诺夫的第149旅，在伏尔加河区舰队的支援下，把敌人赶出了斯帕尔塔诺夫卡镇。

10月26日夜，步兵第45师各团开始陆续到达伏尔加河左岸。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该师已编入第62集团军的序列。当天夜里，我们只组织该师两个营渡过伏尔加河，其余部队已撤离左岸，到达阿赫图巴，以避免造成无谓的伤亡。

10月14日至27日期间，第62集团军的兵力受到极大的削弱，甚至从前沿上抽调一个班也是困难的，我们已经没有一点机动兵力了。

而鲍卢斯还有机动力量。他可以从战斗不太激烈的地段上抽出兵力对付我们。我们已经没有预备队了；而沿着狭窄的河岸进行机动，根本是不可能的。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没有任何警卫分队。我原来手里辽控着预备团的一个教导营（任务是为部队培训军士）。这个营，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肯动用的。如今我把它也投入工区的战斗了。

集团军装甲坦克兵副司令已音卢布在头天夜里，为了给这3辆坦克选择良好的出发地区，在伏尔加河陡峭的岸坡上整整奔波了一个通宵。

反冲击是拂晓前开始的，此次行动得到了左岸的炮兵和叶罗申的“卡秋莎”火箭炮团的支援。通过这次反冲击，虽然没有占领多少地盘，战果还是不小的。我们的喷火坦克烧毁了敌人3辆坦克；我们的两辆轻型坦克压制住了两个堑壕的敌人，步兵趁势占领了这两个堑壕。

希特勒分子们开始在无线电台人谈俄国人的坦克。据无线电截听员报告说，敌人在无线电台用明码报告关于俄国人坦克的消息，看来敌人是向他们上级指挥机关解释夫利的原因。我们在该地段上赢得了一整天的时间。集团军其它防御地段上，这两天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敌人只在“巴里卡德”工厂地域，经过多次冲击后，进至诺沃谢利大街。在这里，敌人个别步兵分队曾进至伏尔加河岸边，但经白刃格斗，已被我军消灭。

希特勒不断从其它战线上抽调人员和技术装备。整个苏德战场上的败局，渐渐地出现在他面前。

希特勒并没有放弃进攻。在伏尔加河和高加索，主动权还掌握在他手里。不过，侵略者进攻的失败，通常也正是崩溃的开始。

众所周知，希特勒对于幕僚 10 月份提出在斯大林格勒转入防御的建议，根本充耳不闻。他继续不断地把军队投入战火。他总是不相信，血腥的进攻已经破产。

在 1942 年的战局中，希特勒已经失掉了战争的主动权。

10 月底的战争中，在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艰苦的日子里，胜利的种子正在萌芽。

11 月初，战斗的激烈程度有所减弱。侦察兵已经能够渗透到敌人的配置地域。他们发现敌人没有任何准备撤离斯大林格勒的迹象。相反，鲍卢斯准备再实施一次进攻。强攻斯大林格勒。我们关切的是，在我们大反攻开始之前，敌人是否来得及实施一次进攻？对于我们何时开始大反攻，不能作任何的猜测。我同方面军司令员交谈时，也不便涉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晓得，实施反攻的时间，是当前苏联红军最大的机密。

如今我们已经知道，希特勒当初在斯大林格勒地区集中了一支十分强大的军队，而且还能接连不断地增强这支军队的力量。希特勒指挥部不拿下斯大林格勒，决不肯善罢甘休，这恐怕与他们依仗实力雄厚，有一定关系。

为了具体说明他们当时的兵力，我在这里引用一些数字。

在斯大林格勒方向实施进攻的日集团军群，7 月份只有 33 个师，到了 10 月底增加到 81 个师。

B 集团军群得到的加强兵力，基本上来源于正在向高加索进攻的 A 集团军群。A 集团军群开始进攻时，编有 60 个师，到 10 月份，只剩下 29 个师。

此外，从中部战场，从沃罗沃日、法国和德国还向斯大林格勒增调许多独立部队。

汉斯·焦尔对于 11 月份的事件的叙述，多少还有点真理。

毫无疑问，到了 11 月份德军继续强攻斯大林格勒的实际意义，已经不在于军事方面。政治上的考虑，取代了军事方面的考虑。威信上的得失，总是专制制度至关痛痒的大事。当然，在德国将军中间普遍存在着对苏联人民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偏见。

11 月初，我们面临着一项任务，就是要紧紧地拖住敌人，以全部兵力不断地骚扰敌人，使他们一时也不得安宁；一旦敌人决定撤离斯大林格勒，就把他们紧紧抓住。

为此，我真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经验、本领和勇气。我们的强击群昼夜出动，打得敌人寝食不安。同时还夺回了几栋楼和整个的街区，迫使敌人分散兵力，消耗预备队。德寇躲在占领的楼房里，提心吊胆，如坐针毡，不知道什么时候挨打，什么时候与大楼一起飞上天。

不过，我们并没有忘记随时准备抗击敌人新的进攻，据侦察兵报告，敌人正在已里尔德镇和红十月镇地域集结兵力。11 月份天气已冷。寒冷的天气像是把敌人逼进了城。城里有苏军，德寇想尽快把我们干掉，以便让他们安安稳稳地躲进暖和的地下室。我在 11 月 4 日的一篇日记中写道：

“敌人在近日内还将同我们继续展开激战，敌人不断动用新锐力量，兵力约为两个步兵师。不过，看来敌人已经把最后的一点力量拿出来了。”

连日来，集团军只出动兵力不大的强击群，通过节约兵力的方法，编组了一些预备队。在伏尔加河左岸，我们已经有两个步兵团和戈里什纳师的司令部（在左岸已经补充完毕）兵员是从远东地区海军调来的。

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节日快到了。

我们估计敌人会实施新的进攻，扰乱我们的节日。因为，古姆拉克和沃罗波诺沃车站上，敌人还掌握着预备队。但今天我们对于敌人的进攻，并不那么担心了。我们心中有数，敌人要想发动一次像10月份那样的进攻，确实需要时间和力量；而时间如今对我们有利。在战时，我们的部队尽管被敌人冲得四分五裂。孤立无援，他们仍能采取自发的方式和我们联系，人们管它叫“战士通报”。例如，像大批军队已开到伏尔加河和顿河；又如，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以及其他同志已来到前线等消息。就是这种“战士通报”经过各式各样的渠道，传到我们这里来的。

“当我们在斯大林格勒方向集中全部精力准备反攻时，扼守斯大林格勒的部队的处境继续恶化，经过一段时间的歇息后，11月1日，敌人恢复了对崔可夫的第62集团军的猛烈攻击，同时把以前同顿河方面军对峙的部队调到这里。尽管敌人遇到抵抗，日终前还是占领了巴里卡德工厂南部，并由这里进至伏尔加河，第62集团军的处境，由于伏尔加河开始结冰而更加严重了。”

直到11月15日夜我们才派出“夜航”飞机用降落伞给柳德尼科夫投下4包粮食和4包弹药。11月19日夜里，我们的4艘装甲快艇终于顺着一条小河流（杰涅日纳亚河）开到了该师防守的岸边，送去一些弹药和药品，队那里运走了150名伤员。

有的时候，这些船只在夜间来不及返回左岸，而白天沿着德寇占领的河岸行驶又十分危险。因此，白天就暂时隐蔽在我们右岸。四周白雪皑皑，河上的冰也是白色的。为了伪装，我们把船只用降落伞，白床单、白布袋等东西遮盖起来。

我们一直担心柳德尼科夫师的处境，于是决定派出兵力解围。我们拿出来最后一点兵力，日以继夜地对在柳德尼科夫师和集团军主力之间进入伏尔加河的敌人连续地实施反冲击。

同时，我们各师不断派出小规模强击群沿集团军全正面，四处出击，夺回德寇占领的楼房和掩蔽部。北部集团从北面向拖拉机厂出击；索科洛夫师和古里耶夫师向“红十月”工厂出击；巴丘克师和步兵第92旅向马马耶夫大山岗出击；罗季姆采夫在城内四处活动，专门攻击敌人占领的楼房，我们的进攻每于连接不断。强击群开始能够夺到战利品和抓到俘虏了。

11月18日晚，古洛夫、克雷洛夫、波让尔斯基、巴音卢布、瓦西里耶夫等同志聚会在我的掩蔽部里，讨论在当前兵力快要枯竭的情况下，我们还能拿出多少力量主动出击。正在这时，电话铃响了，通知我们立刻准备接受命令。我们不由惊异地彼此看了一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

“命令的内容会是什么？”每个人都在这样想。

古洛夫突然用一只手拍着前额说：

“我知道了，这道命令一定是关于大反攻的！”

我走到通信枢纽，当我们焦急地等待的时候，“博多”式电报机在哒哒地响，敲打出那道命令的各项内容。

我们盼望已久的事，在午夜12时左右终于到来了！

字母快速地蹦出来，字母又连成行，电键又把一行一行的字，连成词句，

命令中一项一项的内容出来了。

我的心颤抖了一下。

方面军的命令！

这道命令中显露出苏军最高统帅全部企图的轮廓。电报中说，西南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于11月19日晨从克列茨卡亚、伊洛夫林斯卡亚地域发起反攻，总的方向指向卡拉奇；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反攻开始的时间迟一天（即11月20日），从列伊戈罗德、萨尔帕湖、察察湖、巴尔曼察克湖地域出发，总的方向指向苏维埃镇，至卡拉奇。任务是突破敌人的防线，合围并歼灭敌人。

命令中谈的是反攻，是合围那些集中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敌人全部兵力，是把这些敌人全部歼灭。这次战役的意义超出了地区性，由3个方面军一起转入进攻。就是说，最高统帅部已经为实施这一强大突击，积蓄，证集和集中了大量军队。我们坚守城市的斗争；即在斯大林格勒的艰苦阻击战已经接近尾声。当敌人越来越深地陷入巷战之中的时候，并把一批一批的部队投入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我军强大的力量已经逼近敌人的两翼。

“决下后退一步！”和“伏尔加河后面没有我们的退路！”两个口号有了新的内容。

“决不后退一步！”现在意味着：“要勇往直前！”

“伏尔加河后面没有我们的退路！”意味着，“向西方挺进！”

通过斯大林格勒的防御战，在我的思想上牢固地树立起一条不可动摇的信念，那就是任何战斗的结局归根到底取决于士气。为了证实这个结论，用不着去寻找很多实例。9、10月间，鲍卢斯在人员、坦克和炮兵方面占有数倍于我的优势，在占有制主权的航空兵掩护下，对我防御阵地实施突击。在敌人面前，斯大林格勒保卫者们的士气没有消沉过。相反，敌人进攻越是猖狂。我们的战士越是打得勇猛顽强，即使剩下几个战斗小组，甚至剩下一个人，也是如此。

原因何在？我们的战士们坚定，顽强战斗精神的源泉是什么？

在回答这类问题时，希特勒的战略家们一定断言，我军曾有某种防御工事和特殊武器。

是的，我们每个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确实人人都装备着一种武器，一种特大威力的武器，是法西斯强盗们下曾有过，也不可能有的武器，我们相信能取得胜利，并认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是在捍卫进步的社会制度，在捍卫子孙万代的幸福生活。我们从来没有丧失过这一信念，敌人定会被击败！这不是空口号，而是我们始终不渝的信仰，这是我战斗力的源泉，英勇作战的动力。

斯大林格勒方向上进行大规模交战的时机，已见成熟时，成千上万的有丰富的党政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被输送到我们方面军的各个部队。第62集团军里，从全国各地应征入伍的9000名共产党员当中有500名原来都是地方党各级组织的负责人，他们有的是区委、省委、市委书记和部门的负责人；也有的是集体农庄、工厂企业以及其它部门党组织的书记。

我前面提到过，在集团军里，党的力量分布在各个重要的地段上，这就是说，政治工作同集团军的任务，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这对于部队执行战斗命令，起了保障作用。

全集团军的共产党员通过不懈的努力，狠抓了部队的思想建设，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他们的事迹还多得很，我这里涉及的只是一小部分。这

些党员同志已成为部队的主导力量，他们巩固了部队。在战斗中，他们冲锋在先；在白刃格斗中，他们最拼命；在冲击时，他们最坚决；在强击群活动中，他们最勇敢；在防御中，他们最坚定顽强，百折不挠。

对共青团的领导，是集团军党组织工作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

写斯大林格勒交成的参加者，实际上是写青年人。写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以自己的胸膛捍卫伏尔加河，捍卫可爱的祖国的事迹；写苏联青年对祖国对共产党的无限忠心；写整个青年一代那种不屈不挠的性格；写他们勇敢豪迈的精神和精诚团结的高尚品质。

我们第 62 集团军的部队尽管失去了良好的机动条件，但我常常可以在一夜之间加强兵力薄弱的方向。德寇也常常百思不解，昨天这里还一无所有，或几乎一无所有，为什么到了早晨这里便组织了如此巩固而顽强的防御，甚至组织了反冲击？

希特勒将校军官们的城市进攻战术已经破产。进攻屡次受挫，锐气全失。

战争的转折，如同大自然的变化，乃是大势所趋，势不可挡，当我们牵制着鲍卢斯的大量兵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的废墟上进行防御战时，就深深感觉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为了在斯大林格勒方向粉碎敌人的重兵集团，正在集结力量，准备发动一次有决定意义的进攻。我们转入进攻的那一天，就要到来了。

后来我们了解到，至 1942 年 11 月 19 日，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

苏军方面共有 3 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其中人员 10 万人，各种火炮 1.5 万门，坦克 1463 辆。

敌人在地段上的兵力是：人员 101 万人，各种火炮 1029 门，坦克 675 辆。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苏军在兵力上占优势，特别是在炮兵和坦克方面占优势。这在实施反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

苏军最高统帅部已经集结了必需的预备队，这对敌人来说，是出乎意料的。

敌我双方的航空兵在数量上几乎是均势，但是通过 9 月份，特别是 10 月份的战斗，德军航空兵的发动机的寿命，特别是燃料，基本上已经消耗殆尽。苏军航空兵的发动机的寿命则十分充裕，燃料的供应也十分充足。

11 月 19 日我第 62 集团军战斗队形的纵深不超过 1 公里，后面是伏尔加河，前面是敌人。二者之间是一条狭长的城市废墟，这就是我们的部队坚持战斗的地方。

我集团军主力的右翼是柳德尼科夫师。该师已陷入包围，被压迫在伏尔加河岸，在不到 1 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坚持防御。

集团军左翼是近卫步兵第 13 师。该师沿伏尔加河，在一条狭长的地带上进行防御，其防御纵深只有 200—300 米。集团军司令部设在近卫步兵第 13 师和步兵第 284 师之间，距离战斗前沿 800—1000 米，我的观察所距离前沿更近，设在从东面绕过马耶夫山岗的一条铁路路堤上，就在敌人的鼻子底下。

集团军防御正面宽度约为 25 公里。炮兵火力可以从一翼侧打到另一翼侧。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可以用机枪火力打穿。更为严重的是，这块狭长的地段全被马耶夫山岗的顶部所控制，就是说，供水塔和 107.5 高地控制在敌人的手里。敌人可以从这里瞰视从东面通往伏尔加河左岸的各条通道。因此，

向城内运送弹药、装备和食品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

在这种困难面前，我们当然不能垂手待毙。我们集团军给自己规定两条刻不容缓的任务：一是消灭进至伏尔加河的敌人，与柳德尼科夫师会合；二是夺回马马耶夫山岗和 107.5 高地，把防御纵深扩大到 4.5 公里，并打掉敌人的观察所，使敌人再不能通视我集团军的战斗队形和通往伏尔加河的通道。

为了遂行这两项任务，必须给部队补充人员和弹药，要求上级给集团军加强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实施艰苦的防御战的日子里，方面军指挥部几乎什么都没有给过我们。很明显，这次马上要进行反攻。反攻之前，既未给我们补充部队，也没有给我们加强坦克，弹药给的也有限。

因此我们不得下自己尽量挖掘潜力。部队的人员补充，主要依靠已经恢复健康的伤员。这些同志情绪十分高涨，纷纷要求返回部队，返回城里。在这些日子里，第 62 集团军由于战功累累，已经扬名在外。部队的光荣，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老战士的心。

至于对弹药和人员补充以及坦克的加强，我们只能想往而已。目前经过伏尔加河运送物资，仍然十分困难，从 11 月 12 日至 19 日，伏尔加河河面上仍然有冰块流动，一连数日，快艇和汽轮都由于河面上的冰块，而不能出航。

进攻的序幕很快就要拉开了。

11 月 19 日 7 时 20 分，集中在主要突破地段（总的宽度为 28 公里）的各种人炮，按规定的时间，已经做好战斗准备。7 时 30 分发出射击的口令。刹那间，3500 门各种火炮把成吨的钢铁和炸药倾泻在敌人的阵地上。共进行 1 小时的破坏射击和 20 分钟的压制射击。

自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我军还是第一次实施如此强大的火力突击。

我军的炮火突击使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

8 时 50 分，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 5 集团军和第 21 集团军的步兵和坦克，以及顿河方面军第 65 集团军的突击集团同时转入进攻。

坦克第 5 集团军的快速集群（坦克第 1 和第 26 军）和第 21 集团军的坦克第 4 军，于进攻的第一天中午就完成了对敌战术防御的突破，并前出到战役广场，在敌人防御纵深内展开了战斗。我军在克服了敌人的抵抗之后，顺利地发展了进攻。

那么在鲍卢斯的司令部里，这一天是怎么过的呢？

11 月 18 日和 19 日，鲍卢斯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实施了进攻战斗。汉斯·焦尔在他们的《进军斯大林格勒》一书中可以证实。他写道：

“在这一天（11 月 19 日），第 6 集团军还没有感觉到直接的威胁。因此该集团军的指挥部并没有意识到要采取坚决的措施。于当天下午 6 时，集团军指挥部宣称，于 11 月 20 日继续出动侦察分队。”

我们在这里，除以较弱的兵力牵制敌人之外，别的却无所做为。我们盼望着从西面进攻的部队，能到达这里与我们会合。

鲍卢斯慌了手脚。他 11 月 22 日下午 6 时给 B 集团军群司令部发了一封电报。

“集团军已经被合围，燃料储备已快用完。坦克和重炮在这种情况下，将无法开动。弹药供应面临绝境。粮食只能供 6 天食用。”鲍卢斯如此紧张。

可是，我们的合围圈，这时还并没有封闭起来呢！

鲍卢斯在向上级描绘第6集团军的处境时，是想要给予他放弃斯大林格勒的决定权。

对于鲍卢斯这种企图，希特勒主动作出了反应。他的回答是：

“第6集团军应原地组织环形防御，等待从外面进行包围。”

11月22日日终前，我们已经通过许多渠道得到消息，我们的进攻发展很顺利。11月23日下午4时，西南方面军的坦克第4军（克拉夫琴科少将指挥）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机械化第4军沃尔斯基少将指挥）已经在苏维埃农庄地域会师。

合围圈已被封闭。陷入我军合围圈的有德寇的第6集团军和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分兵力，共22个师，总人数为33万人。

战后，围绕着鲍卢斯集团军达成台围的若干事件，对于如何评价1942年11月底的情况，在理论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方的一些历史学家至今还大肆宣扬一种设想：假如当初希特勒给了鲍卢斯行动上的自由，假如鲍卢斯把军队撤出了合围圈，那么情况会是怎样？

这些理论上推测的言外之意在于，要把失败的全部责任推在希特勒身上，归罪于希特勒的狂热行为，进而为普鲁士军事理论的失败作辩解。如果不是为了揭穿这种意图，那么这种推测是不值一提的。

德国将军们断定，正是希特勒这个独裁者利用他手中无限的权利，把他们推到了顿河草原和伏尔加河岸，而到了紧急的关头，正是希特勒拒绝一切明智的建议，拿不出一条正确的决心。

我就不怎么相信，希特勒的将军们会在当时提出什么明智的建议。其实，最明智的建议，就是当初不该对苏联发动战争。战端一开，他们就在下明智的、罪恶的道路上越滑越远。他们在全世界面前，在本国人民、本民族面前都是有罪的。

谈到明智二字，我这里下禁要问，就整个斯大林格勒战役而论，拉长交通线，远离主要的供应基地，远离德国本土，千里迢迢赶来，对高加索发动进攻，强攻一座我们要全力保卫的城市，难道这也是明智的吗？再者，把一个集团军拖入巷战之中，反复实施攻击，致使伤亡惨重，两翼空虚，难道这也是明智的吗？当鲍卢斯尚未向大本营接二连三地呈递歇斯底里般的求救电报时，11月份的形势转折已经发生了。11月份发生的事情，早在8、9、10三十月中就打下了基础。这个局面，是斯大林格勒的保卫者们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到了这个时候，大局的趋向已经昭然若揭。

斯大林格勒方向上的各个集团军，都准备参加我们在伏尔加河地区实施的反攻。

让我们看看11月份关键的几天。

11月19日西雨方面军和顿河方面军开始发起进攻。这时鲍卢斯还若无其事，准备进攻。

11月19日德国将军们还没有想到失败这件事情。

11月20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转入进攻。这时，苏军指挥部要对敌人的斯大林格勒集团发动钳形攻势的意图已经明朗化。这时敌人还没有叫喊什么合围、什么灾难之类的东西。因为他们还不相信，我军这时已经学会了实施战役范畴的大规模的歼灭战。当鲍卢斯和B集团军群的指挥部还指望以本身的力量摆脱困境时，苏军的坦克已经在加速紧缩包围圈。鲍卢斯不慌不忙地

把预备队投入了战斗。

到 11 月 22 日，他开始叫喊大难临头。可是为时已晚！

11 月 23 日，合围圈已经封闭起来了。

怎么办？闯出斯大林格勒，突出合围圈吗？

试问，在斯大林格勒的条件下，在城市战斗的条件下，怎么能把军队撤出去？你们考虑过没有？

要想撤走，鲍卢斯的军队就须扔下全部的机动兵器，扔下所有的重型武器和全部火炮。要是这样，敌人在我们的火力控制下突围，能够逃出城市废墟的，恐怕所剩无几了。

当然，不是所有鲍卢斯的军队都被钳制住了。他在城内还有许多部队。他可以把部队集中起来，在狭窄的地段组织突围。比如，他可以在 11 月 23 日或者 24 日这样做，设想他们打开了一个缺口，扔下全部技术兵器和全部炮兵突围出去，进到开阔地。可是燃料呢？鲍卢斯自己也承认，燃料快用光了。

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第 51 集团军和骑兵第 4 集团军各部队已进至格罗莫斯拉夫卡、阿克塞、乌曼采沃，东萨多沃耶地区。采取一系列行动的结果，合围战役从西面和南面都得到保障。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预见到，敌人很可能企图解救被合围的军队，因此及时采取了措施，在一个受威胁的方向上增加了部队。因为敌人仓促间新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群，并接着对该方向实施了突击。

解救鲍卢斯集团军的企图被粉碎了。德寇新建的集团军群也遭到了失败。如今合围圈已经被牢牢地封闭起来了。

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每时每刻都在关注着部队的人员情况：每天一大早就汇总情况，具体了解我集团军损失了多少步枪手、机枪手、坦克兵、炮手和通信兵。集团军的人数逐日减少，但是这并不等于集团军战斗力的减低，正相反，集团军的士气大大地提高了。每次激战之后，信心倍增，战斗经验也在不断地丰富起来。

我集团军已与柳德尼科夫师会台，占领了“红十月”工厂，而且伏尔加河封冻后，河面上已经平静，我后方得到保障，因此我们得到了更多的机动自由，对敌人可能组织更加坚决的突击。

从 11 月 24 日至 30 日，各方面军的军队继续遂行所受领的任务。不过却未能分割和歼灭被合围的敌人。

关于让被合围的鲍卢斯的军队向西南方向突围，还是留在城内固守的问题，在德军的领导人物中有过分歧。希特勒最后作了决定：

“第 6 集团军应在原地固守！这是要害的驻防军。驻防军的职责便是经受住围攻。”

敌人为了便于给被围的军队解围和便于对 A 和 B 两个集团军群进行指挥，新组建了一个“顿河”集团军群，其编成是：罗马尼亚军队和德军混编的“霍利特”集群，罗马尼亚第 3 集团军（由被击溃的德军和罗军的部队混编而成），“霍特”混编集群（以未遭到合围的坦克第 4 集团军的部队和罗马尼亚第 4 集团军的残部为基础编成）。鲍卢斯的集团军也被编入“顿河”集团军群之内，该集团军群由第 4 航空队（约有 500 架飞机）进行支援。“顿河”集团军群由曼施泰因陆军元帅指挥，其受领的任务是解救鲍卢斯的军队。

12 月初，“顿河”集团军群共有的 30 个师（不包括被合围的鲍卢斯的军队），其中除步兵师外，有 6 个师是坦克师，1 个是摩托化师。“顿河”



集团军群中最强有力的是“霍特”集群，该集群曾在顿河和伏尔加河之间，从南面对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实施过进攻。其主力已部署在科捷利尼科沃地域。

戈林曾向希特勒保证，他可以利用航空兵对鲍卢斯的集团军进行全面供应。

为了给被合围的集团军解围，“顿河”集团军群司令决定使用“霍特”集群实施主要突击。“霍特”集群是“顿河”集团军群里的最强大的一支突击力量。它编有坦克第4集团军的部队，从北高加索、沃罗涅日和奥廖尔调来的一些师，还有从德国本土开来的增援部队，这些部队里有一个“虎”式坦克营，每辆坦克均有100毫米装甲，并装备1门88毫米火炮，“霍特”集团开始实施反突击时编有3个坦克师、1个摩托化师、5个步兵师、2个航空兵团、2个骑兵师，还有统帅部预备队的一些部队和分队，该集群受领的任务是：在顿河以东，沿着科捷利尼科沃——斯大林格勒铁路线实施进攻，直接向第6集团军靠拢。反突击开始的时间，定于12月2日。

苏军最高统帅部赋予诸方面军的任务是把合围的对外正面向西推150—200公里。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的左翼应对罗斯托夫、利哈亚实施向心突击。在进攻过程中，准备分别粉碎意大利第8集团军和已撤向奇尔河和顿河的德军部队。这次进攻计划的代号是“土星”。战役是在12月中旬进行准备的。与此同时，顿河方面军和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也接到训令：于最短时间内分割被合围于斯大林格勒的伏尔加河集团，并将其歼灭。我军曾从行间实施突击，但未能成功。我们的军队在过去的战斗中受到很大削弱，而且一下子也很难搞清陷入斯大林格勒大包围圈里的到底有多少兵力。鲍卢斯的军队隐蔽在工事里，并不断加固防御阵地。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紧急调动部队支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从统帅部预备队中调去了近卫第2集团军。（由马利诺夫斯基指挥）。可是事情发生了逆转，我们不得不推迟割裂鲍卢斯集团军的时间。

“顿河”集团军群对斯大林格勒已经准备从两个方向实施突击：一个方向从科捷利尼科沃，另一个从托尔莫辛。同时，诸突击集团也在相互靠拢。

应该承认，敌人在指挥上也颇有干练之处。早在12月12日，敌人就从科捷利尼科沃地域实施了强有力的突击，敌人的突击集团利用自己的优势，欺我第51集团军的兵力薄弱，趁势突向斯大林格勒。德寇同往常一样，出动了坦克和航空兵，但却未能攻破我军的防线。第51集团军在撤退过程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敌人遭受巨大的损失。

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看得很清楚，被围困的德寇此时精神又有点振作。俘虏供称，鲍卢斯及其周围的人，每时每刻都等待与解围的部队相互靠拢的命令。

企图进行解围的德寇，打了整整4天，受到很大损失，尸体和被打坏的技术兵器布满了战场，才刚刚走完去斯大林格勒一半的路程。同时，我们估计敌人随时都有可能马上从托尔莫辛方面向我军实施突击。于是，我军最高统帅部及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令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左翼改变方向，不准备再向正南（即罗斯托夫方面），而要向东南方向进攻，以便迂回敌人的莫罗佐夫斯克集团和托尔莫辛集团。我们的进攻，赶在了德寇从托尔莫辛实施突击的前面。我军这次进攻，是12月16日以两个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进行的。在军事学术史上，这次战役称之为“小土

星”战役。

12月24日，敌人在莫罗佐夫卡的态势得以短暂的稳定，可是接着在梅什科科瓦又遭到了突击。

苏军最高统帅部暂时推迟了歼灭斯大林格勒敌人集团的时间，将近卫第2集团军急速调往梅什科瓦，以便阻击“霍特”集群前往解围的行动。近卫第2集团军接受任务后，从行进间进入战斗，同第51集团军并肩作战，把敌人阻击在梅什科瓦河，从而为我军新锐兵力在该地进入战斗创造了条件，12月24日，曼施泰因刚刚在莫罗佐夫卡停止进攻，我军对科捷尔尼科沃的进攻便开始了。12月29日，敌人的科捷尔尼科沃集团已经不复存在。此时，曼施泰因不得不后撤，以避免自己的军队也遭到台围。德军指挥部解救被台围于斯大林格勒的军队的企图，彻底落空了。由于我们12月份积极进行战斗的结果，台围的对外正面从斯大林格勒向外推出去200—250公里。在高加索作战的德寇“A”集团军群就要大难临头。现在应该动手解决鲍卢斯的被围集团了。

开始时，处于台围圈内的德寇士兵抵抗比较顽强。这可能是，德寇的军官和将军们对于苏军已在卡拉奇封闭了台围圈一事，在战士中保守秘密。当德寇士兵终于了解到他们的处境之后，又给他们打气，说“霍特”的强大集团正在赶来解救。因此敌人士兵到12月底还对解围之事充满幻想，死命坚守，常常同我们一拼到底。因此几乎没有抓到俘虏，他们根本没想束手被擒。

一直到曼施泰因集群被粉碎，一直到我军把法西斯强盗赶到哈尔科夫、卢甘斯克和顿河畔的罗斯托夫，被围之敌的士气才一落千丈。关于突出台围的可能性，不但士兵和军官们不相信，就连将军们也不再相信了。我军已经把敌人打得魂落魄魄。

1月初，顿河方面军司令员罗科索夫斯基中将，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捷列金少将和方面军炮兵司令卡扎科夫来到我们的集团军指挥所。他们是从伏尔加河的水上过来的。

罗科索夫斯基和捷列金在集团军司令部的土窑旁下车后，关心地向我们问东问西：在战斗最激烈着起大火的时候，我们的情况怎样；德寇发动进攻时，对城市进行狂轰滥炸时，我们的情况怎样；等等。方面军司令员走进土窑，坐在一张土台旁的一个土墩上，简要地拟制了一个歼灭敌人被围集团的计划，并当即给各集团军下达了任务。以巴托夫和奇斯佳科夫的集团军从西面实施主要突击，以便把被围集团割裂为数块。与此同时，扎多夫和加拉宁集团军从北面，舒米洛夫和托尔布辛集团军从南面实施进攻。第62集团军的任务是，“采取积极行动，从东面吸引住更多的敌人，若敌人企图通过封冻的伏尔加河向东突围时，就坚决把敌人堵住。”任务是明确的。于是我向方面军司令员保证一定完成任务，在方面军主力发起总攻之前，决不让鲍卢斯跑掉一个师。

当方面军开始总攻之前，即在1月10日之前，第62集团军遂行方面军司令员赋予的任务，派出强击群四处出击。我们的阵地也日益有所改善。每天都有数个支撑点和土木质发射点先后被摧毁，并落入我军之手。敌人22个师当中的6个师，另有5个工兵营一直被我们第62集团军牢牢地牵制住。

我们的航空兵经常而有效地袭击敌人的运输机。这些运输机是戈林派出来给被围的军队运送弹药和食品的。

马马耶夫山岗上有几个储水槽。从9月下旬到次年1月12日，几乎4

个月的时间（120天），敌我双方为了争夺这个地方，进行了殊死的斗争。

马马耶夫山岗顶部的争夺战打得最为激烈，双方多次易手，参加的部队也最多。在这里进行过战斗的有，罗季姆采夫师、戈里什纳师、叶尔莫尔士的第112师。下过在这里参加战斗最久的，是光荣的巴丘克师。该师是9月21日到达左岸的，22日便在多尔吉冲沟地区加入战斗。尔后该师好像是在马马耶夫山岗及其附近扎下了根，在这里站稳脚跟，一直坚持到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各师与他们会合。

第62集团军其他各分队的代表们，很快便与巴托夫集团军、奇斯佳科夫集团军和舒米洛夫集团军的部队见了面。

敌人仍然进行抵抗，不过每天都有越来越多的德寇官兵投降。有时，几个苏军战士一下子抓到好几百名俘虏。

1月31日，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抓到了第6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元帅，并俘虏了他的司令部。在这一天，德国法西斯军队的南部集团全部停止抵抗，城市中心区的战斗已经结束，当天晚间。第62集团军的战士们抓到了步兵第295师师长科尔费斯少将和他的司令部人员，当时，步兵第4军军长炮兵中将普费费尔、第51军军长，冯·扎伊德利兹——库尔兹巴赫和第295师参谋长季费尔以及一些高级参谋人员也在那里，便一起当了俘虏。

当时抓到这些希特勒将军们的，只是第62集团军的3名战士。

1月31日，我同古洛夫和克雷洛夫在一间宽敞明亮的土窑里审问被俘的德国将军们。我见这些人由于担心不知会受到什么处置，而精神十分紧张。我见他们个个都饥肠辘辘，便吩咐给他们送些茶点来吃。这些人也身着军礼服，胸前佩带着勋章，德国将军奥托·科尔费斯一边把茶杯和面包片拿到手，一边问道：

“这是什么？搞宣传吗？”

我回答到：

“如果你这位将军认为这些茶点包含着宣传，我们倒不十分勉强你们品尝这种宣传品。”

我这么一反驳，倒使空气活跃起来，我们的谈话继续了大约一个小时，科尔费斯将军谈的较多。普费费尔和扎伊德利兹一直沉默不语，他们声称，对于政治问题不大清楚。

科尔费斯在谈话中阐明了一种思想，当时的德国形势，与腓特烈大帝和俾斯麦时期的德国，有许多共同之处。普费费尔和扎伊德利兹坐在那里，口里不时地叨咕着“是的”，“不是的”，哭了。

冯·扎伊德利兹中将最后还是开了口，他问道：

“下一步准备怎么处理我们？”

我把收容俘虏的条件告诉了他，并且补充说，除了武器之外、勋章和奖章都可以带。

“是什么武器？”普费费尔装出听不懂的样子，瞧着扎伊德利兹感兴趣地问。

“被俘的将军”我重复他说“是不允许携带任何武器的。”

这时扎伊德利兹从口袋里掏出一把削铅笔的小刀递给我。我当然又交还给他，并且告诉他，这类“东西”算不上是武器。

普费费尔将军向我问道：

“在城市争夺战当中，于11月19日之前，您和您的（第62集团军的）

司令部在什么地方？”

我告诉他，我的观察所和集团军的司令部始终在城市，在伏尔加河右岸，最后的一个指挥所就在现在这个地方。

这时普费费尔将军说：

“非常遗憾，当初我们没有相信我们的侦察机关，否则我们会把您和您的司令部一起从地球上消灭掉的。”

当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南部集群被肃清之后，其北部集群的命运虽已危在旦夕，但敌人仍然还在进行抵抗。

残存的敌人不敢应战，乖乖地举起了双手。敌人的刺刀上挂着白布条。

希特勒早在 1942 年 11 月份就许愿，要解救被围的军队。现在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次灾难，并宣布哀悼 3 天。

在伏尔加河岸包围并歼灭敌人坦克第 4 集团军的一部和整个第 6 集团军，是由数个集团军进行的，总兵力达 22 个师以及大量的加强兵器，兵力上超过一个建制的方面军。

希特勒曾把第 6 集团军看成是自己的骄傲。说它机动性大，突击力强，官兵成份好，各师的人员全是“纯血统的亚利安人”。例如步兵第 97 师是于 1942 年 8 月组建的，一律由 20 岁至 27 岁的青年组成，据俘虏巨映，该师每 5 个士兵中，就有 1 个人是纳粹党党员。

第 6 集团军司令鲍卢斯和坦克第 4 集团军司令霍特上将就是日耳曼将军团的典型代表，在强攻斯大林格勒的日子里，鲍卢斯年满 52 岁，其中有 33 年是服役于德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不过是一名小小的队列军官，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是总参谋部的参谋。1918 年德国军队战败之后，鲍卢斯并没有离休，还长期在军事部门工作，尔后在坦克兵司令部任参谋长，积极地参加了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准备工作。

希特勒上台之后，鲍卢斯更是飞黄腾达，当上了集团军参谋长（该集团军司令是陆军元帅赖歇瑙）。1939 年秋，鲍卢斯带领集团军横扫波兰，1940 年参加了击败法国的战争，1940 年 9 月，鲍卢斯被任命为德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的作战部长，1941 年 1 月被提升为坦克兵将军，入侵苏联时，他在希特勒的将军行列中崭露头角。

当第 6 集团军在伏尔加河岸遭到围歼时，希特勒对鲍卢斯又是授勋，又是晋衔。希特勒原来曾授予鲍卢斯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次又授予“橡树叶”勋章并把他提升为元帅。

第 6 集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也特别重要。1940 年 5 月 10 日，该集团军奉希特勒的命令，背信弃义地第一个入侵比利时，在克服了比利时军队在阿尔伯达运河的抵抗之后，即横扫比利时全境，进行野蛮屠杀和大规模破坏。第 6 集团军曾到过欧洲许多国家，并曾驻扎过布鲁塞尔和巴黎。

1941 年希特勒把第 6 集团军派往东方，进犯苏联。该集团军曾在哈尔科夫地域作战，并参加过夺取乌克兰许多城市的战斗，尔后又从乌克兰转到伏尔加河，它在 1942 年的南部战局中，担负着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即夺占斯大林格勒。

当第 6 集团军已经溃不成军时，希特勒又在它的头上加上一个荣誉的光环，以掩饰自己战略计划的破产。1943 年 1 月 30 日希特勒大本营颁布了一

项特别通报。通报中说：“俄国人提出要第6集团军的士兵们投降，可是他们却都在原地坚持战斗。”第二天大本营又宣布：“有少数德国士兵和同盟国的士兵向苏军投降。”这个“少数”足有9.1万人。这时德军的2500名军官、24名将军和鲍卢斯元帅本人已经当了俘虏。关于这些人的命运，希特勒却只字未提。

苏联军队在伏尔加河岸先是粉碎了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最强大的军事集团——B集团军群。接着，又粉碎了技术装备齐全并由精锐部队组成的“顿河”集团军群，该集团军群被粉碎之后，光是在斯大林格勒城内和郊区收敛了大约14万具德寇的尸体。在斯大林格勒200个日日夜夜当中，德军指挥部共葬送（伤亡、被俘和失踪）不下150万人。

大约有一个月的时间，我们都驻扎在阿赫图巴附近的镇子。在这段时间里，第62集团军各师彻底休整了一下，接受了新武器，并且装载列车，向西开拔，以便尽快赶到已经离我们很远的前线。

祖国给了我们各师、各团很高的荣誉。几乎各师、各团均被授予近卫军称号。因此，第62集团军改名为近卫军第8集团军。在广大指战员的胸前均佩戴上了“近卫军”徽章。

在开赴前线前不久，我们曾欢送军事委员阿基古洛夫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古洛夫原来是师职政委，后来晋升为中将，他是我们大家的亲密战友。在整个战斗过程中他始终留在右岸，与我们同甘共苦，如今一旦要分别了……。

我们从中阿赫图巴镇出发，给古洛夫送行。谁也没有说告别的话语，只是默默地拥抱、亲吻。送行的人眼里都噙着泪花，而离开的人比我们心情更加沉重。他走远了，我们还久久不肯离去……。

古洛夫是个意志坚强、冷静沉着的人。记得有一次，我们大家正站在伏尔加河岸，弹片打穿了他的护耳皮帽。他从容地摘下帽子，朝我们微笑着说：“帽子打坏了一点，不过还能将就着戴。”他既坚持党的原则，维护军队的纪律，又能以理服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能及时而有效地从政治上保障战斗计划的实现。他知人善任，以诚待人。他能大胆用人，给以重担，从不缩手缩脚，吹毛求疵。他常对我说：“有些事情应该认真，有些事情就要任其自然。”实际生活正是如此，在生活中，他是豁达乐观的人，同他在一起从来不觉得枯燥。

我们送走亲密的战友之后，觉得像失去了亲人似的，总是怀念他。

就是在那1943年8月，传来了噩耗，古洛夫同志牺牲了，大家都为之震动。他与世长辞，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将不能同我们共享最后胜利的欢乐。古洛夫同志永远留在我们心中。

部队开始装载列车，准备向西开拔，奔赴前线。第62集团军转移到了北顿涅茨的库皮扬斯克地域。集团军司令部在沃罗波诺沃火车站已经装上了火车，准备出发，白天我们巡视了各个车站，看看集团军各师的装载情况。傍晚之前，我乘汽车来到沃罗波诺沃火车站。

火车汽笛响了。列车启动，接着列车车轮有节奏地响起来。每个人都满怀深情，思绪万千。

## 第二章 血 河

我们终于转入反攻  
解放乌克兰  
这里通向柏林  
北顿涅河，让敌人血流成河  
寸土寸血  
迅猛追击  
敌人并未垮掉  
扎波罗热，不可抗拒的洪流

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通往柏林的道路就在眼前了。当我设法了解斯大林格勒会战之后发生的事件时，不禁一次又一次地回顾起往事。这些回顾使我确信，当苏军战士撤退到斯大林格勒接近地时，在思想上就明确地显露出巨大的转折——决不再继续撤退。

苏联军队这种思想上的转折，虽然是用眼睛看不到的，但德寇的将军和军官们却能感觉到。

我当时的心境与激情是容易理解的。我想，为胜利而自豪，这是理所当然，无可非议的。不过，决不能因为胜利，而疏忽大意。否则良心上要受到责备的，要知道，那时候在包围圈里还有敌人的 22 个师和 160 个独立部队（总共 33 万人）有待于我们去消灭。而且随着包围圈的缩小，敌人更是困兽犹斗，凭险抵抗，同时还一心指望“顿河”集团军群能集中大量坦克打开一条通道，为他们解围。当时我一直放心不下，忐忑不安的道理就在这里；我当然完全相信，通过大规模的交战，敌人定会被全部粉碎；不过曼施泰因万一打开包围圈，与鲍卢斯的军队合为一股；那么我们不知还要费多大力气，第 62 集团军还将会经受多大的考验？

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担心，况且对于这个问题，有各式各样的议论，不但当时有，过很多年之后，也有不同的议论，而且各阶层都有。例如，在斯大林格勒会战结束 10 年之后，即在 1952 年夏天，我竟有机会同斯大林对这个问题交换意见。

我们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经受了难以想象的严峻考验，当离开斯大林格勒时，却令人难舍难分，人们留恋它的每一寸土地。人们把二次重生的地方称之为第二故乡，斯大林格勒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二故乡。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欲要倾诉衷肠，却言词枯竭，欲言又罢；好似口齿变得迟钝，又像激情阻塞了口腔，使得满腹衷肠不能倾吐，使得知心的话语不得流畅。这正是为参谋长送行时，我在餐桌上的心境。

我心里完全明白，把我的战友任命为集团军司令员的决定是十分正确的，这是工作的需要。可是感情总归是感情，又有什么办法呢？泪水已模糊了眼睛。但愿在这告别的时刻，把我的战友多看上几眼，再多听几句他的语言。但愿这个送行的宴会再延长些时间。可是，当我讲完几句离别的话语之后，却匆匆地离开了这个房间。我想一个人单独待一会儿。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理解我的心情，他在临行前，到了我的房间，同我单独告别。

1943 年 4 月 16 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把第 62 集团军改编为近卫第 8 集团军。

这个可喜的消息，是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带给我们的。我们受之无愧！第 62 集团军为祖国立下了战功。如今我们的集团军开始了新的生活，戴着近卫军的光荣，准备转入进攻。

5 月初，在我集团军驻地上空，展开了激烈的空战。

我们从来还没有见过天空中出现这么多我国的飞机。我军轰炸机和强击机一批接一批地离开后方机场，尽往前线。在敌人军队驻地的纵深内，响起了轰轰隆隆的爆炸声。接着出现了敌人的歼击机，可是我们的歼击机对敌机进行了拦截。

当时我们了解到，空战已在全线展开：南方方面军、西方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中央方面军、布良斯克方面军、西方方面军和加里宁方面军的上空都发生了空战。这一现象的实质，不难看出，我军的最高统帅部正在以大量而集中的航空兵突击，牵制着敌人各部队的调动，使敌人难以集中重大的突击集团。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大将 5 月份告诉我们要准备打一场艰苦的防御战。他给我带来了一张地图，图上有由方面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勾画出的一个线条，那就是我们的防御地区。我们的任务是在这里组织坚固的、深沟筑垒的防御。防御地区规定在沿奥斯科尔河一线，在德武列奇纳亚、库皮扬斯克、先科沃、戈罗赫瓦特卡地段；防御方向指向西面和西南面。

马利诺夫斯基指示我们集团军要在比较狭窄的地段上组织防御；并要求我们，敌人一旦发起进攻，即向以下几个方向实施反突击：库皮扬克斯克，沃尔昌斯克；库皮扬斯克，丘克耶夫；沿奥斯科尔河右岸向伊久姆市；通过一切可以利用的渡口渡过北顿涅茨河。

进行防御，不符合战士和中、下级指挥员的口味。因为人们都在磨拳擦掌地准备进攻，准备在战役广场内粉碎敌人。

我估计，希特勒可能准备于 1943 年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发起总攻，而我们的任务将是掩护战线的两翼。

这时，我则在积极地研究进攻战，向级别较高的指挥员请教。学习实施进攻战役的方法；吸取他们的实施机动进攻时指挥军队的经验；尽量把他们实施进攻时所了解到的敌人行动特点，统统搞到手。我与瓦杜丁大将的会见，使我收到很大的裨益。他把 1942 年 11 月在顿河突破德军防御的情况，详细地告诉了我，并且还向我叙述了我军从顿河向北顿涅茨河推进的情况。他的讲述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并没有低估敌人的力量，也没有过高地估计我军的战果。

我还见过近卫第 1 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战前我与他在白俄罗斯军区一起共过事。他是一位意志坚定，聪明能干的指挥员。

库兹涅佐夫、坦克第 3 集团军司令员雷巴尔科和第 6 集团军司令员哈里托诺夫等三位同志都给我提供了一个相当重要的情况，就是德寇自从在斯大林格勒遭到失败之后，非常害怕被包围，特别害怕在他们的后方出现我军的坦克。

在斯大林格勒近卫军战士面前又出现了“复仇者”集团军德军第 6 集团军。

5 月 13 日，通过电话接到了大本营训令：

“ 1、航空兵暂时停止轰炸敌人的机场和交通线。

何时恢复轰炸，按特别指示进行。

若敌人实施进攻，关于空军的使用，则应按各方面军司令员的意见行事。

2、应采取措施迅速为航空兵筹备油料。一定要达到20个油料基数（包括从后方提供的数量）；并在短期内把器材准备就序。”

5月20日3时30分，我们接到大本营的预告号令。号令中说：德寇准备于5月19—26日对我们实施进攻。

大本营一再指示，不要放松警惕性，不要放松部队的战斗准备。要使航空兵做好准备，随时出动。要通过侦察和捕捉俘虏，查明敌人的部署和具体意图。

5月份已过去。我们已经了解到，希特勒的将军们企图以南北夹击之势，削平我军于1943年临到春季时在奥廖尔和别尔哥罗德一线形成的一个突出部，从两面压迫我防守库尔斯克的部队并将其消灭，进而夺取库尔斯克，以便在我军后方形成一个纵深很大的突破口。这个企图对于希特勒将军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不过他们把事情看得太轻而易举了。

希特勒当然明白，要想雪斯大林格勒城下失败之辱，要想重新夺回战略主动权，这是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因此，他不惜工本，把一批一批的新锐部队，新式技术兵器，“虎”和“豹”式坦克，甚至“斐迪南”式自行火炮，统统投入即将燃起一场熊熊烈火的地方。

在库尔斯克弧形地带，敌我双方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决战。

敌我双方当然都知道，为了这次交战都在进行兵力、兵器的集中，双方都在加紧构筑工事，积极准备各自的进攻出发阵地。

现在的问题在于谁先开始进攻？当然时间对我们有利。而敌人在我们的领土上，是不能进行持久防御的。

7月4日夜，前线响起了轰隆声。首先开始进行炮火袭击的，不是进攻者、而是防御者。

库尔斯克会战开始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计划规定，库尔斯克会战一旦展开，几个相邻的方面军并肩转入进攻，以便制止德军指挥部在库尔斯克方向上加强自己的部队。

西南方面军应向巴尔文科沃发起进攻；南方方面军应从马马耶夫山岗地域出发，向西，向斯大林诺发起进攻，继而向梅利托波尔发展进攻；布良斯克方面军向奥廖尔发起进攻；西方方面军向卡拉切夫发起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指挥部已经失去了机动预备队的一切可能性。

7月7日，我和我的友邻近卫第1集团军司令员库兹涅佐夫上将应召来到方面军司令部。这时我已明白，该轮到我们进攻了。

马利诺夫斯基向我们介绍了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企图——鉴于敌军的主力已经投入库尔斯克近郊的战斗，我军应趁此机会，以西南方面军的兵力向顿巴斯发起进攻，其任务是，击退敌人的进攻。万不得已时，也要牵制敌人的兵力，使敌人不能进行机动和增强向库尔斯克实施进攻的部队。

第1和近卫第8集团军的任务是，强渡北顿涅茨河，协同正从米乌斯河向斯大林诺（顿涅茨克）进攻的南方方面军的军队，在巴尔文科沃、红军城地域突破敌人的防御；粉碎敌人的顿巴斯集团，并进至第聂伯河。

剩下的事情只有核实敌情材料和进一步查明敌人的炮兵阵地和火力点的位置了。

这些情况通常是利用战斗侦察的方法取得。但是为了隐蔽我军进攻的准



备，以便达成进攻的突然性，我们不可能进行战斗侦察，即使是强渡北顿涅茨河进行战斗侦察，也是困难的。集团军侦察主任格尔曼上校拿出来一份敌人防御工事配置图，内容比较详细。

我命令已渡河的部队继续向前推进，不断在敌岸扩大登陆场。可是离开河岸向纵深发展进攻，已经不像渡河那么容易。敌人的抵抗越来越强。随着战斗的进展，我们的火炮已经压制不到敌人的防线。弹药供应不足，影响了进攻的速度。此时敌人的航空兵活跃起来，不断突击我渡口。河面上空不间断地进行着激烈的空战。由于我航空兵未能不间断地驱逐敌人的俯冲轰炸机，有时敌人可以得逞。

战役计划遭到破坏，可能不会按期实现。

这对于我个人来讲，处境更加困难。因为这是我在斯大林格勒之后，第一次打进攻战。所受领的任务，一项也没有完成。当然，下达任务，在地图上画箭头，要比实际作战容易得多；而且我们的敌人又是经验丰富的强手。

应当仔细想想，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敌人遭受那么大损失，为什么到了中午，我们的进攻一下子全线失利？

后来德军被俘军官供认，关于我方面军准备进攻的情况，他们从7月12日起就知道了。就是说，早在我军发起进攻前5天，敌人就知道了消息。同时，敌人也大致掌握了我们的几个突击方向。我们虽然采取了各项预防措施，看来并没有达成进攻的突然性。

进攻准备的时间大大压缩了。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华西列夫斯基准许我参加第6和第12集团军实施进攻的准备工作。这样就使我有机会从旁观者的角度，来观察这两个集团军实施进攻的各个阶段。

这样我可以一面观军进攻的过程，一面积累自己的经验。这正合乎我的志愿。编入这个集团军第二梯队的有：近卫机械化第1军，该军编有165辆坦克（在进攻准备的过程中增至200辆）；坦克第23军，编有220辆坦克；巴拉诺大將軍指挥的近卫骑兵第1军。他们的任务尾，当两个集团军一旦取得战果，立即投入战斗。战役计划规定，坦克第23军和近卫机械化第1军，于进攻开始前第1天，即第9和第12集团军到达维基诺、多尔格尼科那、克拉斯诺波利耶一线时，进入交战。

毫无疑问，这个战役计划是很高明的。坦克军，机械化军和骑兵军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在发展进攻中，定能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威胁，定能协同南方方面军合围并歼灭敌人的坦克第1军和第6野战集团军于顿巴斯。

为了便于观察，我把近卫机械化第1军的指挥——观察所选在斯图捷诺克镇西南的215.6高地上。从这个高地上可以通观整个进攻地带。

第6和第12集团军的进攻是于8月17日拂晓时开始的。炮兵第一次齐射火力十分猛烈。这样大的火力密度，在那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敌人的整个堑壕被打得烟尘滚滚。被掀起的沙土此起彼伏，直冲云霄。敌人的炮兵阵地和火力点已经被侦察清楚。但是谁能保证，在我发起进攻之前，敌人不会转移阵地呢？因为我们在进行准备，敌人也在准备。

不过，我凭听觉已经判断出，我炮兵在进行第一阵的齐射之后，主动减弱了火力。这是因为要遵守节省弹药的原则。

在指挥——观察所同我在一起的，还有波让尔斯基、古利耶夫和福卡诺夫等各位将军。我们的位置，实际上是在什列明将军的第6集团军进攻地带

的中央。

我总是喜欢引证俄国军事学术的奠基人苏沃洛夫的一句至理名言：“出奇者，方能致胜”。在这种交战中，致胜的主要因素是突然性。今天在我们面前，苏沃洛夫这句话，在实战中得到了证实。

部队开始冲击，向敌人阵地跃进。我炮兵还不停地进行轰击，炮弹在敌人阵地上不断地爆炸，可是敌人仍然可以躲在坚固的工事里向我们开枪、开炮。原来，我们的炮火并没有压制住敌人的火力点。

第6和第12集团军于7月17日实施的进攻，有没有遵守突然袭击的原则？没有。这次进攻是从已经占领的登陆场上发起的。敌人绝对不会没预料到，我们可能利用登陆场，投入新锐兵力，继续发展进攻。因为，通过巴尔文科沃向南发展进攻，对于敌人来说，那是一个致命的威胁。

第6和第12集团军一到达北顿涅茨河，无疑一定会被敌人发现。而这两个集团军渡河，进而与近卫军第8集团军换班，就大体上等于把进攻的大约时间告诉了敌人。至于说，能否判明进攻的具体时间。在这种条件下，没有什么重大的意义。我们给敌人帮了大忙的地方，还有一点，那就是我们在进行炮火准备时，仍然默守成规。

当天中午，第6集团军被迫停止进攻。我们的军队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战斗大约8个小时，只推进1—2公里。第二天，进攻的部队仍在原地未动。一味从正面突击，不进行任何机动，也不改变突击的方向，结果进攻未能奏效。

战役未取得任何的进展。8月18日，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我把集团军从第6和第12集团军的接合部投入交战。

我坚决反对这个时候把我们集团军投入交战。因为我们经过艰苦战斗后还没有得到休整，也没有做实施进攻的准备。况且两个集团军已经进攻失败，要我们又从那个方向，那个地点发起进攻，也甚为不妥。我们集团军亟待休整。

华西列夫斯基不能不顾及到我的疑虑。他以大本营代表的身份，尽量说服我，消除我的顾虑。他以信任的态度对我说，在北线，在沃罗涅日方面军和草原方面军的行动地幅内，我军正在对哈尔科夫实施进攻。这就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采取一切措施对正面敌人施加压力，迫使敌人从哈尔科夫抽调军队向这里增援，哪怕能抽调几个师也好；即使不能迫使敌人从哈尔科夫调出部队，就是能把当面的敌人拖住也好。就是说，起码要牵制住曼施泰因，不让他从这里撤走一支部队。

“如果您能够拖住德军1—2个坦克师，”他说：“那么您对于在南线粉碎敌人方面，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服从。但是我提出一条建议，我不主张在第8集团军正面上全线发起进攻。我认为，应在比较狭窄的地段集中兵力，对于敌人的防御要突破的比较深，至少要突破8—10公里，以保证机械化军进入突破口。如果我们突破成功，我建议把鲁西亚诺夫的近卫机械化第1军投入突破口。因为该军已经准备一个多月了。

在突破地段上，炮兵的数量是够了，不足的是弹药。弹药不能保障炮火准备的需要。就是说，战争之神（指炮兵）这次无力支援战场之王（步兵）了。不过，如果步兵、炮兵和航空兵三者密切协同，再加上机械化军及时地进入突破口，那么我们的不足之处就可以得到弥补。

马利诺夫斯基批准了我的建议。

天将破晓，我们的大炮发了言。航空兵集团军司令苏杰茨把强击机引导到敌人阵地上空。他通过无线电与长机大队的对话，正引导他们去突击那些在我进行炮火准备时暴露出来的目标。

徐进弹幕射击正向纵深转移，这时我各营、团长命令战士们开始冲击。散兵线一波一波地跟在弹幕后边冲击。他们的动作十分协调。在敌人的第一堑壕上已经展开火力战。手榴弹不断地爆炸，传来自动枪射击的声音。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散兵线继续向前推进。我们听到，战斗打到了第二堑壕，连着转移到第三堑壕。我们的坦克和自行火炮以直瞄射击支援步兵冲击。

我们接刊报告，近卫军的部队已经在夺占多尔格尼科耶和马扎诺夫卡。

战斗打胜啦！在一个月浴血奋战中，我们第一次取得战斗的胜利。马利诺夫斯基命令鲁西亚诺夫立即把机械化第1军投入战斗，向着多尔格尼科耶以南、多尔吉一亚尔、巴尔文科沃的总方向，沿着土路发展进攻。同时，马利诺夫斯基又与方面军装甲坦克兵和机械化兵司令取得通信联系，命令他检查鲁西亚诺夫军进入交战的情况。

8月23日，草原方面军在沃罗涅日的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的积极配合下，解放了哈尔科夫市。

毫无疑问，我们的进攻虽然未能向纵深发展，但是却牵制住了敌人大量的兵力，并为草原方面军和沃罗涅日方面军取得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也可能发生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敌人不从哈尔科夫调遣兵力，即可暂时阻止往我军的进攻。这时，西南方面军当面之敌可能得不到预备队的增援，我军继续进攻可能在罗尔文科沃方向取得进展；敌人则开始在巴尔文科沃遭到粉碎；我军继而在扎波罗热方向进至哈尔科夫及其以南地区。

大本营在北顿涅茨河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我们阻止了敌人的机动，牵制了敌人的兵力，并把其它方面上敌人的一部分兵力吸引到自己的地段上来。

在8月份的战斗中，我们不但为全部解放顿巴斯创造了前提，而且为尔后解放祖国的整个南部地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南方”集团军群司令曼施泰因急忙飞往文尼察，急忙赶到希特勒的地下室。曼施泰因写道：

“8月27日，希特勒的大本营召开了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明确地向希特勒提出来两种选择：要迅速给我们增调新锐力量至少要12个师，并从战斗不甚频繁的地段上抽调部队，把我的已经打得精疲力尽的部队替换下来；否则便放弃顿巴斯，以便把集团军群的兵力腾出来。”

给“南方”集团军群增调12个新锐师，对于希特勒来讲，在当时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西南方面军和南方方面军进至巴尔文科沃、红军村、沃尔诺瓦哈地区，决定了德军在顿巴斯必定失败的命运。草原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和中央方面军实施的进攻战役，使德军指挥部失去了防守左岸马克兰的可能性。

曼施泰因已经大难临头。为了寻找出路，他反复较量，终难奏效。于是不得不下令把“南方”集团军群的主力撤过第聂伯河。在南段，把军队撤过莫洛奇纳亚河。

沿第聂伯河一线乃是德军东部防线的基础。

把第聂伯河称之为“东部防线的基础”，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客观情况。

因为在第聂伯河很适合构筑坚固的防线。

到目前为止，德军已在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哈尔科夫、米乌斯以及北顿涅茨河接连遭到失败。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想知道，在这一连串的失败之后，德军的普通士兵以及中、下级军官们在想什么。他们的依靠，将会是什么？

东部防线——这是德军军官和士兵首先考虑到的。他们指望能在这里阻止住苏联红军的进攻。据传说，那里还有某些绝密的工事，万分坚固，无论是步兵、坦克和炮兵都无法突破。

德军指挥部撤至第聂伯河右岸，并把自己的军队撤过东部防线的时候，还在左岸的若干地段上留下了几个坚固筑垒的据点。目的是准备尔后反攻时作为立足之点，同时也作为防御地区，筑垒地域，依托这些地方消耗我各集团军的兵力。德军留在左岸的紧紧靠近岸边的各种据点，对于德军指挥部来说，也是军队防御坚定性的某种担保。

扎波罗热就是这种据点中的一个。它屏护着并控制着重要的工业中心，是东部防线在左岸安下的一个钉子。

因此，我军指挥部给西南方面军规定一项任务是不迟于10月3日务必把扎波罗热据点中的敌人全部肃清，并在该地段上进至第聂伯河河岸。

早在9月16日马利诺夫斯基就对我解释说，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曾打算把我集团军调至中央方向。因为朱可夫曾坚持把第8集团军编入草原方面军的序列，以便协助科涅夫实施大规模战役。但是马利诺夫斯基舍不得放，坚决要求大本营把第8集团军留在自己的西南方面军。他郑重其事地向上级报告，没有近卫第8集团军，他根本无法拿下扎波罗热据点。

9月23日，我集团军司令部接到方面军司令部的训令，要求集团军集中在近卫第12和第3集团军的接合部。这两个集团军已经为进攻扎波罗热做好了战斗准备。

为此，我们集团军在维什涅夫卡、维利尼扬卡、别克罗夫卡、新斯捷普尼扬斯基地段上，需要替换近卫第3和第13集团军的部分军队。

展开在我们面前的这道防线是非同小可的。这道防线经过长期精心经营。让我们看看曼施泰因自己是怎么说的。他曾写道：

“集团军群于1943年初接近第聂伯河时，我们主动地在扎波罗热、第聂伯彼得罗夫斯基、克列缅丘加和基辅等地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以便尽力阻止敌人切断我交通线。”

敌人火急地从各地段上把兵力调往扎波罗热。据侦察了解，9月27日，仅在防御的第一线，克鲁格利克，“德米特里”集体农庄德军指挥部就集中了3个步兵师。

由3—5人组成的强击群，军官或军士带领，装备集束手榴弹和燃烧瓶，机动灵活，便于渗透到敌人的战斗队形里。

强击群四处出动。

夜幕降临，吞没了敌人的阵地。战场上到处还冒着浓烟。夜暗加上浓烟把那些给德寇壮胆的照明弹都给淹没了。突然间在敌人防御纵深的什么地方，闪出耀眼的光亮。好像爆发的小星星。随后又接二连三地爆炸起来。接着又是一片漆黑。有时在闪光之后，传来爆炸声，随后又燃起熊熊大火。原来起火的是敌人的坦克，爆炸的是坦克上的油箱。随着爆炸声，火力点里的敌人也开始打枪、打炮。曳光弹划破了夜幕。而我们的炮兵侦察，则正好趁

机把敌人的火力点都标记下来。随后几个齐射打过去，敌人的火力点被打哑了，又是一片漆黑。

前线的寂静令人胆战心惊。因为这是战场。

突然间，在敌人的配置地域，机枪和步枪声连成一片，怎么啦？是敌人正在阻击我们的强击群，还是敌人惊慌失措，乱打枪，我不由担心起来。因为那里有我们的人，我们的近卫军战士，他们坚定勇敢，正在同敌人的有装甲防护的家伙拼搏。

看见了，在远方，又有敌人的一辆坦克着火。这回敌人全线开火，并用照明弹把天空打得明亮。

战斗一直打到第二天早晨！

10月11日早晨8时，全线的炮兵一起开火。但是这次我们炮火准备的时间不够太长，因为弹药不够。唉，又是弹药的问题！

炮火准备进行了20分钟。8时20分开始发起冲击。

第82师报告，他们已经进至瓦西里耶夫卡。至此已经再不能向前推进。因为敌人的火力太猛。我当即命令，原地坚守，不准再发起冲击。

近卫步兵第27师遭到了敌人坦克的反冲击。战士们已经停止进攻。这时我军152毫米口径的火炮已经推上阵地上，准备实施直瞄射击。当敌人坦克已经冲上来时，立即进行了火力拦击。敌人坦克的反冲击被打退之后，敌人的步兵又冲了上来。总之，该师的进攻未能取得进展。

近卫步兵第28军的部队，刚一发起冲击，就遭到了敌人的猛烈的火力拦击。被迫停止进攻。

步兵第33军传来了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该军第78师迫使敌人后退，并进至“德米特里耶夫卡”集体农庄的东侧。

我发出命令，要求部队千方百计地打坦克。这是当前最主要的任务。我们的炮火正在歼灭敌人的步兵。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敌人坦克的反冲击。这日全天部队都在进行积极防御。看，战场上又有数辆敌人的坦克着了火，火焰冲天。据粗略估计，敌人大约有20辆坦克着了火，至于有多少坦克遭到损坏，被拖下战场，那就无法统计了。这回，敌人的坦克手再不敢脱离他们的步兵，再不敢轻易突入我军战斗队形了……。

我们在伊万诺大卡镇缴获了一辆敌人的“虎”式坦克。我同集团军装甲兵司令巴音卢布上校以及炮兵司令波让尔斯基将军一起来到这里。想看看这只德国“虎”，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这辆坦克的甲板被我122毫米口径的炮弹击穿。坦克旁边躺着十来具敌人士兵的尸体。坦克里的4名乘员全部被打死。

坦克上的装备相当强。光学瞄准设备也十分先进。同时，88毫米口径的火炮的威力也很大。

我想，这种“虎”式坦克在1943年的夏秋战局是一种威胁最大的兵器，无怪乎希特勒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把赌注押在了这种坦克上。可是，我们已经装备了122毫米口径的自行火炮，可以击穿“虎”式坦克的装甲。

方面军司令员马利诺夫斯基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热尔托夫在近卫第8集团军观察所里，一直是寸步不离。从他们那里，我了解到我的左右友邻的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的情况。那里的情景和我们这里也差不了许多。只是第12集团军的进攻稍有进展。在那里，敌人也是接二连三地实施反冲击。

到了进攻的第3天，任务照旧，在原定的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继续

打坦克。

为了改变敌我双方的态势，我们从 10 月 1 日开始就进行艰苦的战斗。今天这个转变已经来临。

10 月 13 日清晨，马利诺夫斯基给我打来电话。我在电话里，把集团军进行夜战的情况，详尽地向他进行了汇报，他让我不要离开。他马上要赶到我的指挥所来。他接着又给航空兵第 17 集团军司令苏杰茨挂了电话，根据我们夜战取得的战果，给 17 集团军布置了相应的任务。

同时，我们还向方面军司令员报告，集团军各部队经过短时间的休息之后，将于早晨 8—9 时，以有限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以便限制敌人进行某些机动。我的建议，当即得到了批准。

马利诺夫斯基上午 10 时到达这里，我们在尼基弗罗夫斯基镇以南的 137.6 高地见了面。这时全线正在进行战斗。我给各部队赋予的任务，深度也不很大。我们准备迎击敌人的反冲击，利用敌人反冲击的机会，再次大量消耗敌人的兵力和兵器。敌人反冲击的劲儿，大不如从前了。因此也没有讨多大便宜。

这时我们急不可耐，不愿在观察所里坐等。于是走出观察所，分头来到各师、团司令部和部队，了解战斗情况，极力采取积极的行动。傍晚大约 5 时左右，我回到自己的观察所，听说方面军司令员正吩咐人到处找我，让我马上到他那里去（他来到之后，我们的士兵临时给他挖了一个土窑）。

我走下几级台阶，下到了他的土窑，一股强光迷盲了我的双眼，我一下子不知绊在了谁的腿上。我听见马利诺夫斯基的声音，他责备我不小心，碰了他。我刚要说句道歉的话，他马上以别的话题打断了我：

“崔可夫同志，你看是不是可以夜间进攻？利用夜暗！迷盲住德寇的眼睛，再揍他们，行不行？”

“怎么进攻？”我一下还摸不清是怎么回事。

“用整个方面军的兵力进攻！”他回答。

“那再好没有啦！”我回答说。

于是我们在方面军司令员的土窑里，着手拟制夜间强攻扎波罗热的作战计划。

当时来不及按格式拟制文件，我们立即给部队下达了相应的指示。

我们计划炮火准备的时间要短，不超过 10 分钟，炮兵火力在夜间不可能很准确，射击效果也不十分大。只突击预先确定好的几个目标，就够了。要节约炮弹，准备第二天早晨以直瞄射击摧毁敌人的工事。

我们给近卫机械化第 1 军和坦克第 23 军规定了专门的任务。

鉴于在过去的战斗中，敌人的部队屡次遭到打击，已经开始把坦克部队调往防御纵深，甚至可能把坦克部队调出扎波罗热。就是说，在敌人防御中可能出现“纯突破口”。这里正好是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发挥威力的场台。作战计划规定，当近卫第 8 集团军各步兵团推进到突破口的左、右两翼时，这两个军同时进入突破口。这两个军与第 8 集团军各步兵团的协同动作的组织，由我本人负责。在这次进攻中，我们集团军的角色，是担任“突破集团军”。

---

苏军军事术语。在这类突破口附近，没有敌人阻击，也没有火力封锁。——译者  
通常是只担任突破任务的集团军。译者

关于近卫第3集团军和第12集团军实施强攻的任务,是由方面军司令员下达的。

在夜间进攻的计划中,除了夜战所具有的一般优越性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令我们神往的吗?有,首先就是很大的突然性。因为使用这么大的兵力进行夜战,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现象。自从伟大卫国战争开始以来,我们也常进行大规模的夜战,但是一下子使用3个集团军,外加1个坦克军和1个机械化军,过去确实从来没有过。就是说,在进攻开始时德军指挥部不会很快意识到,我们会在夜间全线发起进攻,不会很快地判明情况,从而容易错过机动预备队的时机;于是我军则可采取迅猛的行动,突入扎波罗热城。

夜间进攻计划要求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要行动迅速而坚决。为抓紧时间,我同弗拉基米罗夫将军用了不到40分钟的时间就拟制出1份集团军作战计划。这样,集团军军事委员会的各位委员们就可以带领集团军司令部参谋人员,马上分头去到各军,各师,把夜间进攻计划尽快传达给每位指挥员。我本身还有一项任务,就是研究和拟制近卫步兵第29军与鲁西亚诺夫近卫机械化第1军之间的协同计划和步兵第33军和普希金将军的坦克第23军之间的协同计划。我把鲁西亚诺夫和普希金两位将军请到了步兵军的指挥所。开始我们研究和制定了同福卡诺夫和鲁西亚诺夫两位将军的协同动作。然后我们又转到谢苗诺夫的指挥所。在那里又会同普希金将军拟制了一份夜间协同作战计划。

第一批俘虏已经被押了下来。侦察兵当场审讯被俘士兵。俘虏供认,我军这样大规模展开夜战,是他们料想不到的。德军指挥部认为,苏军已经兵力枯竭。因此德军许多军官在夜间都放心大胆地进城去了。剩下士兵都在睡觉,觉得苏军若要进攻,也不过出动一些强击群而已。

打到半夜,情况已经明朗,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已经被我军突破。随后普希金的坦克军进入突破口。紧接着鲁西亚诺夫的机械化军也进入突破口。

部队打到城墙附近时,天已破晓。有些地方,坦克和步兵已冲入市区,在市内展开战斗。

希特勒的强大的军队集团在第聂伯河的左右两岸尼科波尔地域以其附近的锰矿区,坚守了数月之久。如今我机械化军已进入了突破口,敌人这个集团厄运就要临头了。

2月1日傍晚,天气突然变坏,我航空兵不能再进行积极的活动。同时大雾降临,团团的浓雾几乎透不过丝毫的光亮。浓雾之中,又下起倾盆大雨。雨水抖着泥土在脚下浮动。大地布满了水洼,水洼刹时间又连成一片,酷似一面面的湖泊。

2月2日,天气仍然没有转晴。由于大雾加杂着大雨,在大白天,看不见10—15米以外的东西。在浓雾中射击,就如同打在棉絮上一样,闷声闷气。浓雾吞没了一切。阴雨连绵的天气使得战士们的大衣总是又潮又霉;靴子上总是挂着几斤重的泥巴,走起路来真是艰难到了极点。但是我们的部队还在不断地向前推进。

集团军指挥部以及各军、师长们应该怎么办呢?只有一条,那就是紧紧跟上部队,决不能同部队失去通信联络,决不能使部队失去指挥。

中午12时,我们到达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镇。集团军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和我沟通了通信联络。他汇报说,在敌人防御正面上阿波斯托罗沃至佩列维茨庄园地段形成了一个突破口。在这里,敌人的步兵第123师和摩托化第

16 师已经被我军彻底粉碎。格拉戈列夫将军的第 46 集团军也已经顺利向阿波斯托洛沃方向发展进攻。

大本营给我们规定了两项任务，要求我们分两步完成：第一步，夺占阿波斯托洛沃、马里扬斯科耶、切尔托姆雷科、肖洛霍沃，从而切断德军部队从尼科波尔向西的退路；第二步，把部队转向尼科波尔。

在波得巴甫洛夫卡，我已考虑出下一步的进攻作战方案。我利用已经与部队建立的通信线路，传达了我的决心。我下令要求：

近卫步兵第 29 军军长经由卡缅卡河实施突击。任务是进至阿波斯托洛沃、扎波罗热一线，进而向马里扬斯科耶发展进攻。

近卫步兵第 4 军军长经由肖洛霍沃实施突击。任务是切断敌人经过佩列维茨庄园的通路，尔后任务是进至切尔托姆雷克、叶卡捷琳诺夫卡、基洛沃一线。

近卫步兵第 28 军全线发起坚决的进攻。任务是在日终前夺占基洛沃、新伊万诺夫卡地区。

近卫步兵第 27 师，当第 46 集团军（配属坦克第 11 旅和坦克第 5 团）从该师所占的地区通过之后，当即集中于扎波罗热茨、新伊万诺夫卡地域。

我们越是往南推进，道路情况越是糟糕。连绵的雨天加杂着飞雪。乌克兰的黑上层松软泥泞。而且软土层较深。履带车辆简直无法沿道路行驶。越野汽车排成一行向前行驶，每辆走过之后，都留下深深的车辙，后面的车辆便陷进车辙里，泥层淹没到油箱。沿道路到处是陷入泥泞里的德军车辆。陷在泥泞里的还有坦克和装甲车。大量火炮被丢弃在泥泞中。

集团军先头指挥机构设在一个大镇子里。我们在地图上分析了解了一下当前的情况。这里机械化军长塔纳斯齐辛将军突然来找我们。他是来求援的。他们掌握着几千辆汽车，但是缺少油料和弹药。同时，由于十分泥泞，车辆的轮子空打转，开不动。他来要求我们拨给他一些马车，帮助抢运油料和弹药。

清晨我们听到了火炮的轰鸣声。进攻的计划正在被执行着……。

德军指挥部正急于把重型技术兵器撤出合围。第聂伯河下游地区尽是一些灌木丛生、芦苇遍地的沼泽地。德军第 6 集团军和坦克第 1 集团军的步兵部队已经穿过这些不毛之地撤走。敌人把汽车、火炮、坦克和各种大车和货物丢得到处都是，堵塞了道路，狼藉于村镇和田野。其数量简直无法统计。

战利品的数量与日俱增，我们的部队在卡缅卡至阿波斯托洛沃的大道上发现一大队（足有 10 辆）德军“虎”式坦克。坦克还都完整无损，可是都陷到泥里去了，一直陷到炮塔。德寇准备沿着第聂伯河下游的沼泽泥滩地的丰肠小路逃跑。这些小路是不能通行任何车辆的。因此他们把技术兵器统统丢掉了。

德寇的飞机对准医院进行轮番轰炸。这时我才想起来，这是我用明语使用电台惹出的祸害。记得当时我身边没有密码簿，我与参谋长弗拉基米罗夫在通话时，使用的是自己规定的暗语。我曾告诉他，我在医院里。这种“伊索寓言”式的语言，是瞒不过德寇的。他们马上就猜到了，在医院一定有一个重要的指挥枢纽。敌人不停地轰炸。我们在这里只好耐心地等待着。等待着敌人把炸弹扔光为止。我们不是不想抵抗，因为我手里没有高射炮。等着挨打，伤亡是免不了的。战争总归是战争嘛！

我们转移到了新的指挥所。这回吸取教训，进行了严密的伪装。不久便



与部队沟通了联系。

凡是一些重大的战役都有一个高潮。同尼科波尔集团作战中，大科斯特罗姆卡战斗就有这样一个高潮。自从丧失了阿波斯托洛沃坚固的抵抗枢纽之后，德军指挥部对于抵抗苏军的进攻已经失去信心。德军指挥部为了对实施进攻的近卫第 8 集团军的部队进行抵抗，动用了全部预备队。其中包括从第聂伯河左岸调过来的部队（这些部队原来在左岸用于牵制近卫第 3 集团军）。在近卫步兵第 29 军和近卫第 4 军左翼当面又出现了德军新到的几个师。

这些师到达后当即对各军实施了反冲击，各军的进攻暂时停止下来。道路还是泥泞不堪，由于弹药不足，我们在打退敌人的反冲击后，不能立即转入进攻。敌人在反冲击中伤亡无数。可是我军也没有力量一举打到第聂伯河岸和最后封闭包围圈。航空侦察报告，在新锐部队反冲击的掩护下，德寇士兵像潮水一样涌出包围圈，把技术兵器和重型武器统统丢弃在大路上和河滩地里。

2 月 8 日我们得知，什列明将军的第 6 集团军的步兵第 66 军的部队和列柳申科将军的近卫第 3 集团军的步兵第 32 军已经进至尼科波尔。

我认为，尼科波尔市的解放乃是各兵种，数个集团军甚至数个方面军组织协同动作的光辉范例。这座城市是被近卫第 6 和第 3 集团军解放的。但是近卫第 46 和第 8 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对于这个城市的解放，也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敌人丧失阿波斯托洛沃和大科斯特罗姆卡之后，即开始急速地从尼科波尔撤退，扔下了他们曾拚命坚守过的锰矿。

2 月 29 日是粉碎敌人尼科波尔集团的最后一天。为了对付这股敌人，从去年 11 日起到现在，近卫第 8 集团军一直与其它各军团并肩作战。

1944 年 2 月 24 日，我们接到方面军司令员的一份训令。训令要求近卫第 8 集团军和其它集团军准备发起新的战役。

我集团军面临的任务是，首先把敌人赶过因古列茨河，尔后在该河右岸占领登陆场。

2 月 25 日，因古列茨河左岸上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战斗一直持续到 2 月 29 日。

我们的部队向河岸发起猛攻，不断肃清左岸坚固阵地上的敌人。有时战斗平静下来，好像形成了势均力敌的局面。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都没有反映出什么情况来。这使我心中不解。于是我决定下部队去看看。越野车没有一辆能开得动。我只得乘坦克牵引车前往。这种车实际上是一种没有火炮和炮塔的 T—34 式坦克。

我看了近卫步兵第 4 和第 29 军的司令部并到了几个师之后，才发现，我们的部队没有充分利用有利于进攻的一切条件。比如，在敌人沿河岸设置的防线中，其兵力部署只是一个梯队。诚然，泥泞的道路妨碍了我军的进攻。但是，同样也限制了敌人发挥机动性。我心想，一定要想办法使人们振作起精神来，要动员他们采取积极的作战行动。

步兵师发起了进攻。德军指挥部和士兵们都万万没有想到，我军会在这样泥泞难行，而且没有炮兵支援的条件下发动进攻。我们刚一冲上去，敌人就慌张起来，丢下了武器逃跑了。在这一天，近卫步兵第 82 师向前推进大约

16 公里，进至因古列茨河，占领了新库尔斯卡亚至舍斯捷尼亚地段。

本来应该继续发展进攻。这次又是泥泞妨碍了我们。可是有一件事，倒是帮了我们的忙。我从前沿回集团军司令部时顺便到希罗科耶——阿波斯托洛沃铁路线的路堤上看了看，发现铁轨和枕木虽被拆掉，但是路基上还可以通行汽车。我回到司令部后，马上吩咐工兵主任特卡琴科上校，要他组织力量在路堤上修筑道路，以便于部队、技术兵器和弹药的运输。并且要他规定严格的车辆行驶制度，重点保障载重车辆开赴前线。

方面军指挥部赋予我们集团军的任务是，3 月 1—2 日在因古列茨右岸夺占登陆场，并进至泽廖纳亚、安德列耶夫卡、绿盖、戈罗赫瓦特卡地区。根据方面军训令的要求，我集团军到达该地区后，应立即沿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新布格方向发展进攻。方面军在训令中还规定，我集团军应在希罗科耶、安德烈耶夫卡地域构筑渡口，以保障近卫机械化第 4 军和近卫骑兵第 4 军进入突破口。这两个军是方面军的骑兵机械化集群，由普利耶夫中将统一指挥。

左邻的第 6 集团军此时已把战线转向西南。

为遂行此项任务，我决定以集团军右翼实施主要突击，把近卫步兵第 28 军投入战斗并命令潘科夫将军的近卫步兵第 88 师经由因古列茨镇和泽廖诺耶镇实施进攻。

进攻开始的时间定于 3 月 3 日。

经过侦察和现地勘察表明，因古列茨河右岸构筑了十分坚固的工事。那里设有全断面掩体、炮兵阵地和地雷场。总之，敌人依托泛滥的因古列茨河构成了数个坚固筑垒的防御地区。突破这样的防御，首先需要大量的炮弹，但是我们至今还缺少弹药。弹药的运输也极端困难。

3 月 3 日上午 11 时，近卫第 8 集团军发起了总攻。在数个地方强渡因古列茨河之后，一天之内向前推进 5—6 公里。先是夺占了几个彼此不相连的登陆场，进而又将其连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凸向敌人防御纵深的突出部。现在这个登陆场已经从泽廖诺耶延伸到安德烈耶夫卡（扎别列什纳亚）、宽达恰、尼科格——科捷尔斯克火车站。我集团军的部队以右岸为依托，把炮兵、坦克和弹药运过了河。

常言道，战争之中，人们对于死亡已经司空见惯，不以为然。我说这话不对！

怎么处理该军的指挥问题？它刚刚执行集中的任务，它还没有受领战斗任务。通过无线电下达战斗任务，是不可能的。

于是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用波—2 式飞机把集团军装甲坦克兵机械化兵司令巴音卢布从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地域接到巴什坦卡。他的任务是接替该军的指挥，并在第二梯队集结，同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和近卫步兵第 28 军各师保持密切联系，制止敌人穿过新布格—尼科拉耶夫路线向西突围；一旦发现敌人向西突围，立即对其实施反突击。巴音卢布受领任务后经过一小时就动身起飞了。3 小时后，我接到他的密码电报，他顺利着陆，已经到达坦克第 23 军司令部。

敌人不断地实施反冲击，越来越使我们感到，德军指挥部确实急于组织这些军队突围。突围的方向是指向新波尔塔夫卡、巴什坦卡和巴尔马舍沃。其主力分两个集群集中在两个地域。北集群有 5—6 个师；南集群有 3—4 个师。

新波尔塔夫卡有一个已被我军占领的德军列车式军械仓库。列车里装的是弹药，停在新波尔塔夫卡至弗拉基米罗夫卡的铁路支线上。因此，我们特别担心这些弹药重新被敌人夺占。假若敌人一旦夺得这些弹药，他们就会在火力上占优势。

我吩咐炮兵司令波让尔斯基将军，调一个弹药较少的炮兵营来。给该营装备上缴获德寇的尚能使用的火炮，并在仓库附近占领发射阵地，让他们不要吝惜仓库里的炮弹，朝着新谢尔盖耶夫卡、马列耶夫卡地域的敌人集团猛打。

这时我不敢怠慢，忙带上一个作战小组，离开特罗伊茨科萨福诺沃地域，驱车前往新波尔塔夫卡。同我一起前往的还有集团军军事委员谢苗诺夫将军、炮兵司令波让尔斯基、集团军副参谋长别利亚夫斯基上校、工兵主任特卡琴科和司令部参谋。

我们于3月12日早晨到达新波尔塔夫卡。到达后，当即与近卫第28、第4军以及坦克第23军沟通了联系。当我们在现地研究了情况后才知道，我们这次赶来，是十分及时的，敌人在这里已经集中了相当大的兵力、兵器，展开了部队，准备突破合围圈。

我集团军准备于3月14日拂晓发起坚决的进攻。

当敌人发现不能在白天突围时，便改为夜间实施突围。3月13日夜间2时，德寇展开密集的散兵线和纵队开始突围，行进中发挥步、机枪火力。这时我们的炮兵已无法射击。于是步兵和坦克对敌人进行了抵近射击。敌人不顾我步兵和坦克的射击，一味地向前推进。夜间他们发现不了自己的伤亡；其实大量的敌人已被我消灭。

夜间2时，我命令近卫步兵第35、第47、第57师和步兵第353师，从北向南实施进攻。

在夜间，很难看清歼灭敌人被围集团的情况。根据步、机枪火力的激烈程度，大致能估计出一些情况。天亮后，我们根据战场上堆积如山的敌人尸体判断出，德寇是企图窜至因古尔河，并企图渡过河右岸逃生。

方面军司令员要求近卫第8集团军果敢地行动，以全部兵力渡河。普利耶夫将军奉命于3月22日夜间，把骑兵机械化集群带到特罗伊斯科耶、新敖德萨地域的渡河点。

但是由于天气不佳，影响了命令的执行。从南面吹来了海风。布格湖在平常的天气，就是一个严重的水障碍。如今海风把水涌进了湖面。湖水猛涨，颇有淹及我们几个登陆场的危险。因此，必须当机立断，下令让已经夺占了登陆场的部队，赶紧离开登陆场，转回左岸。

两小时之后，我们的军队已经陆陆续续地在桥上通过了。

集团军司令部渡过南布格河，来到右岸，部队报告说，敌人企图抵抗，但在我打击下，全线崩溃。我们乘机俘虏300名官兵。根据俘虏口供判断，我们的当面之敌是德军步兵第9、第17、第358、第294、第302、第325师和罗马尼亚步兵第15、第24师。

至4月1日，集团军的军队已经进至季利古尔湖，使用部分兵力从北面进行迂回，从行进间强渡该湖。在这里，我们交了好运气。刮起了北风，湖水下降了。

敌人在防守季利古尔湖畔的阵地失利之后，整天慢慢腾腾地向西南方向撤退。敌人以后卫部队阻止我们推进的企图未能得逞。这些部队被我军击退

和歼灭了。

方面军司令部一再催促我们加速前进。我军鼓足干劲，接连克服数道水域。

方面军4月1日的命令，要求近卫军第8集团军于4月2日日终前进至多布良卡、阿列斯培罗沃地区。

我军有时不得不暂时停止下来。因为需要把各先遣支队运过一道一道的地域。同时还需要把主力、炮兵、弹药拉上来。否则先头部队会遭到敌人火力杀伤。

4月6日，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克服了一些河流和湖泊以及无数的大小河湾之后，最后到达敖德萨前的哈吉别伊湖的别尔卡、旧万达利诺夫卡地段。

德军指挥部定会估计到，正是在这里，他们才有可能阻止我军渡河，赢得一些时间，以便在敖德萨组织防御。湖面最狭窄的部分为800米，深约两米。

敌人本来有可能在右岸组织防御，但近卫第8集团军赶在了敌人的前面，从行进间渡过了该湖。

敖德萨的大门已经被打开。

普利耶夫的骑兵机械化集群此时突然从右边迂回，从西北方向直逼敖德萨。

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已把集中在敖德萨的敌人集群全部割裂。

在敖德萨战役中，乌克兰第3方面军的各集团军在各自的地段上遂行任务时，能够彼此密切配合，相互协调，统一步骤，统一进度。这无疑已作为大兵团协同作战的光辉范例，载入了史册。

第5突击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已经沿黑海海岸运动。不过，其它几个集团军所实施的夹击性的侧敌行军对于第5突击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沿海岸运动，起了策应作用。敌人由于害怕遭到合围，撤退了。乌克兰第3方面军和第6集团军随后紧追不舍，不让敌人有机会组织巩固的防御。

方面军准备强攻敖德萨。困难的日子已经过去，数道水域已被克服，数个集团军的官兵立功受奖。

近卫第4军各部队于5月10日连续打退敌人的数次进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

为了防守近卫第4军和第28军的接合部，近卫第57师于傍晚时开始向前运动，任务是于夜间渡过德涅斯特河，到达右岸，并在那里组织防御，梯次配置在两个军的接合部上。

5月10日，在一天之内德军4000余名官兵被击毙、60多辆坦克被击毁、15架飞机被我击落。

方面军指挥部设在拉兹杰利纳亚火车站。夜间3时，马利诺夫斯基被轰隆隆的炮声所惊扰。他命令方面军的航空兵全部出动，制止敌人对登陆场的进攻。早晨航空兵集团军司令苏杰茨来到我的观察所。随后方面军炮兵司令涅杰林将军也来到了这里。我同意苏杰茨对敌人的坦克和步兵纵队进行突击。同时我请求炮兵司令涅杰林多拨给我们一些弹药。

当天下午，敌人企图以全力从舍尔佩伊向北发展进攻，以便进至集团军的主要渡口。当近卫第57师的部队投入战斗后，敌人被迫暂时停止进攻。根据俘虏口供和近卫第4和第28军地段上敌人尸体上搞到的文件证明，当面进

攻之敌是：步兵第 17、第 294、第 330 师和坦克第 3、第 13、第 14 师。在 5 月 11 日一天的战斗之中，敌人的飞机共出动 1200 个架次。

在这些日子里，敌人的航空兵使用了箱装式炸弹。箱中装有小型炸弹，每颗炸弹重量约为 1.5 公斤。这种箱装式炸弹由“福克—乌里弗”式歼击机投掷。箱子在空中炸开，小型炸弹自行飞落地面，对生动力量进行大面积杀伤比较有效。不过只要头顶上有 10—15 公分的防护层，完全可以抵挡住这种炸弹的杀伤。我们的战士很快就搞清这种所谓“新式武器”，都管它叫“蛤蟆”，并很快学会了进行防护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们的航空兵也装备了类似的炸弹。不过性能比敌人的优越，不但能杀伤生动力量，而且能击毁敌人的坦克。

5 月 11 日一天的战斗中，敌人遭受重大损失——死伤不下 5000 人，约有 50 辆坦克被击毁。

5 月 11 日，马利诺夫斯基来到布托尔地域。他拿起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有近百辆敌人的坦克被摧毁和被燃烧，方知敌人在该地段上曾发动过大规模的进攻，要恢复态势，需要兵力和时间，特别是需要弹药。单凭步兵去对付坦克，那简直是罪过。

5 月 15 日方面军司令员下令：“近卫第 8 集团军应停止扩大登陆场的战斗，原地转入坚固的防御。”

5 月 16 日至 22 日期间，敌人出动预备队多次发起进攻，但均被我击退，并遭受重大损失。

敌人的最后一次进攻，是 5 月 23 日清晨由步兵第 17 师和坦克第 3 师实施的。进攻从凌晨 4 时 30 分开始持续到 8 时。敌人共 4 次发起冲击，均被我步机枪火力和炮兵火力压制下去。敌人的许多坦克被我炮兵和反坦克手榴弹击中燃起大火。很明显，敌人已经拿出最后的一点兵力。敌人整整打了近两个星期，已经精疲力尽，快要被迫停止进攻了。

我军在防守登陆场过程中，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已把敌人彻底拖垮。

1944 年 6 月 5 日，近卫第 8 集团军被调为乌克兰第 3 方面军的预备队，尔后又遵照大本营的决定，开始准备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序列。

近卫第 8 集团军参加解放乌克兰南部地区的战斗，至此结束。

### 第三章 血 路

横戈跃马在主要战略方向上  
踏着敌人的尸体前进  
波谲云诡的战场局势  
调转主要突击方向  
龙腾虎跃  
插向敌人纵深  
与德国鬼子决一雌雄  
敌人溃退了  
维斯瓦河、奥得河，史诗般的战役

1944年的夏季来到了。6月初我才知道近卫第8集团军要编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并调到主突方向上。

这是至高无尚的荣誉。但对此事，集团军里却很少为人所知。而我们领导人对此消息也无权扩散。因为这是军事绝密，它关系着全军的部署调动。

司令部工作任务浩繁——要确定行进道路、行军路线、军队的集中地域，还要分配交通工具。

而此时，司令部里还正在进行人事调动。别良夫斯基接替了原参谋长符拉吉米洛夫将军的工作。他原任作战部长。该同志当时还不满40岁，人们都开他的玩笑，管他叫“少壮派”将军。他工作起来大胆、心细，精力十足。迅速、准确、干净、利落是他的工作特色。

6月10日，别良夫斯基被召到莫斯科去全面汇报集团军的现状，就在他启程的当天，我们接到了转移的命令，要求我们集团军沿铁路线从苏德战场南翼转移到中部。我们按照调动的方案着手进行工作。

部队装载的时间定于6月12日晨6时。为了指挥部队的转移，成立了一个特别作战小组，组长由我的副手杜哈诺夫中将担任。

当部队装载和开拔的工作就绪之后，军委委员普洛宁少将、炮兵司令波让斯基和我受命乘汽车直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部。

我们启程的时间定于6月14日。我把司机唤来，令他做好行车的准备，带上能行驶1000公里的汽油。

“1000公里？”司机问道。

我见他那疑惑不解的神气，便斩钉截铁地说：“对，1000公里。”

司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说：“好吧，那我执行命令。可是司令员同志，我要说的是带那么多油白费，因为沿途在别尔金切夫、维尼采、日托米尔等地都可以弄到油……”。

司机这番话顿时使我提心吊胆起来。因为出发路线是我们苦心思考的事关重大的机密。如今怎么由一个普通司机随便脱口而出呢？于是我严肃地说：“别瞎说！执行命令。”司机会意地微笑了一下说：“是，司令员同志，您指到哪儿我开到哪儿就是了。不过，开到什么地方，我原来心中就有数。”

对于战士的“小广播”，我本已司空见惯。但对此次之传说我却倍加警惕。因为关于我们沿铁路调动的消息万一落入敌手，那损失将是难以估计的。消息是怎么传出去的？一直使我忐忑不安。所幸后来查明，关于我们近卫第8集团军调动，敌人一点儿也没有搞到情报。

当我们近卫第 8 集团军奉命编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后，苏德战场的形势如何？

战场的阵线缩短了。这样，我军攻，可集中力量；防，可增大纵深。兵力、兵器十分充裕。

这就要求我们打起仗来更加机动灵活。能在一个地段上迅速而隐蔽地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兵器。动作要快，给敌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祖国竭尽全力供应全线。人员、物资源源不断。工业开足了马力，新解放的地区也开始了工业生产。顿涅茨的煤、克里沃罗格的矿石，尼科波尔的锰，统统都使用上了。

到了 1942 年的夏秋季战局，战线长达 4450 公里，从巴连采夫直到黑海，我军战役军团星罗棋布，齐装满员，巍巍然不可一世。

到此时，整个红军的人数已达 660 万。而且火力已大大增强了。有 9.8 万门火炮能随时开火。坦克和自行火炮 7100 辆。空军有战斗机 1.2 万架。

在 1944 年夏季，面对我 660 万人的大军，德寇军队只能拼凑 430 万人。在苏德战场上敌人许多兵团相继被打垮。希特勒拿出来他在欧洲的全部老本，工业上也只能是孤注一掷，在苏德战场上才拼凑出 5.9 万门火炮、7s00 辆坦克和强击炮以及 3200 架战斗飞机。

很明显，凭这些力量希特勒军队再也不能发动任何强大的攻势了，希特勒军队只能进行防御，这是历史所决定的。不过，希特勒凭他这些力量进行防御，还是满有劲头的。

下面我对希特勒军队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思想情绪方面略谈几句。

除了在斯大林格勒外，我对德寇在进攻上的表现，见的不多，而且斯大林格勒战斗又有特殊性。不过，我发现德寇进行防御确实有其长处。他们顽强而干练，是个强手。当然，希特勒和法西斯党在德军中已经威信扫地。但是，德国军队本身却是一个精神支柱。到了 1944 年，在德军中谁也不会再相信希特勒的什么英明和他的什么奇迹。但是，德军士兵已经看到，他们在别人的国土上犯下了滔天罪行，如今他们死到临头了，必须作困兽之斗，才有出路。此外，防御作战也有其特点，就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以较少的兵力抵御强敌。这一切都给我们军队实施进攻带来巨大的困难，我们面临着殊死的拼搏。

最高统帅部在 5 月 1 日命令中全面地阐述了 1944 年夏秋战局的总的目标。

战场上已经面目一新。在苏德战场的中央，我军已经撕开了一个宽达 400 公里的突破口。

这就是我近卫第 8 集团军当时所处的情况概貌。就是在这些日子里，我们集团军在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编成内，参加了 6 月 20 日发起的突击。

他关照我们说：“此地森林茂密，人烟稀少，敌人的散兵游勇经常出没。对于大部队来说，没什么问题，至于我们的高级军官路经此地时，倒要分外留心。”

他在地图上把我们集团军要去集中的那片森林指给我们看。

各梯队分别在拉阔卢夫卡等五个车站卸载完毕。各师、团长接到指示：军队和武器装备的调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并且严格伪装。我们要求司令部和后勤部长精确地组织调整勤务。当时在各个路口上都设立了监察站。各站都由集团军司令部派出参谋人员负责掌握，就地检查各部队执行夜间行军纪律

的情况。最后，各部队都相继进行驻森林并进行了仔细的伪装。我严令各部队不得在沿湖泊、河流较暴露的场所洗澡和洗衣。我们组织部队消除了行军路线和集中地域内所有的履带痕迹。没有特别指示，任何无线电不允许开机。全部无线电台都进行签封。通过有线通信工具的一切通话均用密语，并加保密措施。

我们集团军调往主突方向的时间，正好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巧合。6月6日这一天，盟国的军队在诺曼底登陆了。说老实话，我们这些久经沙场的老将对此事并未看在眼里。问题是行动太迟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据我所知，我们浴血奋战，早在1942年秋就希望盟国开辟战场了。那时，德寇已突入我高加索，德国将军鲍卢斯的军队与我军在斯大林格勒城内逐街厮杀。在城北，我们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徒步50公里去冲击敌寇的城垒。相当艰苦啊！第二年夏天，库尔斯克之战，德寇军队犹如洪水猛兽，一个整师一个整师地投入战场。我们在极端艰苦的日子里也曾希望过盟国能早日开辟第二战场。

当然喽，晚总比没有强。而且，英美部队在法国登陆的最初几天就使德寇大吃苦头。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这些盟友中间还有敌对势力在活动。西方国家和希特勒分子的某些上层人物中间还在秘密地玩弄着一个不小的外交把戏。

尽人皆知，如今就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也可以把德寇赶出去，也可以胜利地结束战争。但是，我们并没有感情用事。我们并没有把盟国的统治集团和他们的士兵混为一谈。我们这些浴血奋战的人还是以同情的心情关注着盟国在诺曼底的登陆。另外，人们也同时看到，我们苏军的进攻越有效，越可以减轻德寇对盟军的抵抗。

当时，我们对部队的训练着重抓了森林地作战。训练部队能够在林区实施侦察，能在林木堵塞的地形上开出大小道路。训练部队能够排除敌人在令人难料的地人所埋设的地雷。因为此时，德军已经开始广泛地使用地雷了。

敌人总共构筑了3道防御地带：

第一防御地带，纵深6公里。阵地上的堑壕十分完整，并有交通壕相连接。敌人阵地前沿均没有雷场和三列桩铁丝网。敌阵地前沿内有若干高地可俯瞰我方阵地纵深。敌方的高地均构成环形防御和火力网连接的支撑点。马采尤夫和托尔戈维两处之间是我军拟定的突破地段。敌人亦将其改造成极其坚固的支撑点。敌前沿阵地前均有侧射火力掩护。

第二防御地带，是沿普拉斯克河右岸构筑的。距第一防御地带前沿约12公里。此外构筑了一至两道堑壕。主要的障碍是这条河。河不大，但是十分泥泞难行。

第三防御地带，是集团军防御地带，沿西布格河右岸构筑的。距第二防御地带35公里。该防御地带内由各个抵抗枢纽部和支撑点组成，其中构筑有堑壕，各火力点之间均有火力协同。阵地正面和两侧的支撑点前均设有铁丝网。

这样，敌人所构筑的防御工事已经达到50—60公里的纵深。此外，敌人辽在仓促间沿维斯拉河构筑了一道防御地区。但敌人兵穷力竭，虽有工事却无实兵占领，特别是在维斯拉防线，已不能派出一兵一卒，因为此处距前沿达200公里之远。

敌人只能派军队占领主要防御地带和第二防御地带之一部，集团军防御



地带则是唱的“空城计”，指望由败退的军队把守，或由预备队前往占领。

近卫第8集团军需要强渡西布格河。河床弯弯曲曲，宽达80米，深达2—4米。每前进一步都是困难重重。甚至那条不起眼的普拉斯克小河，两岸都是沼泽地，给我们带来不少麻烦。道路很少，况且多数是土路，路经的桥梁均被破坏，有的地段高低不平，年久失修。

我们集团军为了等待进攻的命令，集结在距离前沿120公里的地方，在这里进行补充和战前训练。

最后，终于接到了方面军司令员的指令，令我近卫第8集团军在波里杜巴、托尔郭维地段突破敌人的防御，歼灭守敌后，于战役第一日终日终前攻战波查普、赫沃斯托夫、南赫沃斯托夫等三个地区。当时还规定，我们到达戈罗德诺，马雪夫地区后（大致在战役第二天），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交战（司令员是坦克兵上将波格丹诺夫）。

空军第6集团军担任空中掩护。我集团军的右邻是第47集团军，其任务是在5公里的地段上实施突破。左邻是第60集团军，其任务是在4公里的地段上实施突破。

我近卫第8集团军进攻的位置居于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中央，以保证方面军快速集群（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

给我们进攻准备的时间是8个昼夜。

首先，我们会同各兵种主任、各军军长和各师长在突破地段进行了现地勘察。进攻的决心来之不易。它是我们这个集体的友好相处的一个创作。定下决心前经过了反复研究、深思熟虑。

我们尽管处处慎重，但还是忧心忡忡。敌人在战术上究竟耍了什么新花招？至今还不摸底。当时法西斯头子戈培尔正鼓吹所谓的“弹性防御”。据说，这种防御的特点是充分发挥防御军队的机动性和快速性。

此种防御以行动突然为原则。开始先作有计划的退却，尔后从其它地段迅速调来强大的机动部队或预备队，进行出其不意的反击。敌人这一招，我们在德涅斯特登陆场上曾经领教过。那时，我们没经验，方面军和集团军的司令部万万没想到，被打得丢盔卸甲的敌人，后来还有那么大劲头进行反击。那次作战，对我们教育很深。

此次，敌人会不会重操故技，把老一套搬出来？是否可能已经嗅到了我们进攻的威胁，而先退守二线，收缩兵力？因为当时的森林和沼泽有利于敌人隐蔽地进行机动，组织防御，而以突然之举迎击我军。

不，决不能让敌人得逞。应当以最小的代价打破敌人的“弹性防御”。

当时方面军司令员计划令坦克第2集团军从我近卫第8集团军的突破地段上进入突破口，因此决定由我集团军负责保障其行动。而集团军对其最佳之保障，乃是我们急速而不间断的进攻。对此我们是有把握的，因为我集团军各兵团都建立了纵深梯次的战斗部署。

根据我们已经定下的作战决心，拟制了战役计划，并且详细地规定了军队的行动方案，进行了各种必要的估算。

1944年7月13日夜，集团军第一梯队各师在突破地段进入了出发阵地。在我各师前面占领阵地的是原在该地段进行防御的第47集团军的步兵第60师。我们的炮兵对已被发现的敌人火力点进行试射时，十分小心翼翼。常言道，我们的“大作”只欠最后一笔了，真是剑拔弩张，一触即发！

我们设法不惊动敌人，以避免敌人不战而退。

我得到通知，说当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之后，波兰第1集团军随后行动。过不久，波军的一个指挥机构将到达我近卫第8集团军的指挥所，以便了解如何组织对敌人的防御进行突破。

我军一举突入敌阵数公里。至17时，集团军各部队已经进至普拉斯克河。这里已经是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敌军指挥部在这里又一次企图迟滞我军前进。但是，我近卫军战士没有裹足不前。由舒格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7师从行进间强渡这条泥泞的河流，一举登上对岸与敌接火。随该师之后，潘柯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也在各渡场上投入了战斗。该师以一个团强渡该河。此时，格里鲍夫少将的近卫步兵第27师也渡过了该河。

到日终时，我军已经楔入敌人的第二防御地带。

此时，坦克第11军已在奥库宁、新材地域占领了出发地域，并向普拉斯克河右岸派出了侦察。

空军第6集团军的飞机正对敌防御纵深内的军队和指挥所继续进行轰炸突击。航宁兵飞机总共出动855架次。

战斗一直打到夜晚还没有停止。侦察部队和炮兵在查明敌人的火器。工兵部队在为坦克和炮兵架设桥梁和开设渡口。步兵第88师趁夜暗全部渡到普拉斯克河右岸。

7月19日早晨集团军的炮兵再次进行轰击。军队重新发起冲击，至上午11时30分军队进至戈罗德诺、马雪夫一线。

下午坦克出动。坦克第11军此次在渡过普拉斯克河之后，直接进入突破口。该军切断逃敌的退路后，从北面包围柳鲍姆城，直插敌后。

在此段战斗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一些重要地区上敌人的抵抗已被粉碎。在整个突破口上我军已经取得突击的突然性和兵力的优势。在第47、69集团军的进攻地段上我军也已获全胜。

各军的第二梯队在庫信、柳鲍姆、维什涅茨一线进入战斗。各第二梯队的任务是尽快在宽大正面上进至西布格河，并从行进间强渡该河。我各军在进攻中的战斗部署统统采用两个梯队。

我们对左右邻的战斗行动也比较满意。他们也成功地发起了进攻，并与我们齐头并进。

1944年7月21日，波兰人民最高权利机构——人民代表会议作出了一项决定。这个决定于7月23日公布在波兰出版的报纸《波兰立陶宛王国》第一期上。决定中宣布了民族解放波兰委员会的成立。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艾德瓦尔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德日·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改部部长）、旺达·华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米哈伊·罗良·日米尔斯基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副部长是吉格蒙德·别林格。在组建人民代表会议过程中，波兰工人党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拟制了一个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并对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的意义作了说明。宣言中强调，人民代表会议是广泛代表人民各阶层的机构，其中包括农民党以及其它一些民主团体。该会议承认波兰在国外的一些组织（如波兰爱目者同盟），并承认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亡政府，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该流亡政府分裂波兰人民的行径。当时以特别法令宣布了波兰军队的成立。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1集团军和柳道夫游击兵团。该兵团是波兰领土上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的一个统一的组织，而波兰第1集团军则曾在白俄罗斯第1

方面军左翼兵团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战斗。

在这些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多次要求我们要急速地发展进攻。这是政治时局的需要，也是符合波兰人民利益的。

摆在我集团军面前的新的任务是：强渡维斯瓦河。

正当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左翼军队向维斯瓦河推进时，敌人布列斯特集团已经陷入了合围。

布列斯特的陷落迫在眉睫，德军指挥部惊恐万状，德军一旦失掉布列斯特，我军就会逼近华沙，进而从南面迂回东普鲁士。于是，德军指挥部力图将我军之进攻阻于布列斯特近郊。为此，调来第2、第9野战集团军的残部，以解燃眉之急。

我坦克第2集团军竭力向布拉格和华沙近邻推进，德军为加强这里的防御，正在不断地向这两处调遣兵力。

此时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波格耶诺夫负伤。坦克兵少将拉齐耶夫斯基临时接替指挥。

当时，战场上出现了两种情况：一方面是坦克第2集团军发动强有力的进攻，波兰第1集团军进入了交战。另一方面，由于敌人在布列斯特以北及其西北实施了反冲击。于是出现了一种危险情况，即德军很可能将其被割裂的“中央”集团军群和“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合为一股。

在这种情况下，方面军指挥部更加慎重起来。从7月24日起，三天内，我近卫第8集团军先后接到四次命令，但是每次命令中都没有提到强渡维斯瓦河的任务。

我很钦佩罗科索夫斯基的耐心和慎重。我们总是沿着维斯瓦河的右岸行动。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密集集结状态，炮兵处于待发状态，多么想派兵过河侦察，马上渡河啊！我咬紧牙关，克制着这种冲动。这是因为顾虑到敌人可能从北面对我军形成威胁。

已夺占的登陆场，计划是用来作依托，以便向西北方向实施突击，沿纳列夫河和维斯瓦河卷击敌人的防御，以利于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左翼军队强渡纳列夫河，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中部各集团军便于强渡维斯瓦河。

我在图上研究了地形之后，当即得出结论：强渡维斯瓦河的地域，应选在塔塔尔斯科、斯摩尔卡、达米鲁夫、道马耶夫居民点一带。此处我集团军的两翼可以得到屏护；北有皮里察河；南有拉多姆卡河。我集团军以此两河为两翼的屏障，可以经马格努塞夫地区实施主要突击。当前任务是在维斯瓦河对岸夺占一个登陆场，其纵深可达瓦尔卡、拉多姆之间的铁路线。

7月29日晨，我与罗科索夫斯基通了电话。他在电话里静静地听完了我的汇报之后，当即批准了我们前往维斯瓦河进行现地勘察的计划。我立即命令近卫步兵第4军军长拉祖诺夫于7月30日拂晓前派出警戒部队，以保证我们在河岸上进行现地勘察。集团军司令部受命拟制勘察计划。参加勘察的人员将包括各军长、师长。配属给我集团军的师、团长也将参加勘察。

方面军司令员最后批准了渡河。但是要求我们在第47集团军前出到赛列兹、斯托乔克之前，一定要把两个师留在原地，就是说仍然要我们警惕来自北面的威胁。这样一来，我只能在战役第一梯队部署4个师。7月31日我们再次进行现地勘察。因为我们要具体解决渡河的组织指挥问题。和我同行的还有参谋长别良夫斯基。他带领一个司令部作战组。在河岸上的还有各军长和师长。他们同负责炮兵和工兵的同志一起在现地给所属部队明确了任务，

指定了各渡河点并规定了向渡河点开进的通路，等等。

当我正在观察各预定的河口时，被仓促唤往集团军司令部去与方面军司令员通话。我是利用高频通话工具讲话的。通话内容，仅就我的记忆，是这样的：

罗：您要作好准备，大约在3天内就要渡河，渡河地段是马采那维兹和斯捷任沙，以便先夺占一个登陆场。关于渡河计划，最好在8月1日14时前用密码告诉我。

我：任务明白，但是关于渡河地段，我请求选在维尔加河口和波德维布日之间，以便登陆场两翼有皮利察河和拉多姆卡河作屏护。渡河时间我想明晨开始，不要等3天以后，因为我们已经万事俱备，只欠号令。开始的越早，取胜的把握也越大。

罗：我们炮兵和渡河工具都很少。方面军要是能给你们一点补充，也只能在3天以后，最高统帅部十分重视这次强渡维斯瓦河的行动，并且要求我们最大限度地保障这项复杂任务的成功。

我：这一点，我明白。可是我首先要拿到的是突然性。至于加强兵器，我想，如果能取得渡河的突然性。可以不用加强，我只请求允许我明晨开始渡河。

罗：那好吧！我同意。可是我劝你要三思而行，最后把渡河计划简短地报告上来。还有，请转告各级指挥员，对于渡河有功的官兵都要进行嘉奖，直至授予苏联英雄称号。

我：遵命。

我们的通话就这样地结束了。

我当即把计划交给方面军司令部。计划的内容是：

5时至8时进行炮兵试射；在试射期间，每个师派出一个营进行武装侦察。武装侦察一旦得手，即转入进攻。这方面，我们在突破科维尔以西的敌人防御时，已经取得了经验。如果武装侦察不能得手，就是说，敌人封锁很严，不让各营靠岸，或者各营靠岸后不能立足，应坚持一小时停顿，以便标定目标和组织协同。此时，歼击航空突击敌人前沿。

9时整，开始炮火准备和全部兵力进行渡河。

先以武装侦察，随后主力转入进攻这种战法，我们已用过多次，反复使用，会不会成为老套，而为敌人所识破？

我对待敌人是很慎重的。找懂得，敌人有可能猜出我们的战法。当然，敌人如果猜到，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世界上有些现成的打法是可以反复应用的。比如说，敌人这次猜到了我们随武装侦察后即转入进攻。敌人怎么招架？我们各方面都占优势。

敌人放弃前面几道堑壕向后撤退吗？那好哇！我们就可少费些炮弹，轻而易举地拿下他们的前几道堑壕；并以集团军的主力加强各侦察支队，从而以较小的代价攻占敌人的第一道防御阵地。

如果敌人阻击我侦察支队，那也好办。要是敌人在第一阵地各堑壕顽抗，那么我们就集中全部炮火对付他。举起铁锤狠打，敌人同样无法招架……

是的！老办法会奏效的，决不动摇。正是在此地——在维斯瓦河两岸，我们的战士把武装侦察支队称之为“梯队”。

我们利用天黑后的时间变更部署和调运渡河工具。尽管时间短暂，到凌晨4点，各部队都进入了出发位置。

说老实话，我当时内心确实疑惑不解。搞不清，敌人为什么还会有如此规模的进攻性行动。敌人在这个地区建立如此强大规模的进攻性行动。敌人在这个地区建立如此强大的坦克集团，他哪里来的兵力？究竟为了什么目的？我想，敌人短期内在白俄罗斯和波兰的东部失掉那么多地盘，遭受那么大损失，根本不会再有力量向南实施什么反突击或反冲击了。看来，方面军司令部认为他们的担心满有根据，而我们也只好垂首从命了。不过，我们还是说服了方面军司令部，允许把一个师（近卫步后 47 师）投到登陆场上，只留两个师在郭尔沃林以北转入防御。上级提醒我们：敌人坦克部队可能出现。果真不久就出现在我第 8 集团军的当面了！不过不是出现在维斯瓦河右岸，而是在左岸。

我每隔 2—3 小时便把登陆场上的战况向方面军司令部汇报一次。方面军指挥部密切关注着这里的战况。

柯尔巴柯奇中将指挥的第 69 集团军与我军一样，也从行进间强渡维斯瓦河，并在丹布林以西和普瓦维地区夺占了一个登陆场。

当我军调来高炮师占领发射阵地后，航空兵便中止了对各渡口的袭击。这是什么原因呢？从我集团军的观察所可以看到，敌人的轰炸机以 10 架为一批，歼击机以双机飞行，不断地试图突破我高炮拦阻火力。但是遇到我高射炮兵打出的密集的爆炸点之后，敌机纷纷躲开。这是 8 月 7 日晚上的情况。到次日清晨，我工兵部队已经在维斯瓦河架起两座桥梁，我军的新锐力量（炮兵、坦克、步兵部队）像水一样，经过桥梁开进登陆场。一个坦克军（属第 2 坦克集团军）也调到了登陆场。

我军有力地抗击了敌军多次冲击。8 月 10 日敌军把新锐兵力——坦克第 25 师投入战斗。战斗刚开始，敌人便由于损失惨重而停止进攻。

晚上我同方面军司令罗科索夫在集团军第二梯队的配置地域见了面。见面后，我们进行了热情而真挚的交谈。我们肝胆相照，开怀畅谈。从晚上一直谈到次日清晨。当我谈完强渡维斯瓦河和关于登陆场上的战斗之后，我们都回想起在伏尔加河见面的情况和斯大林格勒会战。话题又转向当前的战局和下一步的打算。在谈到进攻战役尔后的发展前景时，我俩的见解竟不约而同。

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十分健谈，自那天夜晚我们推心置腹的畅谈之后，我们彼此更加了解，并且成了终生的挚友。那次会面在我头脑里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罗科索夫斯基是个杰出的统帅，也是一个十分真挚的人。使我对他的性格、观点和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他离开这里时，没有让我送他，这正是他为人的特点。他最不爱摆架子，总是那样平易近人。一个人优良的性格，能全面而深刻地反映出一个人高尚的情操。

我与这位方面军司令员告别时，向他保证，在登陆场地域，我们不会让敌人再向维斯瓦河跨进一步。结果正是这样，敌人遭到回击之后，就再也不敢往河边挤我们了。由于考虑到我集团军夺占的登陆场地位的重要性，于是命令我们转入坚固的防御，为了加强我集团军的实力，决定将坦克第 2 集团军的坦克第 16 军调归我集团军指挥。

至 9 月 6 日我集团军完成了第一防御地带的工事构筑。

第一与第二道绵亘的堑壕之间相隔 200—300 米并有交通壕相连。堑壕前有密集的防步兵和防坦克地雷场和铁丝网。部队构筑完机枪和防坦克炮的工事之后，即开始构筑掩蔽部和第二防御地带（该地带由第二梯队各师构筑）。

根据敌坦克和炮兵可能集结地域我们计划了炮兵火力，炮兵学会了迅速实施精确的集中射击的能力。特别注意了保障预备队的快速部队进行机动的火力配系。在特别受威胁的方向上每公里正面集中大约 30 门火炮。在大居民都组织了环形防御。

如今我们已经在登陆场站稳了脚跟。敌人已经无力把我们推下维斯瓦河。

强渡维斯瓦河这样宽而深的大河，缺了工兵是不行的。由于工兵的自我牺牲精神和高超的技能，不仅人员，而且坦克、炮兵、弹药、粮秣以及其他物资都源源不断地渡过了河。担负这项任务领导工作的是集团军工兵部。这是一项艰险的工作，该部的同志十分团结，他们同心协力在短期内把一切渡河所必须之物隐蔽地集中起来。他们为了不让敌人发现，都是在夜间工作。组织渡河是在枪林弹雨中进行的。为了保障部队和兵器渡河，工兵部队付出的紧张劳动，是用语言难以形容的。

马格努塞夫登陆场与其它登陆场一样，是我军解放全波兰的大门。

在维斯瓦河的登陆场上，炮兵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日夜不停地进行战斗。有时敌人坦克从翼侧直冲过来，要对其进行直瞄射击，必须转移阵地。炮手们要把炮推出阵地，可是炮车轮子陷在沙子里。这时，席尔斯丘阔夫赶着马送炮弹。他知道我们炮手的困难之后，便用马来拖炮，顺利拖出阵地。炮手们又在新阵地向敌人开火了。尔后又去拖下一门炮，这样他将 3 门炮都拖了出来。火炮的精确射击解决了战斗。

生活证明，所谓“堑壕生活的恶劣情绪”并不是处处时时可见的。它是可以避免的。正如我们在马格努塞夫登陆场上那样，在各连、排都进行了良好的党政工作。在当时，我们党政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在防御中保持高度警惕性，使人们不能忘却敌情。因为敌人可能随时利用我们的麻痹大意思想转入进攻，突然，迅速地以微小代价取得重大战果。战士们经常受到提醒，最可能实施进攻或突击的，不一定是当面之敌，而是从预备队中调出的新锐力量。当面之敌只起一个屏障作用，掩护新锐力量进行集中，准备实施突然的袭击。

不要认为，我近卫第 8 集团军在马格努塞夫登陆场坚守防御的静寂的日子里光是闲坐无事，消磨时光。不，不是的。当大炮沉静时，我们的侦察兵四处活动，我们的工程兵忙得满头大汗，各级司令部忙得废寝忘食。

现在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说，我近卫第 8 集团军，加入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序列，在新的环境里，经受住一系列的考验，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去完成更为重要、更为艰巨的任务。

11 月 12 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签署了一道命令，任命苏联元帅朱可夫为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司令员，同时任命罗科索夫斯基为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司令员。

11 月 19 日，罗科索夫斯基告别了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领导人员。朱可夫接替了该方面军的领导。

朱可夫一上任，就积极准备新的进攻。首先，他来到马格努塞夫和普瓦维登陆场，在现地研究了方面军主力转入进攻的条件和能力。

此时，军队、技术装备、武器弹药正在源源不断地运到马格努塞夫登陆场。战斗好像一个被压得紧紧的弹簧，跃跃欲试。登陆场上已经展开了野战活动医院。维斯瓦河的渡口不断扩大，在进攻前马格努塞夫登陆场上已经集

中了 23 个师和 5348 门火炮。在突破地段上每公里正面的火炮密度为 282 门。

近卫第 8 集团军的突破地段宽度为 7 公里。

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要求方面军和集团军后方机关作出巨大的努力，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数万吨各种物资运到登陆场。

在 12 月，维斯瓦河上开始出现浮冰。这给集团军部队，特别是给工兵增添了许多麻烦。河上的大桥有被浮冰冲垮的危险，浮冰不但漂在河面，并且沉在水下，直擦河底。水下的浮冰不断地冲击着桥墩，阻拦着流水，使河水的流速越来越大。河水冲击着河岸和桥墩近处的河底。这时应当集中全部工兵和道路部队保护桥墩。我们为每座桥派出了 3 个爆破连和 1 个修路营。并组织了抢险队。给每个负责渡河的指挥员拨出了汽车和拖拉机。还给了他们一个 120 毫米迫炮连，以便炸碎大块流冰。

在大桥上作业的人们日以继夜地苦战，终于战胜了流冰，保住了渡口，保障了车辆源源不断地通过大桥。

从马格努塞夫登陆场实施强大的突击，有许多特殊要求：如，供应众多的军队（数个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需要大批运输力量，需要渡口、转运站和铁路，在维斯瓦河上架设大桥，修复铁路网等等。这一切给方面军和集团军后勤提出了很多难题，包括政治上的问题。因为红军是在异国作战（在友好的波兰国土上作战）。

战役企图是：全部击溃敌人军队，同时要保存华沙和波兰其它城市不遭到破坏。

为了具体研究战役计划，朱可夫元帅召集作战会议，把各集团军司令员、军委委员、参谋长以及各独立军军长召集到谢德列兹。方面军参谋长马里宁将军简要地叙述了当前战役企图（即战役第一阶段）。进攻速度预定为：在进攻的第 10—12 日，我军应进到彼得库维克、日何林、罗兹一线，尔后向波兹南方向发展进攻。

战役企图只规定了 10 至 12 昼夜的进攻任务。根据所规定的进攻距离（150—180 公里），可以看出，进攻速度每昼夜为 1518 公里。

白俄罗斯第 1、第 2 方面军和乌克兰第 1 方面军共同实施深远的径直的割裂性突击。在这同时还将进行其它几个战役，作为这一突击的补充。例如，右翼有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切尔尼亚霍夫斯基指挥），从东向西在东普鲁士进攻敌“中央”集团军群。左翼有乌克兰第 4 方面军向柯希彩实施突击。

方面军参谋长作简要的介绍之后，朱可夫元帅当即向我们询问情况，并征求我们对当前战役的看法。

朱可夫元帅首先询问了那些已经把部队带到登陆场的将军们。先发言的是我。

我的发言用了约 30 分钟的时间。先报告了敌情：敌人的部队、敌防御设施、敌人预备队的数量和配置地点。接着我谈了自己的分析。我认为，根据敌人预备队的配置情况来看，敌人可能调动防御纵深的坦克和步兵师实施强大的反冲击和反突击。对此应当有所准备。为此，应当掌握合成预备队和反坦克预备队，并且使用航空兵破坏敌人快速战役预备队的机动。我们部队虽在较长时间内一直与敌保持接触，但始终不能确切知道敌人将在哪些阵地与我展开决定性战斗。我认为敌人不会坚守第一阵地。因为我们对此已经了如指掌。敌人很了解我炮兵的威力。敌人只把第一阵地作为掩护主要防御地带的屏障。

根据这一情况，我提出一个曾在科维尔战役中行之有效的进攻作战方案。就是：我们的进攻应从战斗侦察开始，为此给侦察梯队的每个步兵营配备加强兵力（一个坦克连或一个自行火炮连）。

我们并不害怕在黑夜进攻，我们的步兵和炮兵对于敌人的第一阵地已经相当了解，侦察营不会搞错方位和冲击方向的。对第二阵地的冲击，是在一个半至两个小时以后，这时已经天亮，我们的炮兵和航空兵不会搞错目标，进攻的部队也不会搞错方向和插乱队形。

为了分散敌人的注意力，我提议我们在出发阵地上兵力、兵器的集结应当分批进行，以免敌人察觉我进攻准备。人员和技术兵器的移动只能在夜间进行。并且要计划好工作量，以便在天亮前一切都能隐蔽好和伪装好。白天在堑壕内的军队应加强土工作业，使敌人认为我们不是在准备进攻，而是在准备防御。同时尽量利用高音扩音器进行广播。在阵地上放音乐。一方面取悦我军的战士；另一方面麻痹敌军的斗志。

我的这些建议均得到批准。方面军司令部没有给各集团军下达书面命令，所有号令都是严格保密的。方面军司令员也没有下达命令，只是在地图上同我们进行了战斗预演。在演练中对于方面军和集团军的任务进行了介绍和研究，对于合成集团军和坦克集团军、航空兵、炮兵之间的协同动作也进行了概略的研究。

研究方面军各部队的行动时，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关于粮食、弹药和油料的供应。方面军后勤部长安基平科中将报告说，计划准备用于战役的全部储备（包括用于30天的粮食），各集团军应从方面军基地领取，并集中于各自的进攻地带。尽可能离前沿近一些。

根据进攻战役的计划，方面军应从马格努塞夫登陆场实施主要突击，从普瓦维登陆场实施第二个突击。从这两个登陆场实施进攻的军队共有：5个合成集团军、两个坦克集团军、两个坦克军和两个骑兵军。此外还有一个合成集团军将用来增强突击力量。我军使用这两个拳头从南面迂回敌人华沙集团，直指罗兹和波兹南。在我方面军右翼与敌对峙的是第47集团军和波兰第1集团军，他们根据主要方向上的进展情况。数日之后相机转入进攻。

德军在阿登的进攻迫使美英军队处于不利地位。为此，英国首相向苏联政府求援。丘吉尔在他的信中强调，他们认为，苏军快速进攻，以解救盟国，乃是“当务之急”。

1月7日斯大林答复丘吉尔说，“苏联红军将不迟于1月下旬在中部战场发起全面进攻。”

从马格努塞夫登陆场的进攻，定于1月14日开始。

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突击集团于1月12日便开始了进攻。

1月13日，我同其它集团军的司令员向方面军司令部报告说，我们的部队都已经占领了出发阵地。

按照方面军的计划，我集团军的任务是：在马德尔金、施马尔尼克地段进行突破，向利普、维什毫文方向发展进攻，攻占卡利努夫、弗朗齐什库夫、布尔托斯、高林一线，尔后，集团军主力向挪维—缅斯托、拉瓦—马祖维、叶茹夫、斯特利库夫、奥祖尔库夫这一总方向进攻。我军应于进攻的第12日到达阿斯塔霍维兹、杰尔佐什纳、杰日一线。

集团军司令部根据方面军所赋予的任务拟制出战役计划。该计划于1月8日经我批准。在制定这一计划时，周密考虑了敌我双方力量的对比。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突破敌人坚固的野战筑垒阵地。敌人主要防御地带前沿是沿下列居民点构筑的：戈林努维克、戈林努夫、戈雷库夫、布罗尼斯拉夫、列日尼彩、莫斯科，柯金尼彩森林之北侧，斯维日库尔涅。

敌第二防御地带构筑在柯萨维尔努夫、诺夫一斯坦尼斯维兹一线。

实施高速度的推进，并不断增强突击力量，有如开足的马力，这才是主要之点，这也正是进攻中最能扣动将帅心弦的课题。

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是：进攻开始前尽管进行了长时间的准备，数周乃至数月。可是进攻刚刚开始，就可能由于什么原因而遭到失败，结果前功尽弃。

我军 1945 年 1 月 14 日开始的进攻，在兵力、兵器上尽管占很大优势，而且也满有信心。可是，尽人皆知，进攻取胜，不能单凭优势。首先要靠才能。当然，才能和经验对我军官兵来说，那是绰绰有余的。不过，敌军也没有睡大觉。他们天天在研究我军的战法，寻找对策。天天都在玩弄各种花招，诱我上钩，以便重创我军，甚至挫败我军的进攻。

这次我们冒了点儿风险，原计划先进行 2 小时 35 分钟的炮火准备。可是为了出敌不意，我们只进行了 35 分钟的火力急袭，接着侦察梯队便开始冲击。当时我们担心敌人可能猜中我军的意图，从而改变部署，在我军预料不到的地点进行阻击。

清晨，宽宽的维斯瓦河上弥漫着层层浓雾，迷盲了我地面观察和空中侦察。这时我炮兵已不能通过瞄准射击来发挥火力优势。

我集团军的侦察梯队于 8 时 55 分协调一致发起冲击。步兵和坦克边冲击边开火。几分钟之后便攻占了第一堑壕，接着又拿下了第二堑壕。于是敌人的第一阵地很快落入我手。

罗兹城被我近卫第 8 集团军解放了。

晚上我们得知，为了庆祝罗兹城的解放，在莫斯科鸣放了礼炮。

由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和马克兰第 1 方面军 1 月份从维斯瓦河开始实施的进攻，作为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载入史册。

战役计划规定，我军应于战役第 10 至 12 日到达罗兹，可是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5 突击集团军于第 6 天即到达了该地区。原计划每昼夜前进 10 至 12 公里，但事实上我们每昼夜向前推进了 25 至 30 公里以上。

这样的进攻速度，不能不影响到部队的补给。在后勤工作中，原计划中的一些细微的疏忽，如今竟往往会铸成大错。无论是弹药、油料和粮食都满足不了部队的需求，而当时后勤工作的能力又很有限，此外，当解放罗兹之后，方面军指挥部还给我们下达了任务，令我集团军：当全部供给基地一旦跟上部队，应当以高于战役开始时的进攻速度向前推进。

1 月 23 日集团军部队已抵达波维兹、斯卢普察、钦仁一线。先遣支队已经进到格涅兹诺和符热希尼亚。这时，我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已经有可能先敌赶到瓦尔塔河沿岸敌阵地前，并组织突破。因此，我集团军应提高进攻速度，以免落后于坦克第 1 集团军的部队。但此时突然电话里传来了方面军下达的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

由于波兹南的敌人已经被围，而攻占该城很可能要耗时费力，因此方面军司令员命令我把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行动和刚刚赶到的第 69 集团军部队的行动协同起来，于 1945 年 1 月 25 日必须合力攻下波兹南。

在这之前，波兹南并不在我第 8 集团军进攻范围之内。进攻波兹南本来

是第 69 集团军的任务。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第 69 集团军进展会如此迟缓落后，以致于我集团军翼侧暴露，我们必须提防波兹南敌人对我翼侧的突击，因为波兹南城內集结了敌人强大的守备部队。

这时必须赶紧调转我集团军的进攻方向，可是这绝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集团军这时正在鼓足劲头，沿着预定的方向向西挺进。

我当即与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部进行联系。这才知道，原来他们已经赶到瓦尔塔河河岸，而且夺占了一个登陆场。他们像一支长矛，投到了敌人瓦尔塔防御地区。该集团军甚至打算从行进间突入波兹南，但是被敌人阻于该城东部。

过去，我们在北顿涅茨打过硬仗；我们在扎波罗热攻打过敌人的坚固的筑垒工事，工事沿德涅伯河构筑，德军指挥部把它们搞得十分坚固，可是我们还是攻下来了。我们攻占尼科波尔敌防御工事是我军进入波兰的第一仗，打的也是满艰苦的。可是过去这些战斗的艰巨性都不能与攻打波兹南相比。这是因为，一方面这里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另一方面敌军下决心在这里要进行殊死一战。对于这里的敌军，反正是绝路一条：垂死抵抗，定要被歼；如果举手投降，他们在大后方的全家定会被希特勒分子满门抄斩。

根据这一情况，方面军当即定下决心：攻打波兹南既不用我集团军主力，也不使用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具体计划是：以 3 个军的全部兵力强渡瓦尔塔河，从南北两面迂回波兹南，向西挺进，直插奥得河。若波兹南守军原地不动，不撤退，也不企图突围，则我军围而不打，相机行事。

我乘车来到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司令部，遇到了该集团军参谋长沙林将军，接着又与卡图阔夫相遇。我们共同研究了情况，共同研究了决心细节：近卫第 8 集团军主力和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不用来攻打波兹南，对该城实施迂回，以主力继续向奥德河实施进攻等等。

我把我们的决心通过电话，向方面军司令员作了报告。

1 月 25 日我集团军司令部第一梯队波兹南以东 12 公里的斯瓦任德兹镇展开了。12 点时得知，我们的部队在波兹南以南和以北的许多地段上渡过了瓦尔塔河，在河的对岸夺占了登陆场，现在正不断扩大，并不断向西进展。我军再次试图夺占波兹南东部炮台的外围，但毫无结果。经侦察得知，那里的守备兵力十分强大。

要是不把波兹南要塞从四面八方严密封锁起来是不行的，因为敌人可能从波兹南突出来，从后面袭击我进攻的部队。因此，最好是击溃敌人的守城部队。于是在当天决心以近卫第 39 师的兵力实施突击，并攻占城北的炮台。因该师已在城北夺占了一个登陆场。近卫步兵第 29 军正在坚守波兹南城内的登陆场，军长令该军的两个师从南面和西南面冲击波兹南要塞的炮台，集团军的坦克集群即将在波兹南以南渡过瓦尔塔河并进至尤尼科沃地区并作好战斗准备。待敌人从波兹南城向西退却时，击溃该敌，近卫步兵第 4 和第 28 军的主力继续沿瓦尔塔河岸向西进攻，其当前任务是：从行进间一举夺占曼捷利次筑垒地域，并前出至奥得河。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的任务是：主力在波兹南城以南全部渡过瓦尔塔河，并实施高速进攻，防止敌人退守已有准备的防御地区。

这时，封锁波兹南城东各炮台和筑垒工事的只有一个师（近卫步兵第 82 师），而且是在宽大正面上展开的。在波兹南附近还设有第 69 集团军的部队。

统帅部预备队的炮兵，已经跟随部队成纵队前进。该炮兵区分为强有力

的两个集群：南集群和北集群。数百门火炮已经对准波兹南要塞。总攻日期确定在 1 月 26 日晨。

正当我们准备攻打波兹南时，我集团军友邻则落后于我军两昼夜的行程。这点是不能责怪的。当着敌军顽强抵抗时，我们进攻的军队什么困难都可能遇到的。

我集团军的坦克兵团和步兵兵团实施了复杂的机动：一部分军队准备攻打波兹南要塞；另一部分则要快速跃进到奥得河。无论如何要赶在敌人前面。大家都明白，在战役开始时，以高速度的进攻所赢得的每一小时都是十分宝贵的。

就在这一天我们得知，敌人现在正急忙从西部战线和国土纵深把部队调往曼捷利次筑垒地域。同时被我集团军进攻部队击溃的敌军也退向该地域，企图纠集于奥得河一线。方面军司令员在 1 月 27 日的命令中曾向我们提醒过这一点，并且要求我们尽快地进至奥得河。

近日来，正是在这个地区，“柏林”这个词与作战文书联系在一起，变成了现实的任务。方面军司令员在 1945 年 1 月 27 日的命令中强调说：“如果我们能夺占奥得河，那柏林战役的胜利便有了充分的把握。”

在军内人所共知，朱可夫同志是一个严于律己，不善玄想的人。“柏林”这个词在他的命令中，如同通常首要的任务一样，可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命令时，内心何等激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自从战事打开局面以来，千里迢迢，战火纷飞，严寒凛冽，克服了千山万水，攻关拔寨，如今即将径直地踏上战争的终点……

我们根据已经掌握的侦察材料，拟制了攻城计划。总攻从 1 月 26 日晨开始。主要突击是由近卫第 27 和第 74 师从南面开始的。根据俘虏后来供称，我们这次突击完全出敌意料。进攻一开始，在瓦尔塔河西岸，该城南防区的两个堡垒便落入我手。这样一来，我军加强有坦克的部队便可以突入敌堡垒群，从后面（即从内侧）对敌实施冲击。我军在该城南防区进攻的胜利保障坦克集团军在瓦尔塔河渡河的安全，并且掩护了我近卫步兵第 29 军的交通线。

我把各部队的指挥员召集在一起，令他们作好攻击核心堡的最后准备。

我集团军向西发展进攻的部分军队，此时正在奥得河边展开战斗，因此我们必须两头兼顾。我与集团军司令部的人员往返于波兹南和奥得河之间，每周不下两至三次。

我军部队进行巷战已经多日，与德寇必须逐层进行争夺，我们在伏尔加河畔斯大林格勒战斗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对我们这次作战非常有用。

我军强击部队和强击分队突入波兹南城越深，越接近核心堡，敌守军抵抗就越顽强，战斗也就越残酷。每当我回想起配属给第 8 集团军的坦克部队，特别是想起由伊凡诺夫少校指挥的坦克第 259 团时，感谢之情不禁油然而起。从攻击波兹南一开始，他们就与我步兵和炮兵协同作战，他们勇敢顽强，机警灵活，创造和使用新的作战方法。例如坦克在巷战中，成“双车”进攻，靠右侧的坦克向左侧的目标开火，而靠左侧的坦克则向右侧的目的地开火。当我步兵分队需要在敌火下运动时，则我坦克在两侧排开，以自己的车体组成通道，掩护步兵通过。这样，坦克以自己的装甲和火炮支援步兵，以较少的伤亡通过敌火力网。

这种作战方法，在任何一本条令中也没有规定过。可是通过我官兵开动

脑筋，在战斗实践中产生了。我们的军事指挥员、政工干部和司令部人员迅速地抓住了战士的这些智慧结晶，利用各分队取得的成果，总结出新的作战方法。

根据得到的情报来看，核心坚守军的饮水、粮食和医药，只能维持一个半月至两个月。如果我们频繁地实施攻击，只能增加不必要的伤亡。因此我们决定暂时让部队休整一下，给炮兵和航空兵补充些弹药，同时规定炮兵和重坦克主要用来对敌人的枪眼进行直接瞄准射击。

我们准备了过壕用的梯子、跳板和束柴。炮兵使用国产的大口径炮弹猛烈地轰击敌人。结果在要塞的砖质围墙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我马上下令火炮用直瞄射击扩大缺口，于是迅速形成了一个5米长的通道，工兵在壕沟的外侧放置了大威力的炸药包，以便把炸塌的围墙填入壕内，形成路堤，保障坦克和自行火炮通过。

从2月18日开始的进攻，不停地进行了4昼夜。

我们在作战中使用了喷火器，但是使用轻型喷火器未能压制

住敌人的火力点，喷火器手不能匍匐接近壕沟边缘。20—25米的喷火距离起不了多大作用，于是我们改用火药桶。5—6名工兵在步兵火力的掩护下把火药桶推到壕沟的边缘，点着导火索，把火药桶朝着射孔滑滚过去，火药桶炸哑了敌人的机枪。工兵利用敌人火力减弱的机会，把长梯子顺着壕沟放下去，架起了跳板。步兵顺着长梯攀登要塞围墙，并跳到墙的南斜向，有的地方登上了墙垛。

2月19日16时，工兵受领任务在要塞壕沟上架桥，以便保障团属炮兵通过。我大威力火炮在围墙中打开一些缺口，我们准备穿过这些缺口铺设一座支架桥。

天黑以后，工兵把预先准备好的桥梁部件运到沟边，但却无法进行架桥作业，因为敌人不断地用火箭弹和机枪肉他们射击。这时我工兵进行了大威力爆破，敌人的多面堡暂时停止射击。工兵利用这个时机强行桥架。天亮前，一座12.5米的桥终于在壕沟上架了起来。当然，这座桥并未能存在很久。由于敌人以火箭弹直接击中该桥。半个小时后，这座桥被破坏了，但是，这并没有难倒我攻击部队。

1945年2月23日正是苏联红军光荣建军27周年，我们祖国的首都为了庆祝我军在波兹南取得的胜利，224门礼炮齐鸣20响。

我们在波兹南血战30个日日夜夜。战斗是残酷的，使每个战士疲惫不堪。参加战斗的士兵失去正常的人情，对敌人不讲同情不发怜悯，也是难免。然而我们的苏联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相当出色地发扬了他们的革命人道主义。

正当马尔钦柯的近卫步兵第39师、近卫步兵第29军和步兵第91军强攻波兹南的时候，我近卫第8集团军和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主力（后来还有第69集团军）正在向西实施进攻，并到达德国国境线，越过边境之后径直地向敌人腹地推进。

越过第三帝国的国界线，我军士气大振，大大激发了军队的进攻精神。从士兵到将军，只有一个信念：勇往直前！

那时我们就深信，希特勒下台的日子已经指日可待了。

一切都无济于事。无论是防守各要塞的孤注一掷的守军，无论是元首的喃喃咒语，还是秘密的外交活动，以及政治阴谋等等，都无济于事了。

此时此刻，我觉得我们已经接近了胜利，已经接近了我们生活中的最后一战。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能预料到我本人和我们的同胞还将在与希特勒分子的斗争中再次经受更为严重的考验。

在强攻波兹南的日子里，我已年满 45 岁。

尽管在进攻波兹南时，战斗十分激烈，当时我曾两次到达在第 1 梯队进攻的近卫步兵第 4 军第 35 师。师长是格里高利耶夫。此人勇敢坚定。我从 1939 年就认识他。这次，为了查明敌人各支撑点和各防御地域的接合部和间隙，他的侦察工作组织得很好，既隐蔽又周密，我们的侦察员捉到了几个俘虏，从俘虏的口中我了解到了一些关于敌人钢质水泥发射点的配置情况。据侦察报告，敌人正把新锐师经法兰克福仓促调往奥得河。1 月 31 日晨，敌人果真有一个新锐师经法兰克福开往奥得河，而这里正驻扎着我军的部队。于是发生了遭遇战斗，战斗地区是在奥得河和曼捷利次筑垒地域之间。而曼捷利次筑垒地域当时尚不完全在我军手中。

当时我们还不详细掌握敌人永备防御工事的配置情况，因此不得不在进行遭遇战斗的过程中查找敌人各筑垒工事之间的迂回路和间隙。所幸的是，敌人的这个师虽然是齐装满员，但看来也是新来乍到，并不熟悉自己工事配置的位置，因此未能充分利用自己的火力和阵地的优势。打得虽然顽强，但是显得很笨拙。假如德寇这个师很熟悉自己的防御地区，并且哪怕有两昼夜的时间熟悉情况、组织协同和火力配系，那我们的处境如何，就很难说了。也许将不得不进行持久的战斗，遭受重大伤亡。所幸敌人是仓促应战。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天气也帮了我们的忙。当时正是阴天，能见度很差。蹲在永备工事里的德国鬼子也搞不清，哪是自己的部队，哪是对方的部队。

我军这次所进行的遭遇战斗是在敌人的筑垒地域中，与正面赶来的敌新锐部队进行的。在这次战斗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军各级指挥员和司令部在指挥上已经成熟。我军各兵种之间的协同动作组织的比较成功。善于进行迂回、包围，也善于对敌人的行军纵队和战斗队形进行侧后突击，我亲眼看到德寇这个师被各个击破。

我军于 1 月 31 日只用了一天的时间便全部克服了筑垒地域，并将留博将军的编有 1.5 万人的新锐师击溃。在我近卫第 8 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仅被击毙的敌人就不下 1.5 万人，被俘虏的约 2 万人。

离奥得河只剩 40 公里了，距柏林还有将近 100 公里。不但指挥员，就连战士们也都争着瞧地图。

奥得河，这是严重的障碍。德军当局自然将该地区视若金汤。

在奥得河与其支流瓦尔塔河汇合处有一个德国东部最大的筑垒地域，其中构筑有屈斯特林要塞。在上述两河上均架设有若干座桥梁，并与最大的铁路和公路干线相通。屈斯特林要塞地处直通柏林的大道，堪称德国首府的大门。

奥得河地区第二个筑垒地域是布雷斯劳，亦称布雷斯拉弗尔。按照古斯拉夫语，称之为“布拉吉斯拉弗”。该要塞原是古城堡，在奥地利与普鲁士的战争，以及在拿破仑时期普鲁士与法国的战争中都起过重要的作用。从德意志帝国恺撒皇帝到法西斯的德国，为了发动掠夺性的战争，把要塞中旧的工事加以现代化。并且又增建了许多新的工事。布雷斯劳筑垒地域是阻塞通往布拉格以及通往萨克森、德累斯顿和莱比锡三重镇的一个障碍。

在布雷斯劳筑垒地域与屈斯特林筑垒地域中间有一个格罗盖要塞，控制

着周围的平原。因此可以预料，敌人定将死守此地。

法西斯分子也把法兰克福改造成坚固的筑垒地域。并且希特勒总部特别重视此地，把它看成是柏林的第二道大门。

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于1945年2月1日直逼奥得河。

不等加强兵器的到达，我即命令近卫步兵第4军从行进间一举强渡奥得河，于2月2日傍晚前，在对岸夺占一个登陆场，占领屈斯特林的南郊——基兹、曼士诺夫、拉特士托克等地。

近卫步兵第28军受领任务强渡奥得河并在哈德诺夫、彼德尔齐戈、柯列辛地段夺占一个登陆场。左邻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也进至奥得河，但是由于缺少渡河工具而未能渡河。右邻第5突击集团军于2月1日利用就便器材开始渡河。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于1月27日17时30分批准了上述战役计划，并特别提醒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指挥部：方面军右翼有可能遭到敌人从北面或东北面的袭击，因此必须掌握一个集团军（并至少加强一个坦克军）为预备队，以便能随时可靠地保障方面军右翼的安全。

1月28日苏联元帅科涅夫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呈报了一份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战役计划。该计划预计粉碎德寇布列斯拉夫集团，于2月25日—28日到达易北河，同时协同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对柏林实施突击。

科涅夫的计划于1月29日由大本营批准。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在1月28日的命令中进一步向各集团军明确了由奥得河向西进攻的具体方向：第5突击集团军向布尔瑶（柏林以北）进攻；近卫第8集团军向布阔夫、阿尔特—兰德堡、维散泽方向进攻；第69集团军向法兰克福、伯辛、海尔弗尔德方向进攻。就是说，3个集团军将向柏林进攻并对柏林实施迂回。

此时，上述合成集团军；以及近卫坦克第1、第2集团军已经顺利地完成了方面军的当前任务，突破了曼捷利筑垒地域，突破奥得河后，夺占了数个登陆场，并正在为扩大登陆场进行战斗。具体情况是：第5突击集团军在屈斯特林以北，近卫第8集团军在屈斯特林以南进行战斗；第69集团军正在攻占法兰克福；第33集团军也在奥得河对岸，在法兰克福以南夺占了一个登陆场。

我集团军于2月4日接到方面军的训令，训令由朱可夫、捷列金、马里宁三人签署。

训令内容如下：

“1.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当面，尚且没有敌人的任何反突击集团，敌人尚未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敌当前正对某些方向进行掩护，而在若干地段上则以积极的行动进行防御。

根据初步掌握的材料得知，敌人已经从“西线”抽调4个坦克师，5—6个步兵师，并正将这些部队投入东线。

敌人在从波罗的海沿岸和东普鲁士地区调遣军队的同时，估计将于最近7—8天内把调出的兵力集中于施韦特、内施台金一线，以掩护波美拉尼亚，加强施特金的防御，并制止我军向波莫瑞湾推进。估计敌人可能把从西部调出的军队集中在柏林地区，加强对柏林接近地的防御。

2. 方面军的任务：在最近 6 日之内以积极的行动巩固已经取得的战果；把后面的部队全部调上来；补充储备品，把油料补充到两个基数，弹药补充到两个基数；急速推进，于 1945 年 2 月 15—16 日一举攻克柏林。

在巩固战果的过程中（即 2 月 4 日至 9 日），必须完成如下任务：

——第 5、第 8、第 69、第 33 集团军在奥得河对岸夺占一个登陆场；同时近卫第 8 集团军和第 69 集团军应力争在屈斯特林和法兰克福之间夺占一个统一的登陆场。如果得手，再力争将第 8 集团军和第 5 集团军的登陆场联在一起。

——波兰第 1 集团军、第 47、第 61 集团军、坦克第 2 集团军和骑兵第 2 军必须把敌人赶过下列各地区：腊兹堡、法尔肯堡、施塔尔格勒、阿尔特丹姆、奥得河。尔后，在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所属各集团军到达之前留下掩护部队，并向奥得河机动兵力，准备实施突破。

——于 2 月 7—8 日间必须完全肃清敌人波兹南——施奈德米尔集团；

——为了实施突破，各集团军所掌握的加强兵器基本不变；

——坦克和自行火炮在 2 月 10 日前应结束小修和大修并且将器材准备齐全；

——航空兵作好战斗准备，并掌握 6 个油料基数；

——方面军后方，集团军后方和部队后方于 9 日—10 日前应作好充分准备，以便保障战役决定阶段的胜利。”

17 日，我军击退了敌军各次冲击。

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力争的这次进攻，失败了……我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作出决定，在向柏林实施决定性进攻之前，首先要粉碎敌人的波美拉尼亚集团，为此，我军使用了白俄罗斯第 2 方面军的部队和白俄罗斯第 1 方面军的右翼部队（其中包括卡图阔夫和波格丹诺夫的近卫坦克第 1、第 2 集团军）。

敌波美拉尼亚集团在劫难逃。我苏联红军于 3 月 4 日到达波罗的海，3 月 9 日到达奥得河的施德金地区。

我们连日不断扩展奥得河登陆场。

我们当时想，敌人这么干，不是得不偿失吗？对于一座尚未架好的桥梁，打出这样昂贵的武器，真是太浪费了。但是，对于希特勒的指挥部来说，这时也顾不上讲经济核算了。他们动用所有的老本，一心想阻止我军渡过奥得河。

我集团军在奥得河对岸的登陆场已经有了很大的规模——宽 12 公里 纵深为 8 公里。与右邻登陆场相连接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是实际做起来，并不是那样简单，虽说屈斯特林城及其要塞已经落入我友邻部队之手，但是该要塞的核心堡如同波兹南那样坚固，其守军仍在进行抵抗。

离柏林只剩下 70 公里了。我军的进攻虽然暂时地停顿下来，可是我们知道，我军很快会在柏林的大街上摆开战场的，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部队进行巷战训练，决定在每个师和每个团都建立一个预备营（准确地说，是教练营）。这时，已经向登陆场上的两个军（近卫步兵第 4 和第 28 军）的接合部增调两个团。兵力从刚刚由波兹南赶来的近卫步兵第 27 和第 74 师抽调。每个师抽一个团。两位军长有了这两个团，就有可能建立自己的预备队，并把这两个团调回河岸进行整顿。

为了便于沿河坝和路堤向核心堡实施进攻，各师均以连为单位逐次展开，第一梯队均为一个连。这种正面很窄纵深很大的作战部署，在战术上还

是罕见的。

我们的强攻计划是这样的。在进攻之前，我强击航空兵和轰炸航空兵对于核心堡和其它的永备筑城工事进行瞄准轰炸，把敌人从上述工事赶入野战工事。在这一天，炮兵除指定对核心堡围墙进行直瞄射击外，均停止开火。3月29日晨，航空兵对原目标（包括那里的守军）再次进行轰炸。使敌人造成错觉，好像我们并不知道敌人已经躲到了野战工事里。可是当航空兵的第二次轰炸刚一停止，即在上午10时整，我军各种口径的火炮（包括用来进行直瞄射击的大威力火炮），一齐向躲在野战工事的敌军开火。火力急袭的持续时间是40分钟。在炮兵火力的掩护下，我步枪手和自动枪手乘船向沙洲登陆。10时40分开始总攻。

在进攻开始的前一天，我与集团军的装甲兵、机械化兵司令巴音卢布将军（他负伤后刚刚出院）一道来到进攻出发阵地，检查部队进攻的准备情况。中午我们乘车来到日阿布钦火车站西北的水塔旁边。在这里，我们观察重型火炮对核心堡围墙直瞄射击的摧毁程度。

29日晨，航空兵重复了昨日的轰炸。接着便开始了炮火准备。我站在观察所可以看到，我军实施直接瞄准射击的重型火炮不断摧毁敌人构筑在河坝上的永备木质火力点和掩蔽部，当时的情景是难忘的，眼看着砖石和园木纷纷地飞上了天。

10时30分部队乘船登上了沙洲，10分钟后响起了机枪和自动枪声。手榴弹和火箭弹也轰隆隆地爆炸起来。

强攻要塞工事的技能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要掌握好近战武器，要能巧妙地克服各种障碍物，当然头等重要的还是每个战士大无畏的精神。



## 第四章 血 战

日夜兼程，直捣敌巢  
我望见了柏林  
柏林，德国法西斯最后的堡垒  
血溅塞洛高地  
立下军令状  
我军尸骨成堆，血流成河  
柏林城下的反复拼杀  
啊，胜利！

攻克柏林的准备工作逐步地展开了，大批兵员不断补充到部队；成千上万吨的燃料运到奥得河，贮存在地下，隐蔽在大片森林中；数百万发炮弹配置在发射阵地附近，大批炸弹集中在靠近机场的地方。

柏林战役的企图是：在宽大的正面上，尽可能同时实施数个强大的突击，合围并割裂柏林集团，尔后将其各个歼灭。

1945年3月底，波美拉尼亚的法西斯军队已被粉碎，苏军有数个师已经到达波罗的海沿岸。此时，统帅部大本营为了实施这次结局性的战役，共集中3个方面军：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朱可夫元帅指挥）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科涅夫元帅指挥）。

这3个方面军得到了大批炮兵和航空兵的加强，准备在3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

白俄罗斯第2方面军准备在施泰金以南和施韦特城之间的地段上突破敌人的防御。在第一梯队部署3个合成集团军、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任务是：强渡奥得河，粉碎敌人的施特金集团，在不迟于战役的12—15日到达安克拉姆、迪明、维滕堡一线。

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准备在格利特琴、屈斯特林、累布斯地带实施进攻。方面军第一梯队由8个合成集团军组成。准备以5个合成集团军和两个坦克集团军从屈斯特林登陆场出发实施主要突击。他们应该在约70公里的正面上同时实施强大突击，突破敌人的防御地区，粉碎敌人的柏林集团，攻占柏林并于战役的12—15日到达易北河。

当我集团军到达古佐夫、塞洛、多尔盖林、阿尔特、玛力士一线时，预计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将投入交战，并以坦克第11军加强该集团军。当时还考虑到另一个方案：如果我集团军左邻第69集团军进攻发展更为顺利时，则坦克集团军在多尔盖林、德别林地段进入突破口。

方面军司令员要求战役准备要十分注意隐蔽，采取一切伪装措施，力争行动的突然性。

方面军突击集团各集团军的进攻速度，规定为每昼夜20公里。这个速度看起来很一般。可是，在前几次战役中，战役开始时往往达不到这个速度。后来，在战役发展过程中，进攻速度才有提高。突破敌人预有工事构筑的防御时，也达不到这种速度。只有在突破防御之后，进到战役广场时，进攻速度才有提高。

此外，当时的天时和地形也对我军十分不利。4月份，大小河流均已解冻。从奥得河主流至塞洛高地有一段宽达10—15公里的河谷，河谷为沟渠所

遮断。低洼地涨满河水。已经耕过的和种了土豆的田地里一片泥泞。奥得河至塞洛高地之间公路很少。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只有4条道路可以行驶汽车和其它技术兵器。车辆偏离道路便会陷进沼泽。

谷地中大小沟渠纵横，且被塞洛高地所瞰制。敌人从高地上可以通观我军登陆场。在方面军突击集团的主要方向上，沿着屈斯特林至柏林的运动轴线，敌人共构筑了5道防御地带。从明赫贝克以后，这些防御地带又与柏林城的3道防御地带相连。

在我军13公里的突破正面上，敌人共部署9个师：第9、第303、第309、第169、第712步兵师和“库尔曼”师；第20、第25摩托化师和“明赫贝克”师；“元首”坦克师。敌人这些部队还得到了下列的加强：统帅部预备队所属第5和第408炮兵军，第292和第770防坦克师。在主要方向上集中这样的兵力密度，使敌人有可能同时占领2—3道防御地带。

在近卫军第8集团军的进攻地带内，塞洛高地上和奥得河谷地内，敌人的部署是：第一梯队有3个师，并有大批炮兵加强；第二梯队也有3个师。

方面军指挥部赋予我们的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当然，各集团军的加强兵器是相当充裕的。例如，在近卫军第8集团军的7公里的突破正面上就有77个炮兵团、10个坦克和自行火炮团。这样，每公里正面上就有226门火炮和约40辆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然而这些加强兵器并不能同时压制敌人两道防御地带。因此，当我们攻占了第一道防御地带之后，必须把数千门火炮和数百个观察所向前转移，各部队之间还要重新建立联系和组织协同动作。这一切都需要占用时间。

方面军司令员这次提出来一个新的战法：即在突破地段上集中大批的探照灯。冲击时间选在夜间，冲击前打开探照灯，迷盲敌人的观察。

在进攻开始前一周内，朱可夫元帅组织了一次实际演练，我们各集团军司令员和各军军长都参加了。要我们亲自尝尝被探照灯照射的滋味。当时我们觉得脸被烤得很疼。

在谷地上我部队正在集中。塞洛高地上的要点还控制在敌人手中，他们能通观整个谷地。因此，我军很难隐蔽地进行调动。当时，我们很想把部队（特别是炮兵和坦克）隐蔽地机动到出发阵地上。可是敌人不但能清楚地看到登陆场，而且能观察到河东岸的我军阵地。怎么办？敌人在夜间不断地使用探照灯，我军在夜间也无法行动。当时还规定不准用炮兵打敌人的探照灯，因为炮兵受命隐蔽，在总攻发起之前不准暴露自己。敌人使用多种照明手段，当探照灯熄灭时，侦察机又投下照明弹使大地明如白昼，整个谷地清晰地暴露在敌人面前。

进行伪装的困难还在于：当时树木还未生出枝叶；且此地水位很高，而且正值春汛，在地上用铁铲翻动一下，混浊的泥水马上便会冒出地面。

参谋人员和各级（包括连、营）的指挥干部在立体地图上，就进攻过程进行了演练。其间，特别细致地研究了军队指挥和第二梯队进入战斗的问题。我的指挥所设立在来特文镇附近。拂晓前，朱可夫乘车来到了我的指挥所。此刻集团军各部队已经占领了进攻出发地域。

莫斯科时间早晨5点，柏林时间早晨3点……

方面军司令员的表，它的秒针已接近预定的时刻，天已破晓。

炮声轰隆，犹如爆发的火山。4万门火炮连声怒吼，震地齐鸣，非同小可。奥得河地区的整个山各部在抖动。烟尘四起，直冲云霄。

在我集团军进攻地带内，炮火的闪光是如此的强烈，我们在指挥所里竟然辨认不出，探照灯是否已经打开了。我们甚至还在追问：为什么不打开探照灯？后来，听说探照灯已经打开了。我们还是疑惑不解。

应该说，在进攻开始前，我们在靶场上已经体验到了探照灯照射的滋味，但是实际上真的到了战场上是什么情景，谁也不得而知。如今在进攻打响之后，对别的地段上我难说，仅就我近卫第8集团军的地带来讲，只见敌人阵地上烟尘滚滚，夹杂着团团的灰烬。探照灯强大的光束射入那滚滚的烟云。可是灯光却射不透那迷漫的尘烟，使我们难于观察战场。更糟的是，当时刮的是逆风。我们指挥所设在81.5高地上，整个高地都迷漫在厚厚的烟尘之中。我们只好停止观察，依靠无线电话和书面传递的方法进行指挥。

浓浓的烟雾也影响到进攻的部队。

右邻——别尔扎林将军指挥的第5突击集团军于日终前到达奥得河。

左邻——科尔帕克奇指挥的第69集团军未能向前推进。

我军既然在兵力上占有很大优势，于战役第一天只取得这一点区区小胜，为什么就裹足不前了呢？

这是因为敌情起了变化。敌人鉴于过去的战斗经验，改变了原来的防御部署原则。

过去，敌人是把基本兵力部署在第一防御地带，而在纵深内的第二、第三防御地带虽有工事构筑，但常常并未被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所占领。坦克预备队或机械化师只是配置在浅后方准备实施反冲击，而不是占领防御地区。过去，我军针对敌人这种战术，总是力图把敌人歼灭在主要防御地带内，对于其预备队，则以航空兵和远程炮兵进行迟滞，制止其实施反冲击。将第一（或主要）防御地带的敌人歼灭之后，当即把快速部队（通常是坦克军或坦克集团军）投入交战，粉碎敌预备队，进而到达战役广场。我军过去在乌克兰、科维尔，在维斯瓦河——奥得河战役中都是这么做的。

如今，敌人对部署防御则采取了不同的方法。他们不但以军队占领第一防御地带，同时还把大量步兵、坦克和炮兵部署在第二和第三防御地带内。此外，在防御纵深内还掌握着强大的预备队。

还应该注意的，希特勒军队实际上已把奥得河至柏林的整个地区变成了一个绵亘的筑垒地域，在该地域内除了构筑有坚固的野战防御工事外，还在居民地的楼房中、大片森林内以及水障碍上构筑了防御工事。

此外，我们对当时的地形特点，天然障碍（运河、溪河、湖泊）等情况也估计不足。由于缺少道路，我军的机动受到限制，在实施冲击时不能投入众多的兵力。特别是这里居民点很多，对于每座房屋，必须经过强攻才能夺取。

进攻第一天的情况表明，敌人决心顽强扼守每一地区。

集团军直至进攻第2日日终前，才攻占第二防御地带，在自己的地带内夺占了塞洛高地。尔后遂脱离奥得河河湾洼地。

右邻——第5突击集团军已强渡弗里斯河并到达普洛特科沃地带。

左邻——第69集团军为夺占马尔科沃地域继续进行战斗。

在这两昼夜的战斗中，我集团军同整个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一样，只完成了进攻第一天的任务。敌人进行如此顽强的抵抗，是我们未曾预料到的。从敌人绝望的挣扎中，我们感到，他们决心坚守通往柏林的每一寸土地。敌人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他们孤注一掷，动用了所有的力量，只求得能挡住

我们的进攻。我们已经看到，敌人的兵力即将耗尽，事态将发生根本的转折。因此，军队于4月18日受领的任务并不是争夺敌人的一城一地，而是在战场上和在敌人防御的浅近纵深内大量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和技术兵器。于是我们按照各军军长的请求，于清晨再次实施了强大的炮火准备。

4月20日日终前，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各部队均处于有利的态势。近卫坦克第2集团军在第3突击集团军的地段上突入了贝尔瑙地域。由于第3集团军、第5突击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突破敌人第4道防御地带后，进攻发展顺利，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部队已经到达卡格尔、费尔斯滕瓦尔德、克尼肯多尔夫地域，同时近卫步兵第28军的部队也突入该地域。所有这些情况迫使希特勒军队不敢再实施反冲击和反突击。如今敌人已将全部兵力集中防守柏林了。

由3个方面军所实施的战役，虽然在个别地段进展有些迟缓，但是总的来讲是发展顺利的。奥得河已经被抛在我们身后，敌人的战线已被打破，敌重兵已被合围于柏林东南。

我军于4月21日在贝尔瑙、彼是斯哈根、吕德斯多夫、埃尔克纳、乌斯特豪森各地域进至柏林环城公路之后，为彻底合围法西斯首都造成了有利的条件。于是近卫中第8集团军根据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把部队转向柏林的东南郊和南郊，以便从南面合围并强攻该城。

像集团军这样的大部队，处在城郊的条件下，要突然转变行动方向，并非易事。困难在于，集团军的许多部队已经突入城区并且已经展开巷战。这时如果部队突然转变方向，就意味着把已经压缩的敌人放松。这样一来，敌人就可能翻过手来，从背后打我们。

既要执行方面军司令员的命令，又不致产生上述后果，我们尽量把转向动作做得很自然，同时尽可能不让敌人发现。

打开地图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正从东南面和南面迂回柏林，在推进过程中不断地向北压迫敌人，目的是制止敌人突击我军翼侧或防止敌人与其在柏林东南森林中被围集团相汇合。

集团军各部队一面变更部署，一面不停顿地实施进攻……以便强渡施普雷河和达默河。因此，各师师长已经把渡河器材调集在自己的身边。

集团军各部队为在柏林东郊打开道路，已于4月22日日终前攻占城郊的达耳维兹、舍涅赫、菲赫德瑙、兰斯多夫、腓德烈斯哈根、文登施罗斯等地。在这一天，近卫步兵第4军的部队在卡耳多夫和卡耳斯赫尔斯特两地遭到了特别顽强的抵抗。在该方向上的进攻实际上暂时停顿下来了。但是在集团军的左翼和中央，特别是在近卫步兵第28军的地段上，部队在一昼夜向前推进了12—15公里。这个速度对于城市进攻来说，就算是比较快的了。

近卫坦克第1集团军的任务比较艰巨。因为在巷战中，敌人撤离了广场和大街，而躲藏在大楼里、地下室和房屋的顶楼里组织防御。坦克兵看不见敌人在哪里，却成了敌人的活靶子。敌人的反坦克手可以用燃烧瓶，特别是火箭弹对付我们的坦克。但是，我们绝不是说，在城市战斗中坦克和坦克兵没有用，不需要他们。不，不是的。在城市战斗中需要他们，但是他们并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需要协同作战，他们需要强击群的编成内的其它兵种分队共同行动。

只有在步兵分队、炮兵、工兵和化学兵的协同之下，坦克乘员才能够察觉到哪里暗藏着危险。强击群的战士们向坦克兵报告险情，并且指明敌人盘

踞在哪一座大楼，在第几层、在哪座顶楼里，在哪个地下室，需要共同作战，把敌人消灭掉。在这种密切的协同行动中，坦克兵多半应被当成炮兵来使用。坦克就是安装了履带的火炮，坦克手就是拥有装甲的炮手。

在柏林郊区，我们一面进攻，一面调整部署，按照使用强击群和强击支队的要求，编织了战斗队形。在4月22日的那天夜晚，整个集团军准也没有休息，因为刻不容缓的事情简直太多了。

渡河计划拟制得详细具体。看来一切均已考虑周全。但是计划不能如愿实现，倒是战争中常有的事。事件的进程总是对意想给予修正。4月22日夜渡河的渡河就是如此。夜间，近卫步兵第22军和28军的部队已经进至施普雷河。战士们在这里发现了许多赛艇，有的是带桨的。有的是以摩托为动力的。同时还找到几艘重型驶船。此时，各分队指挥员不等接列指示和命令就命令分队立刻登上这些船只，趁夜渡过了施普雷河，接着又渡过了达默河。最先渡过河的是潘阔夫少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的部队。拂晓时，已占领城郊的法耳肯堡。

在城市战斗中，敌人常常是神出鬼没，难以预料。敌人还专门在我们军队的后方布置了破坏小组，暗藏在地下室，等待我进攻的先头部队乃至预备队开过去之后，突然从背后袭击我们的战士。为了对付敌人的这种破坏小组，我们组织了后方警卫队。

4月24日集团军各部队继续全线进攻，不断把敌人压缩到市中心。在这一天，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与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在舍内贝特航空港地域会师。

两个方面军的会师以及柏林的被合围，意味着柏林战役的一个重要阶段的完成。法西斯德国的正规军队已被粉碎，敌人防御的绵亘正面在许多地段上已被突破，敌人的大量军队已被合围，正被各个击破。

德军总部设在措森地域，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部队夺占该地后，敌军的指挥遂被彻底破坏。

苏联军队迎着西方盟军，直逼易北河。第三帝国的日子已经不长，从普通士兵到将军都有此感。4月25日，在易北河上的托尔高地地域，马克兰第1方面军所属近卫步兵第58师的部队与美军第1集团军所属步兵第69师的巡逻队相会合。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而团结在一起的两个盟国的战士，美国和苏联的官兵相互握手。

剩下的还有一步，这就是攻克柏林，从而结束战争。就是这一步，当前也需要苏联军队去做。这一任务光荣地落到了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乌克兰第1方面军的肩上。

敌人的基本集团已经是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实施抵抗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些要塞、永备火力点、地下掩蔽部、大楼的地下室、城市的街区等。德国政府通过各种渠道所得到的消息是：战争的出路只有一条，这就是无条件的投降！

希特勒、戈培尔、戈林、希姆莱、鲍尔曼都是一些惜命的人，为了自己保命，可以不顾一切……法西斯制度，这个制度的首领们开始了垂死挣扎。

我面前摆着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的一本日志。特别使我们感兴趣的是日志中对于法西斯德国覆灭前的最后几天的描述：

1945年4月22日15时左右，在帝国办公厅举行了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作战会议。会议是希特勒主持的。在这次会议上，他第一次表示，战争是打

输了。

至此，苏联军队已经从北面、东面和南面逼近柏林环城公路。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并采纳作战部参谋长约德尔的建议，从西线调回所有的军队来保卫柏林。

约德尔为执行这个决定，于4月24日发出一项特别指令，令各集团军群的司令要拿出他们手中所有的兵力去对付不共戴天的敌人——苏联的布尔什维克。同时他还指出，不要考虑英、美军队将在西线占领大片土地的问题。

日志中还提到，希特勒自从在4月22日的作战会议上蒙受震惊之后，显然已经清醒过来。他当即于19时15分给海军上将邓尼茨发了一封电报，电报中把防守柏林的行动称之为“保卫德意志命运之战”。

希特勒还吩咐邓尼茨摆脱属于海军的一切任务，专心致力于—195—通过陆、海、空各渠道把军队源源不断地运往柏林。

因此，按照希特勒的看法其余的任务和其它战线都是次要的。

日志中提到，4月22日希特勒表明决心要自杀。

希特勒虽说坐在地下指挥部里，但他不会不知道柏林发生的事情，不会不知道国内近日来人心浮动，一片惊恐，交通混乱，道路堵塞，柏林城内数百万居民无法疏散。可是，这位独裁者除了思虑自己的性命之外，却什么也没有听见，什么也没有看见……

4月28日希特勒手中已经只剩下了一块小小的地盘——提加尔登和国会大厦。法西斯制度已奄奄一息。

如今没有可能叙述第三帝国灭亡前最后时日的实际情况。因为，第三帝国的头目们没有一个活下来。已经知道的是，在4月份最初的20天内，戈林和希姆莱曾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进行谈判，甚至以掉希特勒为筹码，来与英、美单独媾和或单独停战。但是他俩与英美进行谈判，是以“使德国免遭共产的拯救者”的身份，自作主张呢？还是受了希特勒本人的派遣呢？这就难说了。这一点至今还是个谜。有人告诉我，在纽伦堡审判中曾经透露过关于第三帝国最后时刻的一些情况。但是，希特勒、戈培尔和希姆莱在开庭之前就已经死去，而戈林的供词又是支吾搪塞的，而且不久他也自杀了。因此，第三帝国的首脑们把他们末日生活的秘密已经带进了棺材。

希特勒临死之前留下一份遗嘱，在遗嘱中他把戈林和希姆莱开除出党。

确实有过这样一份遗嘱。有关这方面的文件，是我首先从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手中得到的。我拿到了戈培尔和鲍尔曼最后签署的一封信，但是当我接到关于希特勒已经死亡的书面报告和口头报告之后，则对于他的死表示过怀疑。因为我们的战士还没有在帝国办公厅院子里找到他那具被烧焦的尸体。克列勃斯的供词以及戈培尔和鲍尔曼的一封信提供的情况是，希特勒于4月30日自杀后，当即被裹在一条地毯里，浇上汽油烧掉了。希特勒当时的一个副官（兼司机）肯普克中校在他写的《我烧掉了阿道夫·希特勒》一书中也曾提到这件事。

1945年4月25日开始了对第三帝国首府的最后一次强攻。

早在强攻开始之前，柏林已经被英国和美国的空军破坏。

在强攻柏林的前一天夜晚，我来到了炮兵发射阵地。

清晨我登上了自己的观察所。观察所设在一幢五层的大楼上。在大楼拐角的屋子里，墙上有一个打穿的大洞，从那里可以观察到柏林。

我们的脚下突然一震动，接着地板便晃动起来。数千门火炮的轰鸣宣告

了强攻柏林的开始。

我从观察所看到，打在敌人阵地上的炮火是极其强大的。虽然城内房屋的窗户均改造成枪眼，大街上设置了拦障和街垒。可是在炮火中却墙倒屋塌，街垒也飞上了天。

在城市中作战，特别是在像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中作战，要比野战条件下复杂的多。在城市战斗中，大兵团司令部和指挥员对于战斗进程的影响要比在野战条件下小得多。因此，战斗的胜负多取决于分队指挥员乃至每个普通战士发挥主动积极性的程度。城市战斗有其本身特殊的规律，对此万万不可忽略。

城中战斗，既是火力战，又是近战。在城市战斗中，不但要发挥自动步枪的近战作用，而且大威力火炮和坦克炮都要求在近距离开火，其射击距离往往在数十米以内。敌人隐蔽在地下室和大楼里。只要我们一露头，敌人就开枪、开炮和扔手榴弹。

城市进攻中，部队是跳跃前进，从一幢楼房跃进另一座楼房。但是这种进攻是沿着每条街道，在宽大正面上进行的。

而对于防御者来说，最重要的是守住最坚固的、有防御设施的楼房或街区。丧失每一幢楼房或街区就等于失掉整个的支撑点或阵地。城市战斗中，军队指挥主要靠发挥分队指挥员和每个战士的聪明才智。他们在了解师、团总任务的基础上，应该独立地遂行任务。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和参谋人员应尽量靠近进攻的目标，任务是：保障通信联系（主要靠无线电），协调各强击支队的行动，组织搜集侦察情报，密切注意弹药和食品的供应，确定在昼间和夜晚相互识别的统一信号。

在城市战斗中，指挥员和司令部的主要任务是组织各个兵种以及营、连、排三个环节之间的协同动作。因为强击支队和强击群是由这三级分队组成的。

因此，发挥中级指挥员的作用，发挥列兵和军士的主动性，在城市战斗中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他们遂行的是战术任务，而这种战术任务有时则会发展为战役性的任务，进而完全决定整个交战的胜负。对于他们在战斗中表现的智慧和力量，应当高度重视和坚信不移。

在强攻柏林的第一天，我集团军的部队向柏林市中心推进 3 公里，在个别地段上推进 4 公里。在右翼作战的部队已进至布里采尔——茨维格运河，该运河在特里普托夫公园附近流入施普雷河。集团军左翼以及在主要方向上作战的部队攻占布里茨和马里恩多夫两市区，并继续沿帖耳托夫运河向前运动。

我们的反坦克枪手、机枪手和炮手一起朝敌人开火。希特勒分子一下子都躲藏到大楼墙壁的后面，敌人的火力暂时减弱。我们的战士趁机发起冲击。中士伊万·特卢巴切夫的强击群一面运动，一面射击，直逼大楼。战士们向地下室门窗投掷手榴弹，冲入大楼的一层后，消灭了敌人的炮手和自动枪手。随特卢巴切夫的强击群之后，中士费多尔，尼基金指挥的巩固战果小组也冲了过去。尼基金冲入一间屋子之前，先是小心翼翼打开屋门，向屋里投了一颗手榴弹。屋里的数名希特勒分子顿时被炸死，剩下的敌人当即逃窜。近卫军战士们以自动枪和手榴弹为自己开路，驱逐了其余屋子里的全部敌人。

巷战的胜负，取决于小规模强击群能否发挥积极顽强的精神和能否机智灵活地作战。

如果我分队是对一个街区实施冲击，则应把该街区分割成数块，使守敌变成彼此孤立的几个部分。对于一座楼房或一个街区的冲击，应当从数个方向同时实施。配属的坦克和自行火炮，应当以直瞄射击首先压制那些阻碍我强击群向前推进的敌人火力点。

对于我近卫集团军的战士们来说，强攻城市已经不是初次。他们利用积累起来的经验，大胆而坚决地向前推进。

在巷战中，火炮的最大射击距离应为 300—400 米。这就要求炮手应当动作准确而协调，能出敌不意地进行射击并能够以 1—2 发炮弹消灭一个目标。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火炮定会被敌人所击毁。

在巷战中，总是距离敌人很近。因此炮长应动作迅速。当步兵指示目标后，应及时指挥开火。切尔帕钦科常常亲自发现目标，消灭目标，为步兵开路，而步兵也常常向炮兵通报敌人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出现情况，向炮兵指示敌人机枪、自动枪和火箭炮的配置位置。

在城市，常需要把火炮推到楼房跟前，对准窗口射击。在这种场合下，使用重型火炮，光有炮手是无能为力的，需要步兵进行支援。

在城市战斗中，步兵、炮兵、工兵、通信兵、坦克兵和侦察兵之间的战斗友谊、相互支援、协同动作有着决定性的意义。各兵种的战士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接近，在强攻城市中最为必要。他们经常这样并肩作战。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侦察。在每次实施冲击和强攻之前都要实施侦察。所谓进行不间断的侦察，就是要摸清敌人的强点和弱点，随之准确无误地打击敌人。侦察人员要具备主动积极，勇敢无畏的精神和机智灵活的素质。

4 月 26 日夜晚，我把自己的指挥观察所转移到别列—阿里安大街的前沿附近，这条大街现在叫梅林达姆大街。我们选用了一座五层大楼，这座楼房距离弗柳加芬航空港的主楼不远，坐落在维多利亚公园前一个三角形街区的狭长的突出部。这座五层大楼的墙呈暗灰色，看来，曾多次被大火所吞没。窗口的玻璃全破打碎。在大门口上方的墙壁上挂用水泥雕塑成的一只黑色老鹰，老鹰抓着一个法西斯万字形党徽。这个图案象征第三帝国的国徽。在大楼的一层有一个客厅。客厅不大，但很高，里面装饰着黑色大理石的圆柱。厅内很暗，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一切都阴森森的，窗户框是黑色的，墙壁也是黑的，天花板呈一种令人窒息的灰色。我今天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描述这样一些细节，是因为在这间屋子里有过与结束战争相关的事件。

当我驱车来到新的指挥所，那里已经架好了电话线。有人向我报告，几分钟之前这里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在三层楼楼梯拐弯的地方有人向我们的女架线兵开枪，女架线兵们当时并没惊慌，因为她们随身都带着步枪或冲锋枪。

4 月 27 日，军队继续强攻旧柏林的各街区，日终之前主力已经进至希特勒军队的最后防御地区——提尔加登。

第 3 和第 5 突击集团军向柏林中心——提尔加登实施的进攻，进行得很顺利。提尔加登里面有第三帝国的主要的政府机关，其中包括帝国办公厅和国会大厦。希特勒和他的大本营就隐蔽在帝国办公厅。这两个集团军作战坚决，指挥得当，对于具有历史性的柏林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正在莎尔洛登堡地域作战。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正与近卫第 8 集团军并肩作战。在近卫坦克第 2 集团军和近卫第 8 集团军的左邻有乌克兰第 1 方面军的部队在实施进攻。

从行进间强渡兰德维尔运河的企图失败了。提尔加登是一个沙洲，四面



环水，位于施普雷河与运河之中，防守该沙洲的是精选的法西斯党卫军的部队和若干警卫营。法西斯分子们隐蔽在沙洲上坚固的大楼里，瞰制着四周的地形，以精确的火力控制着通往这些水障的所有的接近地。

生活实践告诉我们，必须把思想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在巷战条件下，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方式灵活，讲求实效。光是泛泛地发指示空洞无味的谈话，是达不到目的的。指挥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要深入到战士中间去，要和他们谈具体问题，诸如：怎样保养武器，怎么对付敌人；问一问每个战士是不是了解在冲击时的职责，是不是明白联络的信号，带没带个人急救包，带没带应急的口粮等等。谈话要诚恳真挚，解决问题。

在实施决定性突击的前夕，战争的结局已经明朗化，几乎每个战士都在自己头脑里为将来和平的日子勾划出一幅图画。人们可能产生这样一个疑问：部队的作战热情会不会熄灭？最后的格斗肯定是残酷的，会血流成河。理所当然，每个人都希望能活到战争的胜利。那么在这种条件下，怎么才能鼓舞人们不畏艰险呢？况且在巷战中，不能与野战条件相比，师长看不到所属各分队的战斗队形，没有绵亘的堑壕和掩体，也没有供观察所利用的制高点。四周尽是房屋、墙壁、废墟。战斗分队经常隐蔽的场所是：地下室、废墟堆、偏僻的小巷、四周有坚固墙壁的庭院。因此看不见他们。那么怎么能保证一声令下，各团、各营随着“冲击”的信号进行强攻呢？

我们曾下令：不要心疼炮弹，也不需要节省子弹，迫击炮弹和手榴弹要敞开打。现在，这些东西我们有的是！至于火炮，从反坦克炮到最大威力的火炮，其中包括远程重型加农榴弹炮，统统用来进行直接瞄准射击。甚至把各种型号的“卡秋莎”火箭炮也在火药烟幕和烟尘的掩护下，直接推到运河边，展开之后，面对敌人的工事进行射击。

凌晨3点，3点半，天刚破晓。

3点55分整，门开了。一个戴着铁十字勋章的德国将军走进屋来。

我仔细打量他。此人中等身材，体格健壮，脑袋剃得精光，脸上有几块疤痕。他伸出右手习惯地作了一个法西斯式的敬礼；同时用左手递给我一份证件——军人身份证。他是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同他一起走进来的还有坦克第56军参谋长，总参谋部上校冯·杜芬格和一名翻译。

克列勃斯未等我们发问，就说：

“我要讲一件特等机密，您是听我讲这件事情的第一个外国人：4月30日希特勒自愿地离开了我们，他自杀了。”

克列勃斯讲完这段话之后，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观察一下这个消息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看来他在等着我们大家会被这轰动一时的消息所触动，而纷纷向他问东问西，可是我却不慌不忙，用平静语调对他说：

“我们早已经知道啦！”

然后，我沉默了一会儿。便要克列勃斯讲一讲事情发生的具体时间。

克列勃斯显然给窘住了。他万万没想到，这条特大新闻会遭到这般的冷遇。

“事情发生在今天15时”他回答。

可是当他见我看表时，知道他说错了时间，忙更正说：

“是昨天，4月30号，15时左右。”

尔后，克列勃斯开始朗读戈培尔写给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一封信。信中说：

“兹遵照已故元首之遗嘱，授权克列勃斯将军办理如下事宜。

我们通知苏联人民领袖，今日 15 时 50 分，元首已自愿离开人世。元首根据其法定权力，于所留之遗嘱中，已将全部权力移交邓尼茨、我和鲍尔曼。我受鲍尔曼全权委托，与苏联人民领袖建立联系。此联系，为遭受最大牺牲之大国间进行和谈所必需。戈培尔。”

克列勃斯还递交给我两份文件：一份是关于他与“俄国最高指挥部”进行谈判的全权证书（是党务办公室主任的一张公文用纸，盖有印章，并由鲍尔曼于 1945 年 4 月 30 日签署）；另一个文件是希特勒的遗嘱，遗嘱中还列出了新的帝国政府和德国武装力量最高指挥部成员名单（这份文件由希特勒和见证人签署，上面所注日期是 1945 年 4 月 29 日 4 时零分）。

克列勃斯仿佛是想利用这些文件来搪塞他面临的一些问题。他感到这次外交使命把他推上困境，他已神不守舍。因为他此行不完全是代表一方来谈判。他的使命中有乞求宽恕的因素。当然，他很想谨慎从事，先摸我们的脉搏。看一看，从中能不能讨点便宜。在反希特勒联盟中，我们的盟国过去曾迟迟不开辟第二战场。过去我们对此感到疑虑，是理所当然的。因此克列勃斯想利用我们对盟国的这种感情，从中钻个空子。此外，他是个顽固透顶的纳粹分子，不肯轻易认输的。况且他本人也参加过对东方的进攻。

当初我为什么对克列勃斯说，我对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不感到新鲜呢？

说老实话，对于希特勒的死，我原先并不知道，也没有想到会从克列勃斯口中得到这个消息。但是在将要参加这次谈判时，我有一个思想准备，准备对任何出乎意料的事情都持冷静的态度，丝毫不动声色。对于结论性意见，持慎重态度。我知道，凡是有经验的外交官在谈话时，一开始从来不涉及自己的主要问题。克列勃斯正是这样的人。他在开始时必定是先观察对方的心理，尔后伺机掉转话头，迫使负责解决主要问题的人，先把问题说出来。

关于希特勒之死，当时对于我本人以及对于我方参加谈判的其他所有的人来说，确实是一件有头等意义的重大新闻。可是对于克列勃斯却不同。他只是把这件新闻当成他使用外交手段回避要害问题的一个烟幕弹。因此，当他企图扭转谈话内容时，我当即把他盯住，迫使他回到正题，说出他前来的真正目的。

“在这些文件中所谈的是柏林，还是整个的德国？”我问道。

“戈培尔授给我全权，代表整个德国军队讲话”他紧接着回答。

“是谈投降的吗？”

“存在着停止战争的其它办法。为此，应当使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组建起来。该政府将会通过与苏联政府谈判的方法决定问题。”克列勃斯回答说。

“既然你们的元首已经自杀，那就不会存在什么政府，从而他所推行的制度也应当认为是破产了。他死后，或许还留下某个副手。这个副手有权决定，是不是还要继续无谓的流血。现在谁是希特勒的代理人？”

“现在希特勒的代理人是戈培尔。他现在被任命为总理。可是希特勒在他临死之前组织了一个以海军上将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

当我与克列勃斯谈话的时候，我的副官、作家弗谢沃洛德·维施涅夫斯基和诗人叶夫根·多尔马托夫斯基都想尽量把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其实，在那种谈判中会议记录人员起不了多大作用。

幸而，我当时记忆力还好，对那天晚上的细节记得比较清楚。而今，我也尽量回忆，把情况搞得很准确。

在这初次见面中，我向克列勃斯的提问，均一一得到回答。于是我决定

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我拿起听筒，呼唤朱可夫元帅，向他报告说：

“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将军来到了我这里。他说，希特勒已经自杀。戈培尔当了总理，鲍尔曼当了纳粹党主席。他们授予克列勃斯全权，同我们进行和谈。克列勃斯要求在谈判期间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要求让他们组成以邓尼茨为首的新政府，以便决定有关战争的尔后进程问题。”

朱可夫说，他要马上向莫斯科汇报，他要我守在电话机旁，因为还可能有问题要问，有些事情需要说明。

一分钟之后，他问道：

“希特勒是什么时候自杀的？”

接着，我又向克列勃斯提出了这个问题。其实我是故意这样做的。因为头一次他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把日期说错了。不知道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我再次向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眼睛看着表，当时是5月1日4时27分。

克列勃斯赶忙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昨天，4月30日，15时55分。”

我把原话报告给朱可夫，朱可夫又向莫斯科作了汇报。

一分钟后，朱可夫打来电话：

“您问问克列勃斯，他们是愿意放下武器投降，还是故意玩弄和谈的把戏？”

我开门见山地问克列勃斯：

“谈判的内容是不是关于投降的问题，您是不是负有实现投降的使命？”

“不是的，还有其它的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

“请你们允许并帮助我们建立新政府，这个新政府是希特勒在他的遗嘱中拟定的。该政府将尊重你们的利益。”

我把这个问题报告了朱可夫，他指示，还要我等在电话机旁。

我当时心想：克列勃斯这家伙真滑头，他原封不动地重复老一套。其实这也尾外交家们惯用的一个手法：为了达到一种目的，而万变不离其宗。可是他现在做得有点太过分了。我在电话里读希特勒遗嘱中的第5页：

“为了使德国有一个由诚实的、全心全意继续坚持战争的人们组成的政府，兹任命新内阁的成员……”

这时朱可夫在电话中插话：

“什么样的新政府？”

这时恰好读到希特勒遗嘱提到的新政府成员的名单。名单是这样：

1. 总 统 邓尼茨
2. 总 理 戈培尔
3. 党务部长 鲍尔曼
4. 外交部长 赛斯·英夸特
5. 内务部长 吉斯列尔上
6. 军事部长 邓尼茨
7. 陆军司令 施尔涅尔
8. 海军司令 邓尼茨
9. 空军司令 格列姆
10. 党卫队队长兼警察局长 汉克上尉

11. 经济部长 丰克
12. 农业部长 巴克
13. 司法部长 提腊克
14. 教育部长 席尔博士
15. 宣传部长 纳乌曼博士
16. 财政部长 施维林·克罗西克
17. 劳动部长 胡尔法乌埃尔博士
18. 装备部长 萨乌尔
19. 德国人民阵线领导人，内阁成员，不管部长列伊

“克列勃斯还有话要讲没有？”朱可夫问。

我把这句话转达给无列勃斯。克列勃斯耸了耸肩，表示无话可讲。于是我明确地对他讲，我们进行的谈判只能是德国全面投降，向反希特勒联盟的盟国—苏、美、英三国投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是一致的。

“为了有可能讨论你们的要求，我请求暂时停止军事行动，并帮我们在这里，在柏林组织新政府。”他还强调了一句：“只能在柏林，不可在别的地方。”

“我们晓得你们新政府的宗旨是什么，此外，我们还知道您的朋友们，希姆莱和戈林力图向我们的盟国进行试探。对此，您难道不晓得吗？”我向他指出。

克列勃斯警觉起来。看来，我提的问题给他来了个措手不及。他窘住了，不由地用手在军衣口袋里摸来摸去，结果掏出来一支铅笔。其实，这时候根本用不着铅笔。

“我是一个合法政府的代表。这个政府是遵照希特勒的遗嘱组建的。”最终他回答说，“在南方可能再出现一个新政府，但是它将是不合法的。现在只是在柏林有政府，这个政府是合法的，我们要求停战，以便让政府的全体成员集会在一起商讨条件，缔结一个对于你、我双方都有利的和约。”

“关于停战，或者说和约，只能在你们全面投降的基础上解决。”我坚决地回答“这是我们的决定，也是我们盟国的决定，而你们任何的诽谤和允诺都不能分裂这个团结一致的反希特勒联盟的阵线。”

克列勃斯脸上的肌肉在颤抖，面部的疤痕胀得发红，显然，他正在竭力保持镇静。不过结果还是神不守舍，说漏了嘴。他说：

“我们想，苏联将会注意到一个新的、合法的政府。这样做，对我们双方都是合适的、有利的，假如你们占据了新政府的所在地之后，把我们统统消灭掉，那么德国人将没有可能协助你们工作，并且……”

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消灭德国人，而是为了使德国人摆脱法西斯制度。其实，为了避免继续流血，一些诚实的德国人已经正在协助我们工作。”

克列勃斯继续讲下去：

“我们要求，德国未全面投降之前，你们要先承认新政府，同这个政府进行联系，以便使它可能与你们的政府建立一种联手。这样做，只能对你们有利。”

我听后重申：我们只能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德国全面投降。说完，我便走进隔壁房间去给方面军司令员打电话。

我在给朱可夫元帅汇报时，陈述了自己的见解：

“看来，克列勃斯不是来谈投降的，他是来摸情况的，他想摸我们的底，看看我们会不会单独同新政府进行谈判，他们没有力量继续进行抵抗了。同我们政府进行谈判——这是戈培尔和鲍尔曼使用的最后一招。他们千方百计地找机会钻空子，想在我们与盟国之间制造互不信任的气氛。克列勃斯显然有意迟迟不肯回答问题，进行拖延，以便争取时间。其实，这样做对他们毫无益处。因为我们的军队还在继续进攻。我们只是在克列勃斯通过的地段上暂时停火了。”

朱可夫听完汇报，在电话里又摆了几个问题，然后告诉我，他准备马上把这些情况向莫斯科汇报，同时让我继续与克列勃斯进行谈判，督促他接受全面投降的要求。

集团军参谋长起草了一份命令，送来请我签署，命令编号是 2948，日期是 1945 年 4 月 30 日。我看了之后，觉得完全正确，正合我意。我默默地签署着这份文件。岂不知，这将是发给近卫第 8 集团军的最后的一份命令。命令中说：

“兹鉴于柏林城内的被围之敌可能投降或大批就俘，特命令：

一、集团军后勤部长应作好接收 4 万至 5 万俘虏的准备。为此：

1) 在集团军地带内，于市区之外（但不得远于城郊 5 至 8 公里）建立集团军的战俘收容所（地点可能在达姆地域），收容所容量要大，时间应下迟于 45 年 5 月 1 日；

2) 为解决俘虏吃饭问题，应建立必要的粮食储备。

二、各军军长：

1) 应给各战俘收容所派出一个步兵营，以解决看押俘虏和将俘虏由集团军战俘收容所押送至方面军战俘营的需要。

2) 为解决柏林敌人投降后的需要，应指定数个武器收缴点，并划定数条道路，以便将城内的敌人部队遣送至集团军战俘收容所。这些收容所，亦应收容由近卫坦克第 1 集团军捕获的俘虏。

关于收容战俘的准备情况，应于 45 年 5 月 1 日 18 时前向我报告。”

我签署完命令，就又回到了进行谈判的房间。当时的时间是：4 时 40 分。由于疲劳和失眠，我脑袋嗡嗡直响。因为于不熟悉的工作，会使人容易疲劳的。

我又与克列勃斯面对面地坐在桌旁。可以看出，在我暂时离开的这段时间里，他经过前思后虑，又想出来不少鬼点子，为自己的（应该说是为戈培尔的）建议进行辩解，他首先开口，还是坚持暂时停战的论调。

“我没有权力进行其它性质的谈判。”他说，“我只是政府的代表，但我无权代替政府作出决定，你们同德国新政府进行谈判，对你们是有利益的。我们很清楚，德国政府是“帕司”啦！（说到这里，他自己也笑起来），而你们是强大的。这，我们自己是知道的，你们自己也这么认为。”

好比下棋，这回是出的皇后。克列勃斯已经拨动主要棋子了。再不能让他无限制地纠缠下去。显然他是要把我拖入关于和谈问题的无止境的讨论之中。

---

帕司 (pass) 是打扑克牌时的用语，“帕司”表示不再进牌、这里表明“已经无能为力”的意思。——译者

在国际象棋中，皇后是关键棋，好比中国象棋的老将。——译者

“将军先生，您应当知道”，我说，“我们完全了解你们到底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你们有意危言耸听，说你们定要继续较量。其实应该说是进行毫无意义的抵抗。这种抵抗只能增加无谓的牺牲。我想直截了当地给你提个问题：你们进行这种较量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一下子弄得克列勃斯口缄目呆，面对我无言以答。尴尬了一阵，才冒出一句话来：

“我们要较量到底。”

听了这句话，我不禁地苦笑了一下。

“将军，你们还有什么？你们准备拿什么跟我们较量呢？”我停了一下，又补充说，“我们在等待你们全面投降。”

“不！”克列勃斯喊了起来。可是马上又泄了气，无力地说：“如果一旦全面投降，那么从法律上讲，我们作为政府将不复存在。”

谈判把人们搞是厌倦不堪。现在清楚了，克列勃斯前来的使命，就是说服我们承认“新”政府。如果没有戈培尔和鲍尔曼的核准，他是不会改变他所提出的那些意见的，而且会反复陈述同一种意见。在他的言谈之中，令人感觉到他有一种绝望的劲头。可是他又不肯离夫，像是还在期待着什么。可能是期待着赦免令，因为在我们的对话中，他活像一个阶下囚。

我接到一封从外国使馆送来的信。该使馆的领导人在信中说，由于使馆人员受到苏军的关照而表示感谢。

表上的时针已指向早晨8点，我忍耐不住了，于是对他说：

“您坚持停战，坚持要进行和平谈判。可是你们的军队却不断地在投降。你们的官兵成百、成千地放下武器当俘虏。”

克列勃斯身子抖动了一下。他忙问：

“在哪儿？”

“到处是！”

“没有命令？”他惊奇地问。

“我们部队一边进攻，你们的部队一边投降。”

“这会不会是局部现象？”这位德国将军想抓往一根救命的稻草。

正巧在这一刹那，我军的“卡秋沙”火箭炮隆隆地响了起来。克列勃斯心惊胆战，缩成一团。

这时我顺手拿起一张报纸，高声地朗读起来。那是路透社的一篇报导，内容说的是希姆莱一次外交活动的失败。希姆莱曾藉助于瑞典皇家的一个成员别尔纳特，竭力交涉，想与英国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和英国政府进行谈判。希姆莱让别尔纳特转达，说元首体力已经衰竭，政治上已经日暮途穷。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读道“我的双手已被解脱，我但愿让俄国尽可能地少占一些德国的地盘。我准备在西线投诚，以便让西方的大国军队能尽快地向东推进。若形势逆转，我则不准备在东线投降。我过去和现在一贯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誓不两立。”我读到这里时，插了一句话，“你们看，这就是希姆莱对英国人表示的态度。”尔后，我又接着读下去：

“由于苏联政府的干预，美国人与英国人已经拒绝与希姆莱单独举行谈判。关于此点，苏联政府已经得到了通知……”

我转身看了看这位谈判代表。见克列勃斯显然已经是垂头丧气。他用眼睛盯着地板嘟囔着说：

“希姆莱并没有受权这样做。我曾经担心过这一点。希姆莱原并不知道

希特勒自杀之事。”

“可是，关于希姆莱曾经通过广播同我们的盟国约定过单独谈判地点之事，你们早已知道，不是吗？”

“这是局部措施”克列勃斯回答说，“而且根据也是不同的。”他沉默了一下，接着说“如果一旦全面投降，我们就再不可能选择自己的政府。”

一个德国翻译人员从旁边插了一句话：

“柏林有权代表整个德国。”

克列勃斯当即打断了他的话：

“我能讲俄语，而且也不比你差。”

接着他又操着俄语对我说：

“我担心的是，有可能产生另外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将是违背希特勒意愿的，我听了斯德哥尔摩的广播，觉得希姆莱与盟国的谈判作得太过分了。”

克列勃斯的这番话，倒把自己弄得原形毕露。其实，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对于希姆莱的谈判，早有所知。可是，他们曾确信，我们的盟国虽然热衷于希姆莱的建议，而苏联政府定会采纳戈培尔和鲍尔曼的建议。据我们所知，赫尔曼，戈林带着同样的使命去找过美国人，具体地说，就是艾森豪威尔，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

过了一会儿，克列勃斯又老调重弹，说必须成立新政府，说新政府的任务是要同一个大国，战胜国，即苏联，举行谈判。

我再次同克列勃斯明确表示：英美政府与我们的政府在行动上是一致的，我认为希姆莱的外交活动是一次未能得逞的外交讹诈。至于对新政府，我们的看法是：无论对于德国人来说，还是对于我们以及我们的盟国来说，最有权权威的德国政府，应该是同意全面投降的政府。

“你们那个所谓的新政府，”我说“之所以不同意全面投降，是因为你们让希特勒的那个遗嘱给束缚住了。你们执意要继续延长战争。你们的所谓新政府，或者希特勒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所说的所谓的新内阁，是想要继续完成希特勒的意愿。关于希特勒的意愿，在他的遗嘱中是这样说的：‘要让德国有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应该由那些立意全力继续进行战争的，诚实的德国人组成’。”

我指着这几行字对着克列勃斯说：

“从希特勒死后留下的这些话，难道还不能看出，你们所谓的那个新政府是想继续进行战争吗？”

时间的流逝显得特别缓慢。不过，还必须耐着性子等待，等待莫斯科的决定。于是我们转入了私人性的交谈。我问道：

“现在古德里安将军在哪里？1939年我在布列斯特，当时他是坦克师师长。”

“古德里安于3月15日前是德国陆军参谋长，后来生了病。现在在休息。我曾经担任过他的副职。”

“古德里安的病是外交性的，是政治性的？还是出于军事上的考虑？”

“我当然不能讲我的过去上司的坏话。不过，类似的情况是有过的。”

“您一直在总参谋部工作吗？”

“我曾担任军训部部长。我也到过莫斯科，1941年5月之前，我在莫斯科代理武官。尔后被任命为东部的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

“就是说，您是在莫斯科学会讲俄语的，希特勒是经过您的手得到关于

苏联武装力量的情报的？在进行斯大林格勒交战时您在哪里？您对这次交战持什么态度？”

“这时我正在中部战场，在尔若夫。这个斯大林格勒，可怕极了！从那里开始，我们灾难重重，每况日下。您在斯大林格勒的时候是军长吧？”

“不，我当时是集团军司令。”

“我读过有关斯大林格勒情况的战报和曼施泰因写给希特勒的报告。”

接着便是长时间的相对沉默。

为了打破沉默，我问道：

“希特勒为什么自杀呢？”

“他没有预料到，军事上会遭到如此的惨败。德国人民对于未来的期望已经破灭。元首深知人民遭到多么重大的牺牲。为在有生之年不承担责任，于是决定一死了事。”

“他明白的太晚了”我指出，“如果他能在五、六年之前明白这一点，那才是人民的福气哩。”

我拿起希特勒的一份遗嘱高声读道：

“在战争的年代里，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挚友谊并甘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同我生死与共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我为人民服务而给我们俩人自身带来的损失。”

读到这里，我转身对克列勃斯说：

“爱娃·勃劳恩似乎并不是亚里安人血统。怎么希特勒在这里却离开了他所信守的原则？”

克列勃斯皱起双眉，无言以答。

这时我只好补上一句，转了话题：

“很遗憾，要不，我们与戈培尔直接接通电话？”

“那太好啦！”克列勃斯突然精神一振，“那样你就可以直接与戈培尔博士通话啦！我准备派我的副官把你们的通信兵带过去，这是可以行得通的。”

朱可夫元帅给我打来电话。我向他报告说，从3月15日以来克列勃斯担任陆军总参谋长。随后我在电话里给他读了关于戈培尔委派克列勃斯前来谈判的文件。

我们商定，随同克列勃斯前来的上校以及同来的德国翻译要立即返回，以便安排与帝国办公厅的直通电话。我集团军参谋长当即挑选了两名通信人员（一名军官，一名士兵）与他们同往。

这时，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普罗宁少将来到我的指挥所。同来的还有：第一副司令员社汉诺夫、作战部长托尔阔纽科、侦察处长格拉待基上校、副处长马图索夫以及我们的翻译克利别尔大尉。

我们大家起身来到临时当作餐厅的隔壁一个房间。送来了茶点，端来了夹肉面包片。我们大家的肚子都饿了。克列勃斯也不客气，抓起了茶杯和面包。我见到，他的双手在发抖。

---

爱娃·勃劳恩指的是希特勒在遗嘱中提到的那个女人。法西斯主义认为，亚里安人是“高等种族”的代表。——译者



我们坐在那里，个个部疲惫不堪。人们都感到战争即将结束，但是战争的最后时刻却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都在等待莫斯科的指令可是前线的生活却依然如旧。集团军司令部提醒部队，特别是集团军属炮兵，应做好继续实施强攻的准备。侦察分队对于当面的敌人以及敌人预备队和敌人的补给情况，不断地进行观察。弹药和燃料源源不断地补充到各个分队。工兵继续修筑和加固兰德维尔运河上的各个渡河点。我还不时地离开克列勃斯，走到隔壁房间，去关照一下司令部的工作。该发指示的，发指示；该批示的，当即批示。

我对各军军长和各师师长明确地指出：谈判尽管进行，可是部队不能放松，应充分做好准备，一声令下，立即发起强攻。结果是：一方面，戈培尔、鲍尔曼和克列勃斯在磨时间，等机会，碰运气，俄国人会与他们的盟国争吵起来；而另一方面，我们却恰恰利用了这段时间加紧战备，一旦敌人拒绝投降，便一举攻下提尔加登。

我与克列勃斯再次进行交谈。我倒是想摸清第三帝国这些领导人的机密，他们原来的企图是什么，今后怎么打算，况且没有莫斯科的答复，我不能同克列勃斯中断谈判。当然，克列勃斯对于他们的机密是全然了解的。可是他不会轻易吐露真情，因此必须尽可能想办法从他嘴里捞东西。谈话中间，在一问一答之中分析比较，发现问题。

“赫尔曼·戈林现在在哪儿？”

听见我问话，克列勃斯抖动了一下，好像被从梦中惊醒似的：

“戈林么？他，他是叛逆。元首对他是不能容忍的。戈林要求元首向他交出国家的领导权。元首把他清除出党。”他说到这里，突然清醒过来，忙说：“希特勒临死之前曾把他清除出党。他在遗嘱提到了这一点。”

简直自相矛盾，一会儿说：“元首对戈林是不能容忍的。”——用的是现在的口气；一会儿又说：“希特勒临死之前曾把他清除出党。”——此处又用了过去的口气。

我接着问下去：

“依您的见解，希姆莱怎么样？”

“希姆莱是叛逆。他跟元首对着干。他早就想与西方大国单独媾和，并在我们中间制造分裂。对于他的意图，元首早有觉察，而且……”讲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这也是他进行自杀的原因之一，元首珍惜战友们的忠贞。他在临死之前曾寻找出路，缔结和约，首先要找俄国。”

“希姆莱是因为这个缘故成为叛逆的么？”

“是的”克列勃斯证实说，“根据希特勒的遗嘱，希姆莱被清除出党。希姆莱现在不在柏林，他在梅克伦堡。”

“就是说，关于希姆莱建议向英美全面投降之事，您是早有所知啦！”（我终于从他嘴里套出真情，因为在此之前，我对于希姆莱的建议几乎一无所知）。

克列勃斯想了一下，回答说：

“您知道，我们曾经对他产生过怀疑，当听到路透社的消息，才完全弄清此事。我们没有得到希姆莱的消息。元首把他派出柏林，为的是让他把德国全部的武装部队都集中到这里。可是他欺骗了元首，他没有这样做。希姆莱是个叛逆分子，他想背看元首去缔结和约。我一直跟随在元首身边，曾经是他的关于战争问题的贴身顾问。德国武装力量最高统帅部当时并不在柏林，而是在梅克伦堡。元首从柏林直接给他下达命令。我当时负责东线。”

克列勃斯无形中透露了真情。结果，我们过去的猜测和设想都得到了证实。在他的谈吐中所透露的情况，诸如希特勒曾下令把德国武装部队从那里，即从西线调到柏林，调到东线来对付我军，从而给西方大国军队开往柏林打开通路，等等，原来都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我紧紧抓住这个线索，继续追问：

“现在谁是你们的最高统帅？”

“遵照希特勒的遗嘱，现在是邓尼茨。施尔涅尔是新的陆军司令，空军司令是冯·格列姆。戈林生了病，古德至安也生了病。”

“里宾特洛甫在哪儿？”

“在梅克伦堡，他的（外交部长）职务由赛斯—英夸特接替。”

“就是说，政府进行了大改组。改组中惟独没有涉及到您，因为您在希特勒身边。您现在的职务仍是陆军总参谋长，是不是？”

“是的。”他作了肯定的回答。

“那么，谁有权与苏联及其盟国进行最后的谈判呢？”

“戈培尔和鲍尔曼。他俩现在在柏林。只有他两人有权代表德国。”

“那么，政府的其他成员干什么事呢？”

“他们执行元首的指令。”

“部队会承认新政府吗？”

“如果提供条件，让元首的遗嘱传达到军队，那么部队会遂行元首的意愿的。最好在另一个政府宣布成立之前，能做到这一切。”

“您对另一个政府感到畏惧吗？”

“希姆莱背叛了我们，他可能会组织新政府。对于元首的死以及元首的遗嘱，希姆莱还不知道。”

“有关其它地区的情况，您有何看法？因各地区已经相互隔绝。”

“借助于与你们的临时停火，我们会把一切传扬出去的。”

“我不懂您的意思。”

他解释说：

“在你们的协助下，我可以使用航空兵或其它方法与外界取得联系。”

“就是说，成立政府的目的是，让它在德国土地上行使权力，集结力量，继续进行战争，是不是？”

“不是的，是为了展开谈判，从而结束战争。”

这次我又把他抓住了，我说：

“可是，在希特勒的遗嘱中明确地表示：他将启用那些‘全力坚持进行战争’的人们组成一个政府。如果你们赞同的话，先结束战争，尔后再进行谈判，岂不更好？”

不知为什么，克列勃斯迟迟不肯答话。过了一会儿，他说：

“这个问题，我的政府才能回答。而我不……”

外面已经天亮。我们在柏林过五一劳动节，却与众不同。我们是彻夜不眠进行谈判，可是结果却等于零。莫斯科指示我们等待答复，不时地对一些细节进行询问，了解谈判的进程。方面军司令部催促我们尽快把克列勃斯带来的文件送上去。

波让尔斯基将军来到我们房间。他说，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里若夫少将打来电话，要我去接电话。我把克列勃斯留给波让尔斯基将军以及巴音卢布和作家们，自己走到隔壁房间。

里若夫将军报告说，于 4 时 30 分德军无线电台（好像是柏林城防司令部的）请求我们向动物园的东北角派出一名军官去会见德军的谈判代表。里若夫将军和近卫步兵第 39 师师长马尔钦柯上校当即从师司令部选了一名军官，别尔谢涅夫少校，为我方代表。

关于此次会见是如何进行的以及结果如何，别尔谢涅夫后来向我一一作了汇报（如今他是退役中校）。

他说：

“我去之前已有思想准备。我准备向他们提出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保障那些放下武器和停止抵抗的人的生命安全。我要向德寇宣布，如果他们在 24 小时之内拒绝投降，将全部被歼灭。

我认识到，此次执行任务若能成功，会大大减少我军官兵的伤亡。如果敌人停止毫无意义的抵抗，则世界上不会再增加那么多的孤儿、寡妇以及伤残人员。我决心不辜负对我的信任，不顾个人安危，坚决完成任务。

1945 年 5 月 1 日 5 时整，我手持一面白旗到达了指定地点——动物园的东北角。我把汽车、司机和警卫员留在邻近大街拐角处的一个遮蔽物里。

我走到约定地点，并在那里等待了大约 20 分钟，敌人并没有向我打枪。可能这个地段上的德军已经得到通知，知道了我指挥部派出谈判代表之事。

在等候的 20 分钟里，我想了许多，特别使我感到不安的是：敌人这次约请会面，是不是假的？这会不会是一场挑衅？可是我又一想，现在柏林处于这种态势，敌军已毫无出路，量他们不敢妄为，于是我的心也就平静下来了。可是心里有时还是不断地嘀咕。德国人终于出现了，大约离我 200 米的地方有两个德国人举着白旗从拐角处走过来。我朝着他们跨了几步。可是他们中间的一个人突然地倒下了。这时枪声顿起，子弹尖叫着从我身边飞过去。我来不及防备。我感到左胯股和膝部被击了一下，就跌倒了，头部重重地栽到人行道上。

后来，方面军司令部打来电话。朱可夫元帅通知说，方面军副司令员索科洛夫斯基已经乘车前来我这里。朱可夫要求进一步了解希姆莱的情况，察明里宾特洛甫现在在哪里。谁是总参谋长，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还有其它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把从克列勃斯口中了解到的情况作了汇报。其它的一些情况，还需要从口里往外挤，可是克列勃斯是不愿意接触这些问题的，对于每个问题的回答都是极其简单，而且是支吾搪塞。他的处境不是轻松的。他深知，想要说服我们，强行让我们相信戈培尔和鲍尔曼是不可能的。可是他前来这里，却恰恰是身负这个使命，因此，他只好顽强奋斗，尽其所能。而我们呢，我们自己有权决定的只是一件事：接受投降。我们巴不得想把克列勃斯送回戈培尔那里，然后诉诸武力，强迫敌军放下武器投降。可是莫斯科命令我们等待。

我回到谈判的房间，给克列勃斯提了一个问题：

“希特勒的尸体在哪里？”

“在柏林，遵照遗嘱烧掉，这件事是今天办的。”

“谁是你们统帅部的参谋总长。”

“是约德尔。新的最高司令是邓尼茨。他俩人现在都在梅克伦堡。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和鲍尔曼。”

“关于邓尼茨在梅克伦堡，您为什么不早说？”

克列勃斯沉默不语。

我拿起电话听筒，叫通朱可夫元帅，向他汇报：

“‘最高司令’海军元帅邓尼茨现在在梅克伦堡，希姆莱也在那里。戈培尔认为希姆莱是叛逆者。赫尔曼·戈林似乎是生病了，现在在南线。在柏林的只有戈培尔、鲍尔曼和克列勃斯以及希特勒的尸体。”

朱可夫元帅说，在柏林，他们向我们这里派出了谈判代表；而在西线和南线又向盟国派出了谈判代表，这种错综复杂的现象牵制着我们政府的决心。不过我们很快会得到上级答复的。估计可能是要求德军全面投降。

克列勃斯听了我在电话中与朱可夫的交谈。我落落大方，当他在场的情况下，我表达自己的想法，显得十分自然。我放下电话，转身对他说：

“这就是说，主要的军事活动家是在梅克伦堡。而在柏林，戈培尔和鲍尔曼留下来完成元首的意愿。这个意愿是什么？”

“他们想要停止战争，可是只有当你们承认了遵照元首的意愿建立起来的政府，战争才能停止。”

“也就是说，成立一个要战争不要和平的政府。”

克列勃斯沉思了一会儿，接着说：

“起码我同意在双方交火的地段上停火。”

“那还有什么必要呢？因为你们的那个所谓的政府并不打算投降。你们还想继续流血，是不是？”

“我希望做到一切，只求快些。希望在柏林一个合法的政府得到承认，希望不会另外出现某个不合法的政府。”

“如果你们不投降，那我们的军队将会再次进行强攻。到那时候你们再去分辨哪个政府合法，哪个政府不合法吧！”

“因此我们要求暂时停战。”

“而我们要求的是你们投降！”

我问克列勃斯：

“除了已经交给我们的文件以外，您还有没有其它什么文件？”

“还有附件，就是那份政府组成名单，这我已经向您报告过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向我递过来一张纸，上面写着内阁的成员。这些在希特勒的遗嘱中已经提到了。

“您前来的使命只是向苏联谈判，是不是？”

“只同你们。”

“您同我们，而希姆莱和其它人与同盟国进行谈判，是不是？因此你们不愿同我们和我们的盟国同时进行谈判，而是采取了分别行事的办法，是不是？”

一阵沉默，克列勃斯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说：

“当我们的权力扩大时，也将同别的政府，你们的盟国进行谈判。”

“难道这能取决于你们的政府吗？”

“是的，当政府组合齐全时，会这样做的，这是政府的基本目的。”

“你们准备在哪儿组织政府呢？”

“至今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最好是在柏林。”

“可是在柏林守备部队的残部还没有无条件投降之前，你们的政府是不可以在这儿成立的。”

“不过我深信，当柏林守备部队一旦投降，那我们的政府将永远不会成立了。这将意味着不履行元首的遗嘱。我认为在新政府被完全承认之前，全

部投降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这样一来，政府不是投降，而是行使权力，是不是？”

“我来此，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且转达德国人的诺言的。至于全部投降问题，可以在停战后和新政府被承认之后数小时之内解决。”

“就是说，你们想作战到底是不是？您知道全部投降的条件吗？”

“是的，知道的”克列勃斯回答，“可是谁来进行这种谈判呢？”

“你们有帝国总理呀。鲍尔曼也同他在一起呢。如果他们授给你全权同我们进行谈判，那么他们可以做出最后的决定。难道不是这样吗？”

“他们在未向邓尼茨作全面汇报之前，不能够决定全面投降问题。唯一的一架电台在希姆莱那里。我们这里的电台被炸毁了。”

“我们给你们提供无线电通信，你们通过无线电公布你们元首的遗嘱。这可以使流血停止。”

“这样不方便，这个消息会使邓尼茨感到突然，因为他还不知道遗嘱之事。我们试图引起苏联注意，我们不希望出现一个只愿单独同美、英两国缔结条约的不合法的政府。我们只能同俄国进行谈判。”

大概如今时机已到，应该让他明白，我们既不相信戈培尔，也不信任他派出来的代表。而我自己则只等待能够向他直言，我做为军人最感兴趣的是动武，我要尽快跟敌人算帐，跟柏林城内不堪一击的守军算帐。

克列勃斯听完我的话之后，又重复老调：

“假如柏林守军被歼，那就不会再有合法的德国政府。”

“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打断他的话。

“我已经向您介绍了我的使命，其它我没有……”

“而我向您介绍的，只有唯一的也是最后的条件，那就是无条件投降。”

克列勃斯将军和他的副官，从表面上看还是沉着冷静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

我再次强调：

“我们担保你们的生命安全。至于政府问题，那让我们以后再说吧！你们没有军队，但你们还想拼凑一些力量，那办不到！”

电话铃又响了。方面军司令员打来电话，想了解一下谈判的情况。我说，这些德国人没有通信工具。关于希特勒的死以及希特勒的遗嘱，他们不想公布于众。因为害怕希姆莱借机利用。此外，看来他们对邓尼茨也存有戒心。他们想在我们的协助下，在暂时停战之后再将希特勒之事公布于众。

我放下听筒，又对克列勃斯说：

“那些希望别人承认新政府的人，有一条最好的出路，那就是投降。”

“全面投降？”克列勃斯问道。

“全面投降，到那时我就可以同新政府的成员们举行会谈啦！”

克列勃斯摇晃着脑袋表示反对：

“我无权宣布投降。如果那么做，我们的政府会被毁掉的。”在说话中，一会儿讲德语，一会儿又讲俄语。

“可是炮弹不长眼睛，认不出谁是当兵的，谁是政府成员。”我提醒他。

克列勃斯又晃起了脑袋，他用俄语说：

“为了缔结和约着想，我感到不安。”

“我们与盟国都坚持共同的要求——无条件投降。”

这回克列勃斯的话音已经十分激动了，他说：

“合法的政府才能决定全面的、有效的投降。如果戈培尔没有同你们协商好，那结果又会怎样呢？你们应当拒绝叛逆者希姆莱的政府，而承认一个合法的政府。战争问题，大局已定，结果如何，应当同元首指定的政府共同解决。”

“应当把你们元首的意愿向军队公布。”我提醒他说。

克列勃斯发火了，他讲俄语时几乎喊起来：

“变节分子，叛逆者希姆莱会把新政府成员统统消灭掉的。”

吓成了这个样子！我不由得暗自好笑。这些人光想到自己。

我真想到外面去走一走。现在正值春季，外面春光明媚。我们却坐在这里遭受疲惫之苦。这几个德国人正在小声地彼此嘀咕。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这时乘车赶来。我向他汇报了谈判的经过。索科洛夫斯基听完之后，即开始亲自提问克列勃斯。下面是我回忆起来的他们对话的内容：

索科洛夫斯基（问克列勃斯）：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公布希特勒和希姆莱之事？

克列勃斯：当我们同你们达成关于新政府协议之后，我们就公布。

索科洛夫斯基：方面军司令员认为，元首应当宣布希姆莱为变节者，以便使他的打算不能实现。

克列勃斯（活跃起来）：十分聪明的倡议。这一点可以马上去做。当然，这还要取得戈培尔博士的同意。我再次请求让我把副官派回到他那里。

我插话：“应当转告希姆莱，在你们投降之前，成立新政府是不可能的。”

克列勃斯：让我们先休战，成立起政府。

我又插话：“那也要在你们全面投降之后。”

克列勃斯：不。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那里有戈培尔和其他人。因此，你们完全能够宣布投降。

克列勃斯：这要取得邓尼茨的同意才行。而他现在不在柏林。一旦宣布休战，我们最好能够派鲍尔曼去邓尼茨那里。我这里既没有飞机，也没有电台。

这时，空气顿时紧张起来。

我说：“你们放下武器，我们才能继续谈下去。”

克列勃斯：不，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要求在柏林停战。

我问道：“你们有密码，代号以及其它类似的东西吗？”

克列勃斯：这些东西在希姆莱那里。

（这时，我与索科洛夫斯基不由地交换了一下眼色）。克列勃斯继续说下去：“如果你们允许休战，我们之间会达成协议的。”

我说：“那也只能以你们投降为基础。在这之后，邓尼茨完全可前来谈判，就如同你们已经做过那样。”

克列勃斯：应当把邓尼茨叫到这里来。请给他通行条件。

索科洛夫斯基：希望你们投降，到那时，我们立即给他放行。

克列勃斯：我无权决定这个问题。

我说：“希望你们尽快投降，那时我们会安排好邓尼茨前来的各项事宜的。”

克列勃斯：应首先同邓尼茨取得联系，而后再谈投降。我没有邓尼茨的

允许，不能擅自这样做。（他想了一下）不过，我总是能够把这个问题提交戈培尔考虑。（他指着他的副官）我希望您把这位上校派到他那里去。

索科洛夫斯基：就是说，我们之间达成了一项这样的协议：德军上校前往戈培尔博士那里，目的是了解是否同意尽快投降。

克列勃斯（中间插话）：是停战呢？还是在停战前要求戈培尔同意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允许向戈培尔问及停战的问题。

克列勃斯（又表示反对）：没有邓尼茨，无论是我，还是戈培尔，都不能允许投降。

我说：“那你们也组成不了政府。”

克列勃斯：不，还是先组织政府，然后再解决投降问题。

索科洛夫斯基走到隔壁房间，打电话给方面军司令员。他报告说：

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说，没有邓尼茨的允许，他们不能够投降。而邓尼茨似乎对当前的事件全无所知。克列勃斯要求把全部事情都告诉邓尼茨，到那时好像就会产生决定了。他要求派他的副官先到戈培尔那里。然后，如果有可能的话再派一个人去邓尼茨那里。乘汽车去梅克伦堡，再赶回来，来回大约有400多公里。他提议也派一名我们的军官到那里去：邓尼茨可以在前线等候他。总之，这要拖很长的时间。我们暂时只同意派一个人到戈培尔那里。

我接受了朱可夫的指示后，又回到克列勃斯这里。

克列勃斯：我们可以到外面方便一下吗？

我说：“请吧！”

克列勃斯和他的副官走出房间。没过一会儿，他们就返回房间。

克列勃斯的副官出发到戈培尔那里。我打电话给参谋长。吩咐他们要保障这个上校通行，同时要安排我军前沿上的一个营与德军的一个营取得联系，以此来沟通戈培尔同我们的联系。

“德国政府应该是有权威的政府”克列勃斯突然说。

我说：“当今德国已经彻底战败，你认为希特勒还会有什么威望吗？”

克列勃斯伤心地说：

“你们已经看到我们所经受的苦难。元首的威望可能降低，但是仍旧是很高的。他所拟定的措施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改变的。新的人选和新的政府都要以希特勒的威望为基础。

真是狂热已极。讲起来还是一本正经的，外表上也是满神气的：将军服的上衣，缀着红色镶金纽扣、配着窄窄的肩章，1941年冬战功绶带、勋章、铁十字架章……

他继续讲下去：“基础还可能更为广泛，更为民主。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们希望保存自己，假如英国和法国把资本主义制度那套强加于我们，那将是很遭的。”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想消灭德国人民，但是我们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存在。我们不想把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消灭掉，可是必须把这个组织解散。德国的新政府应该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克列勃斯：我想，我也相信，只有一位领袖不愿意消灭德国，那就是斯大林。他曾说过苏联不可能，也不应该消灭德国。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可

是我们害怕英、美国消灭德国的计划。如果他们放开双手对待我们，那是很可怕的。

我问道：“那希姆莱呢？”

克列勃斯：请恕我直言。希姆莱的想法是，德国军队还是一支有实力的军队，可以对付东方。他把这个想法已经告诉了你们的盟国，这一点，我们是清楚的，完全清楚。

我说：“将军先生，那我们对您那种固执态度就很难理解了。柏林还在进行战斗，这是白白地流血。”克列勃斯：克劳塞维茨曾经说过，屈从不如战死。希特勒的自杀，是因为他不想失去德国人民对他的敬重。

这是自杀者的逻辑。我们向这位将军再次询问了希特勒自杀的详情。

克列勃斯：当时有好几个见证人：戈培尔、鲍尔曼和我。遵照遗嘱，他的尸体被浇上汽油烧掉了。元首临终前向我们诀别。我们曾劝说过他，但是他决心已定。我们还曾劝他突围，转移到西线……

克列勃斯的话未讲完，电话铃响了。这时正是9时45分。苏联政府作了最后的答复：要求德军或者全面投降，或者柏林守军投降。如果德军拒绝，定于10时40分再次对柏林城实施炮击。我将此事告诉克列勃斯。

他回答说：“我未受权这样做。看来还要继续打仗，而结果将是可怕的。柏林投降也是不可能的。没有邓尼茨的允许，戈培尔是不会同意投降的。这是很大的不幸。”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不会进行停战，也不会单独举行谈判。为什么戈培尔自己不能做出决定呢？

克列勃斯（不厌其烦地再三重谈老调）：如果我们宣布柏林全面投降，那都会知道，希特勒已经死去。而我们希望建立新政府，让一切事情有组织地进行。

索科洛夫斯基：就让戈培尔宣布……

克列勃斯（打断对方的谈话）：可是邓尼茨是非党人员。他可以轻易决定问题。但愿他也能投降，以便避免无谓的牺牲。

索科洛夫斯基：希望你们投降，那时你们便可以宣布新政府成立。为此，在柏林我们可以提供电台。希望你们也能因我们盟国的政府取得联系。

克列勃斯：是的，看来戈培尔只能走这一步了。那么我能到他那里去吗？

索科洛夫斯基，您可以去。我们可以开门见山地对您讲：你们已处于绝境。连戈培尔和邓尼茨之间甚至无法联系。柏林投降之后，我们可以向你们提供飞机或汽车，并安排无线电通信。

克列勃斯：全把我们全拘捕吗？所有负责投降的军人都会得到自由吗？我们会不会按被俘人员待遇？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还不知道盟国政府怎样决定。

克列勃斯：我再问一句：投降之后，我们将受到什么待遇？

索科洛夫斯基：我保证新的临时政府成员有权利与盟国政府公开接触。三个盟国政府将共同决定问题。我再重复一遍，到时候会向你们宣布。

克列勃斯：我想要知道，戈培尔在想什么。需要把柏林投降的具体方案告诉他。

索科洛夫斯基，你们将在三个盟国面前表态。因为希特勒已死。你们可以行使全权了。

克列勃斯：我们何时得到通信工具？



他已经紧张起来。已经是 10 时 40 分。我们已经开始炮火准备，飞机从上空掠过。

这时德国的翻译返回来了。他原是同德国上校冯·杜芬格以及我们的通信人员一起走的。我们的通信人员是为了去沟通帝国办公厅的直通电话。这个德国翻译回来时情绪非常慌张。他说：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喊：不要开枪，我们是谈判代表！我们的人没有给我回话。俄国少校在架设电话线。在太子街的拐角他被德方射来的子弹击中，伤了头部。我大声喊叫，让他们不要打枪。我只好自己架线。上校冯·杜芬格脱下大衣，摘下武器，手持一面白旗往前走。枪声还没有停止。有几名俄国官兵负了伤（一名连长也负了伤）。当时他们站立在不远的地方等待通信联络。但是一直联系不通。俄国军队方面已经接通，可是我们那边却接不通，我们那里的战斗组没有得到通知。怎么办呢？继续等待联络，还是等待上校返回？俄国人说，从他们方面可以保障上校顺利通行。”

“回去吧，保障上校返回”克列勃斯吩咐说，又问道：“谁打的枪？”

“可能是步枪射手。俄国少校快要死了，真遗憾。”

我们在地图上找太子街。我们仔细看。

“这是‘精益’大饭店”翻译用手指着说，“我们边喊，我们的射手还向我们开枪，在全地段上俄国人都没打枪。”

我们在地图上给三个街区作了标记。我军的一个营打来电话说，德国少校已经回到德国人那里，可是还没有同他联系上。

“你走吧！”我对翻译说。

他要求给他一个麦克风和一面小白旗。

他拿到这些东西之后，抬起一支胳膊，躬身向我们行了一个礼，麻利地转过身去，走了。

炮兵司令员波让尔斯基将军下令停止对 35 号地区（从湖泊至动物园，延伸至腓特烈大街）炮击；谈判代表将从这里通过。

过了不一会儿，克列勃斯说：

“在我们这里，5 月 1 日是个盛大的节日。今天我们要大庆一番，因为战争结束了，俄国人打到柏林。1941 年我曾在莫斯科。我讲过，我有幸担任副武官。在阅兵时，我站在观礼台上，靠近列宁墓……”

早饭之后，与帝国办公厅沟通了电话。克列勃斯将军精神振作起来。他要求准确地记住苏联政府提出的德国投降的全部要点。他拿起听筒开始讲话。他特别强调一个要点：即要通过电台宣布希姆莱叛逆。戈培尔回答说，要克列勃斯将军返回，回来后再同他一起商量。我们同意了。

接着克列勃斯把他方才记下来的我们提出来要德国投降的具体条件又念了一遍：

- “1. 柏林投降；
2. 凡是投降者均应放下武器；
3. 保证官兵的生命安全；
4. 对伤员给予治疗；
5. 为与盟国通过无线电进行谈判提供条件。”

我们当时还向他讲明：

你们的政府将被允许宣布希特勒已死，希姆莱已背叛；向苏、美、英三国宣布全面投降。这样，我们也部分地满足了你们提出的要求。那么我们是

否同意你们建立政府呢？不同意，不过，我们将同意你们列出一个名单，写明哪些人将不以俘虏的身份出现，还将允许你们在投降之后向盟国发一个声明。这些国家将决定你们政府今后的命运。

“我将交给你们的这个关于柏林人员的名单，会不会被认为是战俘名单？”

“这一点可以保证。我们将允许军官保持军衔、勋章并保存冷兵器。我们将给予你们提出政府成员名单的权力以及同邓尼茨进行联系的权力，等等。但所有这一切，必须在你们投降之后才可以。”

“是不是为了组成一个完全合法的德国政府？”

“只是为了把事情公布于众并同我们的盟国政府取得联系，至于以后怎么办，那就由他们决定了。”

“就是说，德国投降之后，苏联的无线电台将把希特勒之死，新政府之事以及希姆莱之背叛等消息统统公布于众，是不是？”

他保证，关于上述各项，他将尽力从速达成协议。

已是 13 时零 8 分。

克列勃斯走了。结果是，第三帝国领导人派出的谈判代表未能同意投降，他不愿意把柏林从毁灭中挽救出来，也不愿意结束双方（包括和平居民）毫无意义的牺牲。

克列勃斯此行，原打算从苏军指挥部和苏联政府手里得到什么呢？他在临离开之前，不知为什么老是磨蹭，已经走下楼梯，甚至还两次借口返回：第一次返回，说什么回来取手套，说把手套和军帽一起忘在了窗台上，可是帽子明明戴在他头上，而他根本没有拿手套；第二次返回，说是把军用提包忘在这里了，说那只提包在来的时候是装戈培尔和鲍尔曼的文件的，可是我明明看着那些文件是从他右侧衣袋里掏出来的。

从克列勃斯的神态和举止上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举棋不定，犹豫不决：是返回坐等待毙，还是主动先俯首投降。可能他是在等待，等我们把他的收为俘虏。那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

可是，我们要这样一个俘虏有什么用？倒不如让他返回去。他回去后，对于停止继续流血，还可能产生点儿影响。

那么克列勃斯在我们这里得到了什么呢？毫无疑问，他前来是为了完成戈培尔和鲍尔曼的意愿的。当然，这也是他本人的意愿。他们本打算利用“希特勒之死”这条消息来缓和一下苏联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矛盾。就是说，主要罪魁既然已经火化，那么德国对千百万人牺牲所负的责任，就可以一笔勾销了。其实，这远远不够，而且也不是主要的。

要害之点在于，希特勒的那些刽子手们（包括希特勒本人在内）死到临头时，还指望加深我国和盟国之间的矛盾。

当然，我们之间的某些分歧是存在的。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可是反希特勒联盟各国的人民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敌人，他们正努力设法尽快把敌人消灭掉。

关于这一点，第三帝国的领导人，包括西方的某种人，是不了解，也是未曾考虑到。他们还在反希特勒联盟内部寻找裂痕。但是并没有找到。

克列勃斯在我们这里总共度过了大约一天半的时间，他看到，我们对于盟国所承担的义务是始终不渝的。相反，我们向他表明，坚决信守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的决议。同时，戈林和希姆莱在盟国的活动也没有取得成果。

克列勃斯将军无疑是一名老侦探，一个经验丰富的外交家，可是这回却两手空空地回去了。很显然，这是企图在盟国间制造分裂的最后一次行动了。戈培尔及其同伙遭到失败之后，肯定会做出某种决定的。

已经发出命令：动用最大的火力，尽快打败敌人。成千上万发炮弹一齐飞向政府街区、帝国办公厅、国会大厦。

由于这次突击力量强大，组织充分，很快取得成效。我军各部队捷报频传。

近卫步兵第 28 军军长里若夫将军报告说，他的部队正处动物园中央，现在正顺利地向北发展进攻，即将与波格丹诺夫的坦克集团军会师。

近卫步兵第 74 师师长巴康诺夫传来喜讯，他的部队已经夺占了波茨坦火车站。

最后得到消息，克列勃斯将军已经顺利通过前线。大概他现在正向戈培尔和鲍尔曼进行汇报呢。

波让尔斯基将军走进来报告说：

“我的令部队只准进行直瞄射击。”

他的决定是对的。应当对目测清楚的目标进行射击。应当保存住房，因为将来对居民是用得着的。

送来报告说，不少德军官兵纷纷放下武器自愿投降。

我总算在沙发上躺下来。闭上眼睛，但是脑子却安静不下来。因为有重任在身，放心不下。电话铃一响，马上就又拿起听筒。里诺夫将军向我报告：

“我部队战士在动物园以北已经进入瑞典使馆区。大使要求保护，哪怕派几名战士去也好。人们对红军的勇敢精神十分钦佩，使馆的成员们现在都躲在防空洞里，对一切都还满意。”

我指示说：

“要瑞典人放心，要派警卫去，要讲礼貌！”

1945 年 5 月 1 日，我们是在战斗中度过的。人们得不到睡眠和休息，可是换来的却是举国欢腾，苏联人民和祖国的莫斯科以及其它城乡各地都欢天喜地。

5 月 2 日 1 时 45 分。虽然绝大部分地区战斗已经结束，可是还能听到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

有人送来一封公文。公文封面盖有“瑞典王国大使馆”的印章(瑞典文)。行文是用俄文写的：“司令官将军阁下：

今吾等敬请关照。瑞典王国址：帝国大街第 1、3、25 号及蒂尔加滕大街第 36 号。瑞典教堂址：柏林，威尔默斯多夫区，别墅大街第 27 号。

敬请苏联军事当局能使我们大使馆继续行使保护瑞典公民及财产之职权。

如能与红军卫戍区代表洽谈，吾当不胜感激。

敬候贵之惠复。据悉，瑞典王国使馆至今处于苏军的保护之中。

1945 年 5 月 1 日于柏林。

代办古果·埃里伐格特”

我委派司令部的一名参谋，带一份声明去瑞典大使馆，向其保证，我集

团军指挥部对于瑞典外交代办的来信已给予应有的注意，并保证对使馆行使其职权给予充分的协助。

战斗虽仍在进行，但是已经是稀稀拉拉，时断时续。我也疲乏得站不住了。

电话铃又响了。近卫步兵第 47 师报告：派往波茨坦大桥的我司令部的军官在那里已与德军代表见面。德军上校冯·杜芬格是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他说，他们受军长魏德林的委托向苏联当局宣布魏德林的决定，他已命令坦克第 56 军的部队停止抵抗，缴械投降。同时，冯·杜芬格上校还交出一份文件，内容是：

“坦克第 56 军军长。

指挥所 1945 年 5 月 1 日。

总参谋部上校军官冯·杜芬格，现为坦克第 56 军参谋长。他受权代表我本人和我所辖之部队传达我们的声明。

炮兵将军魏德林。

近卫步兵第 47 师代理师长谢姆钦科上校问冯·杜芬格上校：“你军指挥部在收交武器以及向苏军当局转递该军所属各部队的人员和装备，共需多少时间？”

冯·杜芬格回答说，必须 3—4 个小时。同时，他们尽量利用夜间行动。因为戈培尔曾经下令，对于企图向俄国人投降者，应立即正法。

我当即下命：

“让冯·杜芬格上校返回魏德林将军那里，并带去一份纳降书，把两名德军少校留下。”

在等候结果的时候，我开始打盹了。5 时 50 分电话铃把我吵醒，报告说，戈培尔派来了谈判代表。我从沙发上跳起来，匆忙用冷水擦了一把脸。

共有 3 名代表，均着便服，另有头戴钢盔的一名士兵，手持一面白旗。我吩咐士兵出去。3 名代表中，有一名是政府宣传部的参议海涅尔斯多夫。我问道：“你们为何而来，有什么要求？”海涅尔斯多夫交给我一封装在粉红色信封里的一封信。

我打开信来看。信的内容是：

“克列勃斯将军已向您告知，原帝国总理希特勒已洁身自杀。戈培尔博士也已不在人世。我做为一个幸存者，恳求您把柏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我的名字为人所知。宣传部部长弗里茨博士”我阅读这封信时，不由得力事件发展的速度所震惊，事态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变化：继希特勒之后，戈培尔死去了；戈培尔死后，还有谁会死去？不管是谁在那里起作用，反正战争已至尾声。我问道：

“戈培尔博士什么时候自杀的？”

“晚间。”

“尸体在哪里？”

“烧掉了。是他的随身副官和司机烧的。”

真有意思，希特勒也是烧掉的。第三帝国的刽子手们把火烧当成清洗他们在人世间所犯罪孽的一种手段了。

“陆军总参谋长克列勃斯现在在哪里？昨天他还受戈培尔之托同我们进

行谈判呢！”

“不知道。我们只知道有一个新任总参谋长艾因斯多夫。”（后来才知道，克列勃斯自杀了）。

“你们知道我们的条件吗？我们只谈无条件投降问题。”

“是的，知道。我们正是为此而来。我们是来提供帮助的。”

“你们想替你们本国人民做些什么？”

“弗里茨博士请求让他通过无线电台向德国人民和军队讲讲话，以使停止无谓的流血和接受无条件投降。”

“军队会执行弗里茨的命令吗？”

“他是全德国的知名人士，他在柏林特别为人所知，他请求在柏林通过无线电台发表讲话。”

电话铃响了，格拉祖诺夫将军从近卫步兵第47师指挥所打来电话，他报告说，从第一线传来消息，在那里已经看到，德军部队正在编为纵队。

我们向德军的军司令部派出了军官格鲁申科，另带两名侦察员。格鲁申科为了接送杜芬格和我们的通信人员，一昼夜之内三入敌境，中间曾被子弹打伤，但仍坚持执行任务。他现在在魏德林那里。

5月2日6时，坦克第56军军长炮兵将军魏德林在其司令部的两名将军的陪同下越过前线，缴械投诚。魏德林供称，他还同时兼任柏林城防司令。他是6日之前接任该职的。

近卫步兵第47师师长谢姆钦科曾向魏德林提问，该军的投降是否曾得到戈培尔的同意。魏德林回答说，他们的投降是未经戈培尔的同意而自行决定的。

我命令格拉祖诺夫将军在该军的整个地段上停火，并把魏德林解送到我这里来。

我对弗里茨派来的代表说：

“你们和弗里茨是否知道柏林守军已经投降？”

他们回答说，他们乘车前来的时候，还什么也不知道。

“现在德国军队在前线各地段上正纷纷投降。鲍尔曼在哪里？”

“他大概曾在希特勒办公厅。那里发生过一次煤气爆炸。鲍尔曼和戈培尔的全家死亡。”

我于是给朱可夫元帅挂电话向他汇报弗里茨派代表前来的目的。

朱可夫在电话里问我：“如果让弗里茨通过电台向德国人民发表讲话，能保证讲话内容不出问题吗？”

我回答说，能够保证，不过应当加以监督和控制。我们会做好安排的。

过了几分钟，朱可夫打来电话，作了答复。我与弗里茨的代表经过谈判之后，当即向在场的人（主要是对弗里茨的代表）宣布了以下几点：

“第一，苏联军事当局接纳柏林守军投降并命令停止军事行动；

第二，现在的德国军事当局和民政当局应当向全体居民和军队的全体官兵宣布，一切军用物质、建筑物、市政设施以及公共财产都应妥善保管，不得炸毁和破坏；

第三，您，海涅尔斯多夫先生应会同我们派去的军官一起前往弗里茨博士那里，再带他一起前往无线电台发表讲话，尔后你们都转到我这里来；

第四，我再次强调，我们定会保证你们军队官兵和将军们以及居民的生命安全并尽可能治疗伤员；

第五，我们要求，德军方面应杜绝一切挑衅行为，如打枪、破坏之类的行动，否则我军将被迫采取回击的措施。”

这时，海涅尔多夫要求保护他们宣传部的同僚。

我说：“凡是自愿放下武器，对苏联人不再表现敌对行为的人，只管放心。不会动他一根汗毛的。”

维加切夫上校前来见我，并带来翻译近卫军准尉茹拉符列夫。

我向维加切夫交待任务：

“你们带领海涅尔多夫去找汉斯·弗里茨博士。弗里茨将代表德国政府向军队发布一道命令，令军队投降，并要求军队携带全部装备和技术兵器向苏军缴械。让弗里茨通过电台向他们的全体人员发表广播讲话，说明苏联当局已经纳降，并把柏林及其守军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你们要保障好弗里茨前往我们无线电台工作，并要安排好监督工作，以保证弗里茨的讲话能符合我们的要求。当弗里茨进行广播讲话之后，要把他以及他的随身助手带到我这里来，以便在这里商谈下一步行动。明白吗？”

我讲完之后，维加切夫上校和茹拉符列夫以及德军的几名代表走向大门，准备出发。

他们在门口恰恰碰上了魏德林。魏德林向这些德国人瞟了两眼，接着说：

“早就该这么做！”

跟魏德林没有谈很久。

魏德林是中等身材，戴一副眼镜，有些枯瘦，但精力充沛。

我问他：

“您在指挥着柏林守备部队吗？”

“是的。”

“克列勃斯在哪里？他向您讲过什么？”

“我是昨天在帝国办公厅见到他的。我估计他会自杀的。开始，他责备我不该从昨天开始投降。今天关于投降的命令已经发到第56坦克军。克列勃斯、戈培尔和鲍尔曼昨天拒绝投降。可是不久克列勃斯改变了主张，他认为苏军合围十分坚固，反对戈培尔的主张，决定停止无谓的流血。我再次重申，我已命令我的坦克军投诚。”

“那么柏林守备部队呢？您的指挥对他们产生作用吗？”

“昨天晚上我下令停止抵抗，可是……后来又下了别的一道命令……”

我感觉到，德国人确实慌了手脚。魏德林在德军地图上向我们指明了他的司令部的的位置以及坦克军各部队、人民冲锋队等等的配置地点，预定6时这些部队开始投降。

索科洛夫斯基将军走进来，于是我们三个人交谈起来。

“希特勒和戈培尔的情况怎么样？”

“据我所知，戈培尔及其全家想必是自杀了。元首于4月30日服毒，他的妻子也服了毒。”

“是您亲眼所见，还是听说的？”

“30号那天傍晚我在帝国办公厅。这消息是克列勃斯、鲍尔曼和戈培尔告诉我的。”

“就是说，战争结束啦，是不是？”

“我认为，每一点无谓的牺牲都是犯罪，都是疯狂。”

“你说的对。您在军队很久了吗？”

“从1911年开始的，起初是一名士兵。”

“您应该下达全面投降的命令”索科洛夫斯基说。

“我不能对全部军队下达投降的命令，因为有的尚无联系”魏德林解释说，“因此，有些地方个别的部队还可能进行抵抗。很多人还不知道元首已死的消息，因为戈培尔博士禁止宣布这条消息。”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已经完全停止军事行动，甚至撤走了航空兵。难道您不了解这些情况吗？你们的军队纷纷开始投降。从这之后，弗里茨派来了身着便衣的代表宣布投降。我们为了保证投降的顺利进行而停了火。

“我很愿意敦促我军停止军事行动。”

他告诉了我们，哪里还有法西斯党卫军部队。

“这些部队企图向北突围”魏德林说，“对于他们，我无权指挥。”

索科洛夫斯基：请您下达全面投降的命令吧，哪怕先在个别地段上停止抵抗也好。

“我军已经没有弹药。因此，抵抗不会持续很久的。”

索科洛夫斯基：这一点，我们不知道。不过还是请您写一道全面投降的命令吧。这样做您也就问心无愧了。

魏德林开始在草拟命令。在场的其他人小声地交谈着，魏德林不停地在写。

“您是否需要您的助手？”我问他。

“噢，是的，是的！这样就会方便得多啦！”这位将军高兴地说。

我吩咐把德军坦克第56军参谋长叫来。来人身材高大，漆黑的头发，分头发型梳得整整齐齐，脸上接着一只单片眼镜，手上戴一双灰色手套，是个衣着讲究，注重修饰的家伙。德国人在交头接耳。只有魏德林一只手扶着头，边写边思考。我仔细打量着魏德林。他的头发向后梳起，显得整齐光亮，一派典型的德国人打扮。魏德林默默地把一张纸交给我。我们看看内容，从格式上看，有点不太象样。当然，事到如今，他也讲不得什么格式了。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4月30日元首自杀，遂将我们这些誓死效忠于他的人遗弃。按元首之命，原是令我们，德国军队，不顾弹药之枯竭，不顾再战无望之困境，仍坚守柏林。

现我命令：立即停止抵抗。

原柏林防区司令、炮兵将军，魏德林。”

“请不要说‘原’柏林防区司令吧，您现在还是司令嘛！”

索科洛夫斯基更正了一句。

“需要提‘效忠’的字眼吗？”波让尔斯基提出异议。

“不需要再改啦！”我说“因为这是他本人发的命令。”

魏德林表现为难。他说，不知道写“命令”，还是写“号召。”

“写‘命令’”我说。

“需要翻印多少份？”翻译问道。

“12份，不，越多越好。”

“我的司令部规模相当大，”魏德林说。“我有两个参谋长。另外这里还有两个退休的将军，他们两人前来投奔我，自愿在我的手下服役。他们两人可以协助安排投降事宜。”

送来了茶点。我们把德国人安顿在一个单独的房间里，给他们送去饭菜。

索科洛夫斯基、特科钦柯、普罗宁、巴音卢布、波让尔斯基和我又集聚在一起分析研究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魏德林精神有点不正常，你们注意了没有？”我问道。

“是的，他处境艰难嘛！”索科洛夫斯基说。

“那是当然啦！”普罗宁同意这个看法，“不过，他在命令中搞了名堂。他强调效忠与责任两个方面，似乎天衣无缝。他不是政府里的人，只不过是块‘招牌’而已。”有人报告，说命令已经印好。我对集团军参谋长别良夫斯基说：

“派一辆车，再派去我们的一名军官，随德国人一起去，让他们把命令拿在手里，乘车沿大街向德军部队和居民宣读。”

早晨，天空有些阴沉沉的。不过大家心情很好，抽烟、开玩笑，想起了斯大林格勒。

11时30分。

副官报告：弗里茨乘着一辆自行火炮车来了。弗里茨走进屋来，他个子不高，身穿一件灰色大衣，戴一副眼镜。一边走路一边还在看文件。他默默地坐下来，翻译坐在旁边。

弗里茨也接受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不管他情愿不情愿，这已经是谈判的必然结果。

索科洛夫斯基（对弗里茨）：我们关心的是，柏林要保持平静。对那些担心自己安全的人，我们可以派警卫。

弗里茨：德国警察部门已经逃散，不过还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对警察不感兴趣。可以把他们编在战俘里。我们对行政当局的官员感到关切。不能让他们受损失，懂吗？

“我不懂。有谁，会在什么地方造成损失？谁会有意产生越轨行为？”

索科洛夫斯基：“由于过去‘盖世大保’作恶多端，因此我们的个别军人以及德国居民出于愤恨，可能对他们使用暴力。”

弗里茨：是的，这是可能的。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这里把一切都预先安排好了，都已公布于众。现在柏林市警备司令是别尔扎林将军。我们还建立了区的警备处。他们将颁布一些具体措施。您还有别的事情吗？

弗里茨：我曾经作为政府的最后一位有重要身份的代表，曾经给您写过一封信。我那封信的意思，原是希望能防止继续流血。

索科洛夫斯基：我们对于您那次被迫做出的一种姿态，是理解的。

弗里茨：我想散发文件，为此我需要同邓尼茨取得联系。

“在早晨10点钟，”我说“邓尼茨向德国军队和人民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已经掌握了领导权，他将同布尔什维克主义斗争到底，如果美国人和英国出面拦阻，也将同他们斗争到底。邓尼茨是吓不住我们的！”

弗里茨：这一点，我原是不知道的。

我们最后约定了投降条件之后，便与弗里茨分子。这时大家都在心中暗想：这个人是不是弗里茨，这家伙是不是冒名顶替的？

敌人虽然已经被打倒，但总还是令人感到不太放心。

我大声推论说：“希姆莱与西方谈判，结果被邓尼茨宣布为叛逆。现在虽然只是柏林单独投降，可是总的来说敌人是被我们搞垮了。假如戈培尔当勾想投靠我们，那他们内部便更是分崩离析、腐败不堪了。”



当大家从我的话音中听出来是对邓尼茨的讽刺挖苦时，便顿时哄堂大笑起来。

电话铃响了。集团军参谋长报告说，柏林已经平静下来。

我把这一情况告诉了指挥所里在场的所有的人。

“战争就要结束了。”索科洛夫斯基激动地说。

到中午时，柏林守备部队投降。我们走到大街上，周围一片宁静。这反而使我们感到不太习惯。由于不习惯，总觉得宁静之中还有响声似的。

战争结束了。

